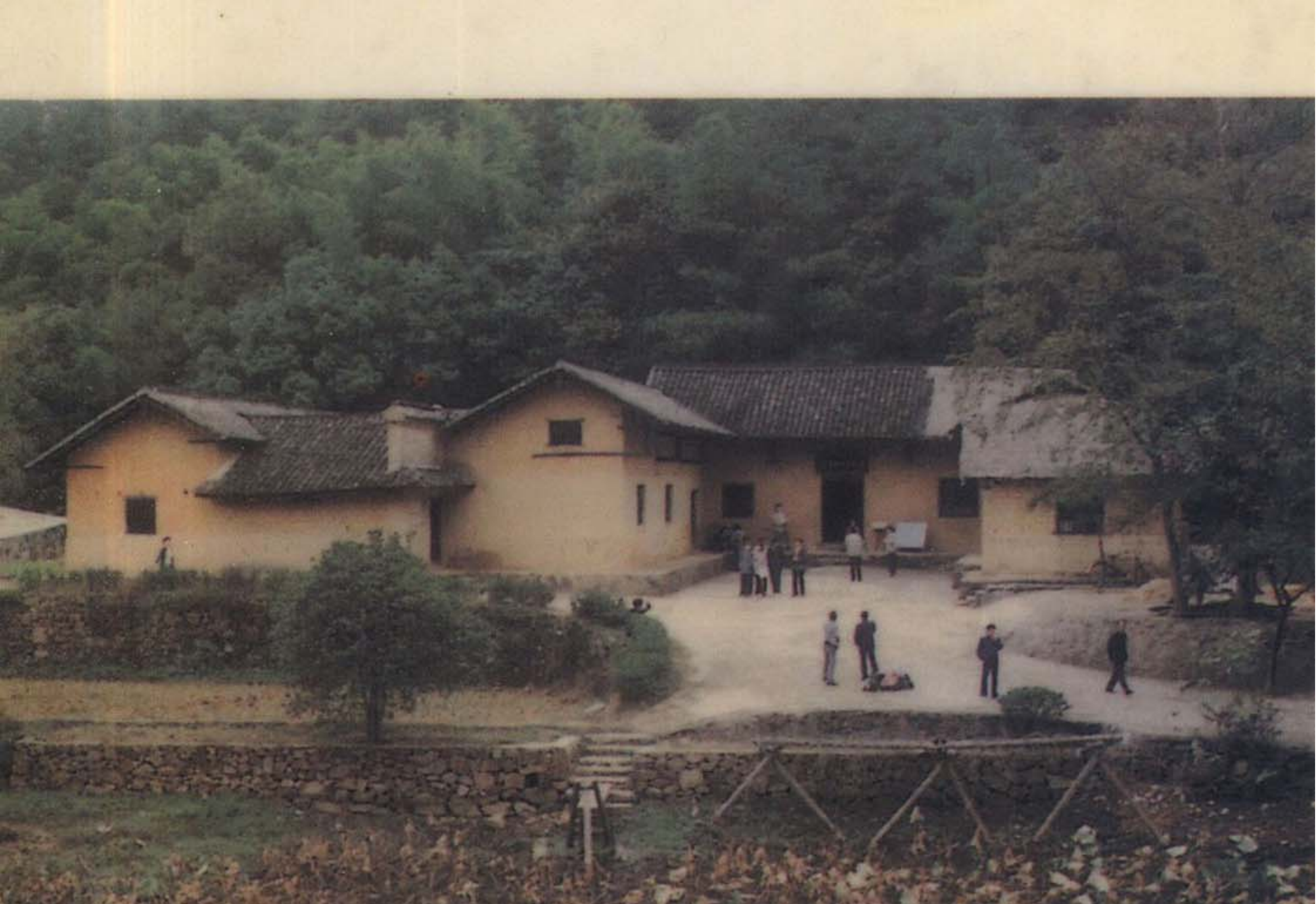
形形色色的造反

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

徐友漁 著



本書力圖通過紅衛兵精神素質的研究以揭示紅衛兵運動的種種特點：例如造反的行動模式、派系形成和地區差異，以及紅衛兵思想的類型及文革前後變遷的趨勢等等。本書作者為紅衛兵的同齡人，通過大量訪問、文獻調研積累了有關研究的第一手資料。目前基於口述資料和個案調研以分析紅衛兵心態形成的研究還很少見。因此本書對這方面的研究者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作者徐友漁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1947年生，長期從事哲學和文革研究，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精神生成語言》等書；並發表過〈西方學者對中國文革的研究〉、〈再說文革中的造反派〉、〈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行為動因的調查和分析〉等論文。

ISBN 962-201-89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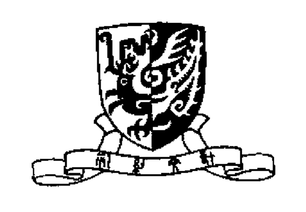
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專刊（三）

形形色色的造反

——紅衞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

徐友漁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設計、編輯及
製作，並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201–894–7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cupress/w1.htm

Rebels of All Stripes: A Study of Red Guard Mentalities (in Chinese)
By Xu You-yu

ISBN: 962–201–894–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http://www.cuhk.edu.hk/cupress/w1.htm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　錄

第一章
導論：目的、方法、主要結論

1976年，身患重病、面臨死亡的毛澤東召見華國鋒、江青等人，向他們就自己一生業績作了一番總結。他說，他一輩子就幹了兩件事，一是打敗了蔣介石，二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對於第一件事，他自信持異議者不多；對於第二件事，他既清醒又悲觀地說，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從研究毛澤東的歷史作用和個人業績的角度看，他幹的第二件事更令人感興趣。這是因為，中共在國共之爭中獲勝，毛的作用在中共領袖中固然是突出和關鍵性的，但為中共勝利作出貢獻的還有許多人。最近的材料表明，許多原先記在毛名下的功勞實際上應歸於別人。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則明顯地只打上了毛澤東個人的印記。準確地說，奪得政權是中共的集體業績，而文革則是毛澤東的個人事業(雖然單憑他個人也搞不起文革，就此而言文革的罪責不能僅由他一人承擔)。另一個使人對文革更感興趣的原因是，雖然中共奪取政權無論在近代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重大事件，但在中國歷史上卻不乏這樣的先例：一批在社會主導地位之

外的知識份子領導農民戰爭，推翻了以儒家思想為意識形態，以地主階級為社會基礎的政權，實現改朝換代。而文革，不論從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史的角度看，都是空前的，而且很可能是絕後的。如果說毛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可以勉強以反帝、反封建為旗幟的話，那麼只有文革才呈現了毛反文化、反現代化的性格。

研究文革的目的顯然不應僅在於對毛澤東個人的興趣。文革的最終動因是毛的個人意志，而毛發動文革的原因又在於他和執掌中共黨政機構領導權的其他人的關係，在於黨內的政策分歧和權力鬥爭，研究文革就是研究中共的政策特徵和行為特徵。此外，文革使中國近十億人捲入一場混亂和內鬥，中國社會各階層、各集團的人在運動中的表現，與中國人所處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與他們的思想和心理特徵是密不可分的，研究文革也就是研究中國的社會和文化。

不言而喻，研究文革還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比起德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反省和懺悔，日本人的態度使所有的中國人憤怒，因為他們對過去的侵略暴行缺乏認真、負責的反省。但我們亦當自問，對於被我們稱為一場浩劫的文革，我們又作了多少認真的反思呢？文革中的受害者大多數現在還活着，積極參與、狂熱投入的一代人現在正是中國的社會中堅，但文革究竟是怎麼回事，有多少人能夠說出一個所以然呢？也許，對不同的人，文革意味着不同的事，也許，對大多數人而言，文革中的是非恩怨是一筆糊塗賬。在80年代初，中共領導人多次宣稱，中國再也不會發生文革了，但並沒有過多久，在80年代中期，領導層中就有人不斷地掀起大批判式的政治運動。在80年代末，同樣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比文革中更慘痛的血案。兩次事件極為相似，民眾舉行和平請願和示威，官方則誣之為「反革命暴亂」，差別僅在於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流的血要多得多。而更具歷史諷刺意味的是，後一次鎮壓的下令者是第一次事件的受

害者。也許，再不會有億萬人像在文革中那樣發瘋般地搞內鬥了，但誰能擔保這一點呢？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自一個半世紀前的鴉片戰爭始，走過了漫長而曲折的道路，而文革則是在無外患情況下自己搞起來的最激烈的反現代化運動，它使自1949年以來以階級鬥爭為名義而進行的內鬥，對國計民生的危害達到了頂峰，總結這種最極端和觸目驚心的反面事件，對於中國今後的現代化建設是有益的。現在才開始作系統研究顯然為時已晚，但對於有健忘症的中國人，對於中國令人憂慮的未來，這項工作永遠也不會太遲。

一　研究紅衛兵是研究文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書的研究對象是紅衛兵，即一度使世界感到惶恐、驚懼的紅衛兵，本書研究紅衛兵在文革中的行為，由於這些行為極其不同尋常(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造反」)，作者將努力揭示他們行為的內在動機和外在原因，本書既把紅衛兵當作形成組織，歸屬於某一派別的群體來研究，又將他們作為單個對象來研究。因此，作者將闡明紅衛兵的派別鬥爭、理論思潮，也將描述他們獨特的心路歷程，說明不同的人是如何狂熱地捲入運動，其中有些人又是如何開始清醒並否定文革的。本書將仔細分析文革在這一代青年身上造成的後果，顯然，文革中罕見的刺激和形勢的戲劇性變化使這一代人獲得十分獨特的經驗，政治運動的狂潮早已退落，但這種經歷在精神上的烙印卻是長期難於消除的，文革將通過這一代人的思想和行為對當前和未來的中國社會產生影響。

作為一項研究，也許有必要首先說明，本書所說的紅衛兵指哪些人，他們一共有多少。有人使用「紅衛兵」一詞，僅指在各地首批

成立組織，從1966年5月底到年底活躍的那批人(在北京被稱為「老兵」即老紅衛兵)，而把後來活躍的更廣大的學生稱為「造反派」。首批紅衛兵中很多人和造反派學生中一些人均這麼使用「紅衛兵」一詞，對於老紅衛兵而言，他們不願把如此高貴和光榮的名稱讓與其他人分享，對於某些造反派而言，「紅衛兵」意味着血統論、「破四舊」①，他們不想承擔這種惡名。但更多的人，包括海外各種人，把所有投入文革運動的青年學生都稱為紅衛兵，這也是中國較為流行的用法，本書取後一種概念。很難說這些人共有多少，哪怕得到一個大致可靠的數字都不可能，我們在這裏只能作粗略估計，以便對這個人群的規模有一個初步的印象。紅衛兵屬於1966年時從初中一年級到大學畢業這十來個年級的大中學(包括中等技術學校等)學生，也包括少量1966年秋季以及以後入學的所謂「新中學生」。由於文革的混亂和破壞，現在無法得到1966年的數字，作為參照的1965年的在校學生數據是：高校67.4萬，各類中學1,431.8萬，小學生11,620.9萬②，以在校學生中約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經常性地投入運動計，紅衛兵的人數下限為一千萬，上限可能為三千萬。事實上，在紅衛兵和非紅衛兵之間，即投入運動的學生和游離於運動之外的所謂「逍遙派」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因此，有的人寧願使用更寬泛的概念「第三代人」③，對本書所說的紅衛兵，也可以做這種廣義的理解。

本書所說的文化大革命，其時間覆蓋長度如何？在中國大陸，人們習慣於說「十年文革」、「十年浩劫」(例如高皋、嚴家其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這也是官方的說法，照此說法，文革發動於1966年5月(標誌為中共中央於5月16日發布的一份綱領性文件，一般稱為「五一六通知」)，結束於1976年10月(標誌為「四人幫」的覆滅)。而西方學者一般把文革的時間界定為從1966年5月到1968年底(紅衛兵退下政治舞台)或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這將近三年的

時間之內（比如看書名《中國學校中的文革，從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April 1969*]④）。在某些情況下，這不僅是簡單的分期問題，而涉及到對於文革評價的理論上的爭論。比如，陳佩華（Anita Chen）在〈清除對於紅衛兵運動的錯誤觀念：重新考察文革派性和分期的必要性〉（"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一文中認為，文革十年說對應於中共官方的解釋模式，它忽視文革中人民的作用，特別是紅衛兵青少年的作用，而文革三年說對應於海外學者「社會衝突論」的解釋模式，這個模式把群眾背景置於中心位置⑤。就研究紅衛兵而言，似乎取三年分期說較好，因為紅衛兵在1968年秋就退出政治舞台，從那時起，絕大多數人被迫上山下鄉。由於本書的研究不限於紅衛兵在三年活躍期內的行為，不僅要追蹤他們脫離運動之後的思想發展變化，而且還要溯源於他們在文革前所受的教育和意識形態灌輸，討論問題的時間幅度大到從50年代至80年代，因此，文革究竟是三年還是十年，就不太重要了。

研究文革，固然需要分析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和意圖，分析中共最高層的權力格局，各派勢力在運動過程中的消長，但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文革遠遠超出了宮廷鬥爭的範圍。人們一提到文革，首先想到的是一場把近十億人捲入其中的群眾運動。文革研究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廣大群眾的參與：他們當時為甚麼會有那麼離奇、狂熱的舉動和心理，這是一個超級魔術師催眠的結果，還是有其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驅使他們處於顛狂狀態，鬥得你死我活的力量，究竟是意識形態，還是個人的切身利益？

研究文革中廣泛的群眾參與，是一個十分龐大複雜的課題。不少學者首先把注意力集中於紅衛兵，這是十分自然的，因為紅衛兵

在群眾運動中首先是起了先鋒作用，而且在相當程度上還起了領導作用。不論從自發的意義還是從被操縱的意義上來說，紅衛兵都是最早動員起來的群體，通過他們的宣傳、串連，運動發展到全國範圍。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工人、農民、其他社會階層和職業集團的人投入運動，是紅衛兵鼓動起來的。在其後的階段，當紅衛兵和工人、農民等在派別組織上形成統一體或結成聯盟時，在大多數情況下起領導作用的仍然是學生。這表現在每一大派群眾組織的行動綱領和戰鬥口號往往由紅衛兵提出，表達本派政治主張的理論也是由紅衛兵制定。在多數情況下，群眾組織與黨、政府、軍隊中的後台(幾乎無例外地一定有後台)的聯絡工作也由紅衛兵擔任。因此，對於在時間和空間上離文革較遠的人而言，紅衛兵和文革幾乎成了同義詞。另一方面，從研究的角度看，以紅衛兵為題材也要容易一些，因為有關學生的材料要比其他材料多得多，而紅衛兵一代人由於最為珍惜自己的那段經歷，採訪起來也容易一些。

這當然不是說，紅衛兵可以作為群眾組織的典型，他們代表了參與運動的所有群眾的行為、思想、社會特徵。一個最大的區別是，就參與運動的動力而言，學生的意識形態因素要大大超過其他群體，而實際利益的考慮要大大弱於其他群體，雖然這兩種因素對所有的參與者都起作用。

就研究文革的影響和後果而言，紅衛兵是各社會集團中最應受到重視的對象。因為，與工人、農民和其他人相比，紅衛兵在文革前後期思想變化最大。他們最敏感，最早、最強烈產生上當受騙的感覺，而且以各種方式把憤懣情緒表達出來。他們的命運受文革影響最大：在運動初期是天之驕子般的「革命小將」，而到後期則被發配到農村——中學生到生產隊、邊疆的生產建設兵團，大學生中許多人到部隊農場。命運改變使得許多人深入了解和研究社會，對政

治和歷史進行思考，因此，文革在他們身上打下的烙印最深。如果說，參與文革這段經歷對所有的人都有影響，並通過這些人對向現代化過渡的中國社會產生影響，那麼這一點在目前正當壯年，不少人作為社會中堅的紅衛兵一代人那裏表現得最為明顯。

二　材料來源和研究方法

和所有的紅衛兵研究著作一樣，本書的寫作依靠下列資源：各種出版物——官方的、非官方的，中國大陸的、海外的，文革期間的、文革之後的，包括各種人的回憶錄、文章和專著，以及與前紅衛兵的訪談。唯一的特別之處是，本書作者在研究中依靠了文革中的個人經驗。下面對各類材料的來源、價值和利用情況加以說明，以期有助於讀者用批判的眼光來衡量本書的結論。

最容易到手的材料是官方的公開出版物，比如《紅旗》雜誌、《人民日報》、《中國青年》雜誌等等，還有各省市的報刊雜誌。應該說，這類材料的價值是極為有限的，其用處基本上是作為排列文革中各種事件的時間坐標。當然，有經驗和有技巧的解讀者也可以從中篩選出個別有用的信息。與這類材料相近的是文革中以中央文件形式下達的官方指示和決定，這種在文革前屬於保密範圍的材料在文革中和文革後很容易看到。它們的價值大大高於宣傳出版物，因為它們談的是實質性問題，而報紙雜誌刊載的是官方要人們相信的東西。在許多情況下，中央文件既反映了官方的意圖，也反映了運動的真實情況，而且，紅衛兵的許多行為往往是對某一個中央文件的反應(比如堅決擁護或變相抵制中央關於解決某省問題的決議)。與此類似還有大量的「中央首長講話」，各級領導、各種機構的「情況反

映」等等。它們屬於「內部材料」，而人們都知道，在中國材料越是「內部」，其真實性就越大。這些材料，有的出自官方或非官方，有的僅由群眾組織翻印。它們當然並非件件可信，但由於同一內容的材料往往有好幾個版本，對比參照之下，較為容易確定其可靠性。

第二類材料是當年紅衛兵的出版物，這是研究紅衛兵運動的基本材料。全面和透徹地掌握這類材料有助於深刻、準確地理解紅衛兵的行為。這種材料當然並非十分可靠，其中充滿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派性偏見和相互攻訐之詞，研究者需要把不同派別對同一事件、過程的描述作對比，鑒別不同說法的真偽和可信程度之後方可使用。在處理這一類資料時，是否親身參加過文革，以及是否在群眾組織的決策圈或宣傳機構中工作過，是十分重要的，因為紅衛兵出版物和官方宣傳品一樣，以一套特定的話語模式和習慣描述事實、傳遞信息、作出評價，若照字面來理解，就會發生誤導，或不知所云有如墮入五里霧中。研究的結論是否正確和有價值，往往依賴於研究者閱讀材料時對於文革和紅衛兵運動的「前理解」，許多有意義的判斷不是在閱讀材料之後依靠歸納方法得到，其過程恰恰相反：一個有準備的研究者往往已經有一些初步假定或判斷，他知道自己應該通過甚麼途徑，找到哪一類材料來證實或否定那些初步設想。在基本條件大致可以滿足的情況下，重要的不是閱讀的數量，而是已經存在於頭腦中的概念。

文革後期和文革之後，海外不斷有前紅衛兵的文章或回憶錄發表，這是一種有相當價值的資料來源，因為幾乎所有的作者都有豐富的經歷，其中不少人還是當年的重要人物或活躍份子(如楊曦光、鄭義)，他們在自由的環境中能從新的視角反觀文革，能坦率真實地講述自己的過去，或能系統、全面地回顧自己的經歷(如凌耿的《天讎》、高原的《自來紅》)，大陸的研究者不易得到這類資

料，我利用幾次出國作訪問研究的機會，並借助於朋友們的幫助，盡可能完全地、及時地獲得這種材料。

大致從80年代後期起，大陸的正式出版物(包括中共黨史研究刊物)中陸續有一些關於文革的資料或研究論文發表，儘管這些論著的觀點仍囿於官方意識形態，但其中包含了若干有價值的史料。收集這類材料對於研究工作是必要的，儘管要花很多時間作沙裏淘金的工作。附帶說一下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的說法是不準確的，他把這類文獻劃分為兩類，一類提供的是「不代表黨中央聲音」的信息，另一類提供黨所認可的信息⑥。實際上，所有這些材料都不正式傳達黨中央的聲音，另一方面，在大陸目前的政治條件下，所有出版物的觀點都不可能與黨的精神明顯相悖。它們不是判然有別的兩類，而是在官方設定的思想界限之內表現出十分教條或多少客觀公正一點的傾向。

本書寫作最費時間和精力的準備工作是採訪紅衛兵，我曾在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廣州、成都、鄭州、濟南和一些小城市作過採訪，了解當地的運動情況和紅衛兵經歷，也在北京、海南、香港等地與來自黑龍江、吉林、遼寧、廣西、內蒙古、西藏、新疆、江西、湖南、貴州、雲南、江蘇等地的前紅衛兵作過廣泛訪談。我正式採訪的對象大致有一百多人，選擇採訪對象時主要考慮了以下幾方面因素：一，地域的廣泛性，盡可能與每個省份的人交談，至少不能沒有某個大地區(如東北三省，西南三省，華東、華南、華北諸省，西北的幾個自治區等)，同時要兼顧小城鎮、農村、少數民族地區；二，年齡層次的代表性，從大學高年級學生到初中一年級學生，甚至1967年以及以後進中學的所謂「新中學生」，即1966年的「紅小兵」；三，組織派別的代表性，從曾當過動「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西糾」(「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北京老紅衛兵，到各種派別、激進程度不等的造反派，都進行訪談，他們

出身於不同家庭，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在學校的地位不同，思想變化過程不同，現在的社會地位也不同(有司局級幹部、教授，也有個體經營者)。訪談的方式有兩種，一是一對一交談，這種方式可以談得比較深入，有時甚至涉及個人隱私，對於了解人們的心路歷程大有好處；二是小組專題討論，一般人數為五、六人，往往來自同一地區、同一派別、同一學校甚至同一班級，偶爾也有對同一話題感興趣的來自不同地方的人，這種形式有利於弄清一個地區、派別、一段時間的運動發展情況，因為人們可以相互啟發、糾正。

毫無疑問，相對於捲入文革的一千多萬紅衛兵，被調查訪問的一百多人實在是太少了。當然，在目前的研究條件下，要進行大規模的調查是不可能的，但我要強調的是，如果在調查方面有缺陷的話，那麼它主要不在數量方面，而在所代表的類型不充分。本項研究在調查方面強調的是「質」，即代表類型的豐富性、多樣性，而不在「量」。被採訪對象的選擇是精心考慮而不是隨機的。本項研究涉及到人的社會、政治行為，行為背後的動機，以及思想發展變化這類「高級」的活動，其重要結論不可能從統計方法中得出，至關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須深入到紅衛兵運動中，以及對於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政治、社會、群眾心理諸方面有深入的理解。

由於研究的需要，調查和訪談的對象不可能只代表紅衛兵總體的一般狀態和平均水平，而是偏重於其中的活躍份子，他們之中有的是重要的或知名的頭領，有的是較有影響的理論家，即寫出過轟動一時的大字報的人，甚至包括少量的武鬥積極份子及指揮者。他們的講述構成了一幅豐富多采、色彩斑斕的圖畫，而實際上文革的圖景要單調和灰暗一些，因為畢竟大多數人是隨大流，在文革結束後隨遇而安的人。這一點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一場運動所包含的重大事件和行為，是由最活躍的參與者作出，或在他們帶領下作出的，而其中涵含的最有價值的思想，也只有在這些人身上才能體

現。另外，本研究強調文革的影響及後果這一方面，而這更需要追蹤文革的活躍份子才能做到，因為他們表達自己的觀點，影響社會、影響周圍人群的願望和能力最強。

就像不能不加分析批判地相信報刊文字材料一樣，隨時警惕訪談中的錯誤也是至關重要的。雖然訪談往往是在坦率和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但我不時能感覺到以下一些問題。一，由於時日甚久，講述者的記憶容易模糊、混亂(這一點不是大問題，因為可以用其他講述，尤其是用各種文字材料校正)；二，除極少例外，人們易於帶着派性偏見回憶和評價往事；三，幾乎所有的前紅衛兵首領都迴避兩方面問題，一是他們在政治鬥爭中的權力欲望與技巧，二是本派組織與某種後台(中央文革、當地駐軍等等)的關係；四、用文革後的觀念，新近學到的理論宰制當初的事實，我將此稱為「記憶受新思潮的污染」。

在研究的準備和寫作過程中我強烈地體會到，我本人的文革經歷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不但在本校和成都市是十分積極活躍的人，與一派的最高頭領有密切關係，熟悉紅衛兵組織的內部運作機制，直接參與和目睹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而且從1967年夏季開始，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夥伴較為自覺和正式地把文革當成一個課題來研究，這使我們努力系統地了解全國各地運動情況，並打破派性界限，與各派中的重要人物或愛思考的人交流切磋。這種經歷使我比較容易去尋找有價值的採訪對象和閱讀材料，在訪談時迅速得到信息，使談話盡可能坦率、深入，對各種書面和口頭的矛盾表述作出清理、匡正，在充斥意識形態話語和派性宣傳口號的材料中解碼並篩選出有用的信息，發現易於為他人忽視的研究線索，等等。當然，不論我反思自己的經歷，還是總結與眾多前紅衛兵交談的經驗，都會看到，如果缺乏自覺，缺乏自我批判精神，那麼親自經歷文革雖然有諸多方便和好處，但同時也極易落入思想的樊籠，因為一段轟轟烈烈的經歷很容易使人自以為是，難於擺脫自我中心的偏見，而當年

全心身地投入又使派性的眼光和情緒擾亂自己的客觀判斷。我在充分利用自己親歷者的優勢時，也萬分警惕並竭力克服「當局者迷」的不利因素，至於我在這兩個方面做得如何，只能留待讀者來評判了。

我在本書中將盡力做到使自己的結論不是僅僅高於經驗材料一個層次的概括和說明，而是對所研究現象作出深度解釋。這就是說，不限於對各種現象作出分類，指出其初淺的、最直接的原因，而是要在社會環境、一般人性、事件進程等因果關係的綜合網絡中把握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儘管這樣的解釋抽象層次較高，但我不追求在經驗事實及其說明之上形成一般的政治或歷史理論，因為在中國60年代那種歷史條件下發生的文革，以及文革中人們的種種行為和思想，畢竟有較大的特殊性，也許，可以把文革及其種種現象視為歷史運動和人性表現的極限狀況，種種經驗事實及由之作出的說明是形成最一般理論的不可或缺的、寶貴的構成因素，但從它們本身不能抽象出最一般的結論。另一方面，我堅決反對用某種現成的社會學、政治學理論來對文革中的現象作出解釋。一般而言，較為成熟的理論都是在西方社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這種環境與中國的條件，尤其與文革的條件相距甚遠。當然，在思考和說明本書所研究的問題時，不能不參照、借鑒一切有關的理論。我在這裏想強調的是，不能借用單一的理論來套裁文革的經驗事實，下一節將有例子說明，援用單一的現成理論會得到勉為其難的、不可靠的結論。

三　對西方研究成果的重視和借鑒

本書的主要特點之一，是作者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高度重視和充分利用西方學者對於文革研究的成果。

我發現，對於文革的幾乎每一個重要方面，西方學者都有研究。尤其是本書的主題——紅衛兵，西方學者的研究相當詳盡和深入，很有啟發性。事實上，自從1966年中文革剛一爆發，西方學者就開始對之進行認真的研究。雖然有一些論述令人產生隔靴搔癢、不得要領之感，但給人印象更深刻的，是西方學者研究範圍之廣，視野之開擴，思路之新，所用方法、概念之豐富。許多十分重要的問題，如軍隊、國際環境和外交政策、貿易，以及專案組、文革的心理創傷等等，都是中國學者從未問津的。我認為，任何研究，哪怕是中國人從事的最有本國特色的研究，如果對西方學術界已有的工作和已取得的成果不聞不問，是肯定達不到應有的學術水準的。照理說中國人對於文革有切膚之痛，研究自己親歷的事應有先天的優勢，但文革研究在中國大陸至今仍是禁區，學者們甚至在收集資料和進行採訪方面都未得天時地利之便。更由於沒有思想、言論的自由，表達和交流幾乎不可能公開進行，因此，作為文革學的研究，在大陸目前還無從談起。不論是從目前國內研究的水平，還是從學術研究應取的態度而言，我都寧願自己的研究是世界學術界對於文革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

因此，在本書中，我始終要和先前的研究者對話，引進他們的觀點，對之借鑒、分析、批評。我將本書視為先前有關研究的繼續和發展。

照理，這種方式是不言而喻的，不值得專門加以說明。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中國大陸學者發表的關於文革論著中，看不出作了甚麼努力考慮和利用過國外已有的研究成果。相當多的中國學者還未養成這種習慣：在從事一項研究之前首先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把自己的研究視為在原有基礎上的推進和提高。在文革的研究方面情況更是如此，中國學者的研究（儘管少得驚人）總是各

自為政，永遠在重起爐灶。有些人在90年代的研究，還在重複(甚至還不如)西方學者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的研究。在我看來，西方學者的下列論著是十分嚴肅認真的著作，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應當作為繼續研究紅衛兵行為和派別鬥爭的基礎，但我還沒有見到中國大陸作者關於紅衛兵的論著提到這些著作，從作者們的論說中也看不出他們研究過這些著作。我這裏指的主要是，李鴻永(Hong Yung Lee)的〈文革中廣州地區的激進派學生〉("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75)和《中國文革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1978)，陳佩華、駱思典(Stanley Rosen)和安德佳(Jonathan Unger)的〈學生和階級鬥爭：廣州的衝突〉("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1980)，駱思典的《廣州地區的紅衛兵派性和文革》(*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1982)，陳佩華的《毛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人格發展和政治積極性》(*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等等。

當然，在吸收和借鑒的同時，也有必要分析和避免西方研究中的某些缺陷。在我看來，西方學者對於紅衛兵的研究主要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研究範圍受到限制，作出以偏概全的結論(這點將在第三章第四節中詳加說明)，二是用西方社會學、心理學的現成的，但不貼切的概念對紅衛兵的行為及其動因作出分析。下面略提一下第二方面問題。

陳佩華在《毛的孩子們》一書中，用「權威人格」這一概念來概括紅衛兵的社會特徵。這個概念既使我受到啟發，又使我感到困惑。最後，我認為把它用於紅衛兵是不確切的。

「權威人格」是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為探討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心

理基礎而提出的概念，在一個長期過程中，不同的哲學家使用這個概念時側重它的不同方面。我們可以允許它的內涵的某些重要方面不適合於紅衛兵(比如「固守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念」這種性格特徵)，但這種人格的形成和家庭結構、家庭教育的關係卻是決不可忽略的。正如賴希(Wilhelm Reich)所指出的：「權威主義國家從權威主義家庭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家庭成了塑造國家的結構和意識形態的工廠。」「家庭是小型的權威主義國家，兒童必須學會適應家庭，以便為後來總的適應社會做好準備。人的權威主義結構……基本上是由於性禁錮和性畏懼嵌入性衝動和生命本質中而造成的。」⑦「權威人格」這個概念反映了法蘭克福學派哲學與弗洛伊德主義的關係：兒童在家庭中的性壓抑使他們屈從於父親的權威，與此同時，一種以父親自居的作用使他們想充當權威。因此，處於青春期的中產階級少年身上存在矛盾而並行不悖的態度：既接受和屈從於權威，又反抗權威。

「權威人格」這個概念顯然以弗洛伊德的性學理論為基礎，如果要說紅衛兵的性格特徵是權威人格，就需要分析他們在家庭中的性壓抑狀態，但《毛的孩子們》一書並沒有做這方面的工作，即使不作這麼嚴格的要求，賴希等哲學家賦予「權威人格」概念的一個重要作用也是決不能忽視的，即用兒童在家庭中心理結構的形成與發展來解釋他們日後對國家權威主義的認同。陳佩華在《毛的孩子們》一書中正確地指出，中國學生性格形成受到的影響主要來自學校，而不是家庭。如果不論證在權威主義方面家庭和社會的同構，就沒有理由使用權威人格這個概念。

如果說，用經過改變的「權威人格」概念來形容紅衛兵的性格特徵還只是不太確切的問題，那麼羅多克(David M. Roddock)照搬原概念來說明紅衛兵的造反行為就顯然是生搬硬套了。他說，決定學生在文革中表現的主要因素是父子間相互作用，是他們不自覺地具

有認同父親的權威或對父親造反的心理。學生造反是家庭衝突的延伸：從攻擊父親到攻擊教師，再到攻擊其他權威。他說，據他的調查，絕大多數文革積極份子都曾有與父親的代際衝突和競爭，所有紅衛兵頭領都和父親有公開的競爭⑧。我不知羅多克的調查是如何進行的(他共調查了三十五個前紅衛兵，全屬男性，都是偷渡到香港的)，在我範圍廣泛得多，更具代表性的調查中，沒有一個人把自己造反的原因歸之於在家庭中反抗父親的權威。

里夫頓(Robert J. Lifton)從宗教心理學的角度研究文革，他用「革命的不朽」這個概念來解釋毛發動文革的動機，解釋紅衛兵運動。他說，毛感到對革命不朽的最大威脅是修正主義，文革不過是對革命的不朽和再生的追求。紅衛兵就是再生的施行者。文革是青年對老年、新對舊的勝利，紅衛兵「破四舊」，用心理學語言來講就是向死亡本身宣戰。紅衛兵之所以代表新的生命，不僅因為他們年輕，而且因為他們階級成分純潔⑨。這種觀點的荒誕無稽是一望而知、毋需辯駁的。

儘管西方學者在研究文革和紅衛兵時常常生硬套用他們熟悉的理論和概念，得出不能令中國學者心悅誠服的結論，但總的來說，他們的研究是有啟發性的。對於紅衛兵的研究，他們起步早，下的功夫多，已經自成系統並在世界上廣有影響(比如著名的《劍橋中國史》第十五卷就借用了他們的不少論述)，無視這些既得成果是不可取的。

四　作者的基本觀點

本書表述的主要觀點可以歸納如下。紅衛兵在文革中似乎不可理喻的造反行為，具有規律性的派別劃分和激烈的派別鬥爭，是

文革前官方意識形態灌輸，毛在文革中巧妙地施展策略手段，以及當時中國社會和政治體制中業已存在的矛盾爆發這三方面因素相結合而發揮作用的結果；文革導致了與其發動者初衷相反的結果，紅衛兵不但沒有在鬥爭中鍛鍊成為「防修反修」的一代新人，反而由於對政治欺騙和利用的反感與原有的革命意識形態疏離，其中善於思考的一些人開始研究中國社會和政治體制中真正存在的問題，成為使中國走向現代化和民主的新生力量。

中國青年學生受到的意識形態灌輸既是強化性的，又是整體性的。它包括學校中課堂內外的政治教育，也包括通過報紙、電台、刊物展開的宣傳，還包括小說、電影、戲劇等藝術手段產生的潛移默化影響。文革中以革命的名義做出的各種有悖常理的行為，說明這種政治教育既是違反人性的，又是十分成功的。許多前紅衛兵在反省文革時很容易看到和承認這方面的影響，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用革命理想和對毛的崇拜來解釋自己在文革中狂熱和盲信的表現，相當多的人沒有看到或不承認其他因素的作用。但是，單用革命教育並不能說明紅衛兵在文革中的行為。文革前的意識形態灌輸是要導向對於革命事業，對黨對組織的忠誠，為甚麼運動一來紅衛兵只忠於毛澤東而反對劉少奇和其他領導人，以及各級黨組織呢？既然各派組織都宣稱自己是革命的，它們之間為甚麼要進行流血鬥爭呢？顯然，不考慮其他因素，如毛澤東爭取人心的手段和中國社會的矛盾，是不能作出合理解釋的。文革中紅衛兵在精神上依靠的，行動上捍衛的，不是一般的革命理想和目標，而是所謂「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他們的理解中，它有別於所謂劉少奇的以壓制群眾為特徵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人們還認為，由於本派本組織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捍衛了這種至高無上、神聖無比的路線，因此應當受封為「堅定的革命左派」，在權力分配中佔最大份額。

另一方面，西方學者在解釋紅衛兵行動的原因時，往往低估了意識形態因素，單純強調實際利益的作用。可能他們很難理解一種虛妄的信念何以左右人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然而，文革中的許許多多紅衛兵確實是因為偏執於自己的信念，而不是為了一己之私利而鬥爭的。其實，在宗教或準宗教思想煽動下，人們狂熱追求和捍衛的東西完全可以是非個人實利性的，他們可能為了理想而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這種情況在古代和中世紀是司空見慣的，在現代也不乏其例，除了文革的紅衛兵，清朝末年的義和團、德國第三帝國時期的納粹份子、伊朗忠於霍梅尼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以及兩伊戰爭中的革命衛隊志願兵，都是可以為信仰甚麼事都做得出來，包括獻出自己生命的人。紅衛兵行為中最複雜、微妙之處，就在於狂熱的信念和個人或派別利益之間既奇怪、又巧妙的結合。

我所謂的毛澤東爭取群眾的策略，是指毛及其追隨者把廣大青年學生的革命信念和對共產黨的熱愛轉變成對他個人的盲目支持和對其政敵極度仇恨的一系列手法。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宣傳，煽起對毛的個人崇拜狂熱，製造「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鬥爭」的神話，總之，在自己身上貼金，往政敵臉上抹黑。二是製造天下大亂的局面，讓劉少奇等人按照中共一貫的做法派工作組去控制局面（這不可避免地要將一些學生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然後突然翻臉，指控對方鎮壓群眾，通過解放被鎮壓的群眾而獲得他們的真心擁戴。在文革的初期和中期，毛及其追隨者一直玩民主牌，以群眾的支持者、保護者的面目出現。他們這麼做的時候確實短暫地背離了中共一貫的作法，把群眾的不滿和仇恨轉移和引導到政敵身上。

毛之所以能施展這種策略手段，當然和歷來的意識形態灌輸有關（比如中共歷來以「群眾路線」相標榜），同時也以當時存在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矛盾為前提，但策略手段和這兩者是有區別的。因為作

為整體的中共歷來都宣稱它的方針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文革前，以群眾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現，並非毛澤東一人的專利，但文革一開始造成的事態，卻使毛顯得有充分的理由指控對手鎮壓了群眾，使得「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旗幟鮮明地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如果不是中國社會已經積累了許多矛盾，群眾的不滿已經達到相當程度，毛的手法就是無的放矢，他就只能以另外的辦法諉過於人、籠絡民心。

必須強調，毛的做法只是一種策略手段。不少人並不這麼看，不論是當時誓死捍衛毛的紅衛兵，還是西方研究文革的學者，都把人們擁護毛看成是自然的，即看成毛和劉對待群眾的態度確實不同的結果。比如，不只一位西方學者認為，毛是群眾運動的領袖，他在群眾中如魚得水，他的政治稟賦和政治資源均來自群眾；而劉是官僚主義者，善於通過組織機構進行操縱，而不樂於直接面對群眾。在他們眼中，毛善於並樂於接近群眾，對群眾和藹可親，而劉則對群眾板着面孔。但是，事情的實質並非如此，不論是從文革後期還是文革之前歷次政治運動中毛的所作所為來看，和劉對群眾的壓制比較起來，毛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一定要說有甚麼差異，那也只是風格和手法的不同。

說明紅衛兵的行動還應該分析與他們的實際利益有關的中國社會中存在的矛盾。本書要分析的矛盾有兩類，我把一類稱為社會性的，把另一類稱為政治性的。中共接管大陸政權之後，按照人們以前的階級地位和政治面目，把人在政治上分為三六九等，其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又人為地製造了一大批「階級敵人」，這樣就把人區分為自己人、朋友、敵人，他們的子女由於父母的政治身分在學校受到不同對待，其前途（尤其重要的是升學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家庭出身。這樣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就形成社會矛盾。與

此同時，共產黨按照一套既定模式頻繁發起政治運動，在間歇期也製造緊張的政治空氣，領導在群眾中劃類，決定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一些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另一些人自願地或被迫地出賣周圍的人，還有人以犧牲別人達到向上爬的目的，這就形成中共政治制度下固有的整人與被整之間的矛盾。一般而言，本人歷史、成分或家庭成分「有問題」的人容易成為政治鬥爭的靶子，但被整者往往也包括對領導不是十分馴順，遇事不看上面臉色而有自己的主見，愛提意見、愛說怪話的人。整人者除了領導，就是所謂的骨幹或積極份子，即是善於觀察政治氣候、揣摩領導意圖，期望在政治運動中興風作浪獲取好處的人。定期的政治運動，不斷製造的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一成不變地把對抗領導者說成是「反黨」，這些作法在文革前十七年已經制度化了。我把這種幹部和群眾的矛盾，及其派生的群眾之間的矛盾稱為政治性的。這兩種矛盾產生的不公正，平時在強大的專政威力和意識形態宣傳雙重抑制下，沒有引起人們的強烈反應，文革使這兩種矛盾以極其尖銳的形式爆發，整人者和被整者，既得利益者和二等公民之間的分野比文革前更為分明，相互間的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各種人都被拋入運動，他們只有爭取本派別的政治勝利來保障自己的安全，謀求自己的利益。

事實上，中國社會內部存在的矛盾要比以上兩種更深刻、更廣泛、更複雜。由於本書的主題是紅衛兵，他們的學生身分使他們相對而言要單純一些，因此本書不打算全面分析一切矛盾。其他矛盾，比如人們在經濟方面、身分方面的矛盾，在產業工人和臨時工、合同工之間，在城市居民、下鄉知識青年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也是客觀地長期存在着。

應當指出，當年的紅衛兵，以及中國大陸為數不多的文革研究者長期以來未曾正視這些社會性矛盾對紅衛兵行為的作用，他們的

解釋都集中於政治教育和革命理想。對這些矛盾予以充分重視和詳盡研究的是一些西方學者，但他們的結論也有若干偏差，他們重視由家庭出身劃分而產生的矛盾，把青年學生參加保守派或造反派歸結為這種矛盾，這固然是有價值的發現，但他們卻忽視了第二種矛盾，因而未能解釋，為甚麼運動初期只有出身好的人才能參加運動時，他們就形成了保守和造反的對立。西方學者還有過份強調社會矛盾的傾向，把紅衛兵的派別劃分和派別鬥爭完全歸結於這種矛盾。實際上，雖然這些矛盾是中國社會的真實問題，但大多數紅衛兵確實是在為假問題而爭鬥，他們的利益意識遠未成熟。即使某些人有清醒的利益意識，並在個人行動中表現出來(有人很早就退出運動，甚至有人逃往香港)，但紅衛兵組織的政策和行動在很大程度上並未受社會矛盾的驅使。也許這麼表述更為恰當，不分析社會矛盾就不能充分和恰當地說明紅衛兵的行為，但反過來，決不能把紅衛兵的行為僅僅歸於這種矛盾。

在以上三種影響紅衛兵行動的因素中，毛的策略手段這種因素最不具有持久的效力，消逝得最迅速，人們或早或遲地看清了文革發動者的欺騙，退出運動並對文革持否定態度。意識形態因素是經過很長時期才逐漸消失的，並且是在人們作出了艱苦的探索之後才被克服的。當然，這種努力使有些人走得更遠，他們不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文革前加之於他們的革命理想，不僅批判文革中的殘忍行徑和毛的手法，而且批判產生文革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而第三種因素，即社會矛盾，至今還未消失，雖然其形式有所改變。社會不公繼續存在，而且大大加劇了，這使得前紅衛兵中有少數人懷念文革，神往於當初對官僚特權的衝擊，而更多的仍然追求社會理想的人沒有停止探索和努力，他們想用與文革迥然不同的方式造就一個公正的社會。

註釋

① 1966年夏天，北京一些幹部家庭出身的紅衛兵提出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它馬上成了首批紅衛兵的思想、政治、組織綱領，並迅速流傳全國，這種根據家庭出身把人分成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觀點後來被當作血統論而受到批判。「四舊」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四舊」並非僅指思想文化上的批判，而是指砸教堂、毀寺院、燒圖書、抄家、打殺「牛鬼蛇神」即有政治問題的人等等暴烈行為。

② 見《中國百科年鑒》(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0)，頁536。《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卷》和秦孝鶴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料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 所載數字亦相同。

③ 關於第一、二、三代人的概念，有不同的劃分標準，這裏不作精確界定，僅把1949年前受教育的人稱為第一代，文革前受教育的稱為第二代，60年代的在校學生稱為第三代。

④ Julia Kwong,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April 1969*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⑤ Anita Chen,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 no. 1 (1992): 73-74.

⑥ Michael Schoenhals, "Unofficial and Official Hist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8, no. 3 (1989): 563-72.

⑦ 威爾海姆．賴希 (Wilhelm Reich) 著，張峰譯：《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頁25、26。

⑧ David M. Raddock, *Politic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Kwangchow* (Tucson, Ariz.: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7), 10, 135.

⑨ Robert J.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20-35.

第二章
文革前的教育、意識形態和政治歧視

文革中的紅衛兵，無論是砸教堂、燒書籍、鞭打師長的老紅衛兵，還是手執長矛、衝鋒槍殺紅了眼的造反派，他們的行動都使世界驚駭。外部世界的人，不論屬於中國血統還是其他種族，都感到恐怖和不可理喻，二十年之後的中國青年看紅衛兵一代人，則覺得他們莫名其妙、可笑可悲。但當年紅衛兵中大多數人，即使是其中有反省能力和悔悟心態的人，卻不會認為當初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不可理喻，雖然其中許多人會認為那是錯誤或可笑的。是甚麼東西決定了他們異乎尋常的表現，是甚麼東西使那些野蠻和荒唐的行徑對他們而言卻是自然的？是民族心理素質和傳統文化的驅使，還是青春期動盪而反常的心理，加上超凡領袖的催眠術般的蠱惑力？

抽象的分析和匆忙的結論是危險的，我們先在中外近代史中考察一些相似的情況，進行初步比較。

就同一種族和傳統而言，紅衛兵運動和上世紀末的義和團運動有許多相似之處：同樣地狂熱和盲信，尤其是參與者都自認為掌握了某種符咒而戰無不勝，並且盲目排外，在使館區鬧事。但是，義

和團的農民是因為無知而被滿清皇室利用，而紅衛兵恰恰是因為受了教育而造反。

就相同年齡段而言，紅衛兵運動和德國法西斯的青年納粹運動十分相似。據摩西 (George L. Mosse) 的說法，青年納粹運動由神話驅動，「神話是一群人持有的最強烈的信念，信仰者感到自己屬於真理的大軍，正在與邪惡的大軍戰鬥。」①並有一位魔力人物希特勒控制運動。如果將神話說成是與國內外的階級敵人鬥爭和「解放全人類」，將魔力人物換為毛澤東，那麼紅衛兵運動和青年納粹運動就很可以一比了。但差別卻是明顯的，納粹運動的動力是種族主義，而紅衛兵運動的動力是共產主義，它是與種族主義背道而馳的。另外，摩西認為納粹份子投入運動是因為他們處在工業化社會，感到社會和自己的本性相疏離，需要在更大的感情共同體中獲得勇氣和力量②。這就和紅衛兵的心態大不相同了，紅衛兵與自己的時代是相融的，他們一直生活在「革命集體」中，看來，兩個青年運動的差別在意識形態方面。

我想從以上比較引伸出我的論點：紅衛兵在文革中的言論和行為是那個時代教育和意識形態灌輸的產物。當然，它們與民族氣質、文化傳統和青少年心理也有一定關係。下面分析當時教育中的負面因素，並不是要作全盤否定，而是為了尋找文革中青年學生不正常行為的原因。不能把文革前的教育說得一無是處。一代人追求理想和生活的意義，有扎實的基礎知識，愛勞動、愛集體、艱苦樸素、能吃苦，也反映了教育的正面成果。

談到中國大陸60年代的教育和意識形態灌輸，我們能不能把它們的內容歸結為馬克思主義呢？在某種意義上能，因為當時官方的意識形態就是馬克思主義。但在另一種意義上卻不能，論據是，後來幾乎所有在思想上反叛文革的人思想轉變的第一步都是從讀馬克

思的原著開始。可以這麼說，當時用來教育年輕人的是一種特殊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它當然屬於馬克思主義，但是如南斯拉夫人在50年代所批評的，是一種「野蠻的馬克思主義」。

應該指出，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是時強時弱的，政治化的加劇曾在1957-1958年大躍進時期形成一個高潮。但在隨之而來的三年困難時期，人民生活在相對而言較寬鬆的環境中。自1962年毛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警告後，思想控制和政治灌輸越來越厲害了。儘管如此，人們文革前的思想和心理狀況仍然不能與文革時的偏執和狂熱相銜接，這樣一個巨大的跳躍，是以大大張揚文革前教育和意識形態中的三個基本要素——對革命的狂熱，對黨的盲從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以及借助於文革時的恐怖氣氛而達致的。

一　革命第一

我採訪的所有前紅衛兵，以及文革後發表回憶文章的人，幾乎異口同聲地(甚至是不無驕傲地)把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現歸因於理想主義。據我自己的經驗，這有相當的道理。當然，這是一種特殊的理想主義，說它理想，是因為它超出了庸俗瑣碎的日常生活，而且常常超出了一己之私利，和人類自古以來追求的美好目標有關係，從而顯得高尚和神聖。但這種理想主義並未帶來人民的福利、科學藝術的創新，而是導致破壞與毀滅。這是一種革命的理想主義，它把革命的價值看得高於一切，高於物質享受，高於文化、科學、藝術，高於人與人之間的美好關係，甚至高於生命本身。在文革中，人們為了捍衛自己的「革命群眾」或「革命組織」的地位，敢於反抗有

權勢的當權派和帶槍的軍人。為了爭當「革命派」，與對立的組織不惜打得頭破血流。為甚麼革命會被置於絕對優先的地位，它的具體內涵又是甚麼？下面，我將進行具體分析。

作為革命政黨，中共自然是把革命置於首要地位。「革命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革命是人民的盛大節目」，這樣的話一直是官方和民眾的口頭禪，這種革命崇拜和中國的古訓「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結合在一起，使得自從中共掌權後，是否革命不但成了價值判斷的最高標準，而且具有判別罪與非罪的法律意義(法律中一直有「反革命」罪)。

「革命」一詞雖然以最高的使用頻率出現，但它的內涵卻豐富得難於界定。在我看來，在中國的政治實踐中，「革命」這個概念包含四個要素。一，它確立了奮鬥目標和共同的理想；二，它強調政治是最重要的活動；三，它把整體利益置於最高地位，把絕對服從視為最必要的素質；四，它頌揚暴力，敵視溫和與妥協。

1949年之後，對青年學生的要求從來就是政治勝於學業，「紅」高於「專」。紅與專關係的反復、長期討論説明黨在灌輸革命信念方面的不懈努力。毛澤東早在50年代就為中國的教育定下方針：「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並作出「政治是統帥，是靈魂」的論斷。這兩句話嚴格地規定了中國青年學生的努力方向和教育部門的工作方針。

因為強調「紅」，學校實施政治輔導員制度，對學生的思想加以指導監督，通過每學期的評語，對學生的政治表現作出裁定。學生為取得一種政治身分，除了學習之外，還要花大量時間達到「紅」的標準，最初的要求是成為含義不明的「積極份子」，更進一步是成為共青團員(學生黨員被視為最優秀份子，即是精華中之精華)。為了這種政治身分，學生相互競爭，爭取得到「組織」(即黨和上級)的承認。在文革中，爭取政治身分的習慣完全承襲下來。絕大部分學生

參加了群眾組織(儘管許多人只是掛名，並不積極參加活動)，因為在文革前，組織之內的人自然優於未取得身分的人。不少人因懼怕運動結束時要對每個人的表現作結論而參加組織，不在某個組織之中就談不上有革命的表現。至於那些積極參加組織的人，則像文革前一樣為取得「革命派」或「左派」稱號而努力奮鬥。為此，他們要做一切事情來滿足有權授予這種頭銜的人——授銜者既可以是最高領袖毛澤東，也可以是某個軍區的司令員。

因為強調「紅」，在學校課程中硬性設置了一門政治課，這是最令人頭痛的課程，然而誰也不敢掉以輕心。對枯燥繁瑣的教義問答死記硬背，使學生喪失了獨立思考政治、社會問題的能力。因為強調「紅」，在中學語文課文中大量砍去古漢語知識、中外文學名著，充塞了大量的毛澤東的文章，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反對自由主義〉，所謂的「老三篇」即〈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以及〈評戰犯求和〉、〈別了，司徒雷登〉、〈「友誼」，還是侵略？〉等攻擊「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文章。高度的政治訓練，使紅衛兵成了文革中各種群眾中最狂熱、教條、偏執的人。

「紅」是抽象和寬泛的概念，有人力圖對它作較為穩健、溫和的解釋。比如，陳毅1961年對北京的大學畢業生講話，強調「紅」應落實在「專」上面，他說，大學生只有成為本專業的專家，才能為社會主義服務，才談得上「紅」，這種主張很快就被否定，在文革中遭到嚴厲批判。在1963年初，即意識形態灌輸加劇時，掀起了學雷鋒運動，一名貧農家庭出身的士兵雷鋒，被塑造為紅的化身，革命者的典型。

甚麼是「雷鋒精神」？宣傳機器按照黨的需要從各個角度加以說明。比如「把偉大寓於平凡之中」，為他人做好事，「幹一行愛一行」，「甘當革命的螺絲釘」，等等。但與以前相比，這次強調了兩個方面，它們成了「革命」內涵的最重要的因素。其一，是「愛憎分

明的階級立場」，用雷鋒最喜歡的話來說，就是「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其二，是對毛澤東絕對服從和崇敬，林彪在學雷鋒運動中的題詞最說明問題，他號召「學習雷鋒同志的精神，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這樣一來，忠於革命變成了忠於毛澤東本人。這個變化是意味深長的，毛澤東成了革命的唯一象徵和最終裁判，接下來會有這樣的問題：如果毛與他的同事意見不合，怎麼辦？如果毛與整個黨的機構發生分裂，怎麼辦？按照林彪的要求，只有站在毛的一邊才是正確的，實際上，紅衛兵的精神最根本之處也在這裏。人們從遵從一種教義，追隨一種事業變成了緊跟一個人，人們的思想從探索「我應當為革命幹甚麼？」變成了只須知道「領袖想要我幹甚麼？」

在青年學生中，學雷鋒運動引發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因為據宣傳，雷鋒之所以成長為一個偉大的革命戰士，就在於他長期堅持學習毛著。早在1960年9月，在林彪主持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就作出決議，號召全軍幹部戰士「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這場運動終於通過學習雷鋒活動從軍隊發展到學校和全社會。我認為，這場運動對於青年學生（其實遠遠不只是對學生）的思維能力和思維習慣造成了深遠的、災難性的後果。它把部隊中簡單、機械、虛偽的學風帶到了學校。前紅衛兵、後來成為著名影星的劉曉慶對於部隊學毛著作了這樣的描述③：

> 早就知道解放軍是所革命的大學校。到部隊後更加證實了原來的嚮往。我們除了出操、跑步、吃飯、睡覺以外，全部時間都在學習，許多學毛選模範的成績令人望塵莫及。比如說，有一位戰士把毛主席著作抄寫了三遍，毛主席的「老三篇」，「五篇哲學著作」背得滾瓜爛熟。戰士們出口成章，發言稿可以做到

每一句話都是毛主席語錄，就像有一個相聲全部用電影片名組成一樣。

由於林彪提倡的學習方法是「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因此，人們形成了這樣的思維習慣：毛著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大全，它包含了對一切難題的解答，遇到問題，決不需要自己動腦筋分析事情的前因後果，只需翻到毛著中適當的地方，就會有最佳答案。在文革中，紅衛兵因為自信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因而掌握了絕對真理，於是聽不進、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見。可以理直氣壯地對持有異己觀點的個人和組織予以打擊，甚至殲滅。因為林彪說過，「誰反對毛主席，就全國共討之，全黨共誅之。」

這種學風使得文革中紅衛兵拿毛的語錄為自己的每一個行為辯護，根本不管語錄含義和面臨事件之間有無聯繫。比如，當老紅衛兵毒打自己的老師、校長或其他「階級敵人」時，他們往往口中高誦這樣的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1968年5月，陝西省某縣發生第一次大武鬥，一派紅衛兵組織用步槍和迫擊炮打敗對立派，對方死了五十來人。戰鬥結束，當勝利者看到遍地死屍時，嚇得心驚膽戰，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時本派一個成年人提醒因開殺戒而手腳無措的學生：「打得好！必然要打，毛主席剛有最新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學生們一聽，立即從驚惶不安變得理直氣壯，原來自己打死人屬於打國民黨！於是開慶功會，頒獎受獎。我的被訪者告訴我，心理上越過了這一關，以後做甚麼事就無所顧忌了。

我並不是說，毛的語錄直接導致了凶殘行為。但毛的話，以及「學習、運用毛主席思想」的方式為殘忍的、非理性的行為提供了激勵和辯護。

當然，青年學生當中也有極少數人，在學毛著的運動中激發了對政治、歷史的興趣，他們很快就不滿足於《毛選》，轉而學習馬克思的原著，進而擴展到西方哲學、社會科學著作。這些人後來成了否定文革，否定毛的先驅。

形式主義地學毛著和對毛的個人崇拜之風，從1963年末到文革期間刮得愈來愈烈，1963年10月，毛發出「全國學解放軍」的號召。所謂學解放軍，實質上就是學解放軍對毛的無限熱愛、無限崇拜、無限忠誠。正是在學習解放軍的熱潮中，林彪提出毛的著作是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毛的號召和林的指示使學生中最嚮往革命的那部分人鄙棄文化學習，崇尚軍人和武力，僅憑背誦幾句毛語錄而自認為掌握了真理，並隨時準備以軍事化的方式(即使用暴力)推行所謂的真理。

對青年學生的革命化要求和教育，在提出「接班人」問題後達到高潮。本來，接班人問題在50年代就提出來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公開聲言，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希望只能寄託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中共對此作出了認真而激烈反應，大大加強了對年輕人的政治教育，以便「和資產階級爭奪青少年」。在60年代中蘇意識形態論戰中，毛把這一問題突出了，他認為蘇聯「變修」是因為被赫魯曉夫篡了權。培養革命接班人不但成了一般號召，而且有一系列實際的措施。比如，中央黨校專門從中學生中招收了學員，舉辦了以培養接班人為目的特殊訓練班。在全國，每個學校的領導都必須物色最優秀的學生，對他們特殊照料和培養，讓他們加入共產黨，當接班人。容易看出，「接班人」和以前提倡的

「革命青年」不同，它具有當掌權者的含義。培養接班人活動對青年學生在文革中思想行為的關係很大，它的直接後果是，第一，大大地把學生導向政治，大多數學生原先以當科學家為目標，現在，他們轉而認為當接班人是最光榮的事；第二，加強了只看家庭出身的血統論傾向，因為不管使用了多少馬克思主義詞藻，「接班人」這個概念和封建時代的權力繼承畢竟有相通之處，即「父權子承」，事實也是如此，一個非革命家庭出身的學生可以當「革命青年」，當「優秀團幹部」，但不論是本人，還是學校當局，都不會指望他(或她)是接班人，這導致了非革命家庭出身的共青團幹部和在新形勢下銳進的高幹子弟之間的矛盾；第三，引發或加強了學生中的權力意識和競爭傾向。當「革命青年」是沒有名額限制的，而接班人限於極少數出類拔萃之輩，「革命青年」是一種政治身分，而接班人是一種政治地位。這種競爭有時變成了傾軋，而且十分激烈。

文革之後，前紅衛兵幾乎是眾口一詞地宣稱他們當年的行為純粹出於理想主義，出於革命熱情，這對許多人而言也許是真的。但是，這種革命理想到底是甚麼呢？它提倡的絕對忠誠，是對人民和民族，還是對最高元首個人？它鼓勵的無情鬥爭，是對社會和民族的敵人，還是對本應受到敬重和愛護的人？當初充滿革命激情的人中，多數對此並不清楚。

二　蒙昧無知和野蠻

在60年代的政治教育和意識形態灌輸中，除了「革命」這種激進成分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使得青年一代蒙昧無知，背離人的天性，與文明格格不入。

我所知道的紅衛兵這代人最背常理的例子之一，是他們中許多人甚至不敢設想偉大領袖具有一般人那樣的生理功能。我採訪過的一位前紅衛兵W在1966年時已經十九歲，是高中三年級學生，他告訴我：「文革中，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既然毛主席和我們一樣要吃飯睡覺，他是不是也和常人一樣要大小便呢？我想他應該要，但我不敢想我們偉大領袖也做這麼低級的事。我堅決否認他會用與我們相同的方式，我不敢想他到底怎麼解決這個問題，也不敢告訴別人我的疑惑。」劉曉慶寫她當年的想法時說：「我對毛主席是這樣的崇拜，這樣的熱愛，感情純潔得可以說毫無一星半點雜質。我逐步長大懂得人事，當我第一次知道男女之間生孩子的秘密時，在恍如五雷轟頂的震動中我首先想到的是：『難道毛主席也這樣嗎？』當然，我立刻就會打消我對深深摯愛的領袖的褻瀆。」④

在紅衛兵這一代人心目中，美國是中國最凶惡的外部敵人。它對於其走狗國民黨在中國的失敗老羞成怒，以朝鮮為跳板，妄圖侵佔中國，當它被打得大敗之後，它又在越南點燃戰火，目的仍是進攻中國。在這一代中國青年中，沒有多少人知道朝鮮戰爭是因為金日成的北朝鮮正規軍大舉入侵南方引起的，也沒有多少人知道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決議，授權聯合國軍援助南韓擊退武裝進攻。當然也沒有多少人知道日內瓦協議和北越對南方的野心及滲透，只知道越南的戰爭是北越抗擊美國的侵略。

現實世界也描繪得符合革命理論的模式。西方國家自然是吸血鬼的天堂，勞動人民的地獄。資本家寧願掉倒牛奶也不願減價出售，為的是保持高額利潤。資本家常常毀掉科學發明，因為這些發明導致產品經久耐用，使他們無利可賺。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黨要求青年學生像偉大的革命戰士雷鋒那樣，每天都要以飽滿的階級感

情想到世界上那三分之二受壓迫、受剝削的人民，隨時準備解放他們。

60年代初，曾放映過一部由美國「進步」人士拍攝的電影，那是一個關於罷工的故事。影片畢竟有一些美國日常生活鏡頭，當中國的大中學生看到美國工人關掉電視機，開着汽車出門去參加罷工時，他們簡直不能調整自己的感情，他們被美國普通工人的驚人富裕生活嚇呆了，他們看不出美國工人生活在地獄裏，是牛馬、是奴隸。

對中國現實的描繪也是神話式的。中國被說成是世界上最先進、最美好的國家。我們的領袖受到世界各國人民愛戴，我國的軍隊舉世無雙。蘇聯變成修正主義之後，世界革命的中心移到了北京，這是一種歷史趨勢：馬克思、恩格斯曾期望英、法、德首先爆發無產階級革命。他們的期望落空了，革命中心向東轉移到蘇俄。斯大林逝世後，由於赫魯曉夫的背叛，革命中心進一步東移，打敗一切帝、修、反，解放全人類的任務由中國人義不容辭地承擔起來。唯一的問題是有人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即復辟一種中國從未正式建立過的制度！)，被推翻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國民黨份子，以及右派和其他壞份子，成天躲在陰暗的角落策劃變天陰謀，他們一旦得逞，就會千百萬人頭落地。他們的方法是千方百計尋找黨內代理人，以及拉青年下水。因此，青年是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變色，世界革命能否成功的關鍵。

在文化方面，則是蒙昧主義盛行。本來，在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中，並不完全排斥所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優秀文化遺產」，毛本人也曾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要繼承。」但自從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之後，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作品都被視為「毒草」，被當成修正主義用來搞和平

演變的工具，毛既仇視又輕蔑地將其主人公稱為「死人」和「洋人」。當權者力圖使這一代青年與歷史的、世界的文明與文化絕緣。

在這種「興無滅資」、「思想革命化」的攻勢下，一切美的東西都是邪惡的、「資產階級的」，從莎士比亞的戲劇、普希金的詩歌，直到色彩鮮艷的的衣服、稍有樣式的皮鞋。在各項罪惡中，擁有知識是最突出、最普遍的罪過。毛在1964年就說過：「讀書越多越蠢」，這句話在文革中發展成了「讀書越多越反動」。知識份子幾乎一律成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被視為資本主義復辟的溫牀，改造的對象。中國幾千年尊師重道的傳統被打得粉碎，團幹部、班幹部、積極份子在課堂上頂撞、批判教師的事情屢見不鮮。文革一開始，中國培養教師的最高學府——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在譚厚蘭的帶領下，開赴山東曲阜，他們挖孔墓、砸孔廟、燒古籍、毀石碑、掘墳曝屍、揪人遊鬥，開萬人「徹底摧毀孔家店大會」。毛澤東一貫敵視和蔑視知識份子，樂於見到他們斯文掃地，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北大附中紅衛兵頭領彭小蒙時，毛問及批判北大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教授一事，他說：「他這種人，書讀了不少，可是越讀越反動。像他這樣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對人民還是有用的，可以掃掃地，搞搞衛生嘛……」⑤

人性論被當成典型的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思想，母愛、溫情、憐憫等等被視為革命鬥志的腐蝕劑。人與人的關係要麼是階級兄弟、革命戰友，要麼是階級敵人。人道主義原則被拋到九霄雲外，因此文革期間普遍發生這樣的事：「牛鬼蛇神」慘遭毒打，他們在生命垂危之際不讓送醫院，送去也得不到治療。據說，醫治階級敵人是對革命的犯罪。據鄭義回憶，在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附中，有一位性格多愁善感的女學生郭蘭惠以「愛看十八、十九世紀描寫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小說」為罪名遭到批鬥，她憤而服毒自殺。而同班

的紅衛兵「齊向東戰鬥組」稱郭為「反動學生」，警告醫生不得搶救。而醫院居然也停止搶救，將她移入停屍間，致使她幾天之後死亡。就在同一班上，一個姓王的學生親自帶領紅衛兵去抄自己的家，而且親自動手將自己的母親打死，而原因不過是她母親以前是小業主⑥。戴小艾在他的書中記載的情況在學生中普遍存在，當教師們遭到毒打和侮辱時，雖然明知加之於他們的罪名不可能成立，但他並沒有感到良心上的不安。他堅信黨不會錯，因此教師一定有甚麼罪過⑦。

由於毛澤東最得意的自我標榜是「無法無天」，青年學生不論在課堂上、書本中還在是其他場合，都沒有受過法制教育，因此在他們的頭腦中毫無尊重憲法和法律，尊重國際法和國際公約，保護宗教自由，保護財產和住宅不受侵犯這類意識。他們只知道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以革命名義為所欲為。對他們而言，毀廟宇、砸教堂，乃至火燒英國代辦處，都不是罪過，而是革命行動。

這裏有一個例子，可以看出中國青少年是如何自外於法律和文明的。一個前紅衛兵回憶說，在1963年秋天，當她和小夥伴正在草坪上玩耍時，突然聽到收音機裏廣播員的聲音：「美國總統肯尼迪遭刺身亡。」她們作何反應呢？「聽到這個消息，我們十幾個小夥伴頓時激動得擁抱成一團。在我們眼裏，黑暗的、反動的帝國主義滅亡的日子終於來到了！我們都認為那位刺殺肯尼迪的人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接下來我們很快就一起為這位英雄的命運擔憂：他會不會被逮捕？會不會被槍斃？他活着還是已經死了？我們激動地議論着，嘆息着。」二十多年後，她到美國，才明白肯尼迪被謀殺的這一天對美國人民意味着甚麼⑧。

在文革前的革命意識形態中，還有兩種因素對紅衛兵的影響至關重大。第一，學生被說成是天然具有小資產階級感情，他們溫情

脈脈，沒有工人農民那樣的革命徹底性和堅決性。於是，為了徹底革命，學生以粗鄙為榮，有意無意在言語和行動中表現痞子氣，甚至匪氣。文革初期首批紅衛兵放肆打人，就是獸性發作和表演兩種成分兼而有之。第二，根據革命的意識形態，立場是根本問題，方式、方法是枝節問題。比如，對於被指稱為階級敵人的人，首先要恨，要無情鬥爭，這是主要問題，如果不該打人而打了人，甚至打死了人，那叫做「沒有掌握好政策」，是枝節問題、次要問題，如果有人「出於革命義憤」而違反了政策，是不應受追究的，不然就是「對群眾的革命熱情潑冷水」。由於有這種標準，不少人寧願故意在「政策或策略」上犯「小錯誤」，以顯示自己的階級感情，他們知道自己不會被追究，因為誰也不願被說成是立場站在了敵人一邊。這種精神源於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文革前學生們對它已耳熟能詳。在這篇文章中，毛把當年共黨內外不少人稱為痞子的農民讚譽為「革命先鋒」，他竭力為「痞子運動」辯護，鼓吹那種動輒就抓人、捆人、戴高帽子、押人遊街的行徑，以及隨意衝入住宅，踏上小姐少奶奶牙牀去滾一滾的無賴心理。毛澤東把亂殺、亂打、亂搶稱為「矯枉必須過正」，認為革命運動「必須贊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他辯解說，決不存在「過份」問題，把造反行為當成是「糟得很」還是「好得很」，是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分界線。文革中，紅衛兵反復引證毛的這篇文章，以當痞子和暴民為榮。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學生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根據，不理睬工作組的勸阻和制止，在校園內設立「鬥鬼台」，給「黑幫份子」戴高帽子、掛黑牌、塗黑臉，拳打腳踢搞遊鬥。6月下旬到7月初，四川大學造反的學生與工作組多次辯論〈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否還適用於文革，工作組某些成員不贊成三十多年前農民運動的搞法，被學生斥責是「攻擊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

學說，否認人的階級性」。淩耿在回憶錄中說，1966年6月中旬學校裏鬥爭教師時，許多學生十分惶恐，態度不堅決，一個工作組員和校革籌主任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鼓勵學生⑨。另一個大學生回憶說，當年他們衝進校黨委辦公室裏去時，心中還是有點膽怯，完全倚仗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鼓吹的那種氣勢，他們趕走了黨委書記，佔領了裝飾豪華的辦公室。「小姐的牙牀也要滾一滾哪，就是那種感情。」⑩

三　鬥爭哲學

紅衛兵在文革中的思想和行為的突出特徵是偏激和好鬥。他們認為「亂」才是革命的表徵，「亂」才是事物的常態，他們把毛澤東的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當成金科玉律，動輒就宣稱要把一個地區搞得亂糟糟的，「越亂越好！」他們決不容忍異己之見，很少作出妥協，把任何事情都當成是原則和路線鬥爭，如果沒有中央強大的壓力，他們之間決不會聯合，相反，分裂倒往往被當成革命行動。他們作任何事都不會適可而止，不搞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決不罷手，他們只能破壞，不能建設。

這一切，仍然來源於60年代的意識形態，來源於馬列主義學說中固有的、又經毛澤東大大發揮了鬥爭哲學。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本來就把矛盾置於「事物運動的根本原因」這一特殊的、關鍵的地位，而毛澤東則作出更極端、更簡單化的概括，他聲稱：「無產階級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他在青少年時代就高聲叫出：「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在他的影響下，不論是老

一代共產黨人還是青年學生，都信奉鬥爭哲學，把中國的傳統教誨「中庸之道」貶得一錢不值。

提倡鬥爭、批判、分裂，反對調和、反對妥協，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及馬列主義政黨的傳統。馬克思、恩格斯對哥達綱領的批判，對拉薩爾的批判，對杜林哲學體系的批判，列寧對經驗批判主義的批判，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分裂，這一切都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經典事例，為許多青年學生知曉和津津樂道。中共內部的鬥爭更為人們熟悉，毛澤東與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瞿秋白等人的「路線鬥爭」早已載入教科書，成為光輝史績。這一切使得紅衛兵深信，鬥爭是必不可免的，鬥爭是事物發展和歷史進步的動力，鬥爭是革命者的本性。而且，最重要的鬥爭往往發生在革命隊伍內部。在文革中，最激進好鬥的紅衛兵組織被形容為「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因為他們一味攻擊與自己觀點相近的組織「右了」、「修了」。

在6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幾乎每一個大事都貫穿着鬥爭哲學的精神，都深刻地影響了青年學生的思維方式。比如，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連續發表了九篇論戰性長文，對蘇共的路線、方針、政策作出猛烈抨擊，這就是對青年學生影響甚大的「九評」。九篇文章中每一篇都充滿激進、好鬥、咄咄逼人的調子。比如，第五評題為〈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其中宣稱「當代侵略和戰爭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國主義」，它們搞「劊子手式的鎮壓」，而赫魯曉夫的政策則是「牧師式的欺騙」。第六評是〈兩種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該文指責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政策是「適應美帝國主義的和平欺騙政策的需要」，咒罵他「背叛全世界人民，妄想同美帝國主義合夥來主宰世界，到頭來決不會有好下場」。第七評是〈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該文宣稱「國際工人運動，同世界

上任何事物一樣，總是一分為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這種或那種修正主義。」在與蘇共的論戰中，中共還提出了自己對世界形勢的分析，即「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以上各論點，以及漫罵式的、尖刻的論戰語調，都被紅衛兵在文革中時時套用。尤其是在「革命造反派」的「內戰」中，給對方扣上「機會主義」、「分裂主義」的帽子，動不動就指控對方為「階級敵人安插在革命隊伍內部的代理人」，完全成了慣常的論爭模式。

1964年6月，在毛的指示和康生的策劃下，全國掀起了批判楊獻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合二而一」論的運動。毛指出，「合二而一」是階級調和論，是修正主義，只有「一分為二」才是馬克思主義。他認為這一表面上的哲學論爭是一場政治鬥爭，要求將這一鬥爭推向全社會。於是，全國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都紛紛寫文章、開會發言，聲討「合二而一」論，他們頭腦中樹立了一個牢固的觀念：鬥爭才是革命的、正確的，調和、妥協則是修正主義的、錯誤的。

這種鬥爭哲學的來源還不僅止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共產黨傳統，中國歷史和文化中也包含有這種因素。中共思想家偏愛和強調傳統文化中的這種要素，排斥其他因素，並無止境地放大這種傾向。正如白魯恂(Lucian W. Pye)所說：「沒有其他任何政治文化像中國政治文化那樣強調仇恨的感情。不論是把仇恨頌揚為積極的德行，還是力求發洩敵對情緒，中共都是把在現今中國政治中業已確定的傾向推到極端。」⑪非共產黨人魯迅在本世紀30年代的文章〈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就是主張鬥爭到底、決不寬容的典型，他提出「痛打落水狗」的口號，使得這篇文章在共產黨人中膾炙人口。從50年代起，此文就是中學生語文課本中的課文。魯迅的雜文以尖酸刻薄著名，它們也是紅衛兵在文革中攻擊敵方的重要的引證來源。

毛澤東在文革中把鬥爭哲學發揮到了極致，這裏只挑三則對紅衛兵最有影響的語錄為例。「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整和的餘地。」他在1967年夏天視察中國的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此時全國處於全面內戰狀態，他卻說：「有些地方前一向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鍊了群眾。」他後來甚至說：「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打一下，也是個鍛鍊。」毛在晚年對於鬥爭偏愛到了無以復加、無法理喻的地步，《人民日報》大張旗鼓宣傳的一條語錄是：「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毛自問自答：「不鬥則退，不鬥則垮，不鬥則修。」

到了運動後期，當毛澤東強行要求不同派別的紅衛兵聯合起來而得不到積極響應時，他大為不滿。他似乎不知道紅衛兵正是以他的話作為「最高指示」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紅衛兵的激進情緒還反映在他們的另一口號中：「傾左利於民，傾右利於敵。」

鬥爭哲學的核心是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毛澤東說：「要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在他看來，人類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史：「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人的屬性只是階級屬性：「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自1963年開始，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出現了一種階級鬥爭迷信，即把任何情況都當成是階級鬥爭的表現，處理任何事情都將其視為階級鬥爭。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在文革中，紅衛兵的一切殘忍行為，都是在階級鬥爭的名義下進行的。他們之所以對受害者毫無惻隱之心，之所以敢於鞭打自己的老師，敢於向自己的同學開槍，就在於把他們當成階級敵人。一

個學生串連時遇到這樣一件事：一個女紅衛兵把一支點燃的鞭炮塞到一個雙手被綁、兩眼被蒙的「走資派」的耳朵裏，鞭炮在他耳朵裏炸響了，他摔倒在地，哇哇亂叫。他責問那女孩，說這樣做是不是太狠了，她說，那人是階級敵人，這麼對待他還算輕的。1966年8月22日，上海市市長曹荻秋在集會上向大學生說，運動中不要打人。學生立即表示反對，說「打人不打人」的問題要作階級分析，籠統地講不要打人是不對的，缺乏階級分析。

從1949年到1966年，毛澤東平白無故地發起過許多次「階級鬥爭」，把一批又一批的人——不論是黨內的還是黨外的，是知識份子還是曾長期與他共事的戰友——打下去，比如1955年反對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957年的「反右」運動，以及1959年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在這一系列鬥爭中，毛建構了一種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分析形勢的思維模式，這是一個憑高度想像力虛構一幅階級鬥爭圖畫的方式。比如，當他向對手進攻時，他聲稱出現了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樹欲靜而風不止。」人們的任何言論都被他看成是為了奪權而造輿論、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他可以毫無根據地臆想出對方的政治綱領、結盟關係，形容對手或是「窺測方向，以求一逞」，或是「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當他無情地打垮對方之後，他總會把鬥爭的過程重塑為對方是有目的、有綱領、有組織、有步驟地從事階級鬥爭。這種分析和描述形勢的模式，憑想像虛構別人的動機、方式、人事關係的作法被文革中的紅衛兵(以及其他群眾)學習和摹仿。學生們可以把一所學校描繪為反共基地：校長是復辟舊制度的總司令，其餘幹部、教師是被安插在各要害部門的骨幹份子。紅衛兵也可以把對立組織的活動想像為是替「資產階級司令部」效力賣命，把對立派的活動與某隻「黑手」的操縱聯繫在一起。他們也學會了毛澤東區別對待、分解瓦解的策略，

孤立、打擊「一小撮壞頭頭」，爭取「廣大受蒙蔽的戰士」。總之，他們學得和毛一樣，不但好鬥，而且善鬥。

四　階級路線

文革中決定一個學生採取甚麼立場、態度或參加甚麼派別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家庭出身。紅衛兵運動的崛起以及迅速地向全國各地擴展，與所謂的「血統論」的猖獗密不可分，這種血統論的精神集中體現在紅衛兵發起者鼓吹的對聯之中：「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文革中學生之間第一個回合的鬥爭，就發生在上述對聯的鼓吹者和受害者之間，最後以中央文革將對聯宣布為「資產階級反對路線」的表現，廣大非紅五類⑫學生取得勝利而告終。其實，文革中血統論的泛起並不是偶然的，它不過是文革前黨的階級路線的延伸，該路線的社會歧視和不公正的本質原來由一層「政策」的面紗遮掩起來，文革一開始，首批紅衛兵就造這個政策的反，這些少不更事的「闖將」要求一種赤裸裸的、更極端的歧視。

不論是文革前黨的文件、報紙社論，還是文革中血統論紅衛兵的文章，都把這種將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政策稱為「階級路線」，但是，幾乎沒有人指出，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傳統中，這個路線是完全名實不符的，沒有任何合法地位的。

按照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解釋，階級路線應指：「無產階級政黨在不同的革命階段，根據當時革命的性質和任務，在分析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革命態度的基礎上提出的分清敵、我、友，確立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基本政策。」⑬

但是，自50年代起在中國大陸執行的階級路線，指的是根據人們的家庭出身而給予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社會待遇的政策。

如果嚴格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定義，那麼只能說這二者是風牛馬不相及的。在正統定義中，階級路線涉及作為階級或階層的群體，而不涉及個人；它依據的是群體中人們由經濟狀況而決定的階級地位，而與他們的家庭出身毫無關係。比如，學生都知道，許多革命導師、革命領袖都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但這並未妨礙他們參加和領導推翻剝削階級的革命。革命隊伍甚至吸收和容納過本人曾為地主、資本家、軍閥等的人，革命要消滅他們所屬的階級，但他們作為個人則有可能、有資格進入革命隊伍。

可以說，按照正統含義解釋的階級路線，在馬克思主義範圍內是有合法地位的，而那種根據家庭出身區別對待的政策，則是沒有根據的。但在實際上，它卻是中國社會中最嚴峻的現實。這說明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中共政策與純正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大異其趣，而和封建傳統有割不斷的聯繫。必須指出，儘管這裏強調，即使按正統馬列主義的標準，所謂的階級路線也是沒有根據的，但它的不合理從根本上講卻不在於不符合馬列主義。從法律和人權的角度看，基於家庭出身產生的歧視和基於種族、宗教信仰、性別產生的歧視一樣是應受譴責的。

中共的意識形態機器從來沒有認真論證過(哪怕是依據馬克思主義原理)這項歧視政策的合理性(倒是老紅衛兵的著名文章〈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提出了坦率的理由：「幾千年來，地主老爺傳宗接代維持統治還不是要依靠家傳嗎？」)，但它的施行是毫不含糊的，它的含義決不僅在意識形態方面，即它不是只決定一個青年能享受多少革命的機會和權利，它決定的是青年的政治身分、社會地位、個人利益。對青年學生而言，最關鍵的是升入大學的機會。

它的實際內涵，最明確地體現在大學入學政治審查關於家庭出身的標準和規條中，也體現在學生為取得政治身分(比如入團)而受制於家庭出身的條件中。

毫無疑問，這項歧視政策不但會引起學生之間關係緊張，而且會引起社會關係緊張，以及大多數人與黨的關係緊張。因此，黨實施這個方針的嚴厲程度，與它一般地執行溫和政策還是激進政策有關。比如，在大躍進慘遭失敗之後，中共一度(在1960年至1962年)實行寬鬆政策，因此陳毅在1961年代表黨中央對北京高校畢業生講話時說⑭：

> 對剝削階級出身的青年學生，不應該片面強調他們的家庭出身問題……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青年並不妨礙他們成為革命者……對各種家庭出身的子弟我們都要同對待工農子弟一樣，當成我們自己的子弟來教育，不應該在工農青年和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之間劃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

這種講話精神從來不會得到認真貫徹，但它確實是政治氣氛寬鬆的風向標。但是，大約從1963年起，由於毛澤東在上一年夏天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大講階級鬥爭，階級路線的施行就嚴格起來。1964年6月，胡耀邦(當時的團中央第一書記)在共青團九大的報告中強調就是另一面，他的寬大只表現在承認地主、富農和其他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本人不是剝削份子，但同時強調，因為他們生長在剝削階級家庭，受到家庭影響，因此對他們的工作是「爭取，教育，改造」的問題⑮。緊接着，《人民日報》在8月3日的社論中，把接班人問題和家庭出身緊密聯繫在一起，宣稱「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的領導核心中，必須注意使成分好、出身好同時又經過長期的階級鬥爭鍛鍊的人佔絕大多數。這是保證我們的革命隊伍和領導核心永不變色的階級基礎。」

1965年1月31日，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在青年和學生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宣布在家庭出身問題上的「重在表現」政策。同年9月9日(時隔大半年，耐人尋味！)《中國青年報》發表社論〈重在表現是黨的階級政策〉。

這是文革前中共關於階級路線提法的最後版本，文革初期學生對它的反應一度成為把他們置於不同地位，劃分為不同派別的分界線。它的含義和後果值得在此詳加分析。

第一，這個方針的本質仍然是把青年劃分為不同的等級，把一部分人當成是可以依靠的，把出身不好的青年當成充其量是可以改造的，對他們實行團結、教育的方針。但是，由於它畢竟給出身於中等家庭或不好家庭的人提供了希望，指示了一條出路，因此獲得了他們的擁護。由於黨許諾對於「表現好」的人也可依賴與使用，他們爆發出十倍的熱情，時時、處處作出「表現」。這在客觀上加劇了學生之間的競爭，尤其是出身好的學生與出身中等的學生之間的競爭。後者的家庭不屬於「剝削階級」或「反動份子」，從來沒有對前途徹底絕望過，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人成績好，而且入了團，當上團幹部或班幹部，因此很可能以自己的後天行為與好出身學生的先天優勢抗衡。這兩部分人各自發揮自身優勢，互不服氣，他們把激烈的競爭帶入文革之中。而且，這種競爭使學生的思想和行為日趨激進，因為不論出身好的學生要發揮自己的固有優勢，還是其他學生力圖彌補先天不足，他們的努力方向都是在政治方面，都要證明自己的階級立場多麼堅定，階級感情多麼充沛。這促使他們競相比賽，看誰對黨和毛澤東更熱愛，對「階級敵人」更仇恨。

第二，實際執行情況。在大多數情況下，「重在表現」方針給非紅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提供的只是安慰和渺茫的希望，表現這一因素所起的作用遠遠不如出身這一因素。不過這項政策也給某些力圖

執行溫和政策的校長、教師提供了理由，使他們能夠起用品學兼優的出生於中等乃至「壞」家庭的學生。在文革開始時，這些校長、教師和學生都受到猛烈攻擊，受重用的學生被攻擊為「修正主義苗子」，平時忌恨他們的人趁機批判、虐待他們。由於平時的能力和威望，以及不甘寂寞的心態，這部分人往往在血統論失勢後成為造反派紅衛兵的頭領。

在文革中，「重在表現」的政策被血統論者大加批判，說成是「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綱領」，因為它使一些非紅五類的學生有可能與紅五類學生平起平坐，這是血統論者絕對不能容忍的。另外，代表黨中央提出這項政策的人是彭真，他是文革中首批倒台的「黑幫」之一，血統論者乘機把這項政策說成是彭真的個人陰謀。另一方面，不少中等家庭出身的學生仍然堅信「重在表現」，企圖以「革命」行為(包括革自己家庭的命)彌補出身的缺陷，他們把自己對於紅五類學生的不服氣轉化成極端的、不顧一切地追隨毛澤東的行為，以此證明：「我們雖然出身不紅，但革起命來並不比你們差。」

五　非官方因素：人性與文明的潛流

在文革前，官方力圖在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搞「興無滅資」，即用階級性代替人性，用鬥爭代替友愛，用禁欲主義代替愛情，用苦行主義代替像樣的物質生活，雖然它取得了極大的、驚人的成功，但決不可以說，他們已經成功地把全體中國人完全變成了失去人的本性，只知道服從的機器人，也決不可以說，中國青年學生完全失去了人道主義感情和判別是非的能力，全然是沒有頭腦和靈魂和工具。

實際上，人對於真、善、美有一種基本的直覺能力，人的是非之心、善惡之心、惻隱之心，不論受到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多麼大的扭曲和壓制，也不會完全泯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這種善良願望和正義感，總會或多或少地在大多數人身上存留。就算人們的人性可能一時迷誤，他們的天良總會或遲或早地覺醒，對人性的壓制和扭曲超過一定限度，就會失效，甚至適得其反，文革的經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另外，意識形態的控制畢竟有其限度，儘管當局已將其發揮到了極點。青年學生總有一些途徑接觸到非官方宣傳的觀點，它們也許來自家長、哥哥姐姐、親戚，也許來自鄰居、朋友，也許來自個別同學或者老師。這些人當中，有的可能是「舊」社會的上層人士，是在西方或國內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有的可能是「右派份子」，或對黨內鬥爭的複雜和殘酷有所了解的知識份子黨員，也有可能是受過不公正懲處的各種人。總之，官方意識形態不可能真正佔領人們的頭腦，從而徹底控制或改造人的思想。

還應該看到，官方意識形態的基礎——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極為龐雜的思想體系。不錯，馬克思強調階級鬥爭，主張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仍然不是中國封建專制制度中「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昧教義，也不是德國法西斯的種族主義，它在原則上認同人類公認的社會平等、個人自由、消滅剝削和壓迫的人道主義目標。在「興無滅資」的強大攻勢和階級鬥爭的喧囂聲中，仍有不少人——儘管他們虔信馬克思主義——沒有忘卻，並力圖堅持馬克思認同的終極目標。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堅持一種人性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我的經驗和採訪表明，在各種非官方意識形態影響中，對紅衛兵一代人最重要的是西方文學作品中蘊含的人性和人道主義精神。

人們從大量翻譯的外國古典文學名著中深受人道主義的熏染，使自己獲得一種精神力量，在殘忍的鬥爭和醜惡的現實中追求精神的獨立、崇高、自由，固守人類文明一致認同的準則。有一部分學生——他們人數雖少但影響很大——在文革前的「思想革命化」運動中雖然狂熱地追隨官方意識形態，但他們心靈的動力卻是普遍的人性觀而非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學說，他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因為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關於人類自由的思想武器，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在他們的理想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西方文學作品對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思想產生深刻影響，使他們在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受到啟發和鼓舞，從而反抗專制壓迫，追求個性自由，這實在是一件源遠流長的事。這一點在五四時期和之後尤為明顯。歌德 (Johann W. von Goethe) 的《少年維特之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易卜生 (Henrik Ibsen) 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 等作品，使許許多多年輕人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向。他們與封建家庭、封建社會決裂，追求婚姻自由和個性解放。我們甚至可以說，相當多的知識份子之所以投奔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就是受一般的自由、平等、博愛理想的激勵。這種通過文學作品發揮的影響遠遠超過其他西方作品的影響。這是因為，第一，中華民族是一個重感性、有文學素養的民族，文學作品最容易影響人們的生活態度；第二，與此相關，近代中國從西方翻譯的書籍中，文學作品的份量遠遠超過其他著作。大多數知識份子革命者在投奔共產黨之前 (乃至之後) 沒有讀過《共產黨宣言》，讀過《資本論》的人更是屈指可數。但他們中許多人卻讀過拜倫 (George G. Byron)、雪萊 (Percy B. Shelley)、雨果 (Victor Hugo)、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等人的作品。

中共接管政權之後，翻譯和發行外國文學作品的工作並沒有停止，甚至更系統、更有組織地進行。列寧曾經說過，只有用人類的全部文化知識武裝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這句話對有些主管文化的官員是有效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當局對西方文學的政策是批判地繼承，他們想盡量利用西方文學作品中的革命因素。在巴爾扎克 (Honore de Balzac) 的《高老頭》(*Pere Goriot*)，薩克雷 (William M. Thackeray) 的《名利場》(*Vanity Fair*)，馬克・吐溫 (Mark Twain) 的《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 A Tale of Today*) 等作品中，官方理論家強調的是作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揭露和批判。在拜倫和雪萊的詩歌中，他們強調革命精神和對統治階級的反抗。他們想借助外國文藝作品中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加強自己革命的意識形態，即利用其中對於舊制度、舊文化的反叛與鞭撻，以及對社會變革嚮往的情緒，他們自認為有能力抹殺和貶抑其中的人道主義因素。

對外國經典文學名著的批判一直在有組織地進行，但這種批判並不能組達到預想的目的。年輕人也許沒有能力否定那種批判，但只要他們閱讀作品，就會受到巨大的吸引。許多優秀學生的思想、人格、靈魂都具有二重性，上海著名的造反派紅衛兵首領安文江的話很有代表性⑯：

> 在學校裏我受着正統教育……一放學我就拜倒在莫泊桑、契訶夫、托爾斯泰、馬克・吐溫和魯迅、巴金、徐志摩、郁達夫的腳下。……學校門外有我自由的小天地：書籍。這樣，我就受着完全不同的兩種教育。學校裏既有系統扎實的知識傳授，又有「興無滅資」的教誨和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的熏陶；走出校門就對不起了，人情、人性、人道通過迷人的藝術形象感化着我。前一個我企盼紅色的革命、鬥爭；後一個我嚮往綠色的自由、溫馨。《雷鋒之歌》激勵我摒棄自我，「每一聲呼吸都是

革命革命革命！」《紅與黑》的于連又引導我個人奮鬥走出昨天的清貧與低賤……前者給我心靈的震撼，後者給我靈魂的纖顫。震撼比纖顫強烈，纖顫又比震撼久遠。從中學到大學，兩個迥異的自我不斷地搏鬥扭殺，切割着我的個性。

與一般人的想像相反，文革中雖然每一部優秀作品都被打成了「大毒草」，但它們流傳得卻比文革前更廣泛更迅速。雖然文革初期有一個「破四舊」運動，各大學、中學圖書館被清理，「毒草」書籍被挑出來焚燒，或者送到造紙廠化成紙漿，但這種破壞是很不徹底的。因此，許多圖書館仍然保留了很多優秀著作。在文革失去控制和管理的情況下，學生們幾乎可以任意去圖書館挑選書籍。而在文革前，這些書籍已不能自由借閱。許多「反動學術權威」和「黑幫份子」的私人藏書被紅衛兵抄家拿走，但卻在學生中廣泛流傳。更有甚者，各地區、市、省一級圖書館中許多書籍被偷盜或搶竊，流失到社會上，發揮了它們以前不能發揮的作用。

除了借閱途徑被堵塞，文革前書禁的另一原因是班主任、團支部的監護作用。他們密切注意每個學生的動向，誰愛看外國小說，或者顯露出受外國小說影響的迹象，就會受到勸阻、警告乃至批判。而在文革中，一切羈絆和禁忌都消除了。在採訪中，許多紅衛兵告訴我，他們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都大量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在文革前是躲躲閃閃地讀，而在文革中則是大張旗鼓地讀，而且進行公開、熱烈的討論。

文藝作品中人性力量十分強大和有感染力，超過了其他許多東西。在文革前，愛看西方小說往往是一件受到懷疑和指責的事，對一個「追求進步」的學生，是「前進道路上的障礙」。但是，不管怎麼貶抑，那些有西方文學修養的學生止不住有一種優越感，他們感到自己對人生的理解更深刻，感情更真實更細膩，他們帶着這種優越

感進入文革，將這種優越感轉化為對於人格尊嚴和精神獨立的捍衛與追求。許多青年學生，可以廢寢忘食地學習毛著，可以批判自己的家庭，但很少人真心拋棄那些「資產階級黑貨」。這看起來是一個矛盾，但卻是許多紅衛兵都有親身體驗的事實。

如果我們認真思考一下，就可以發現當時所指的西方文學名著，實際上有兩類。一類如《紅與黑》(*Rouge et le noir*)，《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它們捍衛和頌揚人的正常情欲和個性。另一類是俄羅斯作家如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屠格涅夫 (Ivan S. Turgenev) 等人的作品，它們表現出悲天憫人的情懷，對自我的無情審視和批判，對黑暗時代的詛咒，對公平、合理社會的嚮往。顯然，後一類作品比前一類作品的個人主義色彩弱，而革命性較強，而且也很顯然，它們對中國人的影響更廣更深。俄羅斯文學從本世紀初影響中國的知識份子，它那追求真理、忍受苦難、嚴於律己、勇於獻身的精神，既可以說鑄造了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心靈，也可以說天然地與他們的感情產生共鳴。這種精神曾受到布爾什維克的利用和讚揚，但對中國紅衛兵這一代青年學生而言，它們的作用開始表現為革命的狂熱，虛幻的濟世主義和天真的民粹主義，後來表現為對真理和生活意義的艱苦不懈地追求與探索，以及勇敢地承受苦難與犧牲。

註釋

①② George Mosse, *Nazi Culture*, trans. Salvator Attanasio, et al.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68), xxiii.

③④ 劉曉慶：《我這八年》(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2)，頁82；66。

⑤ 佚名：〈寫血書給毛澤東——一個女紅衛兵的自述〉，《明報月刊》，1990年3月號，頁92。

⑥ 鄭義：〈甚麼是紅衛兵，甚麼是太子黨？〉，《九十年代》，1992年7月號，頁89、90。

⑦ Gordan A. Bennett and Ronald N. Montaperto, *Red Guard: 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i Hsiao-ai*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71), 42.

⑧ 周勵：《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頁79-80。

⑨ 凌耿著，丁廣馨等譯：《天讎》，中譯本(香港：新境傳播公司，1972)，頁6。

⑩ 〈一個老紅衛兵的自白〉，載馮驥才編：《一百個人的十年》(南京：江蘇出版社，1991)，頁218。

⑪ Lucian W. Pye, "Hostility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Politics", *Problems of Communism* XVII, no. 3 (May-June 1968): 10.

⑫ 文革中，鼓吹血統論的首批紅衛兵把「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稱為「紅五類」，把「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壞份子」稱為「黑五類」，把教師、職員、醫生、科技人員等稱為「麻類」或「灰類」，認為這三類人的子女因家庭出身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階級立場和階級感情，因而應當有不同的政治待遇。

⑬ 參見《辭海．政治法律分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8)，頁5；以及高放主編：《社會主義大辭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13。

⑭ 陳毅：〈對北京市高等院校應屆畢業學生的講話〉，《中國青年》，1961年第17期，頁4。

⑮ 胡耀邦：〈為我國青年革命化而鬥爭——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一日在中國共產黨主義青年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中國青年》，1964年第14期，頁14。

⑯ 安文江：〈我不懺悔〉，載《千秋功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頁280。

第三章
紅衛兵的區別和派別

紅衛兵運動決不是統一的運動，紅衛兵和共青團不一樣，不是全國性的統一組織，沒有統一的綱領和政策。事實上，紅衛兵運動的最大特徵就是它的不統一性：全國有成千上萬個組織，最大最著名的可以在全國各地指手劃腳，最小的則由三、五個少年組成，各地區，各學校內部進行着曠日持久、勢不兩立的派別鬥爭。這一點，對於親身投入運動的青年學生，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但對於許多局外人，卻是難於理解，甚至至今也弄不明白的事情。對於文革初期受迫害的「牛鬼蛇神」和「黑幫份子」，紅衛兵意味着那些由紅五類子弟組成，手舞皮鞭、凶狠殘暴的施虐者，對於運動中期受衝擊和迫害的當權派，紅衛兵意味着被中央文革小組蒙騙和指使，「頭上長角，身上長刺」，「踢開黨委鬧革命」的造反派。對於國外人士和現在的年輕一代，紅衛兵是一些喪失理智、瘋瘋癲癲的偏激狂，他們身着黃軍裝，手裏揮動毛的小紅書，為了莫名奇妙的目的去衝殺，既毀了文化和社會秩序，也毀了自己的前途。

事實上，紅衛兵的組織和運動，紅衛兵的思想和行為，在不同地區、不同年齡段中，在運動的不同階段，呈現出千差萬別。總

之，不能因為「紅衛兵」這個單一名稱而把文革中捲入運動的一切學生視為一類，不能用一個模式研究他們的思想及行為。

討論紅衛兵的差異，我們怎樣選擇作為分析單位的紅衛兵組織和派別呢？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李鴻永和駱思典曾就廣東造反派紅衛兵的派別活動發生過爭論，李鴻永認為，他們的觀點在實質上並無多大差異，但在方法上有區別：駱思典的分析是在學校層次，而他是在省級層次①。李鴻永曾詳細研究過紅衛兵在各種層次上的組織，照他看來，它們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五種類型：一，每個學校的組織，這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二，以學校組織為基礎形成的總部或司令部；三，在總部之上形成的派別聯盟；四，以學校和司令部為基礎，為某一特定的短期目標而設立的協調性組織，如「批陶聯絡站」；五，文革最後階段成立的紅衛兵代表大會。

對於這種分類法的優點和缺陷，這裏不予置評。本書的分析，也和李鴻永一樣，以省級水平為基礎，即他的五種類型劃分的第三種。這麼做的理由是，第一，隨着運動的發展，紅衛兵組織(和其他行業的組織一樣)不斷地聯合和結盟，直至省一級水平；第二，不存在超過省一級水平的紅衛兵組織和其他群眾組織，因為中央明令不允許成立這樣的組織(中共中央、國務院於1967年2月12日發出「關於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告」)，北京當局曾取締過一些全國性組織，如「全紅總」(「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1968年7月，由廣東紅旗派頭領武傳斌倡議，在北航開了一個全國造反派聯席會議，但立即受到中央追查；第三，文革中重要的政治活動和政治事件，一般是以省為單位發生的，如群眾組織的派別鬥爭，與軍隊的結盟關係，對某些幹部定性的爭論，等等。當然，在省級之下也有特定的派別活動，但如果不上升到或聯繫到省級水平的活動，就不能充分説明問題。另外，需要對形勢作跨省分析的並不多，偶爾有這樣的情況：

一個大軍區統轄大約三個省的部隊，軍區的態度和政策會使這幾省的形勢有共同性。比如河南省軍區隸屬武漢軍區，它就受命支持保守派、壓制造反派。但這既不帶規律性，也不是十分重要。

例外情況也有，比如兩個省級直轄市北京和上海，就沒有全市性統一的紅衛兵組織。另外，當某省有一個和省會在重要性和規模上不相上下的城市，全省的派別統一性就會減弱。比如，在四川，成都的「紅成」和重慶的「八・一五」，成都的「八・二六」和重慶的「反到底」在觀點上完全一致，而且相互支援，但卻沒有形成全省性統一的紅衛兵派別，而是各自左右川西和川東的運動。當「八・一五」由於有五十四軍大力支持而得勢時，「紅成」並未分享到這種好處，而當「紅成」由於「打倒劉結挺、張西挺」慘遭失敗時，其親密戰友「八・一五」也未受直接牽連。在福建，「促聯」和「革聯」同是造反派組織，屬於省一級的聯合體「八・二九總部」，但這兩派在廈門卻相互鬥爭，大打出手，而在福州，這兩派則聯合起來，與「二月鎮反」中復活的保守組織「革造」鬥爭。

一般而言，省一級的組織或聯盟是學生、工人、市民、農民、幹部的複合體，全省或各地的派別鬥爭是在統一旗號下進行的，如廣東的「紅旗」派和「東風」派，廣西的「四・二二」與「聯指」。在本書的某些敍述中，如果不便區分，我將用紅衛兵組織所隸屬的更大派別來指稱它們(在不少情況下，大學生紅衛兵是一個地區群眾運動的核心，因此不少省份以某個紅衛兵組織的稱呼來代表一大派別的稱呼，如重慶的「八・一五」派、江蘇「八・二七」派等等)，描述它們之間的對立和鬥爭。事實上，對於研究文革中群眾組織的派別對立和鬥爭，單獨的紅衛兵組織並不總是恰當的分析單位。

一個學生接受哪一派的觀點，參加哪一個組織，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還有偶然因素起作用。但是，一般而言，在隸

屬於某派之後，他(或她)的觀點、立場就很少發生改變，開始選擇時的決定因素固然繼續起作用，更重要的是，人們習慣於從單一渠道，即從本派、本組織接受信息。雖然人們有機會在大街上買各種報紙，得到各種傳單，看各種大字報，但一個局外人很難在各種紛雜對立的消息中作出判斷，學生們從派性出發決定自己相信或不相信，喜歡或不喜歡某種消息。能夠自行判斷形勢而改變觀點的人屈指可數，只有在發生嚴重政治危機——往往是最高當局宣布某組織犯了嚴重錯誤——時，才有一些人退出自己所在組織，其中有些人還會加入取得勝利的派別。

我在本章力圖說明，就全國範圍而言，紅衛兵的派別劃分和派別鬥爭情況大致如下。最初成立的紅衛兵持血統論觀點，思想和行為較為一致(他們被視為保守派，儘管其中少數發起者曾造過本校領導和工作組的反，北京的老紅衛兵到外地一般也造反)，接着出現了造反派紅衛兵，兩派的鬥爭不斷，且愈演愈烈。保守派一般在1966年年底或1967年年初被打垮，個別地區在1967年2、3月曾有短暫恢復，更個別地區直至1967年夏才徹底瓦解(保守派始終未垮的特殊情況將作專論)。在此之後，派性主要表現為造反派內部兩派的鬥爭，這兩派分歧往往起始於保守派垮台之前，他們大致可以分為溫和派和激進派。由於這幅圖景還未被國內外文革研究者所確認，我在後面將着力加以說明和證明。

一　地區差別

中國幅員遼闊，文革期間開展運動的省、直轄市和民族自治區共有二十九個，紅衛兵運動在各個地區呈現出很大差別，如果以對

某一地區的研究來歸納全國紅衛兵運動的特點，就會犯以偏概全的錯誤。

區別首先存在於北京和外地之間。北京是紅衛兵運動的發祥地，如果說紅衛兵的發起者有自己強烈的政見，曾冒着被打成非法組織的危險自發地組織了紅衛兵，那麼外地的同類組織只是一種響應和摹仿而已。外地的首批紅衛兵是在北京串連紅衛兵或當地黨委的鼓動、指導、扶植下成立的，他們遠沒有北京首批紅衛兵那樣的政治抱負，表現不出理想色彩，而顯得像追隨者和僱佣軍。這種區別在保守派失勢之後更加明顯，北京的老兵表現出頑強的抗爭，在大勢已去之後，還有人狂熱地進行理論探討，他們的探索從高層政治擴展到社會制度、經濟體制，甚至有人衝破官方意識形態，研究當代西方最新的文藝和哲學思潮。他們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卻像隕星一樣，短暫地、然而強烈地發出過耀眼的光輝。而外地的追隨者則多是得勢時一哄而起，失敗時如樹倒猢猻散，在文革史上未留下值得一提的事迹。

對於繼起的造反派紅衛兵來說，北京和外地的巨大差別仍然存在，首都紅衛兵倚仗與中央文革小組的直接聯繫，到各地去煽風點火，炮轟省委、火燒市委，各地黨政領導對他們又恨又怕，當地造反派則把他們奉若神明。他們在全國各省設立聯絡站，干預和指揮當地運動，被稱為「救世主」和「太上皇」，當地組織以與他們關係密切為榮。外地紅衛兵組織能扮演相同角色的大概只有一個，這就是地位特殊的「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在某些情況下能看出這樣一種趨勢，即離北京越近的紅衛兵，表現得越自信，能量越大。比如，首都紅衛兵在武漢設有聯絡站，而武漢的紅衛兵又去廣州設聯絡站，他們和首都紅衛兵一道在廣州出頭露面、指手劃腳。

這一切都是因為靠近天子而八面威風，首都紅衛兵可以揮舞真

正的尚方寶劍在外地驕橫一世，也可以亮出假尚方寶劍嚇唬老實人。這種地位決定了首都紅衛兵高度政治化這一特點。雖然所有的紅衛兵組織在某種意義上都是高度政治化的，但這裏的提法有特殊的含義。

第一，與外地的紅衛兵相比較，北京的紅衛兵往往根據內部消息和靠山的指示或暗示採取行動，他們的所作所為自發程度較低。而外地的紅衛兵不那麼容易得到上層的內部指示，需要根據關於文革理論，當地形勢和自己的信念以及利害來作出判斷。比如，著名的清華井岡山兵團就是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勵和支持下才成立的，那是在1966後9月中旬，形勢很不明朗，清華大學的少數造反派處境十分艱苦，中央文革小組於9月17至20日連續四天和蒯大富等人座談，蒯才回校組織了井岡山紅衛兵。

第二，與上一點有關，北京幾大著名的紅衛兵組織在作出判斷和行動時含有較大的機會主義成分，在作出決策時，不是根據事件本身和自己的信念，而是看它的來頭和背景，有時甚至是在冒險和押寶。比如，在出現攻擊謝富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副總理、公安部長)的風向時，有的頭領叫手下人收集、整理兩種截然不同的材料，準備根據形勢的不同發展擇一拋出，其中一份用於打謝，內容是謝的政治歷史問題和「反毛澤東思想」言論，另一份用於保謝，羅列事件證明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第三，北京幾個著名紅衛兵組織的派別結盟很大程度上是無原則的、機會主義的，而不是像外地一樣，政治派別的聯盟反映了一定的政治觀點和社會矛盾。比如，不論從造反經歷還是從觀點、政策中的激進傾向看，蒯大富的「清華井岡山兵團」都應屬於地派，但他們偏偏屬於天派。原因僅僅是因為他們本校的對立組織「四．一四」在社會上受到地派的支持。而北京大學的井岡山兵團，雖然原

先得到蒯大富的清華井岡山兵團支持，雖然它的第二號頭目一度是著名的科學家周培源（他在文革中一直受周恩來支持），但因為與聶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屬天派）對立，因而屬於地派。

第四，正因為接近高層政治人物並直接捲入最高層政治鬥爭，北京的紅衛兵最先覺察出政治鬥爭的黑暗與殘忍，最先感受到文革中的鬥爭並非事關原則和路線，而是一場宮廷內鬥，紅衛兵不過是當權者政治棋盤上的小卒，因此他們雖然投入得最狂熱，但也覺醒得最早。不論是早期保守派的「聯動」，還是中期的「三司」成員，其中退出文革，對文革持否定態度者，比外地相同派別的紅衛兵更多、更早。同樣是由於高度政治化的關係，他們最早的疏離來自對文革小組成員政客手腕的反感和震驚，以及關於他們過去生活和歷史的種種傳言。而外地紅衛兵的覺醒更帶社會性，他們在串連和下鄉時發現普通百姓過着驚人的貧窮生活，這使他們從「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迷夢中驚醒。

不知是由於學生自身的原因，還是中央的原因（不願意身邊有一個強大、統一、難於控制的群眾組織），北京的紅衛兵運動還有以下特點。他們始終沒有按觀點形成統一的組織，大學生中的所謂「天派」、「地派」，中學生中的所謂「四．三」派和「四．四」派，只是因為在主張和傾向上有共同之處而獲得的稱呼，不存在統一的綱領和行動。北京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在運動中基本上是各幹各的，組織上也不統一的（只有少數幾所大學與自己的附屬中學之間關係密切一些）。而在外地的多數地方，大中學生在組織上和行動上是統一的，中學的組織乾脆就是大學生某派或某組織的分團或支隊。北京的紅衛兵也沒有和工人、農民、市民、幹部等其他階層的群眾組織形成更大的、統一的派別聯盟，更談不上與某些部隊結盟，將其作為自己的後盾。他們完全是單幹，他們的靠山就是中央文革，因

此，他們在文革派用得着的時候，顯得能量極大，不但左右了北京的運動，而且在全國各地呼風喚雨，幾乎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理人，但他們本身並沒有成為強大的社會力量，一旦毛感到他們用處不大甚至礙事了，叫他們退下政治舞台他們就得滾蛋，雖然極度不情願，但一點也沒有抗衡和討價還價的餘地。外地則不是這樣，許多地方學生和工農兵及幹部結成一體，在某些情況下敢於抗命中央甚至取得成功，廣西的「四．二二」，廣東的「東風」派就是例子。在北京，工人宣傳隊一進校就把學生收拾得服服貼貼，而在外地，因為原來的派性關係繼續存在，工宣隊進校並不意味着學生完全失去作用。

上海的情況與北京有類似之處，而與全國其餘大多數地方不同。上海的紅衛兵也沒有形成全市性的統一組織(保守的「上海市大專院校總部」和「上海市中等學校紅衛兵總部」是例外，但它們只存在了三個多月)，雖然有「紅三司」(「紅衛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上三司」(「上海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紅革會」(以復旦大學「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為首的組織，「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等跨校組織，但其規模和影響與其他地方相距甚遠。上海中學生的統一性要強於大學生，但也未達到全市性的統一。支持「紅革會」，反張春橋的造反派有一個聯合體「中串會」(「中學生串連會」)，在全市範圍活動，能量很大，但人數不多，內部聯繫鬆散。上海中學生紅衛兵的特點是按區實現了組織統一，比如有「紅西南」(「紅衛兵上海西南地區指揮部」)和相應的「紅東北」等，因為在上海，中學歸區一級教育局管轄，中學生主要關注本校本區之事，與大學生和市一級活動聯繫較少。

與全國其他地方不同的是，上海的紅衛兵也沒有與工人等其他群眾組織形成更大的派別。與北京不同的是，他們在上海的運動中不唱主角。在上海，文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工人，運動初期保守的

「赤衛隊」(「上海捍衛毛澤東思想赤衛隊總部」) 曾活躍一時，而自1967年起，則由「工總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控制局勢。和北京一樣，上海也沒有出現社會失控局面，不論是原上海市委領導，還是以張春橋為首的革委會，在每一個階段都調動了領導力量 (黨委、工作組、聯絡員，等等) 控制運動，幾乎在任何階段都沒有出現過權力真空，因此，除了在1966年接近年底攻擊市委，在1967年1月底和4月中兩次發動炮打張春橋活動之外，上海的紅衛兵沒有多少引人注目的表現。

在全國範圍，紅衛兵的活動大致有以下特點：一，向兩極化發展 (開始是造反派與保守派，後來是造反派內部兩派)，並形成統一組織；二，與工人、農民、幹部組織形成大派，並往往在其中起領導作用；三，與當地駐軍中的某部分力量結成或明或暗的聯盟。這些共通之處，是北京、上海的紅衛兵運動所沒有的，這些特點表明大多數地區紅衛兵運動的自發性要強得多，從而運動的反覆、曲折也多，使鬥爭曠日持久。

某個地區群眾運動呈現的面貌，與當地由於歷史原因而形成的民風和習俗有一定關係，紅衛兵運動也多少染上了當地風土人情的色彩。比如，上海是中國受資本主義影響最深的地方，那裏凡事講究秩序和章法，人們的舉止也相對理智和文明。文革中，上海是全國最穩定的地方，群眾鬥爭起來大多「君子動口不動手」。「工總司」攻打「上柴聯司」算是例外的野蠻行徑，但比起廣西、四川的武鬥則算不上是了不起的大事。廣西是洪秀全金田起義發源之地，民風粗悍，國民黨的桂軍即以驍勇善戰著稱。在文革中，廣西武鬥殘忍程度居全國之首，在一些地區甚至發生大規模槍殺群眾和吃人事件。四川是一個多事之地，俗話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這話在文革中得到應驗。四川派性鬥爭嚴重，武鬥層出不

窮，紅衛兵和軍隊的矛盾，和中央欽命幹部的矛盾長期糾纏不休，雖然人們常說「爛透了就會好起來」，雖然毛說「四川很有希望」，但在四川，卻總是只見爛，不見好，長久無希望。

兩湖之人也有特徵。人云「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湖北人之倔和犟，在全國出名。當地的「百萬雄師」，敢於扣押中央代表謝富治和王力，釀成震驚中外的「七・二〇」事件，同樣，湖北的造反派對武漢軍區也是從不退讓的，不論是1967年的2月，還是「七・二〇」事件之後，他們都是打不垮、壓不服的。在軍隊控制局勢之後的1968年，湖北的造反派掀起「反復舊」運動，其聲勢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在全國都是聞名的。湖南人在中國近代史上相當引人注目，自從曾國藩湘軍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湖南人才輩出，歷久不衰。中共的最高級領導大多為湖南人，湖南人對政局之敏感，理論和實踐上的徹底與極端，勇於鬥爭和長於堅持，在文革中和在以前的大革命時代如出一轍。最先表明紅衛兵獨立思考的〈中國向何處去？〉誕生於湖南，這裏的「右派份子」、前國民黨人士等在文革中紛紛活動，湖南稱得上是中國社會矛盾展開得最充分的地方。

廣東在文革中也有鮮明的特點。這裏遠離中央，面對南洋，歷來地方主義嚴重，敢於對中央另行一套。文革中，廣東的紅衛兵意識形態色彩較其他地區淡漠，學生對個人利益的意識遠較其他地區學生明確。文革前，許多中學生努力奮鬥，目標明確是為升學，而不是真正想做革命事業接班人。個人前途和利益與家庭出身密切相關，他們在運動中選擇派別和從事鬥爭離不開這個背景。當政治運動的殘忍無情顯示出來時，他們較少像其他地方的學生那樣極力為原來的信念作解釋和自我欺瞞，他們頭腦轉變較快，善於直面實際問題，而且，在當局欺逼太甚時，他們可以採取別省學生無法採取的行動——逃到香港去。

我在本書中對全國紅衛兵的派別鬥爭作了一個概括：先是保守派和造反派鬥，然後是造反派內兩派鬥，這種概括有一些例外，而例外往往發生在邊疆省份或自治區，尤其那些既是邊疆地區，又是少數民族地區或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區，比如，在西藏、新疆、內蒙古、廣東、廣西，造反派內部的兩派鬥爭一直沒有發展成主要的派別鬥爭，保守派勢力一直不垮，甚至在後來毛派中央被迫同意造反派與保守派搞大聯合，共進革委會。之所以會有這種例外情況，是最高當局考慮到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殊性，求穩的需要壓倒了「將兩條路線鬥爭進行到底」的意圖，沒有採取激烈手段摧毀受到各地軍區支持的保守派。

文革中，決定政治鬥爭進程最重要的因素是當地駐軍。每省的紅衛兵要與各種類型和級別的軍事單位打交道。每省有省軍區，全國有十三個大軍區，此外還有野戰軍、空軍、海軍部隊。這些部隊背景不同、政見不同、利害關係不同、實力不等，紅衛兵組織與他們的關係各不相同。在一個省內，各部隊之間的關係也不相同。這些情況使得每個省的紅衛兵活動與其他省相區別。這一點，在本章後面還會講到。

二　年齡特徵

參加文革的紅衛兵年齡差距較大，如按入學時標準年齡計算，最小的初一學生年齡是十三歲，最大的大學畢業生年齡是二十四歲，實際差距比這大一些，因為有些人不是在標準年齡入學。大學生中的調幹生（當過一段時間幹部再上學的人）年齡比一般學生大，比如著名的譚厚蘭進入北京師範大學時已經二十九歲。另外，有些

地方在文革發動後小學生仍然升中學，因此紅衛兵中年齡最小的不是1966年初一的學生，而是小學五年級學生。從少年變為青年的幾年中，學生們在體格、思想、性情各方面都有較大變化，因此紅衛兵的思想和行為是有區別的。一般而言，年齡較大者比較成熟和理智，關心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問題，而年幼者性情比較衝動、輕率，偏向於外部行動，參與武鬥多一些。大、中學生之間差別較為明顯，而大中學裏高年級學生和低年級學生也有較大差別。思想和行為的不同不一定純粹出於年齡的差距，不論在大學還是在中學，畢業班學生，或者考慮過畢業分配的學生，實際利害的盤算都是免不了的。大中學紅衛兵最明顯的區別是，在1966年所謂「紅八月」中，搞「破四舊」、「紅色恐怖」的，是中學生而不是大學生。一般而言，中學裏這類事件在初中生中發生得更多、更厲害。順便說一下，一般人會認為女學生的施暴行為應該比男學生少得多，因為中國文化傳統一直要求女性具有溫柔和羞澀的美德。但文革中表現出來的是，女學生施暴一點不亞於男學生。現在不少回憶文章都提及作者在目擊女紅衛兵打人之狠和虐待人方式之殘忍時的震驚心理。如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就是被一些女紅衛兵打死的，而且死後還曝屍校園。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套的宋彬彬，1992年香港《開放》雜誌有文章，提到她親手打死九人，後來有文章更正、說確鑿的數字是七人。也許，她的動力來自毛澤東接受袖套之後鼓勵她「要武」，在文革前，毛澤東就鼓勵並讚揚中國青年女性「不愛紅裝愛武裝」，宋彬彬也立即把名字改成了「宋要武」。

在中國大多數地區，大學生和中學生形成統一的紅衛兵組織，而大學生居於領導地位，中學生只是附庸和追隨者。較為典型的例子可以在四川成都看到，在該地，中學之中除了九中有一個強大的、獨立於大學生的「九毛」(「九中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之外，中學

的每一個組織都叫「××大學××團××中學分團」或稱「××支隊」。當這些大學中除川大一所之外，所有的造反派統一為「紅成」之後，中學相應各分團或支隊也結合成統一的「紅成」派組織，但原來與大學組織的隸屬關係仍然不變。成都學生的政治認同感全然來源於大學生的派別對立。大學生叫「大八．二六」或「大紅成」，中學生叫「中八．二六」或「中紅成」。形成這種局面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大學生成熟，政治能量大，組織能力強，中學生甘當追隨者；第二，當廣大中學生還在遭受血統論之苦時，大學生早已造反了。後來大學生造反派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形成強大的政治勢力，這時，剛擺脫血統論羈絆的中學生只有附和的份了。這種格局表明了造反派大學生和中學生組織關係的自發性，與此相對照，受官方支持的保守派紅衛兵就不存在上述關係，不論大學生還是中學生，都是直接受命於省委或市委，大中學生最多有聯合行動，而無隸屬關係。

北京也許是大中學生關係最鬆散的另一個極端，其他地方往往處於兩者之間，但更接近於成都這種情況。

一個地區的一大派紅衛兵組織中，掌握領導權的幾乎全是大學生，很少有中學生參加最高決策圈（當時一律叫「勤務組」）。因此，在運動中開展各種活動，中學生聽大學生的指揮是不言而喻的，當然，主要原因還不在於領導權，而在於中學生的能力和頭腦。在大多數情況下，大學生寫大字報、編輯報紙，中學生去貼大字報，在街頭賣報紙，散發傳單，大學生調查幹部問題時，許多中學生去作記錄、當秘書、抄寫材料。武鬥中，大學生當指揮或躲在幕後，中學生去打頭陣。西安一個被採訪者Y說，有一次一幫大學生策劃去公安局搶一批檔案材料，他們知道衝擊公安機關是犯法的，於是叫中學生去幹，中學生根本不懂得利害關係，一下就去了。等到把檔

案搶回來，他們受好奇心驅使，很想看一看檔案的內容，但大學生卻說：「你們不是黨員，沒有權利看檔案。」然後把全部檔案搬走了。

當然也有例外，在某些地區、某些學校，有的中學生首領造反早，有政治資本，或者是很有頭腦，能獨立判斷，他們會設法擺脫附庸地位，以獨立的姿態在政治舞台上活動。比如廈門八中的學生在當地造反最早，得到了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各校學生的支持。在江西，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武鬥十分頻繁和激烈，而戰鬥在第一線上的中學生比大學生多得多，中學紅衛兵於是在一派的聯盟中取得較大的發言權。比如一中的紅八團、三中、七中、十一中、南航的「井岡山」都是著名的中學紅衛兵組織。湖南長沙的中學生楊曦光寫〈中國向何處去？〉，提出了遠比大學生有影響的見解。在湖北武漢，幾個中學生於1968年在市中心搞起一個叫「百舸爭流」的大字報專欄，鼓吹「反復舊」，企圖扭轉全省運動方向，他們的主張造成極大影響，也招致當局鎮壓。

中學生和大學生在文革中表現出的差異是多方面的，中學生在絕對數量上比大學生多得多，他們的活動能在城市、農村、工礦、機關各方面發生影響。他們的社會來源(即家庭背景)比大學生豐富複雜，因為上大學需經過一次嚴格篩選，而家庭出身是最重要的選取指標之一。他們的思想更靈活，更具可塑性，因而更活躍多變，這使得中學生在文革中思想變化的幅度更大。我不可能在這裏詳述大中學生的所有差異，只集中討論兩點重要的區別。

第一，在大學，不像在中學裏那樣，在1966年8月、9月間出現過血統論猖獗的時期。大學裏也受到血統論影響，但作用要少得多。對於中學生而言，血統論是文革中最先遇到的重大事情，它對中學生運動的影響是決定性的。1966年8月間在中學裏有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大學裏有高幹子弟譚力夫煽動

血統論的講話，但血統論對大學生並未成為主要問題，這是因為，大學生在從中學進入大學時，已經通過了一次「政治審查」，大學生因家庭背景而產生的對立和競爭要弱得多。其次，大學生思想要成熟、理智一些，即使搞血統論，也無非是不讓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造反，或不當群眾組織領導，不像在中學，搞打、罵、驅逐，甚至「勞改」，同學之間感情傷害到了永遠不能彌合的地步。由於血統論，中學生中許許多多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被剝奪了參加運動的權利，當他們在1966年10月之後重新獲得這種權利時，他們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派。中學生中保守派和造反派隊伍的區分和家庭出身問題密切相關，而在大學中則不是這樣明顯，駱思典就敏銳地觀察到了這種現象。

第二，在運動初期，中學和大學裏文革的內容很不相同。大學生偏重於搞校黨委和工作組的問題，中學生則偏重於批判「牛鬼蛇神」，即有政治問題、歷史問題或家庭出身問題的教師，以及打擊出身不好的學生。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是大學生思想的成熟性，他們從一系列社論和文章中，以及8月份公布的「十六條」中，較準確地認識到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要打倒「走資派」，奪他們的權，他們的行動比較符合毛和文革派的希望。當各級黨委以及黨委派出的工作組力圖轉移鬥爭大方向時，他們有能力看出問題並與之鬥爭。在文革前，不少大學生已被派到鄉下搞過「四清」運動，他們熟悉毛主持制定的四清文件「二十三條」，其中已經明確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而中學生無論認識能力還是政治經驗都不如大學生。運動一爆發，各級黨委以及工作組按照中共歷來搞運動的陳例，打擊和犧牲知識份子，以證明自己的革命性和正確性，中學生一般不能洞察其中的奧妙。當血統論泛濫時，各級黨委不論是出於搞「階級鬥爭」的習慣，還是出於轉移鬥爭方向的考慮，都樂於看到學生把家庭出身當成問題的焦點而相互鬥爭。中學生中許多人既

無知、狂熱，又頭腦偏狹，他們打老師、整同學，在社會上亂衝亂殺，自以為「老子最革命」，而大學生頭腦要清醒一些。

此外，還有兩點區別不可不提，雖然我在後面還要討論。一是大學生對文革產生懷疑和否定的時間比中學生早。因為他們知道的情況較多，分析、判斷、獨立思考能力比中學生強。運動開展不久，一些大學生就陸續感到政治鬥爭實際上並不具有原則性，文革中大量大字報揭露了黨的陰暗面也使他們敏感地重新看待文革。中學生的思想轉變，在運動中期大多是受大學生影響，直至下鄉接觸社會現實，中學生才有自己獨立的、更為深刻的反省。二是中學生不如大學生那麼執着地關注於上層政治鬥爭（文革中稱為「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因此他們的視野要廣一些。文革中，大學生基本上局限於考慮政治問題，而中學生中有不少人開始關注社會問題。這可能與他們在文革前會碰到升大學、上山下鄉或就業問題，以及文革一開始就碰到血統論問題有關。關注文革中暴露的社會矛盾，看到許多群眾投入文革是自覺不自覺地追求自己的切身利益者，亦多為中學生。明確認識到文革除了有毛澤東搞上層權力鬥爭，即文革是「政治大革命」的一面，又看到文革是一場受壓的人民群眾與官僚之間的社會衝突，提出「兩個文革」的人，知名的有楊曦光、王希哲、鄭義，他們都是中學生，這也算是一個佐證。

三　保守派和造反派

紅衛兵組織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區別是它們分為保守派和造反派。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然而在某種意義上這卻是一個矛盾。因為按照定義和起源來說，紅衛兵是造反者，它的宗旨和目的就是造

反。紅衛兵的發起者——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在類似於紅衛兵成立宣言的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中一開始就說②：

> 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說，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說，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一句話敢造反，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貴的品質，是無產階級黨性的基本原則！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義！

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一共寫了三篇文章，即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毛澤東給紅衛兵寫了信，大力支持紅衛兵造反，並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了這封信以及清華附中紅衛兵論造反的大字報。

之所以有保守派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的區分，是因為在首都，第一批紅衛兵(即「老兵」)在發現毛澤東的意圖並不是要他們造「牛鬼蛇神」的反，而是造「走資派」即他們父輩的反時，他們不幹了。他們拋棄了剛立下的「誓死跟着毛主席幹革命」的誓言，當起了「保爹保媽派」；而在外地，各級黨組織借用毛澤東支持紅衛兵的手法，組織和操縱官辦紅衛兵，以對抗其他學生造反。在這種情況下，毛和中央文革不得不改弦易轍，倚重那些被學校黨委、黨支部、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以及被老兵的血統論排斥的非紅五類學生。他們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口號下，對老兵和外地御用紅衛兵進行清算，於是保守派和造反派壁壘分明、誓不兩立。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造反」這個說法其實名不副實。中國歷來把反抗朝廷或現存統治者的行徑稱為造反，是大逆不道之舉。而在文革中，不論是老紅衛兵還是後來的造反派紅衛兵，都是在中國最高統治者——毛澤東的支持和讚許下造反的(後來，毛還命令林彪動用軍隊武裝支持左派即造反派)。也許有人要說，中國古代有「只

反貪官，不反皇帝」的造反，但在那種情況下，皇帝是公開地站在官吏一邊，因此實際上反貪官也就是反皇帝。而在文革中，所謂造反，幾乎是挾着最高領袖毛澤東的威勢，欺辱那些惶惶不可終日的「當權派」。這種情勢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是少見的：皇帝和貴族階級發生對立和鬥爭，平民站在皇帝一邊攻擊貴族。嚴格地說，中國文革中不論哪一時期的造反派，都是貨真價實的保皇派。當然，我們不能這麼嚴格地照字面定義討論問題。本書講的造反派，是文革中官方和百姓共同認定的，造「走資派」反的那部分人。

現在來看看紅衛兵中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區別和對立是怎麼形成的，以及他們的主要鬥爭。

1966年初夏，隨着對「三家村」的批判和聲討不斷升級，隨着黨內揪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的消息不脛而走，北京一些幹部子弟集中的中學瀰漫着一種異樣的氣氛，政治敏感、消息靈通，急欲成為接班人，為「防修反修」衝鋒陷陣的年輕人激動不安地聚集在一起討論形勢，並衝破學校當局和工作組的禁令，自行成立了在當時獨立的，因而有可能是非法的組織。清華附中的一群學生在6月初的大字報中自稱為「紅衛兵」，8月1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並附有清華附中紅衛兵兩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報。於是，在中共官方組織和中共正式決議之外，帶上毛澤東強烈個人印記的紅衛兵取得了合法地位。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隊伍，並佩帶紅衛兵袖章，這相當於向全世界昭告：他是紅衛兵的最高司令③，這就使得紅衛兵運動如火如荼地燃遍全國。在這初期階段，紅衛兵運動顯示了三個特點。第一，它是自發產生的；第二，它的範圍僅在中學；第三，它一誕生就得到了最高領袖的首肯和大力推動，它是一個自發地破土而出和通天相結合的怪胎。

如果說首都中學的紅衛兵具有自發性，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具有反權威的性質(對抗與他們直接打交道的學校領導和工作組)，那麼擴展到大學的紅衛兵組織則不是這樣，它們具有官辦性質，和工作組站在一起，壓制反抗工作組的造反派。例如清華大學的紅衛兵，其首領是劉少奇的女兒、賀龍的兒子等人，他們在王光美和劉少奇的指揮下，配合工作組，打擊最早起來向工作組造反的蒯大富。

紅衛兵從一開始就和血統論結下了不解之緣，它在誕生之日就宣稱自己是階級組織。紅衛兵的發起者把「紅五類」和「黑五類」對立起來，而且使工農子弟，甚至資歷不夠的中低級幹部的子弟都不能參加紅衛兵。7月29日，北航附中的紅衛兵貼出了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紅衛兵的鬥爭鋒芒完全指向出身不好的同學、老師、校長，以及其他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

8月是紅衛兵使中國大地顫抖，使世界震驚的日子。就在毛澤東第一次檢閱紅衛兵的第二天，紅衛兵殺向社會，大破「四舊」。人們(不論中外，當時和後來)對於紅衛兵的印象，就由他們在這一時間的行動定格。

外地的情況和首都不大一樣，運動的發展總是比北京慢一拍。由於高幹子弟不太集中，學生的血統論意識不很強烈。許多學校的學生在7月底8月初自發地成立了各種戰鬥組，非紅五類學生也可參加。由於這時正是工作組撤出學校的前後，這一類組織(不包括前不久反工作組的小組或個人)未受到壓制。但北京的紅衛兵迅速地把血統論傳播到全國各地，這類組織馬上根據家庭出身標準改組，把非紅五類清出去，並摹仿北京紅衛兵搞「破四舊」和「紅色恐怖」。

造反派組織的興起始於8月初，一開始就和保守派形成尖銳對立。早在7月下旬，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就連續到北大等校去參加群眾大會，批判工作組，煽動造反。7月27日

海淀區開批判工作組大會，江青等到會。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京召開，8日通過並發表關於文革的決定，即「十六條」。會議期間毛發表公開攻擊劉少奇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這一系列事件使敏感的學生完全領悟到毛及文革派支持造反的意圖。8月1日，北京建工學院少數造反派成立「八一戰鬥團」，多數派在2日即成立「革命團」；8日北京地質學院造反派成立「東方紅戰鬥隊」，清華造反派8日成立「八·八串連會」，多數派在王光美鼓動下也於9日成立串連會；8月23日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兵團(造反派)成立，同時多數派「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師」也成立。中學生造反組織成立稍晚，9月中旬，北京二中、十五中等發起成立「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血統論。

10月1日是轉折點。這一天，林彪在第三次檢閱全國來京師生大的講話中，提出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同日出版的《紅旗》第13期發表了著名的社論，提到「兩條路線的鬥爭」，說「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採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④10月5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發出緊急指示，為被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學生平反。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和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關於兩個月運動的總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批評劉少奇、鄧小平提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前述對聯定性為「反動血統論」。這一連串的表態，把老紅衛兵置於犯錯誤的地位，置於保守派的立場，並使各地、各校原來受壓的少數派即造反派吐氣揚眉，名正言順地建立自己的紅衛兵組織，與保守派紅衛兵鬥爭。

當毛及其追隨者要打倒劉、鄧及一大批「走資派」的意圖清楚無

遺時，老紅衛兵和他們的蜜月就結束了。他們引起社會動亂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現在成了運動向真正目標發展的障礙。他們受到中央文革的冷落和批評，最後被拋棄。造反派紅衛兵的勢力迅速擴展，取代老紅衛兵的地位，深得毛和中央文革寵愛，成為他們打倒政敵的「鐵拳頭」。老兵們嚥不下這口氣，於12月5日成立「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對抗中央文革小組，並憤而叫出「劉少奇萬歲」和「江青算老幾」的口號。中央文革撕下「支持和愛護革命小將」的面紗，露出真面目，下令抓人。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的社論中，宣布「聯動」是反動組織。在此之後，北京和外地的保守派紅衛兵逐步垮台。

1967年2月，軍方向文革派攤牌，全國大部分地方軍隊實行「二月鎮反」，許多造反派紅衛兵被鎮壓、解散，宣布為「反動組織」，已經土崩瓦解的保守派紅衛兵和其他保守派組織在軍方扶持下死灰復燃，參與鎮壓造反派。但在4月份，毛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吹響了「反擊資本主義復辟逆流」的號角，保守派再一次遭到失敗，從此之後在全國大部分地區，他們再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此後在各地，是造反派內部兩個派別捉對廝殺，最後在中央強令下聯合起來，共同進入權力機構。但在個別省份，由於軍隊頑強支持，保守派並沒有被擊敗，在武漢，保守派因著名的「七．二〇事件」才告徹底覆滅，而在廣東、廣西、西藏、新疆等少數幾個省份和自治區，保守派堅持到了最後，他們在大聯合和「三結合」的權力機構中獲得地位，並在軍方支持下壓過造反派。

造反派戰勝保守派，靠的是甚麼？主要依靠以毛和中央文革小組為代表的「中央的表態支持」，而且常常免不了有一場決定性的武鬥，雙方勝負並不是有賴於各自實力的自然消長。中央的表態往往把造反派定性為當地的左派或革命派，這自然會瓦解或動搖保守組

織。有時，中央甚至指示當地駐軍出動，宣布保守派為「反動組織」，將其鎮壓、取締。以下是不同地區的事例。

在北京，由老兵骨幹份子組成的「聯動」雖然十分頑強跋扈，但他們在「紅八月」中的所作所為使他們喪失人心，造反派「三司」人多勢眾，在半文半武的爭鬥中，經常對他們形成包圍。中央文革不斷表態，將他們定性為「反動組織」，公安局和「三司」密切配合，一次又一次抓他們的人，他們終於在沉重打擊下消聲匿迹。

在上海，1966年12月29日發生了「康平路事件」。工人中的造反派「工總司」和保守派「赤衛隊」出動共計四十多萬人，雙方大打出手，最後「工總司」大勝。上海保守派紅衛兵在這次事件之後也隨「赤衛隊」一道土崩瓦解了。

在山西、青島、黑龍江、貴州等地，造反派得到解放軍支持，擊敗保守派，獲得當地的權力。這一切都發生在1967年1月底，因為，毛澤東於1月21日致信林彪，向軍隊發出指示：「應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群眾。」比如，在1月25日，哈爾濱駐軍出動鎮壓被稱之為「反革命」的保守組織「榮復軍」，支持造反派「紅色造反團」。

在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武鬥中，遲至1967年的武漢「七．二〇事件」，雙方一般都是使用拳頭、石塊以及長矛、大刀等冷兵器，還未發展到動槍動炮的地步。四川成都的武鬥有些例外，5月6日在「一三二廠」的大武鬥中，保守派開槍射擊，造反派死五十餘人，傷數百人。儘管保守派是在廠軍管會命令下，根據中央關於保衛國防工廠的文件開槍的。但5月7日中央在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中，卻將護廠的保守派稱為「槍殺群眾的凶手」，聲言要處理「事件的策劃者」。從1967年夏季起，全國的武鬥升級為槍炮之戰，在造反派之間是如此，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也是如此。

現在來看看保守派和造反派在哪些問題上形成區別和對立。以

下所列各點，既基於熟悉文革情況者的觀察和總結，又在後來文革研究者的論著闡發中得到印證。當然，這也是僅就全局和一般情況而言，例外是不可避免的。

保守和造反學生的區分首先在於對學校領導的態度，在大學是對校黨委，在中學是對黨支部。文革一開始，就宣布鬥爭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教育戰線首當其衝，全國絕大部分大學和一些中學中，都有少數學生給校領導貼大字報，批評他們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而學校當局一般以1957年反右鬥爭經驗為指導，或暗中收集材料，準備運動後期抓「反動學生」，或立即組織反擊，鼓動廣大師生員工圍攻提意見者。因此，學生首先在批判還是支持學校領導這問題上形成對立和鬥爭。但在這個問題上有許多例外。首先，有個別大學，其領導已由中央或上級部門點名批判，並隨即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例如北大的陸平、彭佩雲，清華的蔣南翔等等。早期對他們的批判是應命而起，其中許多批判者後來是保守派，例如清華的劉濤、賀鵬飛等也大批蔣南翔。其次，有不少學生敢於堅持獨立見解，並不追隨當時「凡教育戰線領導皆為黑幫」的成見，實事求是地擁護正直而有威望的學校領導，比如在北京某中學，一個高幹子弟得到內部消息，知道中央正在部署揪文教系統內的黑幫，於是早在1966年5月13日就貼大字報造學校支部的反，而另一學生帶頭奮起保支部。工作組進校後，把保支部的學生打成反革命。後來，這個攻擊校領導的學生屬於保守派，保支部的學生屬於造反派。在陝西省某縣有一所全省著名的中學，尊師重道的風氣尚存，一大批出身中等家庭的優秀學生反對工作組不分清紅皂白整校長和教師的作法，對抗那些出身好的壞學生，堅持保衛校領導，他們遭到工作組和縣委壓制，後來成為當地造反派骨幹。在武漢華中工學院，一學生(後來是著名造反派首領)堅持主張打倒省委書記

張體學，卻極力保校長朱九恩。在這種事例中，學生們雖然聽毛的召喚，造「走資派」的反，但他們從切身經驗中知道，自己的校領導是正派好人。而對那些職位更高，離自己很遠，因此自己不知情的省委、市委領導，他們就可能將其視為「走資派」。另外，由於工作組是由省、市委派，而工作組一般都壓制了學生，加上毛嚴厲地譴責了工作組，因此學生們易於造省、市委的反。

更精確的分野是支持還是反對工作組。文革中有一些曾經反對過學校當局的保守派，但極少有反對工作組的保守派。文革開始不久，各大中學校領導立即落到被打倒或靠邊站的地位，學校大權掌握在工作組手中，他們奉命嚴格控制局面而與學生發生衝突，把造反的學生打成「反革命」的主要是工作組。北大、清華、北郵、西安交大等校都發生造反學生和工作組尖銳對抗的事件。事實上，學校中造反派從起源上說就是當初反工作組、受工作組壓制的少數派。與工作組的關係幾乎成了公認的區別「革」與「保」的分水嶺，即使有少數當初反工作組的人後來站在某個省委書記或軍區一邊，成為保守派時，人們也認為他們是由老造反派「蛻化」為保守派。

支持還是反對血統論也是區分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恰當標準，雖然它在中學裏更為適用。北京一些老紅衛兵(外地也有與他們相似的情況，例如，著名的華南師院附中的十一人戰鬥組)雖然按其對學校領導、工作組、乃至更上級黨組織的態度，都滿足作為造反派的標準，但正是由於他們堅持血統論，而被人們視為保守派。如果說，有相當一部分在校領導和工作組問題上持保守立場的學生後來改變立場加入了造反派，那麼持血統論立場的學生轉變成造反派的就少得多。與血統論問題密切相關的是，保守派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在組織路線和組織成分上明顯不同。保守派堅持只有紅五類

(甚至要達到某種級別的幹部)的子弟才能當紅衛兵，而造反派組織的標準則寬鬆得多，甚至對於家庭出身沒有限制。當然，在當時的氣氛下，造反派紅衛兵的頭頭，一般還是由出身的好的學生擔任，包括一些出身一般的學生，很少有出身不好的學生當頭領。

這裏附帶談一個分歧。雖然西方研究學者都注意到了組織成分的不同是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根本區分，但李鴻永認為造反派是由出身不好的人組成的⑤，而陳佩華、駱思典和安德佳則認為造反派以中等家庭出身的學生為主，當然其中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學生和少量紅五類學生⑥。在這個問題上，顯然陳佩華他們是正確的。他們還觀察到，出身不好的學生由於自己的地位太易受傷害，由於被文革前的階級路線和文革中的血統論搞得垂頭喪氣、膽戰心驚，許多人不敢涉及運動，當了逍遙派⑦。

與工作組和血統論問題相聯繫，另一個區分是對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態度，造反派非常積極，將其視為革命與不革命的分界線，而保守派則十分不情願，批「資反路線」就是對他們過去行為的清算。

是否造各級黨組織的反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重要區別，從本質上講，造反就是造各級領導的反，反省委、市委、地委、縣委等等。注意，這裏的造反和攻擊學校黨組織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文革剛一開始，各地黨委都力圖犧牲教育、文化戰線上的領導幹部，以此保護自己。大多數學校領導並不是被造反派學生打垮的，而是被上級黨委宣布為黑幫的。最先整學校領導的多數是保省市委的保守派，而不是造反派。有個別造反派識破了這種「捨車馬，保將帥」的策略，反其道而行之，保本校黨委而反上級黨委。與此相關，在1967年1月份起來奪各級黨政權力的是造反派，保守派持反對或觀望態度。毛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他明白無誤地表示，奪權沒有保守派的份。在以後搞「革命大聯合」和「三結合」⑧，成立各級革委會時，原則上也只有造反派之間聯合並進入權力機構。只是在少數省份，毛和文革派無力取得徹底勝利，才讓保守派參與聯合和進入革委會。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在當地和全國也有相當一致的看法。

在1967年的「二月鎮反」中，遭到軍隊鎮壓的肯定是造反派(雖然反之不一定成立，也有一些造反派未受鎮壓)，支持鎮壓的大多是保守派。

李鴻永提出保守派和造反派在政治結盟關係上的區分，他說，1967年9月之後，文革進入派性政治階段，主要分野表現為以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為一方，以軍人和保守派為另一方，他的看法對於廣東的情況是正確的，紅旗派在中央文革一邊，東風派和廣州軍區在一邊。但這種簡單的劃分及組合一般而言並不正確，這時派性鬥爭大多在造反派之間，其中有的造反派親近中央文革，如成都的「八・二六」，有的與中央文革有隔閡，甚至暗中對立，如「紅成」。軍隊的情況十分複雜，就軍隊自身性質和自發傾向而言，他們應該支持保守派，反對造反派，但由於毛是軍隊的最高統帥，再加上林彪長期和中央文革小組結盟，因此有不少軍隊在接到中央明確指令後支持造反派，例如專門入川支左的五十軍，湖南的五十五軍，浙江的二十五軍，上海的空四軍等等。那些敢於自行其事的大軍區(如廣州軍區、武漢軍區)和摸不清上層派系關係的地方軍區(如浙江省軍區)則按自己的愛憎立場支持保守派。

在意識形態方面，兩派有明顯區別。雖然大家都擁護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和所謂「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同意文革的目的是防修反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但雙方對於文革中

階級鬥爭的性質認識大不相同。正如李鴻永觀察到的，造反派把「黨內走資派」當成階級鬥爭的主要對象，而保守派則把鬥爭的矛頭對準舊有的「階級敵人」⑨。駱思典也有相同的觀察，他說，保守派只從經濟方面定義階級，把運動的主要目標視為殘存的資產階級，同時攻擊「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和其他「牛鬼蛇神」，而造反派定義階級時則偏重於使用政治覺悟和行為標準，把一切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人都當作階級敵人⑩。

保守派和造反派的主要區別大致就是以上這些。另外，兩派在行為方式上還有各自的特徵，雖然它們還算不上是形成區別的界線。比如，保守派內部比較團結，而造反派是山頭林立、派中有派；保守派內一般沒有意識形態分歧和論戰，而造反派動輒就打內戰，大反「機會主義」；保守派宣傳力量不如造反派，他們的力量來自組織系統，而造反派訴諸於社會動員，保守派的信息渠道較為單一，而造反派的消息來源相對多元。所有這些特點，無不表明造反派的自發性要遠遠高於保守派。

在談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區分標準時，北京的老紅衛兵有一些特殊之處，值得專門討論。他們之中許多人曾經反對過學校當局和工作組，反對過北京市委(他們很早就從內部渠道得知彭真在中央失勢的消息)，在大串連時，還有人到外省去煽風點火，「炮轟、火燒」地方黨委。但他們是著名的保守派，在1966年10月之後，不論是當時社會上所有的人，還是他們自己，都不否認他們是保守派。我認為(而且許多人也同樣認為)，就其反校領導、工作組和地方黨委而言，他們是最老的造反派，當他們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蜜月結束，並發現文革的目標是要摧毀原有權力系統時，他們的立場和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除了緊跟毛澤東這種政治信念方面的原因，他們當初敢於攻擊黨組織和工作組，據一些外省幹部子弟

説，具有這種性質：大官的子女要打倒小官，中央官員的子女要打倒地方官，軍隊幹部的子女要打倒文官。他們比其他學生膽子大得多，可以不買校領導和工作組的賬，有人這麼頂撞校領導和工作組：「你們算老幾，我爸爸的官比你們大得多！」這種行為並不奇特，在1966年6月和7月，每一個省都有一批主管宣傳、文教的官員，以及大學負責人被上級黨委拋出去。在中共政治鬥爭傳統中，無情地犧牲他人(包括同事和朋友)以求自己的利益，已是司空見慣。整人的運動一到，總有許多人趁火打劫，有人下就有人上，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造反派轉化為保守派的事例還不限於北京的老兵。廣州工學院「八·一二公社」是廣州最早的造反派之一，他們因最早趕走工作組而著名，但在一月奪權問題上與「紅旗」派發生分歧，站到了保守派一邊；廣西的「小八」(即「八·一八紅衛兵」)原屬造反派，後倒向保守的「聯指」，浙江的「紅暴」被毛澤東稱為「犯了錯誤的老造反派」，他們僅僅是聽信周恩來的話，採取保省委書記江華的立場，而被對立組織打成了保守派，上述組織之所以被承認為老造反派，就是因為他們曾經反對過校黨委和工作組。當然，造反派向保守派轉化的例子極為少見。在造反派戰勝保守派之後，倒有不少保守派成員倒向造反派，但這純屬個人行動，不是整個組織的轉變。勝利者遵循中國政治鬥爭的邏輯，歡迎「反戈一擊」，「向革命路線投降」，而不允許保存組織。他們把只改變觀點、立場，而不解散組織、徹底投降的行為叫做「改頭換面，搞政治投機」。華南工學院「八·一八」是罕見的例外，它的成員在運動初期堅決保校黨委和工作組，在1967年廣州的「一月奪權」中，它的對立面、造反的「三司」不支持奪權，它於是反其道而行之，支持奪權，並攻擊「三司」保省委，於是自己站到了造反派激進的一邊。

能不能把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各種區別概括為一種根本性區別呢？有人認為能夠，在他們看來，區別在於兩派對維護還是改變現存政治體制持截然不同的立場。李鴻永說，造反派是沒有特權的人，他們極力改變現存狀況，而保守派與優裕的社會集團有聯繫，極力維持現狀⑪。駱思典說，保守派力圖捍衛中國體制化權力的基礎，即黨組織，而造反派恰恰集中攻擊這個權力基礎⑫。保守派紅衛兵中不少人認為，造反派中許多人出身不好，他們是在文革中趁亂造反，發洩對黨的不滿，搞階級報復。他們認為，造反只能針對階級敵人，而不能針對黨。北京著名的老紅衛兵、師大女附中的鄭中偉說：「儘管紅衛兵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但所要造反，要革命的對象是反革命，右派，和封、資、修。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領袖和老革命啊！」⑬而造反派則認為，一些黨的領導人已經變成官僚特權份子，只有打倒他們才能保證中國共產黨是名副其實的革命黨，才能使中國的社會制度真正是社會主義的——也就是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毛教導說，許多共產黨人在革命勝利後會蛻化變質，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後也會改變，重新產生剝削和壓迫，造反派從切身經驗中對毛的學說深信不疑，他們要「繼續革命」。

四　造反派內的進一步分化：溫和派與激進派

在文革中，紅衛兵組織之間，以及大派的群眾組織之間的派別鬥爭有兩類，一類是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另一類是造反派內部兩派的鬥爭。後一類派別鬥爭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前一類，因為它延續的時間更長，鬥爭更激烈。但是，大多數文革研究者似乎沒有注意到後一類派別鬥爭，或者雖然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但卻未能

理解其重要性，他們或者是只注重研究前一類派別對立，或者是將後一類和前一類相混淆。

西方研究文革的學者對於紅衛兵的派性研究比對其他問題的研究更為詳盡和深入，但他們對於造反派內部的鬥爭似乎無所認識。對於文革論著甚豐的李鴻永在1975和1977年的著作和文章中，一直談激進派 (radicals，即造反派) 和保守派的對立，但他顯然把問題搞混淆了。比如他說，廣東的群眾組織分成兩派，一派是反對奪權的保守派，另一派是支持奪權的激進派⑭。這是不準確、不全面的。廣州1967年「一月奪權」時，除了保守派反對，造反派內也有人反對，並在奪權問題上分成了兩派，形成對立。對於奪權的造反派而言，反對奪權的造反派比保守派的威脅更大，因為保守派反對奪權是自然的，而且他們被毛派中央排除於奪權鬥爭參與者隊伍之外，而造反派的反對意見構成了他們奪權合法性的真正挑戰。他還斷言，紅衛兵組織在每地都分成兩派，在北京有「天派」和「地派」，黑龍江有「聯指」和「炮派」，河南有「二．七公社」和反對派，廣西有「四．二二」和「聯指」，廣東有「紅旗」和「東風」，河北有「紅塔」和反對派，西藏有「革造司」和「大聯總」⑮。這裏的混淆顯而易見，上面所作的區分意在說明對立是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但據他所列，有些卻是在造反派內部，如北京和黑龍江的兩派。如果要說得全面，在大多數地區應該說有三派。例如北京，大學生中是保守的「一司」「二司」與造反的「三司」對立，然後是「三司」中「天派」和「地派」的對立。在中學生中，先有老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對立，然後是造反派中「四．三」派與「四．四」派的對立。

在陳佩華、駱思典和安德佳的論文〈學生和階級之戰：廣州的衝突〉以及陳佩華的《毛的孩子們》一書中，他們都只談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區別與對立，而未涉及造反派內的派別劃分。

在上述學者中，駱思典的觀點是最為接近事實真相的。他在批評李鴻永關於保守派和激進派的論述時指出，「更重要的是激進派內部的分裂」，他還看到了「1967年1月奪權是激進派的分裂而不是激進派與保守派的分裂，因為保守派學生組織已經瓦解，他們無法參與奪權。」遺憾的是，他未看到派別分裂具有規律性，而只是過於抽象和一般地認為「在這一問題上保守並不排除在其他問題上激進，反之亦然。此外，一個紅衛兵組織可能在本單位保守而在社會上總的說來激進。」⑯他在《廣州的紅衛兵派性和文革》一書中對於造反派從對待工作組起，進而對待封《羊城晚報》，直至1967年12月佛山會議的分歧，都有準確描述，可惜他未能從中抽引出重要結論，其原因在於他的採訪限於廣東一省，而廣東省的情況恰恰具有特殊性。

現在來看看中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把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區別稱之為「『造反精神』比較不強，甚至保護某些『走資派』的造反派」與「『造反精神』很強的激進的造反派」之間的區別⑰，這是很容易導致誤解的。他在談到「兩大派尖銳對立」時，把四川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武鬥和上海青浦縣造反派內的武鬥相提並論⑱，可見他對兩種不同的派別鬥爭沒有清晰區別。另一方面，他正確地看到「七．二〇」事件之後，造反派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了，而且，從1967年10月之後進行的反派性鬥爭，是指造反派內的派別活動。

王紹光對於造反派內部的派別鬥爭有較多的注意，他看到，在保守派瓦解之後，派性並未因此減弱，造反派內部馬上分裂，形成新的派性鬥爭，這種鬥爭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而且比以前造反派與保守派的衝突還要激烈⑲。作為造反派著名代表人物的楊小凱也看到了「『造反派』是個極複雜的概念」，「造反派經歷了若干次分

化」，「造反派到二月逆流時又分成兩派，一派擁護軍隊的鎮壓，另一派反對軍隊的鎮壓。到1967年夏季之後，反對軍隊鎮壓的造反派又進一步分化為支持革委會的在朝派和反革委會的在野派，或稱極左派。」⑳不過，他們兩人重視的是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而未評論造反派內部的派性鬥爭。

當我說，在全國範圍內紅衛兵組織的派別鬥爭模式大致是先有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的對立，在保守派失勢之後持續較長的是造反派內部的對立，這主要是在省一級水平上的觀察和分析。在省以下，派別對立以保守派和造反派為主的情況要普遍一些。在不少市和縣，保守派和造反派的鬥爭貫穿運動始終。這是因為，毛澤東的造反號召，文革派中央關於打「走資派」的指示，越到基層效力就越低。另外，保守派組織往往得到當地駐軍（可以低到武裝部一級）支持，雖然在全國、全省範圍內大勢已去，但仍可頑強存在，不被瓦解。所以常常有這樣的情況：當省、市一級的造反派分裂之後，地、縣一級的造反派因為始終窮於應付對立的保守派而來不及分化，或者有分化的苗頭或傾向（由於上面分裂的兩派會下來宣傳，拉自己的隊伍），但終因大敵當前而未能形成明顯的對立陣線。我曾採訪過吉林省渾江市的一個造反派頭頭，他告訴我，當吉林造反派「二總部」中分裂出更為激進的「長春公社」時，他們沒有隨之分裂，而是和以前的各方戰友保持良好關係。因為他所率領的「渾江三司」始終打不垮保守的「渾江五司」，軍分區傾向於造反派，而市武裝部傾向於保守派，原市委中的幹部也分別支持兩派。他判斷說，如果運動繼續發展下去，他們的組織肯定也會分裂成兩派，因為已經有人在本組織中拉起了一個「渾江公社」。當然，更多的情況是，下面的造反派組織隨省、市一級的分裂也隨之變成兩派，或者追隨其中的一派，從而屬於更大範圍內兩派對立中的一派。

參加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中所說的「群眾組織的派性」，指造反派內部的分裂，而不是指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對立。文革中長期使毛澤東和其他高層人物感到頭痛，最難於解決的派性矛盾就屬於這一種。官方從1967年下半年起持續不斷地發出「克服派性」、「圍剿派性」的號召，指的也只是這一種。官方把這種鬥爭稱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派性」，說它發生在革命隊伍內部，這就把它和保守派與造反派的鬥爭嚴格區分開來了。對於後一種對立，官方一直認為是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不可調和的鬥爭。在1967年2月《紅旗》雜誌第3期社論中，保守組織被當成是反動組織和反革命組織，對它們，不存在克服派性的問題，而是要「支左」的解放軍鎮壓和取締。

我認為，看不到兩種派性鬥爭的區別，籠統地談論兩派群眾組織的對立，對於研究文革是十分不利的。我在本書中花了很大篇幅來論證文革中除了有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對立，還有造反派內部的分裂和鬥爭，其用意除了糾正對歷史描述的偏差，補充敍述的不足之外，還有更多的考慮。我認為，造反派內部長期不息的派性鬥爭至少提示了以下值得重視的問題。第一，打倒劉、鄧之後，最高層的權力鬥爭並未結束；第二，運動在全國各地發展的不平衡和複雜程度，遠遠超過一般研究者的印象和理解，還有許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和尚未涉及的方面；第三，軍隊在文革中起了極大作用，造反派激烈的鬥爭往往是因各自背後有不同部隊支持，這說明中國軍隊並不是嚴格統一的，許多部隊屬於不同山頭，不同派系、性質、級別的部隊往往有不同利益；第四，雖然造反的群眾都認同毛的「革命路線」，但不同的人對於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變現存體制有不同態度，這反映了中國社會存在的基本矛盾。當然，本書不能對所有這些問題作出充分的闡述，但我想把這些問題明確地提出來和作出初步說明，藉以引起進一步的研究。

(1) 全國派別鬥爭概況

紅衛兵組織和其他群眾組織的鬥爭，一開始是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然後長期存在於造反派內部兩派之間，這是文革運動中一個簡單、基本的事實。捲入文革較深或對全國各地情況較為熟悉的人自然了解這一點。比如紅衛兵理論家、清華大學學生周泉纓在其發表於1967年夏季的著名文章〈四一四思潮必勝〉中專門論述了派別劃分和對立的規律性：「不僅全部成立革委員會的城市中造反派分成了兩派，而且幾乎95%地區的造反派也分成兩支。」他還指出，造反派中激進派和溫和派的分歧既表現在原則上，又表現在組織上，具有全國性的普遍意義㉑。少數地區情況例外，原因較為清楚，不難作出說明。

下面將在省級(含直轄市)水平對全國各地情況作一簡略描述，以證明上述判斷。據我的調查和統計，紅衛兵的派別鬥爭在運動中始終表現為保守派與造反派對立的，在二十九個單位中只佔六個單位。不難理解，由於情況錯綜複雜，而研究者調查了解和閱讀材料的範圍有限，更由於不同的人對本地情況有不同的描述，所以對某些地區情況的回顧不但可能是不準確的，而且可能是錯誤的。我希望錯誤是個別的，並且不十分嚴重，因此不影響總體判斷。當然，我更希望我的說明能引來眾多文革研究者的指正和周全、深入的說明。

還有兩點情況需要說明。第一，對各省情況的描述基本上以各省首府城市的運動過程為主，雖然有時同一省份中不同城市派別的劃分、性質、結盟關係有所不同(例如福建省的福州市和廈門市)，同一派別在不同城市的處境不同(例如廣西的「四・二二」派在南寧和桂林)，但大致說來，省府城市情況可以代表全省運動情況。第二，雖然本書研究的是紅衛兵運動中的派別鬥爭情況，但在提到各地區的派別組織時，將依文革中的慣例稱呼當地的各個大派。所謂大派，指立場、觀點一致的，往往表現為省級規模的大型群眾組織聯盟。

在全國二十九個省級單位(省、直轄市、少數民族自治區)中，我將首先按慣常順序和運動情況的相關性說明二十六個地區的簡況，然後在下一節較為詳盡地說明湖北、四川和廣東的情況，從中概括出我的結論。

北京。紅衛兵組織於1966年初夏起源於北京某些中學，其中某些組織因反工作組而有造反的色彩，但總體上說因大搞血統論，保「走資派」而被視為保守。這部分紅衛兵因在8月得到毛的大力支持，大搞「紅色恐怖」而聲威大振。在大專院校，造反的少數派在8至9月逐漸成立自己的組織，中學的造反組織在9至10月形成。從9月下旬到整個10月，下列一系列事件使得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誰勝誰負大勢已定：9月17－20日，中央文革小組連續四次召集大專院校造反派座談匯報會；10月1日，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代表毛澤東、黨中央、中央政府講話，提出鬥倒走資派和與資反路線鬥爭；10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第13期社論，號召批判資反路線；10月5日，中共轉發軍委、總政緊急指示，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平反，銷毀黑材料；10月6日，造反的「首都三司」發起全國在京師生十萬餘人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受毛和黨中央委託出席並表示大力支持；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文革中兩條路線鬥爭，批血統論；10月25日，林彪和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號召造反。在各大專院校，保守派組織到10月底已大部分自動消解，而中學生保守的「老兵」與「三司」等造反派鬥爭到年底，到1967年1月公安部抓捕「聯動」，二月初《紅旗》第3期社論把「聯動」定性為反革命組織，標誌了保守派的徹底失敗。2月22日，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成立，3月25日，中學紅代會成立，其中完全沒有保守派的份額。但造反派從一成立組織起就有內部分歧，基本上形成兩派觀

點。中學生在2、3月軍訓時就鬥爭激烈，終於形成激進的「四三」派和溫和的「四四」派。大學兩派的分歧由來已久，終於在4月8日和11日釀成武鬥流血事件。在此之前和之後，幾乎每個大學的造反派都分裂為兩派或多派，大致的陣線是「天派」和「地派」㉒。「天派」於5月10日發表〈對首都大專院校目前形勢的幾點意見〉，地派則發表〈關於目前形勢座談紀要〉作為回應，兩派分歧從未彌合，直至全部退下政治舞台。

上海。保守的紅衛兵組織大致於9月在各校成立，大學和中學的全市性統一組織「紅衛兵總部」分別於9月中旬和月底成立。大學生的造反組織大致在10月成立，如「紅革會」、「炮司」等等，並在成立之後發展中學生造反組織。中學生自身的跨校造反組織於11月成立，如「紅東北」、「紅西南」等（以區為單位，對應於教育局轄區，故名）。「紅衛兵總部」捲入工人中保守的「赤衛隊」與造反的「工總司」之間的鬥爭，在12月底「康平路事件」、「昆山事件」中，「赤衛隊」被打垮，保守的「總部」紅衛兵也隨之消散。在1967年1月的奪權浪潮中，造反派紅衛兵因爭權奪利和觀點分歧而互相鬥爭，如「上三司」、「紅三司」和「紅革會」都各自籌劃奪權，但由於張春橋完全排斥紅衛兵自行奪權而未使分裂演化成分明的陣線。在上海，由於張春橋、姚文元的穩固地位和工人造反派勢力強大，造反派內部的鬥爭雖從1967年初起一直存在，仍未成為當地運動的主線。但激進的反張春橋的「紅革會」、「炮司」、「中串會」等與屬於擁張主流派的其他組織之間鬥爭從未停止，比如1967年2月初上海鐵道學院「紅革會」與「紅三司」爆發武鬥，引起外校不少組織介入；又如擁張的紅衛兵組織紛紛批判「中串會」等發表的〈一切為了九大〉等激進造反的綱領。

黑龍江。1966年8月初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造反派組織「紅色

造反團」成立，緊接着保守的「八八紅旗戰鬥團」成立。8月下旬起，以此兩組織為領導和核心形成全省性的「造反團」派和「八八」派。由於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亮相支持造反，林彪、毛遠新公開表態站在造反派一邊，到1966年底，保守的「八八」派處於不利地位。1967年1月，造反派聯合潘復生和省軍區司令員汪家道奪權，保守派也針鋒相對奪權，但遭潘和部隊鎮壓，中央宣布幾個保守派組織為反動組織，因此全省保守派在1月下旬瓦解。奪權後造反派中一部分人與潘復生發生矛盾，潘立即予以鎮壓，哈軍工「造反團」公開支持炮轟潘復生後，潘和汪於5月下旬組織支持自己的「捍聯總」，從此揭開全省「炮轟」派和「山上」派的鬥爭，儘管兩派曾於9月初和12月初在京達成停止武鬥和聯合的協議，但潘復生不顧協議，用武鬥等手段打垮了「炮轟」派。

山東。從1966年8月起就有統一的造反派組織，後擴充成全省性的「紅衛兵山東指揮部」。到10月時，因內部權力爭奪，該組織主力，激進的老造反派「山東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認為「指揮部」右傾保守而從中拉出，另立「山東省紅衛兵革命造反聯絡總站」。在11月、12月、1967年1月的一連串事件中與「指揮部」發生糾紛和鬥爭，奪權時兩派衝突，釀成大武鬥。2、3月「復辟逆流」時「山大主義兵」一派受到革委會和當地駐軍壓制，此時原保守的「濟南紅衛兵師」以新牌號復活，藉着批判「山大主義兵」大肆活動，直到5月經「反復辟逆流」後才徹底失敗。山東省軍區於5月底承認在2、3月犯了取締造反派的方向路線錯誤，「山大主義兵」一派作為「犯過錯誤的造反派」被省革委和軍區承認和受到「正確對待」。

山西。長期由原來的幹部、勞動模範、工人和軍隊左右運動局面，紅衛兵作用較小。保守派很早就失利，紅衛兵組織參加以工人為主體的「山西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於1967年1月12日進行奪

權。奪權後造反派馬上因為對待參與奪權並獲得要職的老幹部劉志蘭態度不同而分裂為兩派，山西大學「紅色造反者革委會」等屬打劉派，而黨校「東方紅」、山西醫學院「紅革聯」等屬於保劉派，前一派後來發展成為以幹部劉格平、程守創為首的「紅總站」派，後一派發展成為受六十九軍和軍分區支持的「紅聯站」派。兩派武鬥不息，運動經歷許多反覆曲折。

貴州。1966年8月底省委負責人賈啟允命令各行各業的人都當紅衛兵，保衛省委，圍攻造反派，但保守派在年底之前即徹底垮台。1967年1月25日，造反派統一組織「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奪省市大權並得到中央承認。造反紅衛兵有統一組織「貴陽市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司令部」，其中一批激進份子於1967年2月3日拉出一些人成立「貴州省大專院校革命造反聯絡站」。4月10日成立省紅代會時，此派中若干組織衝擊大會進行造反，理由是紅代會由省革委會包辦成立，且對參加成員不區分保守和造反派。此後形成「四．一一」派和「支紅」派，武鬥從5月延續至8月，由於中央支持掌權的李再含，「四．一一」派雖然被公認是造反派，但也遭到鎮壓。

河北。石家莊市統一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紅衛兵石家莊革命造反司令部」(「紅革司」) 成立於1966年10月25日，它迅速擊敗諸如成立於9月10日的「紅衛兵石家莊總部」這樣的保守組織。各行業造反派於1967年1月底組成「石家莊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進行奪權，但它在2月份就解體了，因為其內部分裂為反軍派 (「工聯司」、「師大東方紅」等) 和擁軍派 (「紅革司」、「十院聯絡站」等)。到1967年5月，當在2、3月份受到鎮壓的反軍派翻身後，兩派開始戰鬥。5月底，溫和的擁軍派聯合為「大聯指」，於7月與激進的反軍派「狂人公社」發生一系列武鬥。後由於陳伯達明確表態，致使「狂人公社」徹底失敗。

遼寧。到1966年底時，保守的「毛澤東思想八．八紅衛兵」已垮台，造反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瀋陽總部」佔絕對優勢。但在1967年1月下旬的奪權活動中，造反派發生分裂，遼寧大學「八．三一」等退出總部，另組「瀋陽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從2月起瀋陽市形成以遼大「八．三一」和以東北工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為中心的造反派內的兩派尖銳鬥爭。「八．三一」派因攻擊瀋陽和遼寧軍區而受到鎮壓。原「總部」於1967年2月16日聯合其他組織成立「瀋陽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遼聯」)，容納了不少以前的基層保守組織，協助軍區和復活的保守派鎮壓「八．三一」派。到1967年5月，以宋任窮為首的東北局幹部發表三點聲明，把鎮壓造反派的責任歸之於瀋陽和遼寧軍區。軍區遂與宋等反目，而「遼聯」中一部分組織(以原保守派居多)在軍區支持下打宋，從「遼聯」中分裂出來，成立「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遼革站」)。反「二月逆流」之後，尤其是在中央117號文件表態之後，「八．三一」派恢復活動，但「遼革站」在軍區支持下與此派和「遼聯」派不斷武鬥，直至1968年1月下旬，三大派均被中央定為革命派，實現大聯合並進入革委會。「遼革站」被造反派視為保守派，因為它在軍區支持下堅決與造反派作對，且其成員多為前保守派，但該組織自稱造反派，因為它要打倒宋任窮等「走資派」。

吉林。1966年9月初成立的保守派組織「紅衛兵長春市總部」(又稱「大廟總部」)於12月初垮台，造反派的「二總部」於9月21日成立，但在10月和11月內部即出現分歧，因為省市委表面支持造反，拋出一些幹部作為犧牲，引起造反派組織對省市委評價的分歧。在1967年1月奪權和是否支持軍隊鎮壓「工人造反大軍」等三個組織問題上發生分裂，「地院兵團」、「工大造大」、「光機八．一五」、「人大紅野」等退出「總部」，於2月8日成立「長春公社」，但3月即被鎮

壓。「二總部」支持軍區鎮壓「工人造反大軍」和「長春公社」。公社派於4月份獲得新生，但從4月中旬即與「二總部」發生武鬥，持續到10月，兩大派於1968年初達成大聯合協議。

江蘇。保守派為1966年9月初成立的「南京紅衛兵大中學校總部」，南京大學為著名的造反派根據地，但該省造反派分為「八．二七」和「紅色造反隊」兩派。1967年1月3日保守派和造反派發生大武鬥，保守派由此垮台，這時造反派有統一組織「南京地區革命造反派聯絡總站」。1月26日奪省市委權時，以「紅色造反隊」為首的奪權派排斥南京「八．二七」、「南京工學院東方紅」等造反組織。造反派因此分成支持奪權的「好派」(因其口號為「一．二六奪權好得很」，主力為「紅總」、「新工總」)和反對奪權的「屁派」或「P派」(得名於其口號「一．二六奪權好個屁」，以「八．二七」、「工院東方紅」為主)，兩派在2月下旬因江蘇電台播放「一．二六奪權好得很」的新聞稿而發生大規模武鬥，後來，自5日起兩派武鬥不斷，直至1967年底和1968年初各組織陸續實現聯合。

浙江。在1966年的8月底9月初，部分學生就對省委、杭州市委、金華地委等大造其反。在杭州，保守的「紅一司」成立於9月4日，造反的「紅三司」成立於11月15日，兩派在支持還是打倒省委常委、文革組長陳冰問題上一直衝突，11月21日發生武鬥。1967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十條決定」，表態支持造反派進駐省軍區，使其聲威大振。1月19日，「浙江省紅色造反聯絡站」所屬五十個組織討論大聯合和奪權問題時，有些組織提出「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形成分裂。2月上旬，造反派分為打倒江華(省委第一書記)的「省聯總」派和保江華(因周恩來接見群眾組織時說毛澤東要保他)的「紅暴會」派，兩派鬥爭不已，「省聯總」因得到中央文革、直屬中央的空五軍、二十軍支持而佔上風。而省

軍區則支持「紅暴會」以及保守的「紅一司」。1967年7月在京解決浙江問題，其決議稱駐浙空五軍、二十軍正確，省軍區、軍分區、人武部支左犯方向路線錯誤，「省聯總」應為大聯合核心。「紅暴會」被稱為「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但直至1968年底，它的一些組織還遭鎮壓。

安徽。運動前期保守派力量十分強大，在1966年底、1967年初和造反派武鬥時佔居上風，這導致毛澤東下令軍隊介入運動，支持「左派」即造反派，此舉使得保守的「合肥地區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紅總」)和「工總」、「軍總」、「文總」等保守組織馬上垮台。緊接着，造反的「八．二七」等組織在省軍區支持下於1967年1月26日奪了省委及合肥市委的權，他們排斥和鎮壓其他造反派。參加奪權的一派說「一．二六奪權好得很」，稱為「好派」，未參加奪權的造反派說奪權「好個屁」，稱為「屁派」。1967年3月底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批評了對「屁派」的鎮壓，此派翻身後，與奪權派的鬥爭不斷。

福建。保守派「東海前線紅衛兵總部」一直活躍到1967年初，造反派兩個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福建革命革員會」(「紅革會」)和「八．二九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在打葉飛(省委第一書記)時是戰友，1967年1月底準備聯合而未成。「紅革會」等因衝擊軍區而遭鎮壓，「八．二九」派掌權，在2、3月中幫助鎮壓。到5月開始釋放被抓捕的人，被鎮壓的一派要求平反，批判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八．二九」派阻撓平反並保韓。兩派自6月起武鬥，持續到年底，有的地區持續到1968年初，到1968年5月，各派均被承認為革命派而實施歸口大聯合。廈門的情況和福州有所不同，同屬「八．二九」派，以「新廈大公社」為首的造反派分裂為激進的反軍派「促聯」和溫和的擁軍派「革聯」，雙方大打出手，背後有不同軍隊支持。

河南。運動初期的保守派為「鄭州市紅衛兵總部」，由於省委主

要負責人支持造反，力量並不強大。造反派紅衛兵在1966年10月11日召開批判「資反路線」大會時成立「河南省紅衛兵造反司令部」。到1967年1、2月份，以鄭州工學院「造總」(2月下旬發起成立「河南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即「河造總」)為首和以鄭州大學「聯委」(1月下旬發起成立「二七公社」)為首的兩派造反組織為爭奪《河南日報》大打出手。3月，河南省軍區在「河造總」和保守組織「十大總部」、「公安公社」支持下鎮壓「二七公社」，直至6月初才為其平反，造反的兩派從5月初開始武鬥，到1968年1月，「二七公社」以左派身分，「河造總」以「犯過方向、路線錯誤的造反派」身分實現聯合。

湖南。保守派和造反派的鬥爭在1966年12月之前以「紅色政權保衛軍」等保守組織的垮台而結束，此後除1967年「二月鎮反」有一些反覆外，主要事件一直是造反派之間的鬥爭和造反派不斷的分化。造反的「高沙高司」於1966年12月初和原省委達成妥協，與激進的「工聯」、「湘江風雷」發生分歧。後來，「高司」因協助軍區鎮壓「湘江風雷」而在反擊「二月逆流」之後偃旗息鼓。緊接着，「工聯」和「湘江風雷」分裂，這既有權力之爭的原因，也因為「工聯」觀點較為溫和之故。當「工聯」和「湘江風雷」實行造反派大聯合共同進入權力機構時，更激進的在野派別「省無聯」向暫時在朝派別提出了挑戰。

雲南。保守派是「紅衛兵總部」，造反派以雲南大學「炮兵團」和昆明工學院「八．二三」為首。至1967年初，保守派完全失敗。造反派在1967年1月初成立聯合組織「昆明大聯合指揮部」，1月8日衝進軍區大院，之後對於是否撤出產生分歧，「炮兵團」等自行撤出，從此形成對立的兩大造反派別。較溫和的「炮兵團」派得到省軍區支持，較激進的「八．二三」派得到中央文革小組和駐滇野戰軍十三軍、十四軍支持，兩派從1967年5、6月起開始大規模武鬥，

8月達到高潮，直至1968年春才逐漸平息，1967年3月「八．二三」被軍區鎮壓時，保守的紅衛兵一度復活，但只是曇花一現。

陝西。保守的「西安紅衛兵司令部」在西北局、省委直接策劃下於1966年8月31日成立，但在1967年初失勢。著名造反派領袖李世英領導的「西安交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委員會」屬於統一的「大專院校聯合指揮部」，但在1967年1月中旬，李被指責為對保守派妥協、搞折衷而受到批判，從此，西安交大的造反派和以西安工業大學、西北大學為首的造反派公開分裂，不斷鬥爭，前者組織的「工總司」和後者所隸屬的「工聯」從1967年4月至9月武鬥不斷，到1968年6、7月還在武鬥，保守派一直想借造反派內鬥之機復活，但終於沒有成氣候，被排除在大聯合、三結合之外。

甘肅。保守的「蘭州市紅衛兵總部」成立於1966年10月初，失勢後加入「革聯」(此派得到北京南下學生支持，但被中央定為保守組織)。造反的學生在10月中旬批「資反路線」中作跨單位聯合，於1967年1月22日形成大派「紅聯」，但在2月5日奪權後分裂。被「紅聯」開除或後來自己造反殺出去的組織於5月成立「紅三司」，被中央認為是左派，而「紅聯」被視為是犯了錯誤、但可以團結的革命群眾組織。當中央於5月中旬發表關於甘肅問題意見後，「革聯」與「紅聯」有大武鬥，6月底，「紅三司」與「紅聯」發生武鬥。從8月起，「紅聯」聯合「革聯」與「紅三司」鬥爭，此兩派後來拒絕了為其保留的三結合名額。

青海。1966年8月下旬，省委為了對付造反派的攻擊，決定組織保衛自己的紅衛兵，「青海紅衛兵總部」於9月中旬正式成立，著名的造反組織「八．一八」於9月28日成立。到1967年1月底，以「八．一八」為主體的造反派統一組織「青海省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成立。青海軍區在2月開槍鎮壓造反派，釀成全國著名的「二．

二三」流血事件，經中央果斷處置，造反派於3月28日得到平反，在2月復活的保守派隨之土崩瓦解。之後造反派內部紛爭不息，一方面，有「東方紅公社」、「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以「打倒楊植霖」的口號來與「八・一八」作對，另一方面，「八・一八」內部有持激進觀點的組織(比如「長征人」)鼓吹「左派分化論」，「青海需要第二次大亂」。直到1968年初，「八・一八」主流派還在批判「極左思潮」。

天津。造反派紅衛兵於1966年9月24日成立全市性統一組織「天津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保守派於1966年底至1967年初大部分瓦解。但造反派由於內部的權力爭奪和「一月奪權」過程中各自抓權而分裂，天津大學「八・一三」和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退出總部，雙方大肆互相攻擊。「二月逆流」中，天大「八・一三」和南開「衛東」等與保守組織一道，配合軍隊鎮壓其他攻擊過軍區的造反派，3月下旬開始反擊二月逆流，但李雪峰等領導人和當地駐軍繼續支持在2月份恢復的保守派，此後造反派和保守派武鬥不斷，直到1967年9月在中央促合下造反派和保守派實現大聯合。

寧夏。保守的「銀川市紅衛兵總部」及所在大派「銀川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處」在造反派的強大攻勢下於1967年1月瓦解。造反派「寧夏大學聯合指揮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聯合指揮部」及其所在的大派「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聯合一些造反組織於1967年1月27日奪自治區和銀川市的權(有其他造反派反對)，寧夏軍區支持並參與奪權。但軍區在2月11日撤回支持，壓制造反派，大力支持在3月份復活的保守派「籌備處」。「總指揮部」4月在反擊「復辟逆流」的浪潮中恢復，從5月初起與「籌備處」武鬥，同時也與自稱第三勢力的溫和造反派「寧總司」、「寧三司」發生武鬥。由於寧夏軍區司令員朱聲達堅決支持保守派，而且8月8日「總指揮部」與「籌備處」(從7月底升級為「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處」)在

吳忠縣的武鬥中，造反派有人被槍殺，導致中央調遣第六十二師等部隊到寧夏支左，即支持「總指揮部」派。「寧總司」、「寧三司」抱怨六十二師偏袒「總指揮部」，而「籌備處」在武鬥中圍攻支持造反派的部隊，使得部隊開槍，造成「八．二八青銅峽流血事件」。由於中央文革的堅決、反覆表態，並調走朱聲達，保守的「籌備處」終於在1967年底逐漸瓦解。1968年初，以下四派在中央主持下實現了大聯合：「總指揮部」、「寧總司」、「寧三司」以及「籌革造」。最後一個組織是「經過教育、幫助從籌備處中造反殺出來」的，這種安排是為了表明所有各派的群眾組織都參加了大聯合。

在描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鬥爭一直是運動中派別鬥爭主線的地區之前，有必要指出，天津和寧夏是一種混合過渡類型，即保—造、造—造兩類鬥爭並存，而原因均在於當地駐軍堅持支持保守派。由於情況不容易掌握得十分清楚而只能作簡單分類，本書只把天津、寧夏當作這種類型，實際上混合、複雜型可能更多，派別鬥爭模式單一，界線分明的情況更少。

在以下的幾個省（自治區）中，保守派和造反派的鬥爭佔居主導地位。當然，它們的情況也不完全一樣，其中有的地區造反派中溫和派和激進派的分化和差別相當明顯，但兩派之間的鬥爭與保—造的鬥爭相比處於次要地位，而有的地區則沒有表現出造反派內部的分裂與對立。另外，在中央最後處理某地區的決定中，有的省（自治區）只有造反派取得合法地位，而有的地方保守派和造反派都得到中央承認，在大聯合和三結合中共同取得地位。這幾個地區的共同點是，由於保守派得到當地駐軍頑強支持（原因多半是，中央出於特殊考慮而容忍了當地軍區的所作所為），始終沒有垮台，不論中央如何定性表態，他們一直有力量和造反派對抗。

內蒙古。由於軍區的支持，保守派沒有像在其他地區一樣因為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失敗。1967年2月初，以「呼和浩特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呼三司」)為主的造反派因衝擊軍區而遭到鎮壓，但中央旋即於4月13日發出處理內蒙問題八條決定，全力支持造反的「呼三司」，改組內蒙軍區。之後保守派和造反派的鬥爭仍然十分激烈，直至6月，造反派才支配局面。從1968年2月起，挖「內人黨」的大規模迫害事件一浪高過一浪地進行，保守派趁機重新活躍，向造反派反攻倒算。而佔居主導地位的「呼三司」內部發生分化，有人堅決支持挖「內人黨」，有人消極甚至反對。

江西。鬥爭幾乎一直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進行，第一次大衝突發生在1966年底，保守組織「工人赤衛隊」、「省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等在南昌與造反派衝突。1967年春天之後，保守派(統一為「聯絡總站」)在江西省軍區及下面軍分區支持下向造反派(「大聯合籌委會」)發動武裝進攻。中央在8月作出處理江西問題決定，改組省軍區，鮮明地支持造反派，嚴厲點名譴責保守派。保守派未能參與大聯合與三結合，但由於省軍區以下許多軍分區堅決支持保守派，因此兩派鬥爭並未停息。值得注意的是，從1967年6、7月份開始，南昌市出現了一股由老造反派形成的「極左」力量，持激進觀點，向「大聯籌」挑戰(批判其「右傾」)，一些單位甚至發生武鬥。

廣西。自1966年9月上旬造反派和保守派發生衝突以來，造反派一直較佔優勢，但從1967年2月中旬起，以韋國清為首的自治區黨委和軍區改變支持造反派的立場，實行支保壓造的政策。自1967年4月兩派在爭奪《廣西日報》社大打出手以來，保守的「聯指」以軍區為後盾，對造反的「四．二二」大舉進攻，甚至發展到圍剿和殘殺。1967年底，中央在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中承認兩派均為革命群眾組織，雖然在8月底，周恩來代表中央表示過，「四．二二」是造反派，「聯指」是群眾組織(注意，在文革中，造反派等於革命派，而

「群眾組織」則含蓄地表示不是革命組織）。中央的讓步實質上是對韋國清的讓步，因為越南戰爭的關係，毛不打算搞掉他，這使得廣西軍區敢於逆全國形勢而動，支持保守派殘酷打擊造反派。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廣西，造反派也有不少分裂和鬥爭，只不過強敵壓迫，這種分裂沒有充分發展。這裏可舉幾例。第一次，1967年1月7日，「廣西革命造反指揮部」等組織封閉了《廣西日報》，但在15日，「工總」等組織重新封閉並接管《廣西日報》，他們指責前一次封報是搞折衷主義、改良主義、溫情主義；第二次，在1967年3月，造反派在是否應該砸爛「工總」問題上發生對立；第三次，在4月造反派分成打韋（國清）和保韋派，打韋派支持原省委幹部伍晉南、賀希明、霍泛，而保韋派則要堅決打倒這三人；第四次，1968年3月底，「四．二二」派在對待大聯合，抗擊「聯指」進攻問題上發生分裂，分成「老四．二二」和「新四．二二」兩個組織。

西藏。由於地理位置和民族狀況，情況非常特殊。一是學生不是運動主要力量：西藏唯一的大學即民族學院設在陝西咸陽，拉薩只有兩所中學。二是運動發展比內地晚得多，群眾組織起來之時，內地各地「兩條路線鬥爭」已見分曉，因此沒有別處那種保守派和造反派初期的誓不兩立的對抗。1967年1月形成兩大派對立組織，一是「造反總部」，一是「大聯合指揮部」，外地的人一般認為「造總」是造反派，因為它曾圍攻《西藏日報》社、軍區，成立「專打土皇帝聯合委員會」，打張國華，而把「大聯指」當保守派。「造總」在1967年「二月逆流」時受軍區鎮壓，4月初獲得平反，其後兩派武鬥，7、8月達到高潮。軍區一直支持「大聯指」。1967年9月中央表態，確立兩派均為革命派，1968年3月達成大聯合協議，但接下來又是武鬥，直至1968年7月底還未平息。按文革中的標準，西藏的「兩條路線鬥爭」未搞徹底，這顯然是因為中央害怕放縱造反而引起動亂。

新疆。文革前表面上的第一領導人是自治區主席賽福鼎，實際上的第一把手是作為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軍區第一政委、兵團第一政委的王恩茂，各群眾組織以對王的態度劃分派別。「二司」堅持打倒王恩茂，「三促」(「工促會」、「農促會」、「紅促會」)提出「鐵心死保王恩茂」，而「三司」、「紅革聯」提出對王「一批二保」。1967年夏天武鬥時，保守的「三促」和溫和的「二紅」(「紅革聯」、「紅三司」)聯合對付「三新」(「新疆紅二司」、「新疆職工總司」、「新疆農民總司」)，結果是「三新」節節敗退。儘管中央一直表態說二司是左派，但在實行大聯合和組織建革委會時，中央讓上述所有組織都進入權力機構，「三促」、「二紅」還略佔上風。造反派在新疆未獲全勝，原因在於中央不希望新疆局勢動盪，不打算打倒王恩茂。另外，當地群眾造反熱情低於內地(許多單位是生產兵團建制，便於控制指揮)。

(2) 三省典型案例描述和分析

李鴻永等西方學者未能重視造反派內部的派性鬥爭，原因並不在於他們的研究和分析有誤，而在於他們的研究局限於廣東省(西方的研究者在60和70年代只能以香港作為觀察中國的前哨，也只能從逃至香港的廣東難民那裏得到親身經歷的信息，對此，他們無可選擇)，在缺乏大量比較的情況下，他們難於看到廣東地區的特殊性。也許，找一個更有代表性的地區將會有助於說明全國的一般情況，讓我們把四川省(以省會成都為中心)作為例子來看一看。

和全國各地一樣，成都市的大中學校中在1966年6月份就有少數學生造學校領導和工作組的反。到8月和9月，在北京南下學生的鼓動下，他們把火燒到西南局、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並在赴京串

連前後正式成立了造反組織，如四川大學的「八・二六」、成都大學的「八・三一」、四川醫學院的「九・一五」、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的「東方紅」和成都地質學院的「東方紅」，等等，而且各自在中學生中發展自己的分團或支隊，在10月份，這些造反的少數派聯合組成了全市的統一組織「紅成」(「紅衛兵成都部隊」)，展開與保守組織的鬥爭，但分裂很快就發生了。

分歧起始於「一一・一三大會」。事情是這樣的：「紅成」的負責人和省委、市委達成一項協議，訂於1966年11月13日在成都市人民南路廣場召開一個十萬人參加的批判李井泉(西南局第一書記)大會，由李作檢查交代，然後紅衛兵進行批判。事先說定，李井泉提前將檢查鉛印十萬份分發，會場布置由省市委負責。但批判會剛開始，作為「紅成」成員的川大「八・二六」部分紅衛兵在團長Y的帶領下，和「北地東方紅」等北京南下赴蓉造反派紅衛兵一道衝擊會議主席台，造了大會的反。他們的理由是，會場上彩旗翻飛，省市委工作人員在會上指手劃腳，完全不像是批判「走資派」的樣子，這樣開會只會起到假批判、真包庇的作用。因為李井泉本人就希望有一表面檢討的機會，以便蒙混過關。

「紅成」其餘各校組織指責川大「八・二六」破壞批判會，破壞革命組織的統一和團結，搞「左傾分裂主義」。「八・二六」則堅決反對「紅成」的「右傾投降主義」，與西南局、省市委的妥協。他們分析形勢說，四川還沒有亂夠、亂透，要大亂特亂才能暴露並打擊走資派，分辨群眾組織誰是真革命，誰是假革命。北京南下的學生大多站在川大一邊。由此，統一的「紅成」分成兩派，以川大一校的造反派「八・二六」為一方，以近十個大學的造反派為另一方，仍叫「紅成」。緊接着，在關於與保守派鬥爭的策略，在封《四川日報》和1967年「一月奪權」等一系列問題上，雙方發生了尖銳、激烈的鬥爭。

1967年2月，因「八．二六」救援軍內被抓捕的造反派而圍攻靜坐成都軍區，招來中央軍委「二．一七信件」，他們一下子被打成「反革命」，頭頭和大批骨幹被抓。保守派乘機重新活躍，配合軍隊抓人。「紅成」因反對圍攻軍區，未被打成「反革命」，其中有人對「八．二六」抱同情態度，有人樂於見到昔日對手處境惡化，甚至落井下石。成都軍區的方針是：依靠保守派，團結、批評、教育「紅成」，打擊「八．二六」。

到了4月反擊所謂「二月逆流」時，軍隊和公安局開始釋放「八．二六」的人，但並不承認錯誤。軍區見形勢已變，改變態度，轉而宣布「紅成」是左派。「紅成」頭頭為此極其興奮，同時與開始恢復元氣的「八．二六」重新開戰。「八．二六」要求「全盤否定二月鎮反」，而「紅成」反對這種提法，主張只能「根本否定二月鎮反」，意思是鎮反固然不對，但被抓的人也有確實該抓的壞人。

5月4日和6日成都發生大武鬥，「紅成」和「八．二六」廣大成員與保守派激戰（但並無組織上的配合或統一指揮），大獲全勝。5月7日中央作出解決四川問題的十條決定，承認「八．二六」和「紅成」均為革命組織，並希望兩派團結起來，不要打內戰。但實際上，中央文革的方針是依靠「八．二六」，團結「紅成」。因為四川境內沒有堅決支持「八．二六」的部隊，中央火速調五十軍入川支左，表面上一碗水端平，實際上偏向「八．二六」。成都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分別由從廣州調來的梁興初和從西藏調來的張國華擔任。

5月之後兩派內戰愈打愈激烈，由文章論戰升級為武鬥，而武鬥由用拳頭、石塊、鋼釺變為使用槍炮和自製坦克。兩派紅衛兵除了與工人、農民、幹部結盟（「紅成」派屬於「四川地區革命派聯合總部」，「八．二六」屬於「四川地區打倒李井泉聯絡站」），還與其他政治勢力結盟，「八．二六」派與五十軍，省革籌中的第三、四把手

劉結挺、張西挺關係密切，「紅成」開始時孤立無援，後來和強大的五十四軍接近。

兩派的鬥爭在1968年3月見分曉，15日，周恩來、江青等人在北京接見四川地區群眾組織代表和軍隊、省革籌負責人，宣布「紅成」犯了「右傾翻案」的錯誤。在這之後，「紅成」在政治上受到壓制和打擊，最後不得不按「八．二六」提出的條件實現大聯合。雖然在各級革委會中佔有和「八．二六」相等的席位，但已明顯地淪為第二等「革命群眾組織」。

我把四川作為典型，是因為不少省份，比如山東、吉林、河南、湖南、湖北、雲南、陝西等地的情況與之十分相近。我想強調這種典型情況的以下特徵：一，長期鬥爭的兩派確實都是造反派，而不是如有些研究者所誤認為的那樣，一派是真正的老造反，而另一派由保守組織改頭換面而來㉓；二，兩派在意識形態上有深刻分歧，存在溫和與激進的區別；三，在組織路線上也有差別，即對組織成員的社會地位、家庭出身重視程度不一樣；四，兩派對「揪軍內一小撮」的態度不同，因而在「二月鎮反」中的遭遇不同，進而在「反復辟逆流」時對「鎮反」的否定程度不同；五，兩派與北京紅衛兵(或與他們之中的「天派」或「地派」)的關係有親疏之分；六，兩派與中央文革的關係也有差異；七，在大聯合、三結合權力機構中的地位不同(有左派組織和一般革命群眾組織之分)。我將在本節最後一段詳論這些帶規律性的特徵。

和四川相比，廣東的情況有特殊性。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軍隊都鎮壓了造反派，但當毛澤東一發起反擊，各地軍區立即改弦更張，或者其領導人被更聽命於毛的人代替。但廣州軍區一直壓制造反派，使得造反派只能團結起來，共禦外敵，結果是內部的矛盾沒有充分展開。廣州軍區之所以與其他軍區地位

不同，原因有二。主要的一點是，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是林彪的嫡系，林彪願意為黃在政治上冒風險，與毛及中央文革小組討價還價。在1968年秋，江青曾報告林彪和毛澤東，指出南方幾省造反派受壓，根子在黃永勝。她建議處理這類事情，但林彪沒有表態，毛澤東也就沒有表態。另一個原因是廣州軍區對付造反派比較注意策略，沒有把事情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從而保住了自己的地位，然後慢慢收拾造反派。廣州軍區在「二月逆流」中只取締了復員退伍軍人組織「八一戰鬥兵團」和「珠影東方紅」，沒有公然鎮壓學生。這使得4月份周恩來到廣州表態時，一方面肯定造反派是左派，一方面又説了廣州軍區不少好話，使廣州的保守派有理由繼續支持軍方，為靠山不倒而慶幸。這之後，廣州軍區向毛承認自己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同時暫時疏遠保守派，親近造反派。當他們以這種圓滑的手段對付了中央和廣州的造反派，從而站穩腳跟之後，他們逐步地、不動聲色地壓制和打擊造反派。到了1967年秋，毛澤東等人為了在全國穩定大局，尤其考慮到廣州是南疆重鎮，在廣州舉辦的交易會是中國大陸與外部維持經貿聯繫的唯一渠道，已無意堅決支持「革命左派」，這使得廣州的「東風」派得以和「紅旗」派在大聯合和三結合中取得同等地位。這就是廣東地區派別鬥爭一直以造反派和保守派對抗為主線的原因，這種情況在全國屬於少數。

儘管如此，造反派內部的分裂和鬥爭仍然清晰可見，我們據此可以設想，如果廣東的造反派不是一直面對軍區和保守派的強大壓力，情況又會是甚麼樣，請看以下事實。

廣州造反派的分裂早在1966年10月份就發生了，而且看得出來是有溫和和激進態度之分。分裂是在造反的「一司」之中發生的（還有一個造反組織為「三司」，「二司」為保守組織）。「一司」中的中山醫學院和中醫學院造反派主張對工作組的錯誤緊追不放，而廣州工

學院的學生則認為既然工作組承認了錯誤，事情就可以了結。分裂的結果是「一司」變為以「廣州工學院紅衛兵」為核心的「紅一司」和以中山醫學院「東方紅公社」為核心的「新一司」，以及獨立的廣州中醫學院「三○一戰鬥隊」㉔。

1967年「一月奪權」使廣東造反派發生大分裂。學生造反派中，積極主張奪權的是「中大紅旗」和若干外地組織，如「北航紅旗」、「哈軍工」、「武漢三司」等，反對奪權的是「一司」和「三司」，以及「新北大公社」。這種分裂十分嚴重和深刻，反奪權一派觀點溫和，認為條件不成熟，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還未實現。而奪權的一派觀點激進，認為，廣東尚未大亂，要在奪權中加速左、中、右的分化，在這之後再進行大聯合。反奪權派基本上是本地組織，它們仇視外來的激進派到了這種程度，以至於在1月30日去查抄北航、哈軍工和武漢南下紅衛兵的聯絡站。我想在此強調，在奪權問題上的分歧，表現在意識形態的激進與溫和之分，以及與外地激進學生的關係，是與四川的相應分歧一致的。

和四川一樣，激進派在2月上旬為救援被逮捕的軍區造反派而攻擊廣州軍區，當他們遭到軍區的反擊和壓制時，溫和派中也有人參與對激進派的批判。在「二月逆流」被擊退時，激進派大力呼籲為被取締的「八一戰鬥兵團」平反，而溫和派則不甚熱心。

在「一月奪權」時，激進派聯合廣州市公安局內造反派奪了公安局的權，但被另一派「一．二五總部」反奪權，激進派將其視為保守派，在「二月逆流」之後堅決不同它合作，而溫和派則與它密切合作。

1967年8月中旬，廣東造反派中激進的「紅司」、「工聯」、「八一戰鬥兵團」等成立「紅聯」(「廣州地區紅色造反派聯合指揮部」)，「紅聯」的第一個行動是宣布成立搞武鬥的「紅警司」。這個舉動遭到造

反派內部溫和的「三司」、「紅旗工人」等組織的指責，他們說「紅聯」是左傾機會主義的產物，成立「紅警司」是把「武衛」放在「文攻」之上的極左做法。「紅聯」則攻擊對方為右傾機會主義，其中最激進的「指點江山」對溫和派的所作所為進行了一系列譴責，比如，說他們對廣州軍區抱有幻想，指望不經過鬥爭，靠北京談判解決問題，甚至算起老賬，攻擊溫和派在「三月黑風」中不堅定，與軍區一道整激進派。

1967年11月初，在中央強壓下，廣東的造反派在京與保守派簽定十二條協議，實現聯合，12月中旬，造反派各組織負責人雲集佛山，召開會議分析形勢。這次會議形成「佛山會議紀要」，其中的觀點顯得十分溫和，表示擁護黃永勝的領導，並對以前與軍區對立的態度作了自我批評。這個紀要遭到激進派的嚴厲批評判，他們把佛山會議稱為「出賣革命造反派利益的慕尼黑會議」。在此之後幾個月，激進派與溫和派的爭論成了運動的主流。在一部分十分激進的造反派中，形成了極左的「八五思潮」(主要由「八五公社」提出)。這股思潮和湖南「省無聯」的激進思想類似，鼓吹徹底革命，認為當前主要危險是右傾勢力復辟。還認為需要重新劃分階級，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特權者——下鄉知青、臨時工、合同工等等——同官僚特權階級和工人貴族的矛盾。

與造反派內部的嚴重分歧和激烈爭論形成鮮明對照，廣東的保守派顯得十分團結，除了「紅總」對武鬥不積極之外，各組織之間沒有太大的分歧。

最後，我們考察一下湖北省的派別鬥爭進程。由於有震驚中外的「七．二〇」事件，這一地區的文革形勢格外使人關注。在「七．二〇」事件中，保守組織「百萬雄師」和抗命於中央的武漢軍區相配合，扣押了中央特使謝富治和王力，事敗之後，「百萬雄師」被打成「反動組織」。由於這一事件的戲劇性，人們一般認為，湖北的派別

鬥爭的主線是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對壘，造反派內部的鬥爭幾乎未引起人們注意，讓我們來看看實際情況。

1966年9月，武漢地區成立了大學的保守派紅衛兵「大專兵」(「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紅衛兵」)和中學的「三字兵」(「中學紅衛兵」)，他們保原湖北省委負責人王任重、張體學等。緊接着，在10月底成立了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如「鋼二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等。他們很快就衝垮了「大專兵」和「三字兵」，並得到省委承認。在1967年「一月奪權」期間，工人造反派隊伍發生了分裂，「工造」(「武漢地區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從「工總」(「毛澤東思想武漢地區工人總部」)中分裂出來，原因有二，一是奪權中權力分配出現問題，未掌大權的一些人不滿意，二是「工總」頭頭中有些人家庭出身或本人「有問題」，容易被人抓辮子，有的人怕受到牽連。2月8日，掌權的一派與清華、北航、北地、哈軍工等赴武漢紅衛兵組織一道，在他們控制的《長江日報》上發表聲明，攻擊對立派別，引起武漢全市連日大辯論，兩大派陣線變得截然分明，一方是激進的「香花派」(主張「二．八聲明」好得很，是香花)，後稱「鋼派」；另一派是較溫和的「毒草派」(主張「二．八聲明」是毒草)，後稱「新派」。屬於前者的紅衛兵組織為「鋼二司」，屬於後者的紅衛兵組織有「新華工」、「新華農」、「新湖大」，兩派爭論異常激烈。

1967年2月18日，解放軍武漢部隊發表聲明，譴責「二．八聲明」。過後，以種種藉口抓捕「鋼派」頭頭，從此之後，造反派(不論「鋼派」還是「新派」)一直處於軍區的強大壓力之下。保守派在「二月逆流」中迅速復活，配合軍區向造反派發動猛烈進攻。在反擊「二月逆流」時，「新派」雖然基本上支持「鋼派」要求軍區平反，但態度大有保留，不少人堅持認為被抓的一些造反派骨幹份子確實是有問題的壞人，沒有抓錯。由於軍區堅定不移的支持，保守派在反擊

「二月逆流」之後不但沒有潰散，反而力量不斷壯大。在「七．二〇事件」前夕，武漢市區內的造反派幾乎全部失去了立腳之地。

「七．二〇事件」之後，保守派徹底瓦解，「鋼派」和「新派」的紛爭迅速上升為主要矛盾，對抗日益加劇，甚至發展到兩派分別搶槍搞武鬥。從1967年10月到年底，中央和地方當局強令兩派談聯合，但雙方根本談不成，後來上面強行分配名額，成立工代會、紅代會、革委會。大致從1968年年中起，兩派都受到軍方的壓制，矛盾才開始緩解。但立場、觀點的差別依然十分明顯。學生中的「北、決、揚」(即三個思想、理論小組「北斗星學社」、「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革命派」和「揚子江評論」)宣揚激進的反復舊觀點，獲得「鋼派」成員廣泛贊同，而「新派」持觀望或反對態度。

以上事實說明，在造反派於1966年年底之前戰勝保守派之後，除了在1967年3至7月造反派的兩派要共同對敵之外，在相當長的時候內他們之間的對立和鬥爭是群眾派性鬥爭的主線。

比較一下四川、武漢、廣東的情況，可以發現造反派分裂的模式基本上是一樣的。分裂都發生得很早，在諸如與外地激進派學生關係，對軍區關係，在「二月鎮反」中的遭遇，對在「二月逆流」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組織的平反問題，以及意識形態的爭論各個方面，造反派中溫和派和激進派的分野是壁壘分明的。運動中派別鬥爭表現出的差異，也許可以從三地軍區地位的不同中得到解釋：成都軍區在文革一開始就是「有問題」的，因為據說它與反毛和林彪的賀龍有「黑關係」，並在1967年5月另調司令員和政委；武漢軍區是7月事件之後才改組；而廣州軍區在運動風浪中始終屹立不動。也許我們可以由此概括出一條可能失之簡單化的規律：造反派是否分化對立，保守派力量的強弱以及軍區是否被中央「動手術」，其間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

我們還可以從更加宏觀的視角看問題。

從時間上看，以毛為首的中央政策上有一個大轉變：從堅決支持造反派，打擊保守派，「把路線鬥爭進行到底」改變為強調人民群眾之間沒有根本利害衝突，竭力抹平分歧、撮合聯合。轉折發生在毛澤東於1967年7月至9月在各地視察時。在此之前，周恩來多次鮮明地表態：廣東的「紅旗」派是革命派，「東風」派是保守派，廣西的「四．二二」是造反派，「聯指」是保守派；但在1968年分別接見廣東、廣西群眾代表時，周明確地說，以前講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鬥爭，現在形勢不同了，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要大聯合。保守組織，凡能熬過1967年夏季而不被瓦解者，都有資格以合法身分參加大聯合與三結合。在這種情況下，造反派的矛盾與分化已無時間顯露。

從空間上看，六個以保—造鬥爭為主線的省份中，除江西外，全處於邊防前沿，中國邊境線的大部分屬於這些地區，而且其中四個為民族自治區。敵情觀念和對民族矛盾的警惕使得中央把穩定置於「路線鬥爭」之上，使得既不能過於觸動當地軍隊，也不能一味壓制那裏的保守派。中央在關於廣東問題的決定中稱：「廣州地處邊防前沿，美蔣英日蘇修特務妄圖用各種卑鄙手段進行破壞活動，階級鬥爭非常尖銳，廣大革命群眾和全體指戰員應當提高革命警惕性。」在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說：「廣西處在援越抗美的前線，越南人民把廣西稱作是最可靠的後方。」用當時的意識形態語言來說，這些地區是矛盾未充分暴露和徹底解決的地區，也是文革未進行到底的地區。

(3) 溫和與激進的意識形態分歧

考察造反派內部溫和與激進的意識形態之爭十分有意義，在這個問題上，雙方的陣線較為分明。另外，保守派大多無自發性，在

文革中提不出自己的綱領和理論，只是喧嚷血統論，標榜自己是當然的接班人，老幹部(即自己的父母)不應受衝擊(雖然在後期，有個別優秀成員對中國的政治問題有大膽、深入的思考)。文革中兩種不同的社會思潮，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對文革目的不同理解的爭論，不是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產生的，而是在造反派內部進行的。

文革期間，造反派群眾組織中(尤其是學生中)不少人表現出了驚人的理論興趣，他們力圖在官方宣傳機器之外獨立地闡述自己對於文革的理解，並發表了一系列有深刻影響並引起廣泛爭論的文章，例如，湖南「省無聯」的〈中國向何處去？〉(作者楊曦光)、〈我們的綱領〉、廣西「四．二二」派紅衛兵的〈今日哥達綱領〉、北京中學生「四．三」派紅衛兵的宣言〈論新思潮〉、上海「中串會」的〈一切為了九大〉等等。以上文章表述的是激進觀點。溫和派的有影響的文章要少一些，但清華大學「四一四東方紅戰團」負責人周泉纓的〈四一四思潮必勝〉卻全面、深刻地表述了溫和派的觀點㉕。此外還有四川重慶大學「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等等。所有這些文章，既闡述了本派對於文革中重大問題的一般看法，同時又為本派在當時當地的派別鬥爭服務。下面僅在各派中挑出一些最重要的文章，考察其中的基本觀點。看得出來，兩種思潮的分歧集中在對文革前十七年中國的社會性質、政治制度(集中反映在幹部與群眾關係上)，以及文革的目標是在何種程度改變現存體制方面的不同主張。

首先看看〈四一四思潮必勝〉，它完成於1967年8月9日，作者強調，文革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發動和進行的，也就是說，國家當權的是無產階級。「『走資派』在中國的地位和蘇聯完全不一樣。他們在黨內政權機器內未佔統治地位，他們也未形成新的資產

階級特權階層。也正因為這樣，十七年來我國的階級陣線基本上是穩定的，經濟基礎基本上是共產主義化的。……十七年來掌權的工農兵還是工農兵，十七年來受壓迫的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還是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右，而知識份子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顯，但是基本陣線也是不變的。」基於這種估計，作者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階級關係儘管有變化，但決不可能來個『大翻過兒』，也決不可能劃分甚麼『老保階級』，『造反階級』。」文章主張，文革中對於國家政權的改變只能是局部的，決不能是徹底的。作者堅決反對這種主張「文革要引起階級關係的大變動，從而導致文革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㉖。

在中國，軍隊是政權的本質部分，因此〈四一四思潮必勝〉闡述了對軍隊狀況的估計和態度。文章發表時已是武漢「七．二〇」事件發生之後，全國一片聲討「軍內走資派」之聲，中央文革通過《紅旗》雜誌第12期社論，號召「揪軍內一小撮」、「奪軍權」。但作者在這時的立場仍和激進派針鋒相對，作者看到，某些軍區對造反派的鎮壓，首先打擊的是激進派，然後才是溫和派，而一些軍區還支持隊伍的階級成分較「純」的溫和派。文章堅決否定激進派提出的「軍內走資派」有可能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的可能（他們認為武漢事件就是一例），理由是建國十七年來，革命路線在軍隊內部佔統治地位，作者也堅決反對衝擊軍區，對軍隊領導機關「徹底砸爛」，徹底奪權。

再看看〈中國向何處去？〉，它完成於1968年1月6日，文章中的觀點和上述主張正好相反，十分激進。作者認為，要搞文革就必須重新評價文革前的十七年，要對「中國社會重新進行階級分析，以重新組織階級隊伍，團結朋友，打倒敵人」㉗。作者是怎樣分析的呢？他認為，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了一個由百分之九十的高級幹

部形成的獨特的階級，這就是「官僚主義」者階級。「這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已經完全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一個腐朽的階級，他們與廣大人民的關係已經由領導和被領導變成統治和被統治、剝削和被剝削關係，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關係變成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紅色』資本家階級的特權和高薪，是建築在廣大人民群眾受壓抑和剝削的基礎上。」在作者看來，合同工、臨時工、下鄉知青和其他地位低下的勞動者是文革的動力。作者認為「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和尖銳化就決定了社會需要一個較徹底的變動，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會……。」

作者在〈中國向何處去？〉當中當然也論述了軍隊問題：「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觸動軍隊，中國既然形成了紅色資本家階級，軍隊當然不能脫離於這現實之外。」「軍隊走資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資派的利益一致」，「現在軍隊和解放前的人民軍隊有了變化，解放前的軍隊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本書作者按：即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軍民關係像魚水一般，解放後由於革命對象從帝官封變成走資派，而這種走資派在軍隊內是當權者，因此一些部隊在革命中不但改變了解放前軍民血肉一般的關係，甚至變成鎮壓革命的工具。」因此作者號召「必須自下而上搞軍內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這一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改變官僚控制軍隊所造成的軍民對立狀況。」

作者最激進的主張表現在公然提出造反派要用槍桿子徹底改變社會，從「紅色資本家」手中奪權，「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且靠武裝奪取政權，靠國內革命戰爭。」

類似的激進觀點也表現在其他許多文章中，例如〈論新思潮——

四三派宣言〉認為，所謂革命，就是進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而文革就是一輪新的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文革中不少紅衛兵認為，江青在其著名的講話〈為人民立新功〉在中傳達毛澤東向全黨推薦〈觸讋說趙太后〉一文，就是暗示了這種觀點)，「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解決一小撮特權人物同人民群眾的矛盾……因為現在社會上最主要的矛盾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同特權人物的矛盾。」文章主張，造反派的任務是「促成財產、權力的再分配，促成社會的革命變動，打碎特權階層」㉘。在〈一切為了九在大〉中，文章的作者提倡「階級關係變動論」，說「從解放戰爭到文化革命，黨內機會主義者與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為主要的矛盾，成為革命的主要對象，並因而引起革命陣線內部的依靠、團結、清洗對象的變化，這就構成了階級陣線的大變動。表現在教育界就是「非黨員要比黨員好，非幹部要比幹部好」。文章認為造反派應該把精力「集中在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砸爛走資派的舊班底上」㉙。湖北的「北、決、揚」向造反派提出了「三重建」的任務，即重建黨、軍隊和國家。山東大學「共產主義小組」提出，「炮打司令部」應當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常例。

以上述觀點為例可看出，紅衛兵的兩種民間思潮儘管正相對立，但卻接受當時官方的理論前提——即關於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兩個司令部及兩條路線鬥爭等等概念。但是，這些主張很明顯地是紅衛兵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果，而不是人云亦云地重複毛澤東語錄和《人民日報》社論，其思想的力度引人注目的。對比一下當初老紅衛兵的文章，那些文章詞藻華麗、氣勢高昂但內容空洞。除了「滾他媽的蛋」這類臭罵，就是反覆重申「我們高幹子弟要掌權」，看不出他們試圖對中國社會，對文化大革命作一點認真的分析，也沒有對自己的政治訴求作出論證。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四一四思潮必勝〉還是〈中國向何處去？〉，以及其他文章，都被中共當局宣布為「反動文章」，在很大範圍內進行批判。不論是周泉纓還是楊曦光，都以文獲罪被抓捕。毛澤東在1968年7月28日接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時，專門提到周泉纓是理論家，叫放人。而楊曦光則坐牢十年(別的文章也被宣布為「大毒草」，作者許多都被逮捕和拘禁，而且對許多文章進行追查，要抓「黑後台」、「支使者」。對於〈中國向何處去？〉和〈今日哥達綱領〉兩篇中學生寫的文章，周恩來、康生等人表示，他們決不相信是中國學生寫的。他們說，不但中學生寫不出來，連大學生也寫不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上述文章以及類似文章雖然在造反派中引起巨大共鳴，產生了廣泛影響，但幾乎沒有哪個組織敢於公開將其作為自己的政治綱領或理論綱領。相反，為了表示與中央的一致，為了在派性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多數組織還發動對這類文章的批判。

其實，兩種思潮都可以從毛澤東的言論和官方立場找到依據。比如，對於溫和思潮有利的材料有經毛澤東親自審定的《紅旗》1966年第12期社論，其中說：「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從根本上說來，當權的是無產階級。」毛澤東在1967年還說過「『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是錯誤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講部分改善，可以。」另一方面，《紅旗》1967年第3期社論題目就是〈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宣稱「奪權鬥爭，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而文革前，毛澤東於1965年1月29日就在〈陳正人同志蹲點報告的批示〉中說：「官僚主義者階段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份子。」㉚

那麼，為甚麼這些思潮會被宣判為異端而遭鎮壓呢？第一，這

類文章往往以某一地區的文革形勢為背景，而文章中透露的觀點、傾向和中央表示的態度相反。例如，〈四一四思潮必勝〉的副標題是「給河南造總一戰友的一封信」，作者所在的組織支持溫和的「造總」，而中央文革小組支持激進的「二七公社」，並批評過作者的組織在河南問題上的立場。〈中國向何處去？〉的作者屬於湖南「省無聯」，在文章發表前三個月，周恩來主持物色湖南造反派代表進入省革籌，他找的是持溫和態度的造反派，而把激進的「省無聯」排斥在外。中共當局認為這些文章的目的是進行政治對抗，而不是理論探討。第二，在號稱群眾享有「大民主」的文革中，思想箝制實際上十分厲害，除了嚴格跟從中央的調門，任何對於文革的獨立探索(哪怕是在官方意識形態框架內探索，或對官方主張提出獨立論證)都是決不允許的。毛澤東和中共意識形態首腦決不會為民間思潮中與自己不謀而合之處感到高興，他們倒是十分敏感和警惕地防範任何獨立思考的苗頭。

(4) 兩派的一系列對立

保守派在政治上失敗之後，造反派的內部矛盾迅速上升，兩派相爭變成文革中群眾運動的主線。在各地，雙方的對抗往往表現為對某一個幹部的態度(一方要保，要結合進革委會，一方面打倒)，以及與軍隊結盟的一方壓制沒有軍隊作靠山的一方。但是，透過各省令人眼花繚亂的、錯綜複雜的派別鬥爭，我們仍然能看到一系列基本區別。當然，這些區別並未構成明確的分界標準，依地區和時間不同，各地兩派鬥爭中出現了許多複雜和例外情況。下面我們來看看這些區別。

第一，在組織成分上有差異。這種差異不像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那麼明顯，但的確存在。作為由學生組成的紅衛兵組織，兩派的

構成基本相同，差別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兩派對於所謂「階級路線」的重視和強調程度不同，二是與之結盟的其他行業的群眾組織隊伍成分明顯有差異。在〈四一四思潮必勝〉中，作者以溫和派成員一般家庭成分較好，黨團員幹部多而自傲，說他們才代表工農兵最高利益，並攻擊激進派隊伍不整齊，混入了地富反壞右份子。在四川，「紅成」的頭頭一直指責對方一大派組織不純，譏笑對方「工人造反兵團」所屬的「街道工業兵團」中盡是「社會渣滓」，即出身、成分或歷史有問題的人，或者是流氓無產階級，而自己的戰友「紅衛東」則是國防大廠的產業工人。在湖南，激進的「省無聯」有不少臨時工、合同工、下鄉知青、褓姆，甚至「右派份子」、前國民黨人員，而作為紅衛兵的楊曦光則認為他們革命性強，保守思想少。一般而言，溫和派強調出身、成分，而激進派強調受「走資派」壓制和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在湖北，溫和的「工造」因為「工總」隊伍「不純」，頭頭「有問題」而分裂出來。

第二，對當權派的估計和鬥爭程度不同。一般而言，溫和派同意「十六條」中對於幹部的估計(說他們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而激進派則指責說，這是對「走資派」的反動本性認識不足，抱有幻想。四川的「八．二六」之所以要對「一一．一三」大會造反，就是認為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通過批判會能樹立自己檢討認錯的好形象，從而爭取群眾。在廣東，1月份奪權的一派同意以趙紫陽為首的原省委繼續日常工作，而造反派起監督和批准作用，這被另一些造反派攻擊為與「走資派」相勾結。〈中國向何處去？〉宣稱：「我們確實認為百分之九十的高幹要靠邊站，最多只能作為教育團結的對象。」在浙江，「紅暴會」聽信周恩來的暗示，公開保原省委書記江華，衝擊批鬥江華大會，他們因此而被打成「保守派」。與此相關，溫和派認為保守派的群眾只要認錯就好，而

激進派非要「徹底砸爛保皇派」不可，他們主張「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在成都，當造反派在1967年5月初打敗保守的「產業軍」和「八．一戰鬥兵團」並將其逐出市區之後，「紅成」和「八．二六」在形勢估計和對殘餘保守勢力的鬥爭策略上發生尖銳分歧，「紅成」力主爭取保守派反戈一擊，「八．二六」則大聲疾呼不要喪失警惕，認為保守派正在採取「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馬上要「血洗成都」。〈四一四思潮必勝〉指責激進派「排斥一切受蒙蔽的群眾和犯錯誤的革命幹部」，代表了階級敵人的利益。保守組織瓦解之後，歸順造反派的人大多參加溫和派組織。

第三，對軍隊的態度。溫和派和激進派在對待軍隊問題上區別十分明顯。1967年2月份，在全國大多數省份，幾乎所有的激進派都衝擊了當地軍區，而溫和派無例外地未捲入這種活動。其結果是，激進派都遭到軍隊鎮壓(程度不同)，而溫和派則袖手旁觀，少數人還協助軍隊抓人。對於粉碎「二月逆流」之後的平反活動，自然是一派積極，一派消極。由於毛澤東提過「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的走資派」，所以兩派都承認有「軍內走資派」，但激進派對「揪軍內一小撮」十分積極，而溫和派不甚主動。

第四，所謂左傾和右傾。由於有一系列明顯的分歧，而且這種分歧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中共黨內路線鬥爭分歧有可比性，兩派都大反對方的左傾或右傾機會主義。激進派最喜歡徵引的毛語錄是「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他們之中有的人甚至公開提出「傾左利於民，傾右利於敵」。廣州的激進派在運動後期宣稱：「老實說，廣州的文化大革命至今還不曾有過甚麼左！還左得不夠，我們的口號是向左！向左！向左！」而〈四一四思潮必勝〉則把激進派的思潮說成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思潮，即極左思潮。

左傾思想最明顯的表現是鼓吹形勢越亂越好，認為造反派隊伍應該「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在湖北，「二．八聲明」稱「湖北省武漢地區還沒有亂透，還沒有大亂」，「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廣東的激進派在批「改良主義」時寫下了〈廣州還須大亂〉的文章。四川的「八．二六」在「一一．一三」大會與「紅成」分裂時大力宣傳四川還必須大亂，「革命者之所以是革命的，就是他們……迎接這『亂』的早日到來。」

第五，對所謂「毛主席的戰略布署」。激進派的行動邏輯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將文革進行到底。」毛澤東出於政治策略的考慮，時真時假地提出一些與上述精神不合的號召和規定，如不要把鬥爭矛頭指向軍隊，不要對當權派一概打倒，不許搶槍、搞武鬥，造反派要克服派性，實行大聯合，等等。溫和派總是以「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步署」自居，亦步亦趨，避免另搞一套，而激進派則不吃那一套，照自己認為正確的辦。比如，在北京，中央在1967年3月決定中學生回校參加軍訓，溫和的一派欣然擁護，而激進的一派認為「資反路線」還未徹底批判，社會上的鬥爭還在繼續，他們不願回到學校，重返舊秩序，他們對於軍訓團束縛他們的各種禁令覺得很反感。在全國大多數省份建立革委會之後，中央實行穩定大局的方針，溫和派較馴服地停止了社會上的鬥爭，熱衷於在革委會內鞏固自己的權力。對實際掌權的軍人採取配合態度。而激進派認為革委會的「三結合」是新形式、舊內容。〈中國向何處去？〉說：「三結合的提出，等於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們又重新扶起來，而三結合不可避免地會成為軍隊和地方官僚起主導作用的資產階級篡權的政權形式。」在湖北、湖南、廣東和其他許多地方，都發生激進派反對革委會「復舊」的鬥爭。比如在湖北，當溫和派與掌實權的軍方關係融洽時，激進派提

出，革委會不是由堅定的革命派掌權，要由工代會(實際上是造反派)對革委會工作進行監督。他們對文革沒有進行到底就草草收場、穩定大局的作法深感不滿。他們提出，為了將文革進行到底，造反派應到農村去，把文革從城市推向農村。〈中國向何處去？〉也說：「在農民運動沒有起來時要求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這也是空談。」武漢成立「北斗星學會」時，發起人提出，最低綱領是把文革進行到底，完善革委會，使之成為戰鬥堡壘；最高綱領是把中國的文革推向世界，使世界一片紅。在廣西柳州，當造反的「工機聯」頭頭與「聯指」達成「倒旗協議」，同意放棄派性鬥爭，上繳武器時，激進的中學紅衛兵寫出了著名的〈今日哥達綱領〉，譴責那些同意「徹底鏟平山頭，砍掉派旗，打倒派性」的頭頭是出賣革命原則，出賣戰友的鮮血。

第六，對於「解放幹部」的標準。運動後期，需要讓一些幹部站出來工作，在挑選幹部時，激進派和溫和派的標準有差異。激進派偏向於認為，文革初期五十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白色恐怖」中幹部的遭遇是劃線標準，只有受工作組打擊和迫害最甚的人才是堅決革命的。而溫和派則認為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標準仍然有效。在十七年歷次運動中被整的幹部就是有問題，在十七年中受重用的幹部，儘管在五十天「資反路線」盛行時站錯了隊，仍然是可以依靠的。這個問題上的分歧與對十七年的評價有關，而且涉及到的人不僅是幹部。激進派認為，十七年是資產階級(即黨內特權份子)專了人民群眾的政，領導系統已經爛透了，只有在那時受過迫害的人才是革命的。而溫和派認為，不能把十七年全然看成是資產階級專政，那時被打擊的人確實是右派份子和反社會主義份子㉛。

第七，對周恩來的態度。激進派中一直存在打周的傾向。早在1967年3月反擊「二月逆流」時，北京許多學校的激進派學生就把周

當成「二月逆流」的總後台加以攻擊，到了5、6月，各校的「五·一六兵團」對周的攻擊升級，後由於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出面制止(很可能是出於策略，是違心的表示)而暫時平息，但這股潮流一直時明時暗地在運動中湧現。在湖南，〈中國向何處去？〉稱周為「中國『紅色』資本家階級目前的總代表」，因為對激進造反派的鎮壓是周直接插手指揮的。在湖北，周親自對「百舸爭流」、「北、決、揚」點名，致使這些組織的頭頭被捕。在四川，激進派稱周為「走資派的的總後台」，而溫和派則死心塌地認為自己屬於周的勢力，儘管周幾次代表中央出面批評他們。在文革中，周和若干溫和派頭頭(來自四川、廣東、浙江等省)私人關係很好，而江青和若干激進派頭頭關係密切，這在當時是眾所周知的。

說到這裏可稍為扯遠一點。文革中許多人都有一種感覺，認為保守派的後台是各級「走資派」，當上面的「走資派」失勢時，保守派即隨之瓦解。激進造反派的後台是中央文革(這一點相當明顯)，而溫和派的後台是周，雖然拿不出多少直接證據證明這一點。我至今還認為這種感覺是正確的，雖然我也沒有確實的證據證明這一點，只是在訪談中聽一些頭領抱怨說，好多事都是照周說的去做，但最後政治鬥爭失敗時，把賬都算到自己頭上。溫和派與周的一致之處是，他們都正面參加文革，但時時、事事表現溫和、克制，按照決議和條規行事，被指責為「右傾」。在文革中，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一直處於不利地位，但在實際力量方面卻頗佔優勢。各地溫和派的存在以及與激進派的抗爭，是和周在中央上層的地位和態度一致的，周在1966年9月份、11月份通過秘書周榮鑫、雍文濤等人支持保守的「西糾」、「聯動」活動，被江青抓住而大加攻擊，使自己處於很難堪和被動的地位。從此之後，周對群眾組織的插手就隱蔽和微妙得多了。

最後，我想對文革中包括紅衛兵在內的群眾的派別劃分和派別對立的最根本的區別提出一個概括的說明。

文革中，不論上層領導和下層群眾，他們在立場和觀點上的區別可以說是對於改變現存狀態的態度不同。劉少奇和各級被打倒的當權派，以及保守派力圖維護當時的現狀，這既包括上層政治權力格局的現狀，也包括下層群眾中既得利益者和社會地位、經濟地位低下者的現狀。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打破現狀，他的目的只是改變他「大權旁落」的現狀。但是，他不可能單靠上層權力鬥爭實現這一點。為了爭取和動員群眾，他偶爾暗示他的目的也包括改變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現狀，以爭取廣大對現狀不滿的群眾以極大的熱情支持他。造反派是要改變現狀的，但溫和派只是從「上層建築領域內的革命」這一角度理解文革，支持文革派改變上層權力結構的現狀，所以他們也打「走資派」，但不允許下層階級陣線「大翻個兒」。激進派群眾既想改變上層現狀，也想改變下層現狀，他們對毛澤東的某些說法信以為真，打算徹底實現毛偶爾暗示的，目的是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文革綱領。因此，激進派和溫和派在打「走資派」上是一致的，但一旦涉及到對中國社會的徹底變革，兩派就分道揚鑣了。

註釋

① Stanley Rosen,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Hong Yung Lee's "Repl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0 (June 1977): 390-406. 被Stanley Rosen批評的文章為Hong Yung Lee,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4 (December 1975): 645-83.

②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紅旗》，1966年第11期，頁27。

③ 周恩來後來説，紅衛兵的統帥是毛澤東，副帥是林彪，他是總參謀長，紅衛兵完全認可這個説法。

④ 〈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紅旗》，1966年第13期，頁5。

⑤ 同註①，以及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340.

⑥ 同註①，以及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September 1980): 432.

⑦ 同上，pp. 433-39。

⑧ 大聯合指不同派別的「革命群眾組織」，削平山頭，放下旗幟，形成統一組織。能否參加大聯合是運動中產生的各個組織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標誌，大聯合也是派別鬥爭結束的標誌，雖然大聯合往往有曲折和反覆，以及激烈的討價還價。三結合指某些群眾組織的頭頭、「革命幹部」和軍隊領導人被推選和指定組成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有造反派才參與大聯合與三結合。

⑨⑭⑮⑯ 同註①。

⑩ 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2), 95，應當指出，駱思典和其他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保守派是用經濟觀點定義階級，這是不對的。保守派的標準是文革前的官方標準，並未恪守馬克思原來的經濟定義，比如並不依據對於生產資料的佔有，而是依據生活經歷、職業或思想傾向把一部分人當成階級敵人。文革中的新標準是毛提出的，即「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⑪ 同註⑤Hong Yung Lee, 3, 5.

⑫ 同註⑩。

⑬ 馬利：〈第一個紅衛兵袖章的誕生始末〉，《春潮》，總第4期，頁5。

⑰⑱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200；259-60。

⑲　王紹光：〈群眾與文化大革命〉，載於李少民編：《大陸知識份子論政治、社會、經濟》(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頁88。

⑳　楊小凱：〈革命首先死了，才能萬歲〉，《中國之春》，1990年11月號，頁55。

㉑　載轉於清華大學小報《井岡山》，1967年8月26日，第11版。

㉒　「天派」得名於北京航空學院的「紅旗」，「地派」得名於北京地質學院的「東方紅」。

㉓　在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at Harvard University, 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中，作者把「紅成」說成是保守派，這是不正確的，見該書頁124；李鴻永也錯誤地把「紅成」當成保守派，見*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266-67.

㉔　分歧還可以追溯得更早，在1966年8月下旬，由於「十六條」的公布，保守派勢力急劇下降，造反的學生對於如何批判當地黨委，有溫和與激進兩種態度之分。見Gordan A. Bennett and Ronald N. Montaperto, *Red Guard: 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i Hsiao-ai*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71), 67.

㉕　清華大學「四一四東方紅戰團」屬於「地派」，與本校屬於「天派」的「井岡山兵團」對立。「地派」傾向於激進，但此文卻是溫和派觀點的代表作。這種派別的組織性與思潮性劃分的矛盾，是本書前面說到的北京地區文革運動一個特點的表現，即高度政治化引起了結盟關係的機會主義。另一個例子在北京師範大學，屬於「地派」的「井岡山」大肆批判屬於「天派」的對立組織「造反兵團」的極左、激進的主張，在外地，這種不一致現象少得多。

㉖　〈四一四思潮必勝〉，引自清華紅衛兵小報《井岡山》，1967年8月26日，第11、12期，下同。

㉗　引自楊曦光：〈中國向何處去？〉，載《民主中華》(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9)，頁31-50，下同。

㉘ 搞自油印傳單，注明轉自《「四三戰報」湘江評論》，1967年6月15日。

㉙ 轉引自「《整黨戰線》戰鬥組」為批判而油印的傳單，原文載於《紅衛戰報》。

㉚ 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常常不按馬克思主義的方式使用概念。他隨意地把自己不喜歡的人或事叫做「資產階級」的。他把50和60年代中國社會中不平等、人壓迫人的現象視為具有資本主義性質，實屬張冠李戴。紅衛兵和其他人一樣照用毛的話語。只是到了70年代末，人們才不再把反對官僚特權説成是反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才不再是政治上最帶貶義的詞。

㉛ 參見William Hinton,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06-90。

第四章

造反的原因

上一章討論了紅衛兵組織的區別和他們的派別鬥爭，那是研究他們的外在活動。在這一章，我要研究人們為何要起來造反，為何不同的人會參加這一派而不是另一派，即研究人們造反的內在原因；與此同時，還要研究在運動過程中，他們的各種具體造反活動的原因和目的。關於造反派行動的目的與意義，文革研究者有不同的評價，我將討論其中最重要的觀點，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進入討論之前我想指出，如果說在前一章作出的概括容易流於粗率和不確切的話，這一章的分類和概括就更是如此了。如果說每一派有共同的目標和綱領，那麼參加同一派的人的動機和原因則往往是各不相同的。我現在想強調兩類區別。

第一是學生和其他人的區別。雖然本書的研究對象是紅衛兵，但把學生和其他人群作一簡單的對比是有益的。相比而言，學生投入文革的動機要單純得多，理想主義和意識形態迷狂起了很大作用，而其他人受利益驅使的因素要明顯得多，雖然他們也表現出強烈的意識形態動因，其中也有人始終為理想而奮鬥，而學生的造反

也並非全然與個人利益無關。在其他人群中，幹部的頭腦最清醒，他們往往把赤裸裸的利益關係毫不含糊地揭示出來。某工廠幹部在回顧文革中自己受迫害時說：「打我的人有的是臨時工，想藉着『革命』鬧一通轉正；有的在車間幹活，為的是不再當工人，到科室裏當幹部……『文化大革命』不過給大夥一個機會，各奔各的目的掙罷了。一幫人往上掙，就得有一幫人墊背。」①另一個當過造反派頭頭的幹部說：「真心說，關心國家大事，都是胡扯，不能不這麼喊罷了。」在他看來，派性與原則無關：「要說我們局的兩派，都因為人際關係的背景。所謂觀點，不過是藉口。這兩派以兩位局領導為分界線，誰是誰的人，互相都清楚……一派是局裏的老人，原先的幹部班子，再一派都是後來調進來的新人，大都是政工幹部，跟隨一位後來調來的領導。」②

第二是紅衛兵中帶頭造反的人、骨幹份子和一般群眾的區別。如果說很多學生的派別選擇或多或少地跟自己的家庭出身、自己在中國政治體制和學校中的地位有關係，那麼一般而言，紅衛兵的頭領的行為是較少受制於這些因素的。不論是當初帶頭造反的人，還是後來當上頭領或理論家的人，他們的觀點主要出自於自己的革命理想和意識形態取向，而不是個人利益。當最早的造反者被學校當局或工作組打成反革命，被圍攻、關押而仍然不改變態度時，很難說他們在謀取一己之私利，他們的動力來自自己的理想和政治信念。比如，蒯大富被駐清華大學的工作組組長葉林打成反革命，他堅持絕食鬥爭多日，而且寫公開信，要求與他觀點一致的學生堅持到底。這是一種絕望而義無反顧的鬥爭，在當時，他不可能想到會有來自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不可能預見形勢很快逆轉，使他能反敗為勝。當然，這並不是說，這些最早的叛逆者在日後的政治鬥爭中永遠只受政治熱情的驅使，不會膨脹個人野心和學會政治手腕。

一般而言，學生組織的成分分三個層次，第一是政治頭領，他們身上表現的理想、信念、熱情最多，他們在運動初期之所以有號召力，就在於他們表現了某種對真理和正義的執着追求，他們追求的利益具有某種相對的合理性。第二是組織中的積極份子，他們的行為、對派別的選擇既受理想和意識形態支配，又與自己的利益有關，而且，不論是他們的主觀願望還是文革中出現的客觀形勢，都能使這兩種因素統一在一起。比如，他們不止一次地在受到迫害之後強烈要求平反，這既是對正義的呼聲，也是對自己利益的捍衛。他們為頭領的理想與熱情鼓舞，對自己行為的正義性堅信不疑。第三是隨大流者。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有一種習慣：人們害怕自己最後不隸屬於一個組織。通常認為，不是某個組織的成員，就談不上在政治運動中幹過革命。人們受到相當大的心理壓力，要進入某個組織，以免最終自己的政治身分仍為空白。這一類人在選擇派別時理想、信念、原則的因素最少，但還是不能說完全沒有政治立場。

一　共同原因

依斯瑞爾 (John Israel) 說：「想當紅衞兵的誘惑有多種因素，因人而異：參與建設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的願望，在受教育和就業的無情競爭中得到好處的前景，享受同志情誼，共同冒險和集團權力感，以及串連歷險的機會。」③這話說得不錯，不過，對於大多數學生而言，也存在一些共同原因，這些原因並不決定一個學生參加甚麼樣的紅衞兵組織，在運動中幹哪一類具體事情，但它們使得一個學生總是想當紅衞兵，總是想在運動中幹點甚麼。現在我們來看看這些對大多數人起作用的共同因素。

大多數學生是在他們的青春期遇上文化大革命的，在這個時期，他們由少年走向成人，他們急於向人證明自己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不再需要家長、教師的監護，能夠獨立承擔社會責任。他們長期生長在高度政治化和禁欲的環境中，當文革把加在他們身上的一切外力撤去，他們體內洋溢的青春潮水不是按其本性自由發洩，而是由堅實的政治堤岸被導向既定的方向。在這個階段，他們充滿激情和想像，常常不能區分夢幻和現實，以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變世界上的一切，可以戰勝任何邪惡的東西，也可以創造各種美好事物。他們缺乏生活經驗，思想偏激，遇事好走極端，把世界看成只有黑白兩色，對人對事抱着「新松根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的態度。他們需要偶像並崇拜偶像，樂於將自己的理想、熱情乃至一切奉獻給某個偶像。

與這種青春期的騷動浮躁相對照的，是學校中十分枯燥刻板的生活。中國的文化教育從古至今都是十分壓抑個性的，中國的教育制度從來不以啟發人的心智為目標，從來不面對實際，而是強迫人死記硬背，搞分數掛帥，對學生的要求苛刻、瑣碎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學校中每一科教師為爭取學生在本科目得高分，競相以補課、留大量作業的方式擠佔時間，學生顧此失彼、窮於應付。文革前夕，北京若干中學就發生過學生自發地抗議和罷考事件，可見問題嚴重。文革爆發，受到學生熱烈歡迎的一個最簡單事實就是：可以不讀書了。這一點在中學生，特別是低年級學生中尤其明顯，請看當初某些中學生的心情：「學生們聽說可以不上課了，都像籠中鳥看到那籠門已經打開一樣，樂得自在。」④現在的著名導演，當初北京第十三中初一學生田壯壯在一次採訪中被問到「文革開始時你印象最深的是甚麼」時說：「文革開始對學生來講最高興的一件事兒就是不上課了，我已經上了八年課了。學校通知以後大家就不上

課，這特別愉快，覺得沒有功課沒有負擔。從個性上講我屬於那種特別散漫的人，所以我覺得最愉快。」⑤作家王朔則說：「文化大革命再不好，但它打亂了生活秩序，給個性發展提供了機會，使小孩兒擺脫了學校那種陳腐教育的束縛，所謂長知識的階段全在社會上，學校裏的東西相對於這種東西來講是毫無意義的。你要考試要升學，就好像迫使你就範。」⑥

附帶說一下，中國教育中那種追求高分、折磨學生的積習至今未改。在90年代，當年的紅衛兵已是40多歲的人了，他們的兒女正是中學生。有不少前紅衛兵感慨地說：「中學的教育真是愚蠢，那些老師真可憐，他們辛辛苦苦，強迫學生學習，一心為學生好，但只招學生恨，依現在學生的心理，如果有一個毛澤東那樣的人出來號召一聲，我們的孩子肯定又要造老師的反。」

除了功課令人厭倦和反感外，文革前學校中存在着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當局教育和鼓勵學生要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大事，反對「只專不紅」，另一方面，學生參與政治活動的熱情(不論是自身要求的還是被煽動起來的)完全得不到滿足。就像廣州一個紅衛兵說的那樣：「我們感到壓抑，沒有投入國家政治生活。我們的生活是單調、枯燥、沉悶的……在學校，政治意味着被教導黨在這一或那一問題上的路線是甚麼。」⑦北京一個紅衛兵首領在被採訪時說：「在學校裏，黨組織只是告訴學生這不准、那不准。學校中有共青團組織，這本應是學生從事政治活動的場所，但實際上，團組織純屬執行黨的各項具體任務的工具，而且十分官僚化，完全不能滿足學生的政治熱情。」正如依斯瑞爾所觀察到的，自從1949年之後，團面臨看兩大問題，一是與學生有隔離感，群眾害怕團員、團幹部匯報他們的情況，二是人們往往抱着實用和機會主義的目的入團，他們表面上是追求進步，實際上是為了個人前途⑧。因此，許多懷抱真正理想和

革命熱情的學生，對共青團並無好感。文革中一出現紅衛兵這種形式，許多人都對它寄予極大的希望，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參與政治的組織形式(它從表面上看不是黨組織的工具，也不官僚化)。

文革前，學校對學生的「革命化教育」還包括一個內在矛盾。一方面，黨要學生做它的馴服工具，它為學生提供的榜樣是雷鋒，他兢兢業業地工作，樂於助人，在平凡、瑣碎的小事中體現一種共產主義理想。另一方面，黨又號召青年投身於革命鬥爭的大風大浪中，以得到鍛鍊，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就要求某種敢闖、敢幹的獨創性。自50年代起，中國的青年學生深受毛澤東青少年時代事迹的影響，李銳的《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書發行量很大，深受青年喜愛。在對毛的個人崇拜還未形成的時候，不少青年就竭盡全力地模仿讀書時代的毛澤東。李銳書中刻畫的毛澤東的形象是這樣的：他從小就心憂天下，有救國救民之志；他具有強烈的獨立精神和叛逆性格，在家反對父親的封建家長作風，在校反對死板僵化的學習方法，主張自己鑽研；他竭盡全力「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在風雨中、原野中練膽量、練意志，為改造社會作準備；他到處求友，組織「新民學會」，聯絡志士仁人共計國家富強之道。在學校中，溫順工具型的積極份子居主流地位。那些同樣準備獻身於革命，但堅持自己的主見和個性的學生居在野地位，他們在學校無職無權，但在學生中頗有號召力，文革為後一種人提供了機會，他們一直在等待這一天的到來。

文革剛發動時，廣大學生都能夠感到，官方的意識形態調子，黨的號召的口氣和內容，都有了明顯變化。以前是居高臨下的，板着面孔的告誡和教訓，而現在是讚揚和鼓勵。比如「十六條」中這樣的話就使學生很感受用：「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

的。」對於那些具有內在革命熱情，盼望一顯身手的學生來說，後一種調子顯然要合胃口得多。現在，領導人講話，報紙社論再也不是必須背誦和遵循的命令，而是能撥動心弦、引起共鳴的親切話語，是自己期待已久的戰鬥號令。在文革前，不少立志革命的學生對生活和命運感到遺憾，他們聽了那麼多革命故事，熟悉那麼多英雄人物的事迹，但自己卻沒有趕上那火熱的大革命時期，既沒有「五四」的大遊行，又沒有戰場上的槍林彈雨。現在只有平凡的、逐漸積累式的、為社會主義大廈添磚加瓦的建設。沒有烈火，怎麼識別真金？沒有暴風雨，怎麼鍊就堅強的翅膀？文革一爆發，不少學生興奮地認為，自己畢竟不是生不逢時，夢想變成了現實！

西安一所中學的造反派頭領Y，在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之後，在與我交談時仍然能背誦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1966年8月16日對外地赴京學生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他背誦時一往情深，既充滿對陳的敬佩，又充滿對往事的留戀和自豪。陳講話的題目是〈在大風大浪裏成長〉，他說⑨：

> 你們這次到北京來，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都來，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來，經過很多辛苦，不怕大風大雨，你們的行動很對！！！你們的行動，你們的鬥爭，表現出你們有希望，你們能夠真正做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能夠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你們這次辛苦，表現你們的英雄氣概，但是，這只是初步的考驗，你們還要經過千萬次的考驗，還要經過長期的考驗。要在群眾的泥巴裏滾過千百萬次，把自己變成為人民，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奮鬥的革命者。

武漢的作家H當時是中學生，組織過一支紅衛兵文藝宣傳隊，他在採訪時講了一大段話，全面、生動地反映了當年學生歡呼文革爆發的情緒，下面是採訪記錄。

中國的教育制度對於青年是極不健康、非常壓抑的，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青少年生活，物質上、精神上十分貧乏。在60年代，大部分人沒有收音機。學校的教育刻板、軍事化，學校中政教合一，幾乎所有教師都是政治輔導員，管理學習以及學習以外的生活。後來又加上專職輔導員、團幹部。而從生理、心理、情感方面講，形成了張力，沒有渲洩的渠道。不能唱歌跳舞，不能交友。要聽取各種各樣的教導。因此，一旦有一個機會表現自己，不論是建設性還是破壞性的，不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他們都歡欣若狂。以前被老師管，現在可以管老師，甚至打罵他們；以前規規矩矩，現在可以在外面活動多少天不回家；以前足不出户，現在可以坐上火車到處跑，這完全是青春期欲望的表現。人際交往、活動範圍都空前擴大了。這些人得到了機會，但目的是不同的。前期的紅衛兵有的基於政治榮譽感，他們中不少人感到未能像父輩一樣經歷戰爭和革命年代，而文革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他們想以自己的行動，掙得像父輩一樣的地位。有些人則是厭倦了以前那種平庸、嚴格、枯燥的生活，希望有一個轟轟烈烈的青春歲月。這是一種個人主義，個性至上，他們表現出一種特別的欣喜、熱情。文革為許多人提供了舞台，施展他們以前無法施展的能力。如出身不好的，被老師認為有思想問題，被抓到甚麼把柄的人，以前根本無法有一個大大方方表現自己的機會，這時天下大亂了，以前的家庭問題、思想問題等等這時顯然不成為大問題了，這時有了機會，有了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這是以前絕對沒法做到的。狂熱的人中包括一部分出身不好的人，他們想表現自己有一顆革命之心，願意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獻身。他們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像牛虻、拉赫美托夫那樣近乎殘忍的方式

對待自己，以獲得一種新的生活。他們打赤腳走路，上學很遠不乘車，跑步二十里，連五分錢的公共汽車也不坐。有些女同學長得漂亮，偏要紮小辮，穿補丁褲，光着腳丫子去上學。可以看出，他們以一種近乎於宗教的情緒，幹着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二　老紅衛兵

老紅衛兵是學生中最早的造反者，他們的造反似乎有許多難於解釋之處：他們的父母是當權者並享有特權，難道他們受到壓迫或感到壓抑？如果說他們造反純粹是為了保衛自己的「紅司令」毛澤東，那麼為甚麼很快就轉而反對文革？

要理解他們的造反必須把握多方面的、複雜的因素：意識形態的狂熱和當仁不讓的接班人心態；與自我期許相距甚大的現實，即學校中仍有競爭者；通天的信息渠道使人有恃無恐；對「階級敵人」、文教工作知識份子、幹部以及黨內鬥爭失敗者殘酷打擊的傳統。總之，毛的階級鬥爭和接班人理論，既投合他們的理想，又符合他們的利益，是他們造反的精神源泉。

從1962年開始，毛澤東為了改變大權旁落的局面，首先在意識形態戰線發難，用大講階級鬥爭的方法來抑制劉少奇等人溫和、務實、注重經濟建設的方針。他大聲疾呼，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1963年5月，他警告說，如果忘記了階級鬥爭，「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一方面是

要從上層建築領域和文化教育部門向劉少奇等人進攻，一方面是出於自己少年時不當好學生的本性，毛從1964年起，在多種談話、批示中，對學校的教育作了極為尖刻的批評。

毛在1964年春節對一些人談話時說：「現在這個辦法摧殘人才，我很不贊成。讀那麼多書，考試是對付敵人的辦法，害死人，要停止。」緊接着，毛對於課程和考試方法作了一個批示：「現在學校裏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解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與學生為敵，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1965年7月，毛又作了一個批示：「學生負擔過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請學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執行。」

除了嚴厲批評現行教育政策和方法，毛還提倡要深入社會生活，從事階級鬥爭。具體地說，學生應該去搞四清。在1964年與侄兒毛遠新的談話中，毛說：「都是上課，理論有甚麼用？應該到實際中去學。」「階級鬥爭是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到農村搞四清……對社會不了解，階級鬥爭也不知道，怎麼能算畢業生呢？」

毛的一系列談話和指示，通過各種渠道在全國大中學校中廣泛流傳（毛遠新所在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就把毛的談話印發了幾萬份）。在幹部子弟，尤其是高級幹部子弟中，毛的上述指示更加引起了注意和熱烈的議論。這些人對政治敏感，對上層的政治信息和政治動向十分關注，正躍躍欲試，想抓到甚麼機會大大施展一番。由於父母身居高位，以前有一番九死一生、轟轟烈烈的革命經歷，他們的志向在當「革命接班人」方面，而不滿足於做「自大掛，實驗室」類型的知識份子。他們之中最有才幹和政治抱負的人物（往往也是學業優秀，而不是成績不佳，調皮搗蛋的壞學生）一再提出，不能滿足於學校中死氣沉沉的學習生活，要到農村去，去搞四清，

去搞階級鬥爭。1965年6月，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就有部分學生串連起來，搞罷課，給中央寫信，要求往學校派四清工作組，搞階級鬥爭，搞學校領導的問題，並要求到農村去參加四清。1966年3月，上海某校一些高三學生（幹部子女和工農子女）公開提出廢除現行高考制度。文革前夕，北京二中等校學生對學校布置的高密度考試和過量的複習功課安排提出抗議，他們質問說：「既然毛主席說階級鬥爭是主課，為甚麼不讓我們去搞階級鬥爭？」他們引用毛對教育體制的批評，揚言要罷考。最後，北京市教育局居然作出讓步，他們的鬥爭贏得勝利（其實，教育部門在毛澤東的號召或壓力下，早就開始把教改提上了議事日程，一些學校已經辦起了試點班）。這一方面使學生更加有恃無恐，感到反抗現行教育制度有理有據，另一方面，他們對當局按步就班、慢吞吞的教改步伐深表不滿。

在鬧事中帶頭的人可以說是有理想、有抱負，立志接革命的班，不順從現行教育制度的人。但對其他擁護鬧事，反對考試，尤其是反對大學入學考試的人，恐怕就不能這麼說了。他們的優勢來源於家庭出身好，而學習和考試則非他們之所長。他們的個人利益和毛澤東激烈地反對現行教育制度，提倡搞階級鬥爭一致，並且在「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一口號下統一起來。師出有名，而且利害攸關，造起反來幹勁自然非同一般。

學生中其他家庭出身的人興趣和利益則大不相同。當然，他們知道流傳中的毛的一系列談話和批示，他們也為毛的犀利見解所激勵，但是，他們也有理由在「為革命而學習」的口號下在現行教育體制中實現自己的理想，或爭取自己的前途。他們是出身於中等家庭的人，也有少數是出身不好的人。愈接近文革，學校中抓「階級教育」的氣氛愈濃，搞「憶苦思甜」的活動愈頻繁。不論他們政治上多

麼努力(不少人已經是團員，甚至是團幹部)，他們都難以和家庭出身好的學生競爭，他們的優勢在學習方面，於是不少人既抱着為黨所用的希望，也懷着對倚仗家庭而一帆風順者的不服氣心理，發奮讀書。還有少數人不甘寂寞，企圖以異乎尋常的「革命表現」為黨破格錄用，躋身於接班人之列。因此，文革前學校中的情況一般而言是，由於家庭出身原因，學生分成了兩部分：出身好的人盡量發揮政治優勢，希望「階級鬥爭」越激烈越好；而非紅五類出身學生一則在學習上繼續保持優勢，二則在「表現」上狠下功夫。雙方都各自發揮優勢，揚長避短，競爭日趨激烈，各自的利益與最高層政策偏向緊密聯繫在一起。

學校當局持甚麼態度呢？一般而言，校長教師喜歡那些成績好、守紀律、對學校集體活動表現積極的學生，但是，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毛對教育部門的指責越來越嚴厲，他們只好盡量提拔出身好的學生，壓抑其他學生。儘管如此，他們仍然滿足不了幹部子弟的胃口，在文革前，他們已經遭到幹部子弟的攻擊。攻擊最多的是「重在表現」的政策，該政策意味着家庭出身並不是唯一標準，非紅五類出身學生可以靠後天努力來彌補先天不足，也有受到重用的機會。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附中發生的事情就很說明問題。

清華附中是幹部子弟十分集中的學校，儘管該校以教學質量高著稱，但到了1964年，學校的偏愛已絕對地傾向政治一邊。校長和班主任常常把學生中的高幹子女召開去會，諄諄囑咐他們：「你們和其他同學不一樣，你們的父母是革命家，你們天然地對黨有特殊感情，黨把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你們要爭氣，以後接班就指望你們了！」

鄭義在90年代初回顧了1964年發生在班上的一件事。一天，兩個同學發生口角，一位姓熊的出口傷人，另一位姓婁的給了他一拳，這本是小事一樁，教導主任對雙方均作了批評。但晚自習之

後，校長對全校學生作了沒有前例的講話，重提此事，把婁狠狠批評了一頓。全校學生覺得不公平，貼出不少大字報，這招來學校當局的嚴厲壓制。原來，問題的實質是：挨打的學生是高幹子弟，儘管他自己寫大字報承認自己首先罵人，侮辱了婁的人格，表示道歉，但學校領導仍然要以打擊其他學生的方式表示自己站穩了「階級立場」，堅決地貫徹了階級路線。因為就在前不久，另一個學校的領導就因為沒有「保護好」幹部子弟，貫徹階級路線不力而在四清運動中垮了台。

紅衛兵的主要發起人之一卜大華回憶說，在1965年，他和幾個幹部子弟同學得知，學校準備培養一位學習好、又聽話、出身於知識份子家庭的同學入團，他們感到憤憤不平，質問道，不第一個發展根正苗紅的卜，想幹啥？他們結夥和學校當局抗爭，終於使學校同意卜成為全年級第一個團員。過了不久，在選舉班幹部時，他們又挑起爭論，指責校方選拔學生幹部不講階級路線，挑選學習好、聽話的學生是鼓勵走白專道路。這次，他們又成功了⑩。

許多人抱怨說，文革前貫徹所謂階級路線，已經是極其不公平的事，它剝奪了許許多多品學皆優的非紅五類學生上大學的機會。在毛澤東和他的侄女王海蓉談話時，王就說過：「我們學校裏貫徹了階級路線，這次招生百分之七十都是工人貧下中農子弟，其他就是幹部子弟、烈士子弟等。」這種政治標準好像是一種不公平的競爭規則，它規定一部分人帶上腳鐐和別人賽跑。儘管如此，文革初老紅衛兵仍不滿足，因為帶上腳鐐賽跑還是一種規則，他們要求乾脆取消規則，取消競賽，按照家庭出身(甚至按照父母職位的高低)預先分配獎牌。在他們看來，講規則(不論這規則對自己多麼有利)就是資產階級，就是修正主義！

幹部子女敢於造反，和他們自身的先天優勢有關。他們比其他

學生有更多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對他們而言，這句話並不僅僅是抽象的座右銘，天下就是自己老子打下來的，遲早要傳到自己手中)，他們是黨的嫡親骨肉，被當成「反革命」是不可想像的。他們父母的官比一個區區校長大得多，他們沒有一般同學對領導的那種敬畏心理。當然，他們的最大優勢是政治信息靈敏，他們常常幹一些出格的事，弄得學校領導和同學目瞪口呆，如果誰要說他們的言行是錯誤的，他們會給你來一個「請君入甕」，因為他們早已知道毛澤東的意向了。運動初期，頗有一些平時較為平庸的學生作出驚人之舉，貼出大字報要打倒這人那人，原來他們是從父母或親戚那裏知道了中央的會議或決議精神：教育部或北京市委的領導人倒霉了。

毛實際上早就慫恿學生造學校的反。在和侄女王海蓉的談話中，毛說：「回去以後，你帶頭造反，星期天你不回去，開會你就是不去。」當王表示不敢破壞學校制度時，毛說：「我看你這個人將來沒有甚麼大作為。你怕人家說你破壞制度，又怕挨批評，又怕記過，又怕開除，又怕入不了黨。有甚麼可怕的，最多就是開除！學校就應該允許學生造反，回去你帶頭造反。」毛甚至把話說到這個地步，他要王海蓉造反時講，就是聽了主席的話才造反的。

在毛的眼裏，王顯然是個沒有甚麼出息的人，但高幹子弟中不乏敢作敢為者，尤其是有毛澤東這個大後台撐腰的時候。

毛澤東在1966年3月18日的談話中曾說：「去年9月，我問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險的。」「我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就要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地方要多出幾個孫悟空，大鬧天宮。」過了三個多月，以清華附中為首，果然殺出了自稱是「孫猴子」，揚言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的紅衛兵。怪不得老人家龍心大悅，把他們的宣言拿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作為文件印發。

如果說這批最老的紅衛兵只會奉旨行事，對毛的指示句句照辦，那就錯了。他們顯然有自己的主見、自己的利益。他們的政治要求的核心，是要把以前歧視性的階級路線變成赤裸裸的血統論，在接班、掌權問題上，不能有競爭者。毛澤東真是明察秋毫，他在1966年8月1日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在盛讚小將們的造反精神之餘，意味深長地以下面的話作為結束：「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這時正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風行一時並引起爭議的時候，毛為了不給「正合孤意」的紅衛兵潑冷水，沒有公開批評對聯，不過他的意見也是再明顯不過了。但紅衛兵們對於不合他們心意的話，竟然充耳不聞，儘管這些話來自他們的「紅司令」，被遵為「最高指示」，還是不起作用。由此可見老紅衛兵是多有主見和個性，對他們來說，革命的意識形態，甚至政治權威，比起自身利益來也是次要的。

北京的首批紅衛兵到外地串連，使紅衛兵運動的星星之火在全國醞釀成燎原之勢，但外地紅衛兵的自發造反精神遠不能與北京的先鋒相比。在外地，高幹子弟不如在北京集中，其父母的級別沒有那麼高，不能像在北京那樣，可以很快知道毛澤東的意圖。他們的水平也遠不如北京的開創者，既沒有一肩挑天下興亡重擔的氣概，也沒有寫出〈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水準。他們沒有向學校當局和工作組挑戰（可能不是不敢，而是看不出問題），只是在北京紅衛兵鼓動下，在當地省市委組織下，成立了官辦的紅衛兵。他們和北京紅衛兵不一樣，不存在從造反到保守的轉變過程，他們一開始就以保當地黨委為己任。他們缺乏自發性、主動性，完全沒有北京紅衛兵那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派頭，他們的成立宣言往往

是學校黨支部指定語文教師或是上級黨委派人捉刀而成。但有一點是共通的，即狂熱地搞血統論，攻擊以前學校當局貫徹執行階級路線不力，把「重在表現」政策說成是「修正主義復辟綱領」。不過，在外地，紅衛兵的組織基礎比北京紅衛兵要寬泛一些，基本上所有紅五類都有資格參加，不像在北京，雖然說是紅五類，其實往往只有幹部子弟，而且是達到一定級別的幹部子弟才有資格參加紅衛兵。

外省紅衛兵中也有極個別出類拔萃之輩，他們的情況和北京紅衛兵發起者相似，他們的造反可以反映當時中國學校中存在的張力。我只舉兩個例子，其一是駱思典在廣州調查採訪中得知的情況。華南師院附中學生L，廣東省副省長之子，於1966年5月27日貼大字報批評學校領導，內容有三點，第一，反對學校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第二，他上政治課不聽講，看《紅旗飄飄》，老師將書沒收，他說這是修正主義教育方式；第三，批評學校長期把政治放在第二位。顯然，這是一個毛澤東在對王海蓉談話時認為有出息、敢造反的那一類學生。他和其他十個高幹子弟頂住了學校當局和工作組的壓力而造反，最後由陶鑄表態支持取得勝利。當他們造反時，一大批廣東省幹部子弟站在工作組一邊反對他們，而在8月中旬血統論對聯傳來時，雙方就一致了⑪。

另一例是我在上海採訪的S，家長為上海市領導幹部，他志向高、個性強，與學校要求服從聽話格格不入，他認為自己是當然的接班人，但不寫入團申請書，他瞧不起那些「五分加綿羊」式的學生幹部，他打算直接入黨，不願屈居於團支部的領導之下。學校當局不喜歡他，但又奈何不得，還破例允許他不上課。他按自己擬定的計劃看書，準備寫一篇論述中國社會問題的大文章。S和北京的紅衛兵很早就有接觸，十分佩服他們的志向和才氣，當他成為上海最

早的紅衛兵之後，他處在一種左右為難的境地。身為幹部子弟，他相信上海市委沒有問題，甚至認為那些造反的人是右派、反革命。另一方面，北京紅衛兵的造反精神極有感召力，他也感覺到毛澤東的意思是支持造反。他不像其他上海紅衛兵，一味保爹保媽，與北京赴滬鼓勵造反的紅衛兵對抗。他曾去找曹荻秋，希望說動市委支持造反，與中央一致。他與曹的秘書談了自己的想法，並受到讚揚，但事後證明曹和市委堅持認為自己是正確的，沒有採納他的意見。他對此非常失望，認為那些老年官僚既僵化又愚蠢。

首批紅衛兵在文革舞台上發出了眩目的光芒，但如流星一般迅速消逝。他們一度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寵兒，但很快就與之發生對抗。文革並不是如他們一廂情願想像的，使這些血統高貴的接班人輕而易舉地封爵受地，恰恰相反，倒是要剝奪他們父輩的尊榮。反目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們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的冷落，文革小組的首長們沒有如約參加他們在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舉行的大會，這種羞辱是他們不能忍受的。會議內容馬上從自我批評變成狂呼反對中央文革的口號，他們又一次率先造反，這次與「無產階級令部」迎頭相撞，當然失敗得很慘。

兩次造反的膽量都是其他學生無法相比的，誰也沒有他們那樣的決心和勇氣，敢於不顧一切地掃除權力道路上的障礙。

三　造反派

更多的學生是出於甚麼原因而造反呢？與首批紅衛兵被冠之以「保守派」、「保皇派」相對照，他們被稱之為「造反派」，他們在心理上和思想上與保守派有甚麼區別呢？

李鴻永、陳佩華、駱思典等人認為造反派之所以造反，是因為他們大多出身於非紅五類家庭，他們在文革前屬於政治上不得志、受歧視的人。在文革中，與積極維護現行體制的保守派相反，他們力圖改變現行體制。

這種觀察相當有深度，他們在著作中列出了各種統計數字，證明造反派紅衛兵的家庭出身大部分是中等階級，少部分是革命階級和剝削階級，而保守派紅衛兵的家庭出身幾乎全是革命階級⑫。他們的觀察和分析也是深刻的，因為自中共1949年執掌政權以來，中國社會中一個最基本、最普遍的事實就是，人們按照家庭出身被區分為三六九等，他們對現體制的態度和感情自然有差別。

不過，僅僅這樣來解釋造反派的動機是不全面的。中國社會中存在的矛盾不是只反映在劃分家庭出身這一方面，還有另外的矛盾，這種矛盾同樣重要，也在文革中爆發。我們必須把這些基本矛盾都考慮到，才能充分解釋人們造反的原因。

先來看看為甚麼只用家庭出身解釋造反的原因是不充分的。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幾乎所有造反派頭頭都是紅五類家庭出身。比如著名的北京五大紅衛兵領袖，除聶元梓早已具有革命幹部的身分外，其餘四個學生個個都是好出身。其他地方大學和中學裏的情況也基本如此。我們應該問一問，他們帶頭造反是出於甚麼動機，難道是作「黑五類」出身學生的代言人，替他們謀利益？還有一件事應該解釋，文革前升入高等學校必須以階級路線為標準進行嚴格篩選，大學生的家庭出身情況已較為「純潔」，那麼如何解釋他們激烈的造反行為？請聽聽一位造反派代表，鄭州工學院學生W在「河南省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1966年10月11日召開) 上的發言。W說⑬：

> 我們是紅五類的後代，我們是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們最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為了捍衛無產階級的鐵打江山，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為了使我們的國家永不變色，起來革命，起來造反，我們何罪之有？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一些人罵我們是「陰謀推翻黨的領導」，「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是「貧下中農的叛徒逆子」等等，我們的父輩跟着毛主席幹革命，造反，打下了社會主義江山，我們是革命造反的繼承者、紅後代。我們為革命上刀山下火海死且不懼，這些流言蜚語、造謠誣蔑、謾罵中傷，算得了甚麼？

另一個同樣重要、而且不為文革研究者注意的事實是，保守派和造反派在家庭出身方面的差異，一開始並沒有和他們的政治態度相對應。運動剛開始時，人們出於慣性相信和擁護黨組織，保守的人居多，造反的人很少，出身非紅五類的學生大多持保守立場。他們之所以沒有當保守派，是因為血統論泛濫，人家不要他們革命，他們想當當不上！由於受到紅五類的壓制，他們產生了怨氣，當1966年10月之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有資格參加或自組「革命隊伍」時，保守派已經式微，他們自然就參加了造反派。由此可見，出身不好的人參加造反派，大多數不是基於家庭背景作出選擇的結果。我敢說，如果運動一開始沒有血統論，非紅五類中的大多數肯定會參加保守派。在幾乎一切地方，保守和造反學生最初的分裂、爭論只發生在紅五類學生內部，因為其他人根本無權參與(文革初期的辯論會上，每個發言者的第一句話必須是自報家庭出身，出身不好或一般的人不是遭到噓聲，就是被轟走)。

我們的分析不能脫離文革前的實際狀況和運動的進程，讓我們來看看造反派的形成過程。

文革前，學生中的積極份子(即政治上活躍，熱衷於參加政治活動，或喜歡就政治問題發表意見，而不是默默無聞搞好功課的人)有這麼兩類。一種人篤信黨的一貫教導，把革命理想和當前學校中布置的任務結合起來，把擁護黨的領導落實為擁護學校黨組織的領導。他們力圖做雷鋒式的革命者，亦步亦趨地追隨自己的直接領導(甚至還不是校長、黨委書記這種級別的領導，而是班主任、政治輔導員，黨、團支部書記或小組長這樣的頂頭上司)，把聽話和遵守紀律看成最基本的革命美德。他們習慣於掏出筆記本，記下上級的指示，然後照着去做。他們不習慣(或者沒有能力)根據馬克思、毛澤東著作和中央的文件、精神分析形勢，他們認為自己的思維不如領導正確，自己的解釋不如領導的解釋深刻和恰當。總之，他們習慣於追隨，不愛自己動腦筋。另一種人則不同，他們不論是出於思維活躍還是個性倔強，都喜歡凡事問一個為甚麼，不願意盲從領導。他們既然要革命化，就要努力弄清革命的原始教義，當他們認為領導違背原始教義(既包括理解和解釋不正確，又包括辦事不公道，不實事求是等等)時，他們勤於思索、質疑，甚至提出異議。他們不一定喜歡做好眼前那些瑣碎的小事，他們心目中的革命者形象不是只會服從命令的、雷鋒式的戰士，而是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以天下為己任，立志改造社會的人。精神獨立、敢作敢為的稟性使這種人容易在社會變動時脱穎而出，當然，也使他們易於受到打擊與迫害，正是在反抗迫害的過程中，他們成長為領袖角色。河南著名造反派頭領D就屬於第二種人。

D造反時，保守派和黨組織為了打擊他，公布了一封他寫於1962年12月23日的「反動信件」，那時D才18歲。信中説到了他對1958至1959年農村嚴峻形勢的看法，認為「發生這些事情的原因，總的來説，追根求源是我們黨中央在那幾年犯了不小的『左傾』的錯誤」，並説⑭：

三面紅旗，現在我們的黨中央是想竭力的舉起來，但是三面中的兩面已經在很多人中失去了號召力，不用說工人、農民，就是參加58-59年的實際生產不多的我們這些青年學生中間，提起大躍進，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種極度混亂的情況。從理論上來講，「大躍進」、「人民公社」，在中國是完全應該有的，誰不想中國早日富強？不想中國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然而，如果像前幾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最好還是不實行的好。我認為三面紅旗已大體失去了人心，要舉起來是有困難了。

從這裏所引證的內容和他談及中共革命史，當時越南、老撾的抗美鬥爭等來看，D是極其正統的，但從他敢於懷疑和反對「三面紅旗」的態度看，他的思想又是很「反動」的，其實，這正體現了在革命意識形態前提下的大膽和獨立。

在平常時期，前一種人佔居主流地位，因為黨一直要求學生學習雷鋒「甘當革命螺絲釘」的精神。黨的號召、指示、要求，從中央到支部，都是統一的、單一的，聽支部的話和聽黨的話不但沒有矛盾，而且是聽黨的話的具體表現，因為黨是一個等級劃分層次分明的系統，每一個級別的人看到的文件、聽到的「××會議精神傳達」是不同的(現在仍然如此)，人們很難直接聽到黨中央和最高級領袖的聲音。然而，文革發生了，革命運動屬於異常時期，在這時，除了通常的逐級傳達的信息渠道，還有從上到下一竿子插到底的通道(文革初期學生們頻繁地聽到一個用語，要求「把中央精神原原本本地傳達給群眾」，就是這個意思)。這時，領袖長期身居深宮的做法也改變了，學生們很容易直接見到他，聽到他的聲音。在這異常時期，主流派和在野派的狀態有可能發生變化，甚至轉化，在野派可能會發現自己和最高當局心心相印，而主流派則感到風向急轉，無所適從。

這種異常現象並非中國的文革初期所獨有，有人把文革視為一場由皇帝親自領導的平民對貴族的造反，有人以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的宗教改革運動來説明教義—僧侶—造反領袖—信徒之間的關係。讓我們來看看後一個比喻。共產黨系統和歐洲中世紀時的宗教系統有對應性：二者都有救世主 (耶穌、馬克思或毛澤東)，福音書 (《聖經》、《資本論》或《毛選》)，嚴密的思想監控和布道系統 (教會、黨組織)。信徒通過教會和上帝接觸，教士解釋上帝的意志，懲處異端；而革命群眾通過黨組織接受領袖或中央的領導，書記們解釋中央指示精神，決定誰是左派、誰是右派。宗教改革運動時，馬丁．路德宣示，教徒可以和上帝直接溝通，無需教士作為中介，並攻擊教會和教士腐敗及違反基督精神。文革情況也類似，最高領袖突然直接對群眾發話，並譴責説各級黨委對中央陽奉陰違，「打着紅旗反紅旗」，正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大搞修正主義。兩種情況的共同點是：精神領袖和組織系統發生矛盾，造反的一方雖受到譴責和打擊，但似乎更忠於原始教義。

文革初期的異常狀態和紊亂首先表現在黨的聲音從一種變成了兩種，一種聲音來自上級黨組織，另一種聲音來自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時，聽支部書記話的人和從《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獲得信息並作出判斷的人分別形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李鴻永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他説在工作組時期，報紙等宣傳工具發出的號召和黨組織執行的政策有區別。一方面，學生通過黨的機器得到的信息是，運動對象是資產階級權威和牛鬼蛇神，上級強調黨的控制，限制學生自發行動。另一方面，學生從宣傳中得到的是對自發和不受限制的群眾運動的鼓勵，發揚毛澤東思想。學生通過自己的政治覺悟和判斷了解到，鑒別對錯的唯一標準是毛的指示，而不是黨組織的意見。此外，社論還暗示了黨組織本身可能就是運動對

象，說「任何人，不管他職位多高、資格多老，『聲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反對毛澤東思想，就要對他的錯誤主張進行堅決的抵制，就要對他進行堅決的鬥爭，一直到罷他的官，撤他的職。」(《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社論) 那些反毛份子以組織原則為藉口鎮壓不服從他們的人，當有學生指出實際執行的方針和社論上說的有很大差別時，工作組說：「你聽誰的，聽黨委還是聽報紙的？」工作組把懷疑他們正確的學生打成野心家 (出身好的人) 和右派 (出身不好的人) ⑮。

學生中形成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區別主要是產生於對工作組的不同態度。在工作組進校之前，少數學生給學校黨委提意見，學校黨委紛紛以1957年反右鬥爭的經驗告誡學生，揚言這一次又是先「引蛇出洞」，運動後期要抓右派，有的學校還將1957年反右運動的電影拿出來放映，以警告那些敢提意見的人。不過，校黨委和造反學生的對立還未達到最大程度時，工作組就進校了，並行使領導大權，而且立即與造反的學生形成更激烈衝突。

工作組與造反學生衝突的原因並不全是他們採取保校黨委的態度，而是他們要強制執行一系列限制性措施 (來自於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八條規定，據說是由劉少奇負責制定的)，如大字報不准上街，不搞示威遊行，等等。下面，我們以清華大學為例來看看學生和工作組的對立。

工作組進清華後，組長葉林宣布，學生班與班、系與系之間不准串連，未得到允許不能貼大字報。他還命令鎖住校門，以防止外校學生來串連。造反的學生抓了一些所謂「黑幫」，戴高帽子遊校，工作組對此加以批評，學生們搬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進行反擊。如果說，以前造反的學生還是極少數，那麼，工作組的壓制使得許多學生站到了對立的立場。工作組的邏輯反映在組

長葉林的這句話中：「你們把矛頭對準工作組，就是反黨！」也反映在工作組的這個公式中：反工作組就是反北京市委，就是反黨中央。由於工作組斷然宣布蒯大富的大字報是反革命大字報，蒯本人是反革命，並用政治壓力代替辯論，因此使許多原先觀點不一的人一致地與工作組對立。一個學生回憶説，他的班上共有二十人，就有十八人在反工作組的大字報上簽名，有一個班原先只有六個人造反，當工作組表態後，全班都造反了。工作組的反應是立即反擊，他們把學生劃為五類：第一類支持工作組，是左派；第二、三類對政治形勢理解不夠，覺悟低；第四、五類反對工作組，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屬於敵我矛盾。他們把曾經擁護蒯大富的八百多人打成反革命。一旦戴上帽子，就失去人身自由，上廁所都有人跟蹤。有個班共三十人，有十二人被打成反革命，十二人是同情者，剩下六人完成不了監視任務，還要到外班去調人來協助⑯。蒯大富被工作組關押十八天，他以絕食進行抗議。在這期間，許多反工作組的學生、教師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

工作組的所作所為，是中共搞政治運動的一貫做法。清華大學的鬥爭，是當時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通過妻子王光美(清華工作組成員)和女兒劉濤(清華學生，校文革負責人)遙控指揮的。他曾對劉濤説：「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搞成少數派，批倒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劉的另一個女兒在北師大一附中，他針對該校反工作組的大字報説那是「右派打着紅旗反紅旗」，若引蛇出洞，消滅起來就容易了。6月13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北局關於文革運動的報告中寫道：「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對大學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

來」，「對高中應屆畢業生中的一些人，經市委批准，可以批鬥和戴帽。」在北京市委召開的工作會議上，市委書記李雪峯指出，反工作組的人中有壞人，「打着『紅旗』反紅旗……企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外地情況也是如此。西安交通大學是全國造反最早、影響很大的學校，1966年6月5日，交大以李世英為首，有學生1,683人致電毛和中央，稱「工作組不能勝任領導文革」，發起反工作組行動。陝西省委和西北局將此定為反革命事件，一千多人被鬥爭，多人自殺。李世英為貧農出身，中共預備黨員，在被鬥被打、絕望之際服毒自殺，他在遺書中要求弄清楚「在這個事件中，我的動機是反黨，還是要保衛黨？」工作組扣了他的遺書，還有人說：「中國有七億人口，少一個算甚麼？死一個還能每月給國家節省三十斤口糧呢！」另一位在造反大字報上簽了名的女學生王永婷遭到圍攻，被迫寫檢討材料三十二份，長達一百六十二頁。她被動物展覽式地遊鬥，圍觀者上千人。7月9日跳樓自殺後，工作組給她家人發的電報是：「×××：你妹妹王永婷破壞我校文化大革命運動，於9日晨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是否火葬，請急電告，望能速來料理後事。」李世英經搶救脱險，平反後毛澤東數次接見他，江青親切慰問讚揚之後明確告訴他：「你的問題不是西北局平反的，是我們派人去的」，「你的材料我都看了，我很感到痛心。」怪不得李世英立下誓言：誓當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急先鋒，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⑰！

與劉少奇的態度形成鮮明對照，毛澤東於1966年7月18日一回到北京，就批評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指責他們鎮壓學生運動，他氣憤地説：「誰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緊接着，陳伯達派人到清華去看望和慰問被關押的蒯大富，表示對他的支持。

對於學生中的造反派，1966年最關鍵的事情是，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於10月5日發出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其中說：

> 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鬥學生；要注意保護少數，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份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出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

同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指示，指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行。」幾乎每個造反派積極份子都記得，當宣讀這兩個文件時，氣氛是多麼激動人心。一大批在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的人獲得了新生，這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破天荒第一次，被黨組織打成反革命的人獲得平反，獲得解放，獲得勝利。這也是整人者的第一次失敗，在以前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因為是黨的代理人，無往而不勝。人們清楚地記得，重新獲得政治生命的人對毛澤東和以他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多麼的感激涕零，他們下定決心，「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拋頭顱、灑熱血也再所不惜」，真是「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覺毛主席親」。

以上情況說明，學生中的造反派在文革中起來支持以毛澤東為首的文革派，反對以劉少奇為首的黨的官僚，暴露了中國社會存在的兩類矛盾，第一，領導歷來壓制群眾，群眾一有不同意見就打反革命，我將這視為一種政治矛盾；第二，當局歷來根據家庭出身把人分成等級，一部分受重用，一部分受歧視和壓制，我將這視為一種社會矛盾。在這兩個問題上，劉少奇等各級黨的官吏在文革中堅

持黨的傳統作法，而毛澤東一反常態地支持群眾與黨的機器對抗，結果把群眾爭取到自己一邊。

只有理解了這兩類矛盾，而不是僅僅看到一種矛盾，才能全面、準確解釋學生的造反行為。

陳伯達在1966年10月16日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報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他在其中着重講的也是這兩類矛盾。他對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集中到兩點，一是害怕群眾、鎮壓群眾，二是搞血統論。

白霖(Lynn White)在〈論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根源〉一文中以類似的方式談到了中國社會裏存在的兩類矛盾。他說，文革的社會基礎有兩點，「第一個因素是，經過長期的積累，形成了給人貼政治標籤的政策(如『走資派』、『右派』、『壞份子』，或者『工人』、『革命烈士後代』等)。這些政治標籤可以使一個家庭的全家人在就業、求學、城市戶口、物資供應配額等方面受到不同待遇。」「第二個因素是，經過多年的積累，中國所制定和執行的各種政策使『單位』中的個人越來越依靠當地的黨的領導人——中國人改善生活的其他出路完全被堵塞了。」⑱

現在我們來看看，文革前中國社會中潛伏和積累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要注意的一點是，這些矛盾在工廠、機關、企業、農村比在學校尖銳。當然，學校中也要反映出這些矛盾。這裏談的不是全部問題，主要是學生能感覺到的問題。

從1949年到1966年，中國社會表面上處於高度穩定有序狀態，但這是建立在犧牲全面發展和強力控制的基礎上。執政者在人民之中劃分等級、製造矛盾，使各單位、各部門總是有人整人、有人被整成為生活的常態，並不斷發起政治運動，使一批批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人淪為人民公敵，同時製造出一個以政治監視為職業的政工

隊伍和一批平時專打小報告，政治運動一來就興風作浪、羅織罪名、落井下石的政治打手。這個以高壓、清洗為特徵的制度大致包含以下方面。

製造一個以「地、富、反、壞、右」為主體的「階級敵人」隊伍，和以他們的子女為成員的「不可信任者」隊伍，在中國社會中形成一個以階級鬥爭學說為基礎的種姓制度。與印度的種姓制度不同，統治者不斷在統治集團內部和一般群眾之中清洗出一些人落入賤民隊伍，同時又在賤民中樹立一兩個「棄暗投明」、「脫胎換骨」、為官方所器重的典型，使所有賤民懷着上升的希望。這種作法極為聰明和有效，它使大多數人謹小慎微、馴順服從，生怕「犯政治錯誤」而貽誤終身前途，同時又使被壓制者一心企求救贖而不致反抗。

推行奴化教育，使每個人忘掉個人的自由和權利，這種教育的主要內容一方面是歌頌黨的絕對正確，另一方面是要求人民徹底忘掉和否定自我，絕對服從。請聽聽相距二十多年的兩代學生的評論，1957年成為著名右派份子的北大學生譚天榮說：「我是本屆畢業生，但是在畢業前夕的今天，我還不知道自己將來要到哪裏去；因為我像每一個畢業生一樣，沒有選擇自己前途的權利。黨要我服從分配，隨便把我們分配到自己不願意去的地方，擔任自己不願意做的工作，盲目的服從被認為是優秀的青年。」⑲趙淮海指出，即使在中學，班主任也是靠運用權術來控制學生，「佔學生總數80%的學生從小就處於一種受到班主任、家長和班幹部聯合編織的監視網裏，動輒得咎，真是如入鮑魚之肆，但那邊還在教訓學生『你們都是蜜水裏泡大的，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長久的這種訓練已從生理上改變了中國人的激素系統，不見分泌能引起反抗意識的荷爾蒙了。」⑳

在這種制度下，告密不僅不是可恥的事，反而成了一種美德，成了「爭取進步」的必要條件。官方要求人們「思想革命化」，爭當接班人，但這決不僅僅是具有革命理想、信念、意識形態的問題，判斷一個人的政治立場的關鍵是看其是否「靠攏組織」，這指的是勤於匯報自己以及他人的思想和行為。不少學生回憶說，當他們提出入團、入黨的申請，為此在學習上努力，對集體工作關心並盡力時，組織上往往指出他們有「不愛反映情況」這種缺點。匯報的內容，大至別人對黨的方針、政策、對政治運動的態度，小至愛看甚麼小說，和甚麼人交友，等等。組織上最感興趣的是人們對他們本身的意見和評論。最惡劣的情況是，一些已經受到信任的人專門去接近「落後份子」，故意向他們說「落後話」或「反動話」，從他們口中套出相同的話，然後匯報上去邀功。趙淮海回憶說：「每屆班幹部都是那幾個『勤於向老師反映情況，勇於和不良現象作鬥爭』的人。」㉑

控制人的最根本手段是檔案制度，這是長期以來最遭人憎恨的。城市裏的每個人從中學時代起就有一個檔案，裏面詳細記載了家庭出身、社會關係、本人的政治表現，以及政治運動中的結論，還有別人的告密材料。人們永遠不知道檔案中關於自己說了些甚麼，它像一個陰影終生追隨你，又像達摩克利斯劍懸在你頭上，當你與領導發生矛盾要挨整時，當一場政治運動來臨決定你要成為靶子時，檔案中的材料就拋了出來，成為置你於死地的利器。一個廣州造反的紅衛兵在被採訪時說㉒：

> 我們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毀了學校的檔案，因為它們是用來控制學生的。黨支部對某個學生不滿，就公布他的檔案，這對他的前途不利。比如，這種檔案可以用來妨礙一個不聽話的學生進大學，或不利於他找工作。檔案是對付我們的重要武器，

當我們搶過檔案後，我讀到了關於我的記錄，我幾乎看不出那說的就是我。我們公布了檔案，把它們作為謊言公布，以證明黨的官僚是一群扯謊的人。

在這個制度下，最不幸的遭遇就是被打成反革命，這不但使受害者本人永無翻身之日，而且還要累及親屬、子女，甚至朋友。人們最為恐懼的是，被定為反革命並不需要法律程序（「反革命」本身就不是恰當的法律上的罪名，雖然中國法律一直有這一罪名），任何一個單位的領導就可以把人打成反革命。定罪的邏輯是這樣的：反對黨委（甚至反對某個黨的負責人）等於反黨，反黨等於反對國家和人民，因此等於反革命。許多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並不是因為從根本上反對中共，而是與基層黨支部負責人有矛盾，或者性格桀敖不馴，愛給領導提意見、唱反調。由於領導有打反革命這一殺手鐧，群眾與本單位領導之間的關係類似於人身依附關係。膽小如鼠者有之，狐假虎威、為虎作倀者亦有之。

一篇文章把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作了如下總結：「一頭是弄虛作假的『馴服工具』，一頭是遭受迫害的『階級敵人』，一般群眾就生存在這樣狹小的沒有其他選擇餘地的政治窄縫裏。儘管在高壓和箝制下，表面上一片熱烈，而實際上整個社會基層的離心傾向和上下的對立情緒則越來越嚴重了。人際關係緊張到了臨界狀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這篇文章的作者把文革中的造反看成矛盾爆發的結果，「文革期間，儘管在口號上『左』得出奇，但許多捲入者的行為，正是由怨憤和反抗心理所導引的。在文革波及全國，各地楸鬥負責幹部勢如雪崩時，這種怨恨和反抗心理表現得十分明顯。許多單位的失控就是在批判『資反』路線後開始的，多數群眾之所以熱烈贊同批判『資反』路線，是因為反對政治迫害。只有在燒毀黑材料時，人們才真正感到痛快，感到『革命是盛大的節日』！因此，雖然

旗號打的是造『走資派』的反，而實質上不過是對整個整人—控制體系的反抗。這就是推動文革（到了幾乎不可收拾地步）的社會層面的潛在致因。」㉓

X的親身經歷和前面的說明是一致的。他在採訪中詳盡地敍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活動和思想變化，文革時他在四川成都讀書，正值高中畢業。X被視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但在血統論猖獗時並未受到直接迫害（父母早已病逝）。他在運動初期十分相信學校領導和工作組，雖然沒有機會去當保皇派，但當學校中有人造反時，他處於渾渾噩噩的狀態，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在1966年12月初，X卻義無反顧地參加了造反派紅衛兵。促使他這麼做的直接原因有兩件事。

在50年代，X有一位極有才華和個性的表姐在大學畢業前被打成了右派，她的罪名之一是愛看西方古典文學名著。X也有此愛好，平時對她很喜愛敬佩，打右派過程中X的所聞所感使他幼小的心靈蒙上了一層抹不掉的陰影。上高中時，X又因愛看西方小說而遭非議，甚至有團員偷偷檢查他的課桌，匯報他讀的是甚麼書。臨高中畢業時，X聽說同年級有的同學被班主任寫上這樣的評語：「此人對黨和社會主義有不滿情緒，建議大學不予錄取。」X雖然未受過殘酷打擊，但對環境的壓抑，卻深有感受。

1966年11月串連到北京，在北京大學看大字報時，X讀到一份傳單，說的是中央文革小組員王力和關鋒談論中國的檔案制度。他們說，檔案這個東西像個沉重的包袱，壓得人一輩子直不起腰，像陰影一樣籠罩人的一生。他們主張廢除或改進檔案制度，至少要讓當事人能接觸自己的檔案，不然隨便有人誣告一下，就使人在毫不知曉的情況下蒙受不白之冤。X知道，這兩人的言談和1957年右派的言論一模一樣，但代表了廣大群眾的心聲，他因此對文革派的印象比對當權派的印象好得多。

串連返回成都之後，12月份X去鐵路工人俱樂部聽「首都三司」一個紅衛兵鼓動造反的講演，這個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演説極有説服力和煽動性，他決不提那些報紙上的大道理，而是一件接一件地説明和分析人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他問聽眾，為甚麼給支部書記提意見就要被打成反革命，弄得降職降薪，兒子上不了學，妻子離婚。為甚麼拿了食堂一根小白薯就要在檔案中記上一筆，以後每次運動一來就成了靶子？這種制度難道説明在我國人民是當家作主？他據此號召人們起來造反，打倒特權官僚，即「走資派」，讓人民真正享受民主和自由。X和數千名工人一樣，含着熱淚聽這個紅衛兵的講演，聽完之後就參加了造反派組織。

四　文革發動者的策略手段

如果説，文革中群眾造反的表層原因是受宣傳鼓動，深層原因是中國社會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那麼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必須回答：為甚麼在大多數情況下，對於大多數造反者而言(尤其是對紅衛兵造反派而言)，鬥爭的矛頭不是指向整個領導階層，不是指向現存制度的締造者毛澤東，而只是指向部分領導人，指向毛的政敵劉少奇㉔？另外，既然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和宣傳已把絕大多數人訓練得膽小馴順，把「反黨」視為罪大惡極，他們為甚麼一下子又變得膽大包天，敢於造反？難道毛真是要帶領群眾向舊體制宣戰，難道他真是為了自己的烏托邦社會理想，要打碎黨的機器，再度革命，重建理想社會？

事實當然不是如此。毛不過是利用了社會矛盾，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向政敵發難，我們現在就來分析毛的手法。

首先應該看到，在毛和劉的權力鬥爭中，毛在有一點上大佔優勢：他讓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即劉為一線，毛為二線），他自己可以甚麼事也不做，也可以隨時半路殺出，打亂劉的部署，他永遠握有批評劉的權利。在文革初期，毛離京外出，讓劉指揮全國運動，這就將劉置於處處與群眾對立的境地。

不在北京的毛不向劉少奇、鄧小平，甚至不向周恩來打招呼，就批准在6月1日廣播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引起天下大亂的局面。6月4日左右，劉、鄧兩人專程飛到杭州向毛匯報情況，並請他回京主持工作。毛表示暫不回京，委託劉、鄧相機處理運動中的問題。劉、鄧回京後，主持中央會議，會議決定派工作組。按照中共「集體領導」原則，毛並無權力否定這個決定。此外，派工作組是中共領導政治運動和政治鬥爭的一貫方法，土改時就派了工作組，四清運動也派工作組。而且，前不久毛還批准派工作組（以陳伯達為首）進駐《人民日報》社。中央文革小組參加了中央會議，對於派工作組的決定並無反對意見。會後，劉將決定電告仍在杭州的毛，他也沒有表示不贊成。

毛通過康生等人的密報知道工作組在學校裏和少數造反的學生尖銳對立，他7月18日回北京後，馬上就指責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到了8月5日，他親自出馬攻擊劉少奇，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指責劉和他的同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完全可以設想，如果劉不派工作組，毛就將指責他「放棄黨的領導」，「聽任牛鬼蛇神翻天」。而劉如果處在可以指責毛的地位，他就會說「聽任右派向黨進攻」，「動搖無產階級專政」。

毛和他的追隨者作出了一系列姿態以爭取群眾。他們把文革鬥爭的焦點説成是對待群眾的態度問題，把自己和劉少奇的區別説成是保護還是鎮壓群眾的立場對立。

毛從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共八次檢閱了一千多萬來自全國的紅衛兵。紅衛兵只知道自己是「毛主席請到北京的客人」，他們並不計較並不是毛為他們付旅費和食宿，也不知道毛的大串連決定給國家造成數百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檢閱的效果是極其明顯的，一個中學女紅衛兵回憶説：「那天檢閱回來，大家激動的不得了。同來的一位高中同學割破手指寫下一份血書，在一個白被面上寫下十幾個通紅的大字『緊跟毛主席，永遠不變心，誓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她一腳踢開我們的房門，舉着血書進來説，誰贊同，來簽名。我們二話沒説，都割手指簽名……第二天我們就殺回老家造省委的反去了，我們省奪權在全國是靠前的。」

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也擺出一副「尊重群眾，與群眾心連心」的姿態，他們在群眾集會上經常和學生們手挽手，下雨時學生給他們打傘、加衣服，他們堅決不要。他們特別在發言中大發阿諛討好之詞，以示和劉少奇等「走資派」的「做官當老爺」態度截然不同。比如江青1966年7月25日在北大參加辯論會時發言説：「同志們，毛主席要我們做你們的小學生。就是説，做革命派的學生，革命派的同學、教職員如果需要我們來，我們召之即來。我們小組的成員如果有甚麼不正確的，也可以寫大字報，也可以直接寫信給毛主席，也可以直接去見他，我們是革命派的勤務員。」

當天津大學等學校的一些人由於造反而受壓制，徒步向北京進發去告狀時，中央文革立即派火車在途中將他們接到北京，這些人感到毛和中央文革是自己的恩人和親人，他們高呼口號，當即決定自己的組織名稱為「八・一三紅衛兵」，因為1958年8月13日

毛澤東視察過天津大學。這支紅衛兵以後造「走資派」的反對是最堅決的。

針對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提倡的「馴服工具論」和文革前的奴化教育，以及「反對黨委就是反黨」的流行主張，文革派現在提倡反對奴隸主義，批判劉少奇等人「要人們不講原則、無條件地服從直接上級領導」。指出「這種論調，實際上是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並援引毛澤東的話說：「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㉕針對文革前黨政部門的官僚主義和不民主作風，以及文革中工作組的飛揚跋扈，文革派大力主張搞「巴黎公社式的選舉」，即全面普選，群眾隨時可以批評領導，撤換不稱職者。

這一切，都讓人感到毛和他的人是站在群眾一邊的，與黨的官僚完全不同，他們的方針、政策的精神是民主和平等，與其對立面施行壓制和打擊群眾恰恰相反。

只是到了有人攻擊中央文革而遭到鎮壓，只是當毛澤東派到學校的工宣隊和軍宣隊比以前的工作組更厲害地鎮壓學生時，造反派才看清楚上述言行不過是爭取人心的表演而已。

其實，並不是只有毛和毛派人物才會作出尊重群眾的姿態以獲得好感。劉少奇在文革前曾接見北京掏糞工人時傳祥。說：「你是掏糞工人，我是國家主席，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革命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劉的話被傳為美談，反覆引用，劉也樹立了自己謙虛、樸素、接近群眾的形象。文革中，時傳祥隨劉少奇垮台而倒霉，被說成是「工賊」和「糞霸」，備受打擊而被逼瘋，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當劉的夫人王光美在清華大學隨着工作組遭批評而陷入窘境時，她到食堂去幫助工人賣飯，以此改變形象，但立即遭到造反派的譏笑與攻擊，可見「與群眾打成一片」的形象只能屬於政治上

的正面人物。實際上，毛及其文革派人物所能做的一切，劉和其他人也能做到。他們之間並不存在一方愛護群眾，而另一方鎮壓群眾的區別，區別只在於文革初期方法和策略的不同：一方一如既往，另一方一反常態，暫時與歷來做法背道而馳。

同樣，對於文革前十七年對人民的壓制，並不只是劉少奇才應該負責任。試問，哪一次政治運動不是毛發起的呢？關於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難道不是毛提出的嗎？作為中國最高統治層的首要成員，毛和劉並無區別。如果一定要問十七年的第一號負責人是誰，回答顯然只能是毛澤東。但毛比劉高明之處在於，他善於利用社會矛盾，是他激化了這種矛盾，然後將一切罪過推到劉的頭上，正如西蒙．勒斯 (Simon Leys) 所說㉖：

> 毛動員和利用紅衛兵的方式和慈禧操縱義和團的方式極其相似，他把群眾普遍的不滿用於針對他的敵人，而這不滿是因他自己的統治而產生的。更可理解的是，這種不滿本可以是針對他自己的……毛本人建立起來的官僚制度長期以來一直是青年不滿和感到沮喪的原因，他們隨時都要爆發。毛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指控他的私敵為造成這制度的根源(而實際上他才是始作俑者)，然後把廣泛的憤慨引向他們，把他們搞掉。……紅衛兵最後意識到他們上了當，但這已為時太晚：當他們的作用完成之後，毛可以把他們拋到軍事壓制之下，用一批和原先一樣的官員來代替他們。

一般人認為，中央文革小組堅決反對血統論，至少在這一點上證明他們是站在受壓制和迫害的學生一邊。要說他們把一大批受壓群眾解放出來倒是事實，但要說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恢復社會公平則大謬不然。毛派人物加給血統論的罪名是「挑動群眾鬥群眾」，這就是說，本來群眾是應該鬥「走資派」的。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他們

用血統論來代替階級論，企圖混淆階級陣線，孤立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這話的意思是，血統論把文革中真正的敵人「走資派」放跑了，去打擊並不太重要的黑五類；血統論把一大批群眾置於受壓地位，使他們不能加入打「走資派」的行列。因此，他們要「解放群眾」，群眾被解放出來，就死心塌地地為他們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賣命。譚力夫大肆鼓吹血統論，被中央文革小組批判，不過更耐人尋味的是他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關鋒、戚本禹親自打交道的情況。1966年11月的一天，中央文革小組約譚到中南海與關、戚面談，在談話中，他們最感興趣的是追問譚力夫的後台，企圖找到他與劉少奇、鄧小平、李雪峯、張平化的聯繫。他們並不想和譚論理，而是想整人。

同樣是關鋒和戚本禹，出面把反血統論的人打了下去。北京四中幾個學生辦的《中學文革報》登載遇羅克的〈出身論〉，銷路很好，影響極大。出到第3期，關鋒就表態說報紙大方向錯了，必須懸崖勒馬，否則後果自負。到1967年4月份，戚本禹又表態說「中學文革報」是反黨反人民的，〈出身論〉是一株大毒草。遇羅克於1968年初被捕，最後以「思想反動透頂」、「大造反革命輿論」的罪名被判處死刑。

從上述中央文革一手打鼓吹血統論的譚力夫，一手鎮壓反血統論的遇羅克，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在血統論問題上，文革派既非堅持正確的原則，亦非站在廣大受害者一邊，他們倒是深透了解中國的社會矛盾，他們成功地利用這種矛盾達到打垮政敵的目的。他們並不想以公正的方式解決這種矛盾，在文革前，他們屬於這種矛盾的製造者，在達到自己的目的後，他們仍然和以前一樣製造和維護社會不公正。

和劉相比，毛厲害之處不僅在於權術方面棋高一着，而且在於他對中國社會中存在的基本矛盾，對於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更敏感，有更深刻、更清醒的認識。許多人都知道，文革之前中共的幹

部有以下兩種類型。一種人信念堅定但思想狹隘、僵化，他們或許是因為自己生活在十分優裕的環境中，或許被自己炮製的意識形態神話所欺騙，把黨、社會主義制度看得完美無缺，看不到社會中存在的問題，看不到陰暗面。對於群眾政治上的不滿，他們真誠地吃驚，出自內心地憤慨，習慣於以鎮壓方式解決問題。他們一門心思維護現存制度，無力解決越積累越多、越積累越深的社會矛盾。另一種人則更精明、更實際。他們雖然大力維護現有體制，但還能看到這個體制內存在的問題。他們口頭上大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內心清楚地知道實際上並不是那麼回事。在某些場合，他們能以十分超然的口吻談到社會的弊端和陰暗面，當年輕人表示不滿時，他們會表現出對這個體制中腐敗方面的深透了解並加以無情抨擊，這往往令批評者大吃一驚。當然，他們決沒有在內心、從道義上否定現存制度，不想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制度。他們的理解與清醒只是服務於維護這個制度，或從這個制度中最大限度地撈到個人好處。在最上層領導集團中，把共同的罪惡諉之於敵手，用揭示社會不公並高舉追求正義旗幟的手法以爭取民眾，借用群眾力量打倒對手，然後繼續維護並加深以前的不公正，是不少人慣用的策略。毛澤東會這麼做，別的人其實也會這麼做，只不過做成功的人同時會得到維護正義和人民利益的美名，而失敗者將落得「人民公敵」的罵名。當林彪派和毛派進行權力爭奪時，他的兒子林立果及其死黨搞了個所謂「『571工程』紀要」，從中可以看出林派對於「解放群眾」這一套也非常熟悉，並打算玩同樣的手法。他們在這個紀要中說：「對過去……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這不是和文革派在運動初期施展的手法如出一轍嗎？

如果說，在運動初期，文革派的基本策略是打民意牌，那麼中央以下各級黨委的策略就是緊跟中央，支持造反，主要手法就是拋

出替罪羊，這也是激勵學生造反的直接誘因。請看上海著名造反派紅衛兵，「紅革會」頭領安文江對復旦大學情況的描述㉗：

> 校黨委也被毛澤東的指示搞迷亂了。一邊放映反映匈牙利事件的電影《前夜》、《黎明》，警戒可能蠢動的學生，一邊違心地組織對周谷城、周予同的批判以應對時局。在少數師生貼出揭批黨委書記陳傳綱同志的大字報後，經上級批准，校黨委宣布陳是修正主義份子，陳書記不久便飲恨自殺。這種丟卒保車，捨一人保整體的做法意在控制主動權，但與其願望相反的是客觀上鼓勵了學生的蠢動。
>
> 陳是修正主義，那麼被陳提為宣傳部長的原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徐震是甚麼主義的呢？我們依照極左的思想進行想當然的推理。6月25日，我和同年級11名學生貼出《徐震是甚麼人》的大字報。徐講話多，又是筆名公今度的雜文家，和「三家村」一對照，辮子一大把。於是，又貼出《二談徐震是甚麼人》、《三談徐震是甚麼人》。憑心而論，徐震同志豁達平易，對我們也很器重。大字報的領頭人物還是他精心培養的尖子。可是，《人民日報》尖銳地提出「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生死鬥爭中，是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當資產階級保皇派？每個人都必須做出自己的選擇。」我們當然不做保皇派啦！於是，揭竿而起踏上造反的第一步。
>
> 校黨委意識到「徐震問題」可能會成為沖決黨委的缺口，在力保半個月後就放風「黨委對徐震問題早有覺察。」黨委負責同志說：「6月中旬，我們就叫徐震考慮問題了。」7月25日，該同志又說「決心下得晚了。」次日，中文系黨總支組織百餘人貼出《徹底打倒徐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陰謀》的綜合材料。徐成了又一隻為保車而棄的卒子。這無疑宣告了我們的勝利，激發

了我們乘勝追擊的鬥志。校園裏一派「向中四小將學習」的歡呼，我則更堅信了「懷疑一切」的極左信條。……文革中，丟卒保車，丟車保帥的現象遍及全國，有多少周谷城早在紅衛兵誕生前被批鬥，有多少陳傳綱、徐震被推出來充任無罪的替罪羊以致走上絕路。

事實上，在全國各地，省委、市委、各大學黨委，都把主管文教、宣傳的負責人，把各省、市級報刊總編或副總編一級的負責人拋了出來，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修正主義份子」批判鬥爭。雖然馬上就會證明，各級黨委是這場運動的衝擊對象，但在直接受到衝擊之前，它們不遺餘力、唯恐落後地煽動學生造反。犧牲下級、同僚，尤其犧牲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以表明自己的忠誠，以求在運動中過關，這是歷來如此、屢試不爽的方法。但這一次，老經驗不靈了，當各級黨委拼命為學生的造反烈火澆油時，火立即燒到了他們自己身上。

在中文裏，「造反」本來意味着犯上作亂、大逆不道，但在文革初期，造反是黨的號召，是最高領袖的意旨，是時代的需要，是歷史的洪流。對青年學生而言，造反行動的迅猛異常，不過標明了文革前教育和宣傳工作成功的程度。

五　結盟和聽命

紅衛兵起來造反，幾方面重要原因如前所述。他們在運動中各種行為和活動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追求政治上的勝利。為此目的，他們自發的願望和熱情都受制於現實的政治鬥爭格局。紅衛兵在文革中看起來叱咤風雲、東征西討、為所欲為、不可一世，但實

際上，決定其鬥爭勝敗的並不是他們自己，而是更強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們造反活動背後還有一種動因，即投「無產階級司令部」或「革命領導」之所好，任其驅策，憑戰功受獎領賞。

那麼，紅衛兵把甚麼政治勢力作為自己的靠山，把鬥爭的矛頭針對誰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澄清一些錯誤觀念。對於紅衛兵為誰而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說法。陳佩華最近對於政治結盟關係的不同表述作了一個大致總結。

毛派在文革中提出的模式是：紅衛兵和毛以及毛派份子站在一起，攻擊「走資派」和「資產階級權威」；

鄧小平等文革後復職的中共元老在1981年作出的官方說法是：紅衛兵和受迫害的革命幹部站在一起，與「四人幫」及其追隨者作鬥爭；

造反派紅衛兵在1968年認為：文革的鬥爭，一方是官僚特權階級和作為他們工具的保皇派紅衛兵，另一方面是爭取社會平等的造反派紅衛兵㉘。

我認為，這三種說法都非常片面，但都有一定根據。毛派的說法在文革初期是正確的，但不能解釋廣大紅衛兵在運動後期對文革的否定和抵制，尤其不能說明，當「四人幫」垮台時，大多數紅衛兵歡欣鼓舞，並在其後全力支持以前「走資派」們提出的現代化建設綱領——比文革中被批判的「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綱領」更「右」的東西。第二種說法不能解釋文革中紅衛兵對當權者的造反，於是產生了一個補充說法，運動初期紅衛兵被「四人幫」蒙蔽、利用，幹了不少壞事、錯事，但後來逐步覺悟，終於站到了代表人民利益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邊。這樣說好了一些，但仍有問題，老紅衛兵中的「聯動」會說，他們早在1966年底就造江青等人的反，而造反派紅衛兵中不少人始終把幹部當成官僚特權份子。

有人想這樣來調和以上兩種對立觀點：紅衛兵在文革初期站在毛派份子一邊，在後期站在被打倒的「走資派」一邊。我認為不能作這樣的概括。最粗略地說，以上種種說法都把紅衛兵當成一個整體，而事實上他們分裂為受不同集團支使，或與不同集團結盟的派別。其次，文革的上層鬥爭並非僅僅是毛加「四人幫」和劉、鄧加其餘「走資派」的兩極對立，在政治舞台上活動的有若干個派別，文革政治鬥爭是在他們之間，以及與他們相應的各派紅衛兵和其他群眾組織之間進行。另外，我們不能忘記，除了中央一級的派別，各地區、各個層次都有錯綜複雜的派別鬥爭，紅衛兵組織及其政治靠山之間的關係是多種多樣的。一般地和抽象地說，紅衛兵只服從毛和中央文革，但他們並沒有告訴人們在每個地區具體應該怎麼做，應該打誰和保誰，因此在實際上，儘管各派紅衛兵的口號都是「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但往往在支持或反對當地駐軍的政策，在對某個或某些當權派態度等方面發生分歧和鬥爭。他們勢必要在當地尋找後台和同盟者，雖然所有勢力的最後裁決者在北京。

第三種模式較前兩種有一個顯然的優點，它看到了紅衛兵之間的對立和鬥爭，它不把紅衛兵的行動僅僅理解為遵奉當權者的旨意，而是有自己自發的目的和深刻的社會原因。但是，它過份地、片面地強調了紅衛兵行為的自發性，它沒有看到，從根本上說，紅衛兵是文革發動者達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即使在很多地方紅衛兵是自發地起來造反的，但一旦進入了政治鬥爭的格局，任何人、任何組織都必須服從政治鬥爭的邏輯，紅衛兵的一個派別、一個組織的勝利，最終標誌是甚麼？不是別的，僅在於被承認為是「左派」或「革命」組織，在新的政權形式——革委會中有一席之地，這一點就足以令所有的紅衛兵組織積極尋找政治靠山，對中央或地方當權者投其所好，任其驅策。

讓我們先看看紅衛兵受指使而行動的例子。其一，大串連之後，北京的紅衛兵四出串連，到各省市去煽風點火，鼓動打倒當地黨政領導(儘管這些紅衛兵中不少是幹部子女，在北京被視為保守派，但只要遭攻擊的不是自己的父母，他們還是樂於響應毛的造反號召)。周恩來秘密召見著名的紅衛兵頭領，師大女附中的鄭中偉，叫她帶一隊紅衛兵去上海，把串連到那裏煽動造反的紅衛兵叫回來。鄭中偉組織了一支八百人的著名的「第十六縱隊」到上海，受到上海市委熱烈歡迎和密切配合，最後動員近四千人回京㉙。其二，當1966年11月上海成立保守的「赤衛隊」，張春橋在上海處境困難時，江青和王力秘密接見聶元梓，叫她帶領紅衛兵南下增援，她到上海後，由張春橋安排接待，聶則大肆鼓動當地群眾造上海市委的反。

在東北，黨政軍各方勢力介入文革，在群眾組織背後起支配作用最為突出。這是因為，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與西南、西北的書記不同，直到1968年初還未被打倒，他在運動中一直活躍，而在1967年2月份鎮壓造反派的陳錫聯也未像其他軍區司令員那樣被中央否定，瀋陽軍區始終掌握住一派群眾組織而左右運動的形勢。現在來看看遼寧省的情況。1966年夏天，為了對抗遼寧大學「八．三一」等學生的造反，瀋陽市委就派幹部去找過保守的「紅衛兵瀋陽大專院校總部」、「中學紅衛兵總部」、「紅後代總部」等。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陶鑄、周恩來分別於1966年11月和12月接見「遼大八．三一」等，支持他們造反。1967年1月中旬，周恩來指示東北局、遼寧省委、瀋陽軍區，要他們支持造反派接管報紙、電台、公安局。2月16日造反派成立奪權的「大聯委」，瀋陽、遼寧軍區支持，並派人在該組織任常委。宋任窮在成立大會上講話，東北局候補書記喻屏也任常委，而該組織負責人在省委大院內辦公。「二月逆流」時，宋任

窮等東北局領導人支持瀋陽、遼寧軍區鎮壓造反派中最激進的一些組織。在全國反擊「二月逆流」的形勢下，宋任窮等東北局負責人發表「三點聲明」，指責軍區鎮壓造反派，瀋陽軍區對此作出強烈反擊，他們物色一批歸順了造反派「遼聯」中的原保守派成立「遼革站」，以更加激進造反的面目出現，堅決打倒宋任窮。當遼革站與「遼大八．三一」等衝突時，軍區向它提供槍枝彈藥。宋任窮1968年3月倒台時，曾在一份檢討書中交代東北局對造反派使用的策略：「迫於形勢所趨，感到單純用壓制的辦法不行了，即由壓制改為利用，在利用中有拉有打。」㉚

事情並不總是自上而下的操縱，很多情況下是紅衛兵組織竭力去尋找靠山，或者設法得到內部指示。許多紅衛兵大頭目都有這樣的經驗：本派組織要想取勝，除了自己的實力和鬥爭策略，找到一個硬靠山往往更為關鍵，群眾組織的鬥爭要想取勝，常常不取決於自身的力量和行動，而是比誰的靠山更強大。為說明這點，可舉一個例子。1967年年初，毛號召造反派組織從原來的黨政官僚手中奪權，但何時奪，怎樣奪，沒有詳細說明。廣州的造反派在奪權問題上發生意見分歧，以「中大紅旗」為首的紅衛兵主張立即奪權，而另一紅衛兵組織「三司」則反對，理由是時機尚未成熟，因此造反派未能實現大聯合。在決斷不下時，「中大紅旗」頭頭令其駐京聯絡站人員與中央文革取得聯繫，當回電說林傑明確表示支持奪權時，「中大紅旗」立即作出了決定並採取行動。

文革中，上情下達的方式和途徑有兩種。一方面，有「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社論，中央首長、各地黨政軍負責人講話，另一種是秘密下達指示。人們往往容易看到前一種，而看不到後一種，實際上，後一種可能更重要、更具實質性。比如，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張春橋在中南海單獨召見蒯大

富，授意他公開提出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蒯領受任務後，馬上率領清華「井岡山兵團」五千餘人在北京市中心遊行示威，大肆宣傳打倒劉、鄧，此事震動全國。又如，1967年1月16日清華「井岡山」步中央黨校造反派後塵，貼出打倒康生的大字報，江青馬上叫蒯大富扭轉方向，去搞薄一波、王光美、王任重的問題，康生於同日，並在20日與王力、關鋒一道對蒯作同樣指示，由於蒯沒有馬上改弦更張，中央文革小組長陳伯達於1月22日對他下達了電話指示，江青於2月初繼續對蒯施加壓力。當蒯大富於2月15日作檢查時，他說：「對中央文革的指示就得百分之百、不折不扣地執行，思想通了要執行，思相不通也要執行，不能有絲毫的抵觸情緒，不得持有任何保留……」

官方人士對群眾組織的表態和示意，並不總是採用秘密談話的方式。文革中政治局勢有時波譎雲詭、變化莫測，露骨的談話可能落下把柄，若以間接方式做出暗示，則可收進退餘裕之利，我們可以看看下列例子。

1967年夏季，四川地區「紅成」和「八．二六」之間的鬥爭，得到來自北京的一種十分微妙的表態。在此之前，兩派組織模仿文革前的大型革命歷史舞蹈劇「東方紅」，各自按自己的觀點編排上演了反映四川文革歷程的節目，「紅成」的舞蹈劇叫「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簡稱「萬歲」)，「八．二六」的叫「四川很有希望」(簡稱「希望」)。在兩派鬥得不可開交，一般人急待中央表態而遲遲不可得之際，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了「希望」劇的選段。這在全四川引起了廣泛注意，「八．二六」派認為這是中央支持自己一方的表示，「紅成」則宣稱這是一個偶然事件，沒有政治含意。但過了不久，中央台又播了一次「希望」選段，卻始終沒有播送過「萬歲」。許多人由此猜測到了中央的態度，事後證明這種推斷是正確的。

再舉一個例子。在1967年年中，廣西兩派「四．二二」和「聯指」鬥爭激烈之際，新華社播發了兩條消息，一條題為「六九五五部隊幫助廣西師院軍訓好得很，堅決支持熱情幫助革命左派桂林『老多』」，另一條題為「我們的團長——記軍訓團長張體成幫助廣西師範學院革命師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這兩篇通訊在表面的老生常談中暗含了兩項重要信息：第一，與廣西地方軍區的態度相反，屬於中央的野戰軍支持「四．二二」派；第二，與廣西當權人物韋國清的立場相反，中央認為「四．二二」是左派。難怪「聯指」的人對新華社提出抗議，並打了新華社廣西分社的工作人員。我們知道，當時新華社是受控於中央文革小組的。

就全國範圍而言，許多紅衛兵組織的後台是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或者是以林彪為首的軍方，周恩來的幕後作用要隱蔽得多。正如李鴻永所說㉛：

> 文革小組和軍隊竭盡全力擴展或保全他們自己一派群眾組織的力量，因為依附於他們的群眾組織的力量對於他們在高層的權力地位至關重要。反過來說，群眾組織的興衰從根本上說取決於他們的支使者在中央領導中相對的權力地位，以及支使者在使問題的解決有利於追隨者時的成敗。因此，當紅衛兵組織逐步向各自的支使者施加壓力時，紅衛兵之間的衝突隨時會轉化成上層集團的衝突，增加文革小組和軍隊之間的緊張關係。

李鴻永的觀察十分正確，可以補充的是，文革小組與林彪軍事集團的鬥爭，最後以後者覆亡而前者獲得大勝結束，這當然也是周恩來與文革小組結盟的結果。然而，在最終勝負之前，兩個集團既有鬥爭，又有妥協，而紅衛兵則成了每一次妥協和交易的犧牲者。下面舉兩個例子。

1967年4月中旬，上海爆發了第二次炮打張春橋活動。在此之

前，同年1月底的「炮司」(「紅衛兵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和復旦大學紅衛兵組織「孫悟空戰鬥隊」發起第一次炮打張春橋活動。第一次炮打由於中央文革迅速、堅決地表態支持張春橋而失敗。為甚麼很快能形成第二次炮打呢？因為這次攻勢的發起者中有軍隊系統的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紅衛兵，人們聽說此次炮打有軍隊作後台，而且攻擊張春橋的材料也是軍隊提供的(在上海和華東，張春橋和軍隊的矛盾早已不是秘密)，因此有膽量在張春橋這個太歲頭上動土。在張春橋一夥人商議對策時，他的走卒王少庸說：「別的都好辦，就是有穿軍裝的刷『炮打』大標語很麻煩。」張問是哪裏的，王答：「估計是二軍大的，是國防科委系統『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張知此情況後深感憂慮，他只有向北京的江青求助。江青立即去找葉群，葉群又去找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林彪手下幾員大將，由他們向駐滬和駐華東陸海空三軍領導表態保張春橋。經過這一番幕後交易，炮打張春橋活動戛然而止，二軍醫大等學校的紅衛兵被自己的支使者出賣，被張春橋整得死去活來也無人過問。

大多數文革的觀察者、研究者，甚至大多數紅衛兵，都不易發現紅衛兵組織與其他各種幕後勢力的關係，因為政治交易多在隱蔽處進行。實際上，紅衛兵行為的自發性往往是表面的，自始至終都有人企圖插手、控制、操縱。由於經驗和力量有限，紅衛兵運動被操縱的成分很大，儘管往往在開始是自發的。

六　文革是一場社會衝突嗎？

在上一節，我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即紅衛兵在文革中的行動並不完全是自發的和自主的，各種紅衛兵組織都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

利益與某些官方政治勢力相聯繫。現在，我要進一步考察這個問題，因為有一些文革的研究者強烈地主張應對文革作另一種理解，他們的觀點稱為「社會衝突説」，明確使用這個術語的是陳佩華和楊小凱(又名楊曦光)。

楊曦光是這麼説的：文革史研究者一般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的理論框架有三種，一是「權力鬥爭説」，用中央上層政治人物爭奪權力的鬥爭為主線分析文革，一種是中共官方的「路線鬥爭説」，以中共最高層的「兩條路線」或「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來解釋文革，文革時毛派的官方採用此説，文革後鄧派的官方也採用此説，只不過正確與錯誤調換了位置。再一種就是「社會衝突説」㉜。

力主社會衝突説的陳佩華和楊曦光並沒有確切闡明這個理論的內容，但從他們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出這個學説大致包含的主張。它反對另外兩種説法，認為文革不僅是上層的權力之爭，而且是中國社會中不同利益集團的鬥爭；文革中捲入鬥爭的紅衛兵及各種群眾並不是中共領導人從事政治鬥爭的工具，他們有獨立意識，利用文革的機會追求自身利益；文革中造反派的利益表現在反對官僚特權階層，保守派維護現存體制，即是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雙方的社會衝突構成文革的主要內容。

在我看來，社會衝突論至少具有以下明顯優點。第一，它打破了官方關於文革的神話，力求探索文革的真相。那種神話，不論是文革時由毛的文革派製造，還是文革後由獲勝的反文革派製造，都是單純為政治服務的意識形態；第二，它力圖對文革中紅衛兵和其他群眾的行為給予説明，它正視群眾分裂為不同派別這一事實，它把投身於運動的群眾當成具有各自利益的主體，這便於説明文革中億萬人的熱情、相互鬥爭，以及他們的思想隨着文革發展而產生的變化，因而文革產生了其發動者始料不及的後果，等等；第三，它

力圖揭示文革爆發前中國的社會狀況和社會結構，這對於理解文革中乃至今天中國的許多重大社會問題，都是至關重要的。

儘管這種理論有種種長處，但我認為它對文革的說明仍有許多錯誤和不精確之處，下面作一簡明分析。

陳佩華斷定說：「66年至69年文革是反官僚運動。」㉝這似乎是社會衝突論的主旨。我認為，雖然提出這個命題觸及了評價文革的核心，但結論卻遠不能如此肯定。

文革中的一些事件雖然不是在明確的反官僚體制的口號下進行，但我們確實有理由將其內涵分析為具有反官僚性質，比如反對工作組把學生打成「右派」或「反革命」，要求平反和銷毀黑材料，在1967年春季抗拒和反擊軍區對群眾的鎮壓。但也有大量的活動顯然與反官僚無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造反派內部長期的派性鬥爭和武鬥。不論是陳佩華、楊小凱，還是李鴻永等人，都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鬥爭視為反對和維護現行官僚體制的鬥爭，但文革的一個基本事實是，當各地造反派在以毛為首的文革派的支持下打垮保守派之後，造反派內部的鬥爭比以前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鬥爭更長期、更複雜、更激烈，而上述論者都沒有看到這一點，本書已在第三章對此作了詳盡論證。

社會衝突論者完全正確地看到，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在毛的發動和支持下反官僚的，這就需要對群眾的反官僚的性質作仔細分析。文革中最持久、最普遍、最帶特徵性的事件是群眾起來批判鬥爭以前的官僚，但決不要忘記，他們批鬥當權派的理由主要是他們「反對毛澤東思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和「搞修正主義」，至於官僚搞特權、欺壓群眾，那只是次要的理由。認識到毛實際上是官僚體制的締造者和最大代表的人更是寥若晨星。在當時，恐怕沒有人能認識到，如果毛發動的文革取得勝利，官僚體制將比以前不合理和殘忍若干倍。

遇羅克可能是看出其中問題的絕無僅有的先知先覺，1966年8月底他所在的工廠鬥爭一個姓宋的當權派，他回家後在日記中寫道，他痛恨這個幹部平時養尊處優，以空頭政治來刁難人，謀取一已私利，但他認為群眾加給宋的罪名十分荒唐，他們說，宋不讓他們學《毛選》，不接受印刷《毛選》的機器。過了十多年王希哲以此為例子總結說㉞：

群眾批鬥幹部，是因為幹部的官僚化與群眾發生了衝突，但這種官僚化並不完全是幹部個人的作風，它正是在毛澤東專制主義體制下人民不能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必然結果。但是人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給幹部羅列的「罪狀」首要的卻恰恰是，因為幹部們反對了毛澤東(這真是冤枉！)。這說明1966年下半年，人民群眾反官僚主義的利益還從屬於毛澤東發展專制主義的利益，人民群眾本能的反官僚制度的要求卻被毛澤東披上了為國家更加專制獨裁而戰的戰袍。「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的口號是林彪提出來的，誰高喊了它呢？是人民，但這根棍子最後把誰打痛了呢？還是人民！

應該承認，說文革中造反派的行為動機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這是正確的，但這種行為的效果卻有兩個相反的方面：它在衝擊大大小小官僚的同時加強和鞏固了頭號官僚的地位。套用一句俗話說，造反派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比古代造反者不如的是，現代造反派不僅極易招安，他們本身就是「無限忠於」的御林軍，他們的造反不但是皇上恩准的，而且根本就是皇上挑動起來的！

陳佩華還說：「文革剛開始時，造反派被從壓迫中解放自己的號召所發動。如果他們在頭一年被中央文革小組操縱，那麼他們馬上發展成為有自己政治計劃的獨立力量。」㉟楊小凱也一直在多篇文章中把文革中的群眾組織稱為「準政黨」，說它們是毛玩「自由結社牌」的產物。我認為，這種說法大大誇大了文革中群眾組織的自

發性和獨立性。據我自己的經驗和採訪，文革中群眾組織從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日程安排，他們最重要的自我標榜就是「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沒有一個派別有異端的政治綱領，除非是極個別被嚴厲鎮壓的「反革命組織」。毛支持群眾成立組織，是在中共「群眾路線」的意識形態框架內施行的權宜之計，在這裏使用「結社自由」是誤導人的。我採訪的大多數前造反派骨幹都把文革稱為「授權革命」，即毛叫幹就幹，毛不准幹就幹不成。在文革中，紅衛兵有高呼「打倒劉少奇」或「打倒賀龍」的自由，這決不是一種「言論自由」或「準言論自由」，因為這不過是表達了最高當權者的意願而已。

在文革中，以毛為首的中共官方允許成立群眾組織，是基於以下原因，第一，他們需要和劉少奇等黨官僚作對的組織；第二，他們對於十七年來中共的社會控制能力和意識形態灌輸深具信心；第三，他們可以隨時取締任何組織。我們不要忘了，毛首先支持的紅衛兵是極端狂熱地忠於中共和毛本人的，他們是名副其實的當權者的「子弟兵」。我們也一定記得，文革中當局取締和壓鎮了許多組織，其中最大和最出名的是全國性造反組織、復員軍人組織，乃至在某一時刻不合毛派口味的保守組織，例如哈爾濱的「榮復軍」，北京的「聯動」，這些組織絕對沒有反共意圖，下場尚且如此，真正離經叛道的組織則遭到迅速的、毀滅性的打擊。我完全看不到文革中群眾組織的政治獨立性和「準政黨」性。

造反派是受毛的挑動和利用以反對毛的政敵，還是反對共產制度本身？楊小凱斷言：「文革中積極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對共產黨不滿的人」，「共產黨官僚十七年來幹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㊱，連與楊小凱商榷的侯一謙也認為，造反派運動是「對中共暴政的反抗」㊲。我個人的經驗和採訪結果與這種論點格格不入。首先，最早起來造反的人一般是所謂根正苗紅的人，出身不好、有歷史問題、被人認為有不滿情緒的人根本沒有資格造反，他們一動就

是「右派翻天」，「乘機搞階級報復」。其次，造反派組織雖然不像保守組織那樣搞血統論和堅持極端左傾的政治標準，但仍然用類似於文革前黨的標準看組織問題，不太願收留「有問題」的人或不滿份子，因為怕被對立組織抓辮子，被說成「組織不純」，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基本上是按當時的標準，如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是否黨、團員)推舉的。這樣的組織敢於在最高領袖號召之下向以前被奉若神明的中下級黨組織進攻，卻不會在本質上反對黨。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黨畢竟是由毛締造和領導的。

應該承認，造反派中除了許多人是受毛的號召造反之外，確有很多人懷有不滿情緒，但準確地說，他們是對當時現實中的種種現象不滿，而不是對共產黨不滿。楊小凱把紅衛兵的發起者，即1966年6、7月份成立被黨委打成非法組織的紅衛兵或紅旗小組的人，也算成對共產黨不滿的人，是大錯特錯了。事實上，他們之中大多數是高官的子女，他們對文革前政策不滿，是因為那些政策給他們的特權還不能讓他們滿意。比如，上大學畢竟要考試，他們之中成績太差者就不能太隨意，又如，入團、入黨、當接班人，還是要看表現，這使得某些學習好、政治積極的非特權子女也可能侵佔他們一兩個席位。他們的要求是一切只看家庭出身，因此，他們批判「重在表現」政策，將其說成是彭真推行的反黨復辟綱領。另外一些人確實因反抗政治迫害而造反，但迫害來自於本單位的黨委或工作組，他們相信毛主席、黨中央不但不會施行這種迫害，而且會支持他們反抗這種迫害，當毛和中央文革小組宣布對他們的迫害是「實行白色恐怖」，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他們對黨的信仰和熱愛更為堅定了。顯然，如楊小凱本人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他們對共產黨施行迫害本身並不反對，他們急於分辨的是，他們不應該被錯誤地當成迫害對象。也如楊小凱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樣，

他們並不認同在以前的諸如鎮反、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㊳，因此，完全談不上他們「清算共產黨官僚十七年來所幹的事」。

被楊小凱列為社會衝突論者的王紹光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個證明群眾組織自主性的論據，值得在這裏討論。他說：「在某個意義上，我們大概可以說，不是毛澤東掌握着文革的進程，恰恰相反，正是難以控制的文革推着毛澤東團團轉。」他的論據是，毛原先預定文革只搞三個月，結果搞了十年還未達到他的目的，這說明「不是他所發動的運動受制於他，而是他受制於他所發動的運動。他本人成了文革最大的犧牲品。」㊴我認為這種論證不能說明問題，第一，毛本來說文革只搞三個月很可能不是真話，因為，如果他一下子把他製造長期動亂的計劃端出來，全黨全國都不會贊成；第二，文革一再延期，基本上是上層權力鬥爭使然，並不證明毛受制於群眾。從中央文革小組前期清除陶鑄、王任重，中期清除王力、關鋒、戚本禹，以及「二月逆流」時兩派的抗爭，乃至清除「楊、余、傅」，文革中每一次使毛的戰略布署受阻或延期，全是由於來自於上層內部的原因，與群眾關係不大。至於與林彪的鬥爭，為打倒周恩來而掀起的「批林批孔」運動，以及反擊鄧小平的「右傾翻案」，則更為明顯。文革中，如果說毛有讓步的話，全都是對上層實力人物，而不是對群眾。對群眾，毛大體上做到了收放自如。

使毛稍感費力因而十分憤怒的，是他發出停止武鬥、實行兩派大聯合的號召實現得不順利。即使這件事也不能說明群眾組織的獨立性。武鬥停不下來，和毛本人「武裝左派」，軍隊各支一派打內戰有關。群眾組織公然不立即響應大聯合的號召，是他們更相信毛「在路線、原則問題上沒有調和餘地」的說法，既然毛斷定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人們就把大聯合當成毛違心的戰略退卻。造反派經過文革中政治鬥爭的反覆鍛鍊，變得自以為懂得在毛的公

開講話中的隱晦含義，而事實上有時證明他們是對的。比如，1968年初大張旗鼓地掀起了「團剿派性」的活動，號召造反派立即解散組織，實現聯合，《人民日報》轉載《文匯報》社論〈論派性的反動性〉，但到了4月份，《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又傳達毛的最新指示：「對派性要進行階級分析」，提出「我們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派性。」造反派據此堅信，這後面的話才是毛的真意，他們前一階段不聽話是對的。

沒有當過造反派頭目或理論家的人很難理解造反派在文革後期的某些行為。造反派早已習慣了毛的真實意圖與官方宣傳的不一致，他們認為自己已經諳熟毛的理論和戰略部署，與毛心心相印，他們按照毛的文革理論進行邏輯推演，得出自己的結論，不理會毛的停止與退卻，他們自以為在幹毛想幹又不便公開說出來的事，他們力圖比毛澤東更毛澤東！甚至當他們的綱領受到追查，行動遭到壓制時，他們還認為自己在為毛的退卻付出代價。武漢的「北、決、揚」從1968年底起鼓吹革委會是復舊的產物，號召造反派把文革堅持到底，發展到農村，發展到全世界，他們認為這是毛的本意。上海「中串會」的部分紅衛兵在1972年寫出〈一切為了九大〉，提出堅持打倒「走資派」的一系列觀點，他們因為這篇文章受到迫害，卻認為自己和毛共同遭到失敗，因為文革未能進行到底，他們堅信自己道出了毛不便言明的主張，其中受迫害最甚者以這樣的詩句表露自己的哀怨：「既有真經傳後人，何必棒打傳經人？」

這簡直是劉賓雁形容的「第二種忠誠」：為了領袖的最終信念而在表面拂逆領袖的意志，即使有犯錯誤、遭壓制的危險也再所不惜！

社會衝突論者常常說到造反派為是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為虛幻的毛的理想而戰鬥，那麼，他們的利益是甚麼呢？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了自己的利益呢？對這個問題顯然不能一概而論，捲入

文革的人中，幹部、工人和紅衛兵對於取得實利在思想和行為上差別極大。我想強調的是，用西方的標準和現在的眼光，很難想像當年造反派紅衛兵多麼缺乏自身利益的意識。以下例子應能充分說明問題。對於出身於非紅五類家庭的學生而言，爭取平等權利，消除因家庭出身而導致的歧視，無疑是最涉及利益的事情了。但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雖然遇羅克寫了極為雄辯和感人的〈出身論〉，但它從來沒有成為造反派紅衛兵的政治綱領，從未為此產生過有形的政治活動。這篇文章流傳全國，受到人們極大關注，許多人認為它講出了自己想講又不敢講，或者講不清楚的話。但內心擁護是一回事，在政治鬥爭中為之奮鬥又是另一回事！

在採訪著名大字報〈論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的兩位主要作者時，他們強調，批判此文的不但有保守的「東風」派，而且造反的「紅旗」派也同樣積極。要記住，這時已是1974年，人們的利益意識比1966年至1969年不知增加了多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遭到各派群眾批判之時，他們卻得到了在台上的趙紫陽和尚未解放的一大批幹部的同情和支持(這種支持有的是公開的，有的是隱蔽的)，因為此文在批判林彪體系時，批判了林彪集團對幹部的打擊和迫害，具體到廣東，就是黃永勝等軍人對於前文職官員的打擊排斥。

我在上面說了這麼多，並不是想否認造反派的動因中含有利益因素，我只想強調，他們的利益應作精確界定。文革時興起的各種群眾組織中，最明確、最大膽地追求集團利益的是老紅衛兵，他們明確提出「高幹子女要掌權！」造反派的前身——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和因家庭出身被歧視與虐待的學生確實在為自身利益而鬥爭，但這種利益與老紅衛兵的利益並不對稱，他們不過是爭取一種基本權利。他們不甘心被人當「狗崽子」對待，他們最多要求取得與別人平等的政治權利——當時造反的學生都認為這就是投入

運動以「保衛毛主席」的權力。在運動後期，雖然多數人對政治鬥爭已經厭倦，或者看清了自己被利用的事實，但除了極少數野心家，造反派的繼續鬥爭帶有被迫為之的性質，他們不抗爭就要被「秋後算賬」。就此而言，與其說他們追求的是某種集團利益，不如說他們的行為有一種防衛性質。

我堅信，至少就學生而言，造反派一般並無反中共的意圖，他們運動初期造反，多數是給工作組和校黨委逼出來的。不錯，他們給上級提了意見，而這不但是共產黨政策允許的(不是有「群眾路線」一說嗎？)，而且是最高領導號召的。他們爆發出驚人的反抗，決不是為了清算中共十七年的所作所為，而是為了捍衛官方意識形態中最冠冕堂皇的(他們暫時還不知道是虛偽的)那一部分，從而捍衛自己的生存權。據我的觀察，直到1989年學生搞民主運動，他們的行動也具有同樣性質。不錯，他們上街遊行，向國家最高領導人遞交請願書，但這難道不是憲法允許的嗎？黨不是既反復申明保證人民的民主，又號召青年關心政治嗎？和文革一樣，學生們的合法合理行動遭到粗暴壓制，也和上一次一樣，他們開始的反應是吃驚委屈，然後馬上看到，不抗爭就會被打成反革命。於是，既出於自保的動機，又出於平等和公正觀念，他們被逼上梁山。和上次一樣，只是在運動的進程中，特別是在最後受到殘暴的鎮壓後，他們才明確地產生了反對中共的意識。而在初期，恰恰是中共意識形態中那不能兑現而又被大肆宣揚的部分，成了他們的思想武器。

那麼，文革到底是上層鬥爭還是社會衝突呢？為了概括這兩個方面，有人提出了「兩個文革」這一概念。比如，李鴻永反對把文革僅僅看成上層權力爭奪，認為文革既包括上層分化，也包括群眾的分歧，還包括上下層之間的繁雜關係㊵。王希哲明確地持「兩個文革」的觀點，他一方面認為文革是堅持斯大林極權主義的毛澤東與

黨內較開明、理智的一派的鬥爭，另一方面又主張可以「從另一種意義上來理解文化大革命，把它理解為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把文革說成是中國社會矛盾尖銳化的產物㊶。楊小凱實際也持相同觀點：「在上層，這是一場以1959年後政策分歧為背景的權力鬥爭，而在下層，這是現體制的既得利益者組成的保守派與現體制的造反派的衝突。」㊷鄭義也在《歷史的一部分》一書中表達了這種見解。

王希哲對「人民的文革」的理解是，毛一開始「蒙蔽和煽動了一大批在國民經濟體系中沒有獨立利益的青年學生起來造反，發動了一場『紅衛兵』法西斯運動」，隨着運動的發展，人民認識到毛追求的目標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馳，終於否定和反抗毛的政策。嚴格說來，這和社會衝突論並不一致，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文革」論，因為人民的覺醒和抗爭是對毛那個文革的反應，二者不是平行關係，而是因果關係。我不同意王希哲關於青年學生無獨立利益的看法，我還承認文革中有極少數像遇羅克、楊曦光這樣的先知先覺者很早就看清了人民利益之所在、官僚利益是甚麼。儘管如此，我不願無保留地接受「兩個文革」的觀點。因為，對於絕大多數捲入文革運動的群眾(尤其是紅衛兵)而言，意識到自己的正當利益是在受了欺騙和利用之後，當他們醒悟時，已經沒有甚麼機會來從事「人民的文革」了。

註釋

①②㉛　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頁252；196-97；9。

③⑧　John Israel, “The Red Guard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Chinese Youth Move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0 (1967): 5; 2.

④⑳㉑ 趙淮海：〈一個老紅衛兵的回憶〉，《中國之春》，1985年11月號，頁81。

⑤ 見吳文光：《革命現場一九六六》(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頁48。

⑥ 王朔：《我是王朔》(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頁7。

⑦㉒ Livio Maitan, *Party, Army, and Masses in China* (London: NLB, 1976), 359; 361.

⑨ 載於《人民日報》，1966年8月22日。

⑩ 見于輝編著：《紅衛兵秘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頁3-5。

⑪ 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2), 169-71。

⑫ 比如，見阿妮達·陳(Anita Chan)著，史繼平等譯：《毛主席的孩子們》(天津：渤海灣出版公司，1988)，頁179。

⑬ 見「河南省省會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主辦小報：《紅衛兵》，1966年10月15日。

⑭ 同上，1967年3月12日。

⑮ Hong Yung Lee,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4 (1975): 680.

⑯ William Hinton,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45-55.

⑰ 見「西安交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委員會」主辦小報：《人民交大》，1966年11月12日。

⑱ 白霖：〈論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根源〉，《知識份子》，1986年春季號，頁3。

⑲ 譚天榮：〈教條主義及其產生的必然性〉，《民主中華》(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9)，頁2。

㉓ 凌巍：〈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代人〉，《知識份子》，1986年春季號，頁54。

㉔ 海外一些文革研究者認為造反派反抗的是中共政權，我不同意「造反=反共」的觀點，參見我的論文〈再說文革中的造反派——與華林山商榷〉，《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2月號。

㉕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1967年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㉖ Simon Leys,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 and New York: Allison and Busby Limited, 1981), 52-53.

㉗ 安文江：〈我不懺悔〉，載《千秋功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頁287-88。

㉘㉟ Anita Chen,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 no. 1 (1992): 70; 69.

㉙ 見鄭中偉的回憶：〈第一個紅衛兵袖章誕生始末〉，《春潮》，總第4期，頁6。

㉚ 吉林省「長春公社」主辦：《長春公社》報編輯部文章：「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1968年8月20日，第5版。

㉜㊷ 楊曦光：〈評《中國「文革」十年史》〉，《爭鳴》，1990年8月號，頁69；70。

㉝ 陳佩華：〈對文革「社會衝突論」的意見〉，《爭鳴》，1990年10月號，頁61。

㉞㊶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1981年2月號，頁36；49。

㊱ 楊小凱：〈六四省悟：反文革造反派翻案〉，《中國之春》，1990年8月號，頁42、43。

㊲ 侯一謙：〈造反派不能算獨立政治團體〉，《中國之春》，1990年第11月號，頁52。

㊳ 王路、楊小凱：〈大陸政治文化與持不同政見的非連續性〉，《民主中國》，1992年2月號，頁18-24。

㊴ 王紹光：〈群眾與文化大革命〉，載李少民編：《大陸知識份子論政治、社會、經濟》(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頁90、93-94。

㊵ Hong Yung Lee,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4 (December 1975): 646.

第五章
幻滅和覺醒

從總體上說，紅衛兵這一代人經歷了從盲目追隨毛澤東、狂熱地投身於文革到信念動搖、破滅，對文革持否定態度的過程。許多人在不同時間、因為不同事件觸發而導致思想轉變。一般而言，越是挨近文革發源地，思想轉變發生得越快。最早對文革進行反思和批判的，是那些捲入運動最深的人——開始是首都的老紅衛兵，接着是首都三司的大學生，他們最早、最密切地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打交道，對於文革的真正目的，以及政治鬥爭的無原則性和殘酷無情有切身體會。一般而言，大學生覺醒較早，他們的思想和言行影響了中學生。轉變的刺激因素不是單一的，而是因人而異，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有共同的原因，是一系列事變的綜合結果。

紅衛兵的思想轉變與在文革中持異端見解的其他人不同，這裏僅舉兩個例子來作為對照。一個是寫〈出身論〉的遇羅克，他在文革前兩次參加高考，雖然成績優異，但因家庭問題而落榜，他在農村、工廠和其他地方工作過，社會經驗相當豐富，理論修養也很高。1965年底他曾寫文章對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發表不同意見，當

時他還以為是在進行學術討論，但在1966年初就對文革的性質和目的看得比較清楚了。他在文革中從事宣傳活動一直躲在幕後，他寫〈出身論〉等文章在《中學文革報》上發表，但只有一兩個人知道作者是誰，他從不公開參與報紙工作，只在背後出謀劃策。看得出來，他一介入文革就是清醒的，他是借文革之機發表自己的政見①。另一個是劉鳳祥，此人原為《湖南日報》總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對中國政治和社會有極為透徹的認識，文革中經過仔細觀察和深謀遠慮，決定將翻案和改變中國現存政治制度的希望寄託在造反派身上，從而和一幫右派份子一道介入湖南的文革運動②。而紅衛兵一代人可以說是以忠於毛澤東和中共的心思投入文革，他們後來在政治上的異見正是文革中種種教訓的結果。對他們而言，達到後來程度不等的清醒認識有一個探索和思想轉變的過程。可以說，是文革造就了整整一代人和官方的意識形態分道揚鑣。

如果僅用「從擁護文革到否定文革」來形容這一代人的思想變化，那幾乎是一種無重要內涵的套話，因為中共中央在1981年也正式作出決議，否定文革。本書所說的紅衛兵一代人的思想變化，和中共官方對文革截然不同的評價無關。這裏所說的一代人對文革的否定，遠遠發生在中共官方（代表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資派」）的正式決議之前，是獨立自主地探索和思考的產物。因此，這種轉變，不可避免地具有背離中共傳統意識形態的後果。紅衛兵這一代人投身於文革是與他們文革前的政治信念和革命理想密切相關的，他們的否定，除了表明他們對於在文革中上當受騙的憎惡之外，也程度不等地損害了以前的革命世界觀。這種否定是作出巨大努力進行批判性探索的結果，因此被批判的不僅是文革，而且是以前盲從的習慣，這一代人因此養成了對於官方宣傳持警惕和不信任的態度。當然，在思想反叛的道路上走多遠，是因人而異的。有人的反思與總

結僅做到對剛發生的十年浩劫有一個勉強和粗淺的説明。有人從否定毛澤東的文革進到否定毛在1949年之後的主要政策，進而否定整個政治制度。有人從探索文革的起源發展到探索中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甚至把這種探索放到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背景中進行。有理由認為，這一代人的探索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產生巨大影響。

一　「聯動」的最先發難

最早起來與中央文革小組抗爭，明確反對文革中一些作法，甚至把文革運動歸結為左傾路線的，是首批造反的北京老紅衛兵。他們集合在「聯動」這面旗幟下，率先表現出抵制文革的思想和行動。

1966年10月之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在全國掀起，中央文革小組對老紅衛兵越來越疏遠、冷淡，以前受他們壓制和迫害的非紅五類學生形成造反派組織，對他們過去的行為進行清算。與此同時，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造反派開始攻擊、揪鬥各級幹級。昔日為所欲為鎮壓「狗崽子」的英雄好漢們，現在落到「黑幫子女」的地位。這一切使他們從狂熱地擁護文革變得迷惘和心懷不滿。

老紅衛兵的反抗以上層的抵制迹象為背景。面對文革派的步步進逼和造反派越來越猛烈的攻擊，身居高位的革命元老愈益難以容忍，當時較有發言權的是軍界人物，1966年11月13日，陳毅、賀龍、徐向前、葉劍英四位元帥、軍委副主席在軍事院校系統赴京串連師生大會上發表講話，旁敲側擊地對文革中種種作法表示異議。比如陳毅在講話中抱怨「現在搞校長處長不過癮，要搞部長，搞部長還不過癮，還要升級，要搞我們幾個副總理了！」他暗示

當時批判「資反路線」是「用工作組的辦法來對待工作組」、「用錯誤的辦法去糾正錯誤，這是錯上加錯，犯更大的錯誤。」葉劍英在講話中批評造反派「沒有階級感情」，指責他們在幹部犯病時還要去揪鬥。

失勢而又不甘心的老紅衛兵把四位老帥的講話當成一種反擊信號。11月27日，十多所中學的老兵齊集北大附中，商議成立新的統一組織。12月5日，「聯動」正式成立。「聯動」的最初活動是和以「三司」為代表的造反派對着幹，但也公開表示出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對抗。京工附中的鄒建平等人用幾十張紙刷成一條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聯動」的一大動作發生在12月26日，他們專門挑選這一天(毛澤東的生日)召開大會，本來的目的是在會上作自我批評，期望取得中央文革小組的諒解和重新支持，以圖重振旗鼓。他們本來已與戚本禹約好，戚許諾他和文革小組成員赴會，但會議中途才知道文革小組的人不會來了。被羞辱的感覺和對文革小組成員平時的積怨結合在一起，一下子爆發出來。有人在會上宣讀一份傳單，宣稱要「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幾天發表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講話」，「反對亂揪革命老前輩」。緊接着，有人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打倒戚本禹！炮轟江青！火燒謝富治！」等口號。

如果說，在12月5日「聯動」成立時發表的宣言只是表示了一種意向，他們的政治觀點還表達得不鮮明的話，那麼1967年元旦的一份文件就把他們的主張闡述得相當明確了。這份通告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幹子弟，國務院、人大常委會革幹子弟，中國人民解放軍帥、將、校革幹子弟，中共中央軍委、國防部革幹子弟，十六省市委部分革幹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名義發布。其中說到關於「聯動」的任務是「堅決、徹底、全面、乾淨地粉碎中共中

央委員會二個主席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這句話意義甚為含混，但宣言在後面聲稱：「忠於馬列主義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說明「聯動」已經從根本上否定毛發動的文革了。宣言還把「堅決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產生的各種反動組織」和「保衛黨的各級組織和優秀、忠實、英勇的領導幹部」作為「聯動」的任務。

在這之後，「聯動」向中央文革小組進行了大膽的抗爭，他們的成員被公安部抓捕，就聚眾衝擊公安部，要救出自己的戰友。在絕望中，他們喊出了「劉少奇萬歲」、「打倒江青」等口號。在2月初，《紅旗》雜誌1967年第3期社論明確宣布「聯動」為反動組織，聲稱要對之進行法律制裁。他們之中更多的人被抓，不少人從北京逃到外地，和各省高幹子女結合在一起，進行反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抓捕「聯動」成員引起了中共上層黨政軍官員的抗議和憤怒，毛親自下令釋放他們。1967年4月22日，被捕的中學生由監獄用車拉到人民大會堂，在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接見之後，全部釋放。

「聯動」的活動仍在繼續，1967年6月17日，一批前「聯動」成員又在京成立了一個叫做「首都紅衛兵共產主義小組」的組織，在他們的宣言中，反對文革的觀點更加明確、堅定了。宣言說：「一年來的文化大革命發展證明，文化大革命完全違背了反修防修的初衷，正在演變成迫害共產黨人，迫害工人、貧下中農和革命知識份子的大清洗運動，實在為親者痛，仇者快。」「共和國的元帥們、副總理們、部長們及各省市的黨政負責人，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被抄家，被批鬥，有的甚至奪走了寶貴的生命。」武漢的「七．二〇」事件曾使「聯動」十分振奮，他們看到大軍區司令部和成百萬的保守派起來以武力對抗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組織，感到大局有望。但「七．二〇」事件以文革派的勝利告終，「聯動」從此消聲匿迹。

值得專門一提的是，當「聯動」對文革派發動進攻時，江青成了突出的目標。她的個性、風度、生活經歷，以及她對自己特殊身分的濫用，很容易使人產生反感。與江青有較多接觸之後，紅衛兵發現她是個沒有自制力、任性、喜怒無常的人。她太愛在大庭廣眾之中表演，突出自己，但過火和失誤之處甚多。她和紅衛兵打交道時，竭力突出自己的特殊地位：她是毛澤東的個人代表，直接傳達毛的指示。老紅衛兵在開始時稱她為「江阿姨」，以示關係之親昵。當老兵和中央文革小組關係惡化時，江青講話、訓人十分凶狠，老紅衛兵也就把攻擊的火力集中到她身上。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女人是最容易遭到攻擊的，尤其是不知收斂，喜歡拋頭露面、大出風頭的女人。而且，老紅衛兵們認為事情壞就壞在她蒙蔽了毛主席。

老紅衛兵對江青的攻擊方式主要是傳播關於她的「不光彩歷史」的流言蜚語。信息顯然來自其父母，評價標準是典型中國式的。在中國傳統中，像江青這種早年當過「戲子」，多次嫁人，有過浪漫經歷的女人，是「禍水」，是要被詛咒的。在中國歷史上，女人經常被說成是皇帝昏庸、政治腐敗的原因，如商朝妲己、唐朝楊玉環等廣為流傳的故事。事實上當然不是女人誤國，只不過文臣武將不敢公然指責天子，女人才當了替罪羊。文革的情況和中國歷史上的朝廷故事並無兩樣：那些元勳重臣，即「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多只是私下裏對毛澤東議論或抱怨一陣，並不敢公開地在政治上加以批評，而把對毛的一切不滿都加諸江青。在老紅衛兵當中，流傳着甚麼「毛主席晚年糊塗了，對江青偏聽偏信」，「母雞司晨天下必亂」等說法，似乎中央文革小組與歷史上的「后黨」或「宦黨」是一回事。

下層百姓比較容易認同上層圈子對於江青等人的攻擊，他們的

標準也是傳統的。在一般人看來，那些被稱為「走資派」而被打倒或靠邊站的部長、將軍都是以前馳騁疆場、出生入死的開國功臣，而江青不過是戲子，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不過是舞文弄墨的文人。他們很容易把當前形勢和歷史作類比：開國之君平定天下後，要貶謫甚至除掉那些勇將能臣，以確保自己的皇位。

對江青反感的尚不止於老紅衛兵。在我採訪的眾多對象中，對文革派的最早疑惑都是由江青引發的。1966年7月25日，江青和康生參加了北大的辯論會並作了發言。江青的講話本來很有鼓動性，她又口口聲聲代表毛澤東，因此受到學生熱烈歡迎。但她中途突然話鋒一轉，由國事、公事而大談其家事、私事，她痛罵北大一個叫張少華的學生，說她是個騙子，用欺騙手段和毛澤東那個得了神經分裂症的兒子毛岸青結了婚，到處以毛主席兒媳的身分招搖撞騙，同時還大罵張少華的母親張文秋。她講得大動感情、聲淚俱下，但聽眾卻感到愕然，他們的政治熱情和這種家長里短的是非恩怨協調不起來。這件事無疑使江青的形象大為受損，而聽眾中個別有頭腦的人根據此事推論，江青與其政敵的鬥爭也不過和她剛才抖落出來的家庭糾紛一樣，並無是非可言。

當江青的威望和魅力急劇下降時，中央文革小組「尊重群眾，愛護群眾」的假面目也被許多人識破了。文革派在批「走資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以貫徹群眾路線自我標榜。一些學生，尤其是政治上失勢的保守派，用群眾路線的標準來衡量，認為文革小組的作法與工作組並無二致。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八一縱隊」連續四次貼了質問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字報，指責他們支持一派壓制一派，使群眾之間隔閡加深，對立情緒日益嚴重，造成了「全國性的群眾鬥群眾的局面」。北京林學院紅衛兵戰鬥兵團「一二．九」戰鬥隊和「永向黨」戰鬥隊貼出大字報：〈看！中央文革小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中執行了一條甚麼路線？〉說他們與舊工作組一樣，給群眾定調子、劃框框，束縛群眾手腳，在群眾中製造分裂，以新的形式執行資反路線。清華大學紅衛兵「雪蓮」印出傳單「用毛澤東思想檢驗一切」，指名道姓地批判江青和陳伯達。在1966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之間，北京各校掀起了一股反中央文革的浪潮。

早期的抗爭沒有影響文革的進程，「聯動」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首先，人們對他們在運動初期的迫害行徑記憶猶新，他們得不到廣大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人們把他們的抗爭當成在中央文革小組那裏失寵之後的洩憤。這是有一定根據的，比如「聯動」骨幹之一的「一〇一中學紅衛兵」寫了這麼一幅對聯：「想當初小將可愛造反有理，看如今血統高貴甚麼東西」，橫批「一落千丈」，署名「想不通」。「聯動」成員寫的詩中還有這樣的話：「昔日美夢不重返，只因『三司』受寵愛。」其次，他們始終不改血統論的謬見，形成極度排外的小圈子。在1967年元旦的通告中，他們的組織路線是按以下方式發展成員：「(1) 第一階段由中共中央、國務院、解放軍、省市委幹部子弟組成；(2) 第二階段由基層組織(地委專署與公社)幹部子弟組成；(3) 第三階段吸收全國工農兵和出身他種家庭而政治表現好的。」在「首都紅衛兵共產主義小組」的宣言中，他們也是說「我們革命幹部子弟——獻身於革命事業的少年共產黨人，發誓要承擔起挽救黨和國家的神聖責任。」在他們與中央文革小組抗爭時，還重新貼出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絕對如此」。他們反對文革中的迫害行為，但只針對造反派對高級幹部的衝擊，對普通老百姓的迫害，對「牛鬼蛇神」的專政，在他們看來是理所當然的。因此，他們的鬥爭雖然勇敢無畏，但人們並不認為他們在為全民而戰，不過是「保爹保媽派」而已。當然，他們失敗的另一原因是對文革的反抗太早，人們十七年來受當權派的壓制，那時剛開始敢

於表示反抗，還看不清文革派實際上在利用他們。「聯動」的抗爭只是一陣大膽的喧囂，很快就消失了。當文革運動不斷發展，人們吃盡了社會動亂的苦頭，而且造反派也像老紅衛兵一樣被利用之後又被拋棄時，對文革和文革派反感的情緒才在中國人民中廣泛產生。到1976年4月，終於爆發了全民一致的對文革的反抗。

二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中國的青年學生是在一種雖然狂熱、但同時也是純潔的革命理想和意識形態中成長的，文革迅速地從開初的意識形態喧囂變成權力鬥爭，學生們突然接觸到大量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之事，對他們革命的人生觀是一個極大的動搖和衝擊。

文革中各種大字報和傳單對於「走資派」的生活作出了大量、詳盡的揭發，紅衛兵們簡直想不到，在這個充斥着各種革命口號的社會中，在反覆強調艱苦樸素的時代，還有人享受着驚人的特權，過着腐朽靡爛的生活，而這些人正是他們以前的導師和指路人。文革前，黨和政府領導人的形像十分高大和光輝，他們被說成是公而忘私、心懷革命、關心群眾、生活簡樸的聖徒。大字報的揭發使學生大吃一驚，他們想像不出，那些「老革命」、「人民的公僕」原來在動人的革命詞藻掩蓋下過的是另一種生活！一方面，宣傳和實際情況反差太大，另一方面，虔誠的人們心理上毫無調節和適應能力，這是對原有信仰的一種沉重打擊。

原西南地區最高負責人L是文革中遭揭發批判較多的人。據大字報和各種材料說，他一家人就佔有三處住房，一處是原四川大軍閥田頌堯的住處，花了很多錢裝修，L平時不住，也不讓另外的人

住。修省委書記樓時，給他蓋了一幢造價最高的樓房，但他只用來打撲克和開會，再有一幢是供他住的。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國處於困難時期，但政府用了一百二十萬元給他修一個室內游泳池，冬天搞溫水游泳，一次就得燒十多噸煤，耗費幾萬元。他為了給中央領導人進貢，命令當地供銷社和煙廠製造特別的雪茄，因為收不回成本，又由他妻子(省輕工業廳廳長)出面，由副省長批准在輕工業廳的預算中拿出數萬元來彌補。在50年代末，他大搞浮誇，虛報成績，在四川廣大農村幾乎家家挨餓的情況下，反而將川糧外調，支援別省，以求自己升官晉級，造成四川餓死近百萬人(四川省委後來給中央的報告中承認餓死十五萬人)。他在1959年開完廬山會議之後回川傳達，故意不談中央對彭德懷的批判和結論，只出示彭給毛的信，引誘許多幹部發言支持彭的意見，然後亮出中央的結論，將一大批幹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不管上述揭發的可靠性如何，L在四川人民心目中是聲譽掃地了。

湖北一個造反派頭頭在採訪時告訴我，他在文革中認識了一批北京醫學院的紅衛兵，他們運動初期十分活躍、積極，但很快就退出運動，到全國遊山玩水。因為他們看到了一些中央最高級幹部的醫學檔案，從中知道他們生活多糜爛，性關係多混亂。他們被這種「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的虛偽作風所苦惱，再也鼓不起幹勁繼續搞「革命」。他們所了解的情況影響了不少人的態度和情緒。在中國，個人私生活和政治形象關係最為密切，文革前各級領導人在群眾面前個個道貌岸然，文革中的揭發在這方面最觸目驚心。這種揭發十分普遍，比如，來自各地高幹療養院的大字報說，有關部門專挑個子高、漂亮的護士在療養院為高幹服務，她們往往成為洩欲對象，這些受害者不但無處伸冤，甚至不能聲張。更有甚者，有些達官貴人的妻子得知丈夫在外邊的風流勾當後，生怕自己

被拋棄，她們不敢責怪丈夫，就跑到療養院去大吵大鬧，罵那些受害者是「小妖精」，「拖首長下水」，要求嚴懲。有的受害人本已羞憤難當，現在又有口難辯，只好以自殺來逃避。在中央有的機關內，群眾把高級幹部動用國家十分稀缺的外匯從國外購買的春藥陳列出來，引起參觀者咒罵。當時，人們對高幹的性生活異常關注，這怪不得群眾，因為官方一直提倡一種嚴酷的清教主義，各級領導動輒就以「男女問題」為由整治他們不喜歡的人。文革中群眾過份的關心和追究，不過是使他們嚐到了自己的宣傳和兩面派作法的苦果而已。

紅衛兵這一代學生只是在文革才生平第一次真正接觸政治鬥爭。在以前，由於正面政治教育，他們從不懷疑黨的領導人的言行是光明磊落的，他們認為政治鬥爭毫無疑問是是非分明、高度原則性的。但實際上，文革給他們展示了政治鬥爭的骯髒和陰暗，這種事實是難於接受的。紅衛兵的主要發起者之一卜大華回憶說：「我們的特殊地位也使我們多多少少接觸到了黨內一些不正常東西……一次是66年8月6日，在天橋劇場，江青把幾個有名的紅衛兵叫到一起，神神秘秘的，像哄小孩似說：『我跟你們說呀，中央內部也不一致，我們站在前台支持你們，可是有人背後捅刀子，有人謊報軍情……』，我心裏很別扭，覺得有一種陰暗的東西讓人不痛快。」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許多成員打過一些交道之後，卜大華的感覺是，「我覺得很不正常，這不是我心目中的黨。」③

在文革中，只有極少數紅衛兵頭頭從上層人物那裏學到以冷酷無情、實用主義的態度來搞政治。據當時的許多大字報說，文革派人物如王力、林傑等有時對紅衛兵講話時道出了政治鬥爭的真諦，如「政治鬥爭無誠實可言」，「要引誘對方犯錯誤」，「自己犯了錯誤要矢口否認」，等等。少數人如獲至寶似地聽取這些教導，而大多

數誠實的人則惶惑、反感，他們對自己鬥爭的價值和意義產生了懷疑，許多人有感於政治鬥爭的不可捉摸和可怕而退出運動。

1967年1月，上海發生炮打張春橋事件，中央文革迅速去電，嚴加警告和斥責。「紅三司」頭頭安文江對電文心有疑惑，認為中央文革小組不會以那種方式和口氣對待革命小將，他趕到北京，想核實電報真偽並伺機告狀。蒯大富的一席話使他茅塞頓開：「歷史要為現實服務。上海能亂嗎？張春橋能倒嗎？」他終於明白了，「上海已成奪權樣板，張春橋是『一月風暴』大功臣。現實需要他，他就倒不了！這就叫『一切從革命利益出發』！」認識到文革奉行的原則不過是政治上的實用主義，使他「心一冷，腦殼也降溫，這是『自我回歸』的開始。」後來，他進一步認識到，「從反右到『四清』直至『文革』，有多少實事求是？有哪一次沒有輿論一律、味道濃烈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④

江西一位曾經狂熱地投入文革的紅衛兵李九蓮在寫給戰友的一封信中說：「我不明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甚麼性質的鬥爭，是宗派鬥爭還是階級鬥爭？我有時感到中央的鬥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生反感。我認為劉少奇好像有很多觀點是符合客觀實際，是符合馬列主義的，又覺得對劉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感到對劉少奇的批判是牽強附會。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現象，很多『正確的觀點』，和運動初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差不多，本質一樣，提法不同而已。」⑤

在文革中，毛及其追隨者一心只想打倒各級不忠於他的當權者，為達此目的，他們無所不用其極。這種做法的結果是，受到損害的不僅是被打擊的「走資派」，而且是黨的威信。當劉少奇被宣布為「叛徒、內奸、工賊」時，人們自然會問，難道劉不是毛多年來的親密戰友嗎？難道不正是劉的倡議，才使「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正

式載入黨章的嗎？在《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中，本來有毛以讚許口氣引證的劉少奇講話，文革開始後不久刪去了這些話，這種手法只是顯得不誠實和可笑，難道歷史事實是可以刪改的麼？張旭成說：「文革中對黨的高級領導人漫無邊際的指控損害了黨的形象，這看來是幾乎無法修復的。號召造反和奪權的效果是，不僅年輕人，而且大多數人蔑視權威，包括新建的革委會，甚至中央領導的權威。」⑥

對紅衛兵的政治信念打擊最厲害、促使他們重新思考文革的最有力因素，是他們自身在文革後期的遭遇。還在1967年夏天，毛就發了話：「現在輪到小將犯錯誤了。」(當時紅衛兵知道毛的說法就是如此，後來在報刊上發表時，成了「現在是小將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了。」) 許多紅衛兵馬上意識到，這是毛要紅衛兵退下政治舞台的信號，但毛不想把他們請下去，而是以他們犯了錯誤為口實把他們趕下去。紅衛兵的氣餒和不滿是廣泛的。道理很簡單，政治上的正確與錯誤不可能是季節性的，今天你犯錯誤，明天輪到我犯錯誤。但在毛的政治日程表上，事實就是如此。為了政治需要，毛說工作組犯了錯誤，不管他們到底做了些甚麼，得到多少人的擁護。後來輪到保守派犯錯誤，當造反派紅衛兵在毛的政治棋盤上不再有用時，就輪到他們犯錯誤了。他們清楚地記得，在不久前，毛和文革派還把他們捧上了天，說他們覺悟最高，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理解最深，是革命先鋒；還告誡工農群眾不得反對他們，干涉他們的活動。而到了運動後期，事情正好反過來，說他們搞派性（不是「堅持和捍衛革命路線」了），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在作怪，要「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讓工人和軍人開進學校，把他們管得服服貼貼的。這不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又是甚麼？

許多紅衛兵明確意識到，自己當了炮灰，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

品。他們以前意氣風發、威風凜凜，現在除了意識到被欺騙利用因而極度沮喪之外，自身地位還岌岌可危。因為曾經為毛澤東和文革派衝鋒陷陣，立過大功的人，是不可能勸其退下舞台的，只能製造罪名，一巴掌打下去。

那些昔日對校黨委、工作組不依不饒、堅決鬥爭的造反派，現在再也不能對抗工宣隊和軍宣隊了，雖然他們對學生和教師的壓制打擊比以前的工作組厲害得多。但這一次，鎮壓群眾就不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因為毛公然宣布，後台就是他，而且說，誰要反抗，就派軍隊消滅！到了這個地步，紅衛兵不能不重新思考：甚麼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甚麼是文化大革命？

如果以為可以單方面地愚弄人而不付出代價，那未免太一廂情願了。毛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利用青少年的純潔理想，驅使他們向自己的政敵進攻，將他們玩弄於股掌之中。但是，人們不是天生的傻子，不會永遠受騙。當毛在現實政治中得手之時，他的威望遭到了無法修復的損害，紅衛兵的理想和熱情轉化為對他和他締造的黨、政治制度的懷疑。這可用毛愛用的話來形容：「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三　上山下鄉

對於人數眾多的中學紅衛兵來說，上山下鄉運動是使他們對文革、甚至對當時的社會、政治體制反感的重大原因。1968年12月，報紙上發表了毛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毛很輕鬆地

提到「來一個動員」，而實際上各地是搞強迫和半強迫。如果學生不願立即下鄉，他們的父母就要進單位或街道居委會辦的學習班。在那裏，名為學習，實際上是搞變相批判鬥爭。此時正在搞所謂的「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人人自危，誰也不敢為了子女不下鄉而引起政治麻煩（罪名通常是「對抗最新最高指示」，「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當局把學生下鄉説成是一個政治教育問題，但不少人當時已能看出，這實際上是一個經濟問題。文革運動已經把國民經濟搞得一塌胡塗，大學又停辦，國家根本無力解決學生的就業或升學問題，於是以意識形態為幌子把昔日的「革命小將」統統趕出城市。這種用起來把人捧到天上，不要了就當垃圾一樣掃地出門的手法，使學生們極為寒心。紅衛兵在運動初期和運動中本是壯志凌雲，他們有那麼高的理想，那麼強的使命感，一心以為自己可以在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中有所作為，但到頭來卻像用過的工具一樣給扔在一邊。而且，為了避免繼續在城市作為一般政治力量存在，他們被毫不憐惜地統統發配下鄉。前後待遇有如天壤之別，紅衛兵在不滿之餘，當然要問一個為甚麼。

除了由於自身遭遇而引起對於當局的逆反心理外，紅衛兵上山下鄉思想上的最大變化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神話的破滅。文革的可悲下場使紅衛兵感到被利用、被出賣了，然而這還屬於政治範疇，它使人感到到捲入政治鬥爭太危險、太不合算。文革前灌輸的種種政治神話，如「新舊社會兩重天」，「集體化使中國億萬農民走上富裕道路」等等，仍然存留於學生頭腦中，並沒有隨着政治上的不幸遭遇而消除。下鄉之後，這代人才算真正看到了中國社會的現實，農村驚人的貧窮和落後使他們震驚，他們的懷疑從政治領域擴大到社會及制度，他們的思考從個人遭遇擴大到中國人民在現存體制下的生存狀態。

上山下鄉不過是集中地、強制性地使所有的中學生接觸到中國農村貧窮、落後的現實，實際上，從文革一開始，紅衛兵(不止中學生，也包括大學生)就通過串連和其他方式開始了解中國的現實，看到與他們以前在書本上、課堂上所學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東西，這使他們在思想上產生震動。只不過轟轟烈烈的運動使他們無暇多想。在被趕下政治舞台，開始反思政治問題時，中國的現實狀況就成為重要因素了。

中國農村的貧窮和落後是出乎紅衛兵想像的。一篇寫文革和紅衛兵的文章作了如下描述：「他們驚奇地發現『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全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大好形勢下，這裏竟貧窮落後得令人心顫。村子縮在荒山禿嶺之下，與世隔絕。山民們一個勞動日值六分錢，一個雞蛋賣八分錢，一個人一天還頂不上一隻母雞一天的價值。由於近親通婚的原因，山民們長相極其醜陋和怪異，患癡呆症的人不少。」「當地的山民們還說：『毛主席領導我們翻身得解放，日子比以前好過多了，一年的大部分日月能吃上土豆。』這裏的男人幾乎一年四季沒上衣穿，天熱了光着身子，天冷了則披一件油光光的獸皮。山民們家家沒牀，墊起樹葉或野草鋪一牀竹席便席地而臥。村裏的一位退伍軍人，有一牀破軍被和綴補丁的白牀單，便成了全村的『首富』。」⑦

淩耿在《天讎》一書中記敘了他和一些紅衛兵文革中外出到安徽省的情況。他們從火車裏向外望去，只見滿目荒田，樹木都被剝了皮，不時還可以看到鐵軌旁躺着一具具屍體。當他們向車窗外扔變硬不能吃的麵包時，飢民會一擁而上，甚至搶得頭破血流。面臨此境，他們不由得反覆思考：這是誰的錯？有人問了出來：「這算是甚麼新中國？」

安文江，前面已提到的上海大學生紅衛兵頭領，在1967年初炮

打張春橋失敗之後逃避政治，到南方去遊山玩水。他到了很多地方，但是，他所見到的情景使他產生了深刻悲哀，他又一次感到失落和幻滅。

> 廣州白雲山衣衫襤褸的乞丐向我伸出污黑的手指；……陽朔的農田上踽行着人拉的木犁；安順飯館內剛揮去嗡嗡叫的蒼蠅又圍上一大群要飯的孩子；川江岸邊古銅色的縴夫拽拉着逆流而上的破帆；廬山腳下一群冷漠的看客圍觀着一具倒斃的屍體……懂事後第一次走出大上海，看到如此貧窮、寒愴、淒苦的圖景，我給震懵了！從小到大，唱的是「社會主義好」；學的是「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心中有一股想吼叫想罵娘的衝動⑧。

紅衛兵下鄉之後，農村的貧窮、落後、愚昧固然出乎他們的預料，但更讓他們吃驚的是，「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內容往往與官方的宣傳教育相反，許多農民根本不認為共產黨比國民黨好，「新社會」比「舊社會」好，「解放」後比「解放」前好。許多紅衛兵下鄉前自以為有不少不滿情緒和離異思想，但農民的態度和敘述仍使他們吃驚。

幾乎每個農民都認為，他們一輩子最吃苦的日子不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而是在緊接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之後的「困難時期」。大躍進時，幹部強迫農民砍樹煉鋼，結果鋼沒有煉成，原來茂密的樹林卻被砍光，以後農民不但建房、做傢具缺乏木材，甚至做飯燒柴的問題都難於解決。上邊強令布署密植，生產隊幹部認為不符合實際，不願執行，為此他們被抓到公社，被鬥爭、被吊打，直到答應搞密植才放回去。但秋季收穫時，田地裏長滿草一樣的細禾桿，穀粒空癟。學生們在上中小學時，從講堂、課本和報紙上得知，大躍進時放「高產衛星」，畝產糧食幾千斤、幾萬斤，甚至十多萬斤。真是如毛澤東所說，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甚麼人間奇迹都可以創造出

來。但下鄉後，他們發現那純屬騙局，像《人民日報》這種備受信賴的黨報竟會撒彌天大謊。農民道出的實情是，收割時幹部命令他們把幾畝甚至十多畝水稻拔起來集中在一塊田裏，讓上級來驗收，讓人們來參觀，讓報紙、雜誌記者來拍照。後來上面強行搞食堂化，幹部帶領民兵到每家每戶去收繳炊具，拒不交出就強行砸碎。食堂剛開辦時讓農民敞開肚子隨便吃，叫做過共產主義，不久就降到每日口糧半斤，再不久就降到每天只有二、三兩。採訪中有人回憶說，幹活時，農民向他挨家逐戶地回顧計算困難年代餓死的人，他粗略統計了一下，竟佔總數四分之一以上，有許多是全家餓死，一個不留！

知青下鄉時全國一個模式搞「憶苦思甜」教育，讓老農民現身說法，講「解放」前受剝削受壓迫的「血淚史」，講「解放」後毛澤東、共產黨的大恩大德，他們的幸福生活。令學生們十分奇怪的是，在開憶苦會之前，隊幹部反覆叮囑即將出場的老大爺老大娘，叫他們千萬要記清楚，「這次是憶解放前的苦，不要憶成1962年的苦！」儘管如此，幾乎每個農民都控訴說1962年他們餓得多厲害，村裏餓死了多少人，弄得生產隊幹部哭笑不得。有趣的是，幹部儘管在會上一本正經，但在平常幹活時卻大放厥詞，講他們以前給地主幹活時吃得多飽，吃得多好，合作化之後就從來沒有過好日子。

另一種形式主義的教育是吃「憶苦飯」。據說，現在的年輕人過慣了「蜜水裏泡大的甜日子」，往往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因此要定期讓他們有實感地體會一下解放前的苦日子。辦法是用粗糧、薯藤、野草等豬食煮一頓飯、讓大家親口嚐嚐那難於下嚥的滋味。下鄉學生對此既新鮮、又緊張，他們事前作了充分的心理準備，一定要與貧下中農共苦，以示自己的立場和感情與勞動人民一致。但令知青們大吃一驚的是，吃「憶苦飯」時，農民歡天喜地，搶着吃了一

碗又一碗。問起來才知道，他們平時吃的就和這差不多，而且常常斷炊。能夠白吃一頓，何樂而不為？

這種現實生活，這種「再教育」，是學生們以前絕對想不到的。一時間，知識青年們奔走相告，議論紛紛，交換自己的新鮮經驗。

我在採訪前紅衛兵時，發現以上現象極為普遍。從東北到西南，從內蒙古到廣州、福建，下鄉知青都碰到開「憶苦思甜會」結果變成控拆1962年苦難的笑話，這令人尷尬，也發人深思⑨。

有一件事使人感到十分費解，毛澤東似乎真的相信，只要青年學生去接觸中國實際社會，去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他們就會培養起勞動人民的感情，更加熱愛中國共產黨，更加熱愛這個社會制度。但這一代人的經歷證明，事情恰恰相反。不錯，學生下鄉使他們更了解農民疾苦，更同情他們(在這種意義確實可以說增強了勞動人民的感情)。由於更了解中國國情，他們思考中國問題時更現實、更成熟。但是，接觸實際往往使他們拋棄了以前在學校中接受的政治灌輸，拋棄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和共產黨給中國人民帶來幸福的宣傳。他們從貧下中農那裏得到的，並不是對黨的歌頌，而是抱怨和批評。

楊小凱於1968年初在農村作了一次社會調查，他說⑩：

> 那次調查給了我很多新鮮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發現，中國農民對當時官方的意識形態抱着相當普遍的敵視態度。湘鄉的一位老貧農向我訴説1959年大躍進中，農民遭受的他們記憶中最痛苦的磨難。他津津樂道地回憶1949年前國民黨時代農民的生活。他特別喜歡國民黨政府試行的貨幣地稅，「一畝地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稅，然後甚麼也不用交了」，他說。他告訴我在共產黨的交公糧制度下(實物地租)，統購統銷加公糧實際上拿走了農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穫。特別是1959年，由於幹部放衛星(虛報產量)，名義上公糧比率上升到收穫的百分之五

十以上，實際上所有收穫交了公糧還不夠。「這都是『毛家大爹』作孽呀！」他無可奈何地表達他的憤恨，他說的毛家大爹是指當時的「紅太陽」毛澤東。

這次旅行使我發覺看似壟斷了社會輿論的官方意識形態，原來在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中幾乎沒有市場。農民不喜歡共產黨，他們把共產黨當成一種別無選擇的不得不接受的東西。

如果不是文革的政治遭遇，紅衛兵一代人也許不會對中國現實中的苦難體會那麼深，並從而得出那麼帶批判性的結論。文革前，所有的大中學生也下鄉勞動、搞四清，但他們往往被虛飾的光明所蒙蔽。文革後期各種逆反因素相互影響和激盪，使這一代人的思想急劇變化。戴小艾的經歷就頗有代表性。作為一個中學造反派紅衛兵頭領，他在運動後期總結說，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七歲入校就當班長，很快加入少先隊，自認為是黨的忠實信徒，最大的理想是加入共產黨。文革時抱着同樣的革命動機投入運動，批判老師、校黨委、工作組，冒着生命危險在文革中衝鋒陷陣，搞奪權。但最後甚麼也沒有得到，被自己為之獻身的那個權威鎮壓。他們開始時使用他，當不再有用了就把他扔在一邊。戴聯繫到共產黨的一貫作法回顧文革發生的事：校黨委在運動初期為了保自己，把語文教師拋出來，交給紅衛兵鬥爭，這就是這個教師多年忠誠服務的結果。這件事說明了許多黨的領導的本性，他們的行為和他們對學生的教育是不一致的。當戴想到自己就要成為鬥爭對象時，他感到不寒而慄。他從文革中退隱，回到家鄉農村。他一下子發覺農村是那麼貧窮，農民缺吃少穿，一年的收成連半年都不夠，三個男人中就有兩個窮得結不成婚。這是他決定不革命之後第一次用新眼光看待現實。他以前當然並非對農村的貧窮一無所知，但那時要找種種理由

來解釋，現在他看到貧窮和落後是制度本身造成的。農民公開聲言，過去(「解放」前)的日子比現在好，當他對這一點仍然接受不了時，生產大隊的支部書記給他詳細講述了自50年代以來農民遭受的種種苦難。戴說，文革的爭鬥和虛偽使他對黨和毛失去了信心，他回鄉之後，完成了覺醒過程。最後，在清洗、迫害造反派頭頭的威脅迫近時，他選擇了逃往香港的道路⑪。

四　林彪事件

1971年9月13日發生的林彪事件，是對當局、特別是對毛澤東本人最為難堪的一件事，也是對紅衛兵原有的正統信念最沉重的打擊。對於原來屬於不同派別、文革中有不同經歷、年齡各不相同的人而言，這一事件在心理上和思想上都引起了巨大衝擊。為甚麼法定的接班人，毛唯一的忠實戰友，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把毛澤東思想用得最活，全國人民每日必須祝福其「永遠健康」的人，會「企圖謀殺偉大領袖毛主席」，會「圖謀政變」未遂而「投靠蘇修」、「叛黨叛國」，為何在「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中挖出一個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不久，又暴露出一個以副主席為首，另外包括一個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和五個政治局委員(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的反黨集團，而這些人前不久還因為全力支持毛澤東打倒劉少奇而被譽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左派？全國人民都在等待當局給出一個說得過去的解釋。

當局向群眾說明這個事件的方式和步驟就很可笑，如果說以前紅衛兵在運動中是「當局者迷」的話，那麼這次他們則是從「旁觀者

清」的角度看待整個事情了。1971年9月下旬，大批知青返城過國慶節，這時有中共中央文件傳達至各單位，稱國慶不舉行遊行慶祝活動。國慶期間，毛和林彪沒有慣常的露面，這是極為異乎尋常的。一些敏感的人已在猜測中央出了大事。國慶之後，人們從各種渠道(高幹子女從父母那裏，其他人從外國電台中) 知道林彪等人外逃未遂身亡之事。當返城的人回到鄉下，幾乎所有的知青都知道了林彪事件，但在農村，各級革委會仍高掛林彪畫像，在中學和小學，每天早晨教師仍帶領學生作「三忠於」儀式，背誦林彪語錄。對於早已知情的知青來説，這種情況顯得十分荒謬，他們之中有人忍不住道出實情。農村幹部聽了有的十分害怕、困惑，有的「立場堅定」，要追究「反革命煽動」。多嘴的知青受到嚴厲警告，還有少數人被當成「現行反革命」被抓捕。但是，很快就傳達了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以及「粉碎林(彪) 陳(伯達) 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鬥爭」的一系列材料。

現在的知識青年，以前的紅衛兵不得不思考，既然他們曾經誓死捍衛的「副統帥」其實是叛徒和賣國賊，那麼他們在文革中鬥爭的意義何在呢？既然文革中紅極一時的人物是大壞蛋，那麼那些被打倒的人是否不一定是壞人呢？既然一個人在位時光芒萬丈，倒台後就狗屎不如，那麼現在仍在台上的人是否也不是那麼偉大，有朝一日也會落個身敗名裂的下場呢？

如果説許多問題尚在思考和懷疑之中，那麼下列幾點則是確定無疑的：既然中共黨章載明的接班人落得如此下場，那麼這個黨的一切宣言、政策、決議等等，顯然並不是神聖莊嚴的⑫；既然號稱洞察一切的偉大導師親自挑選的接班人其實是最凶惡的敵人，是叛黨叛國的罪人，那麼他的絕對正確的神話就是欺人之談，他顯然有可能犯錯誤，他顯然已經犯了錯誤。那麼，他發動文革是不是錯了呢？

毛澤東並沒有按照邏輯和常理就林彪事件公開認錯，相反，當局發出一系列文件和材料，作出一系列解釋，力圖證明黨仍然是正確的，毛澤東仍然明察秋毫，有未來先知之明。但是，這些解釋是如此拙劣、可笑、自相矛盾，它們不但達不到預期效果，反而引起了進一步的疑問。

為毛澤東辯解的最重要材料是一封據説是他於1966年7月8日寫給江青的信，信中有些話是針對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⑬。毛説：「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據説，這封信證明毛澤東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種解釋毫無道理，因為根據信的內容，充其量可以説毛不贊成林彪對他的過份吹捧，而且還肯定他吹捧的動機是好的。另一方面，如果解釋成立，問題就更大了。既然毛早在文革一開始就看出林彪不是好人，為甚麼還要封他當副統帥和接班人呢？為甚麼還要依靠他打倒一大批與自己共事多年的戰友呢？毛無論如何也推卸不掉林彪事件的責任。如果説他被林彪欺騙了，那麼他是昏君，如果他明知林彪是壞人還要重用，那麼他就是一個大陰謀家、權術家。

當局掀起了大規模批判林彪和陳伯達的運動，其目的當然是為了把這些「反黨陰謀家」搞臭。但是，要把一場內爭説成是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非正義的大決戰，是極其困難的。勝利的一方對失敗的政敵作了過份的塗污，但使人們感到可怕的不僅是那一小撮陰謀家，而且包括勝利者，使人們認識到黨內權力之爭的殘

酷和血腥。關於林立果糾結死黨，企圖暗殺毛，以及毛與他們鬥智鬥勇的故事，聽來使人毛骨悚然，使人感到黨內政治生活陰森可怖。而且，那些故事十分離奇，人們不能肯定，林彪是陰謀敗露後倉惶出逃，自取滅亡，還是毛及其同夥先發制人，置林彪於死地？

對林彪集團各個人物的歷史作揭露，打擊的不僅是那幾個人的威信，而是黨本身的威信。林彪被說成是早就對革命沒有堅定信念，在黨內鬥爭中數次反對過毛的人，而且他的戰功也是假的，他不會打仗、膽小怕死。如果真是這樣，怎麼把這樣一個人捧成聲名赫赫的元帥呢，怎麼讓他當接班人呢？難道對毛澤東思想理解最深，對毛的指示貫徹最力的就是這麼一個小丑嗎？林的心腹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以及林的妻子葉群，被說成是十分無能，工作上媚上欺下，生活上腐朽透頂、荒淫無恥之徒。人們倒容易相信這是真的，但問題在於，為甚麼這些人統統都當上了政治局委員？為了向林家潑污水，當局還詳細地描述了林彪、葉群為林立果在全國「選妃」的事，這也許是真的，人們也聽得很感興趣。但是，這種只會在封建王朝發生的事為甚麼發生在「新中國」呢？林家能做的事，難道其他高官就不會做嗎？

給陳伯達定的罪多得嚇人，他獲得了一連串頭銜：「國民黨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這種人怎麼幾十年給毛澤東當秘書呢？他麼能當文革小組組長呢，怎麼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呢？據說，他在廬山會議上配合林彪搞陰謀，他們的反黨綱領是「要設國家主席」。許多前紅衛兵百思不得其解，怎麼「設國家主席」會是一個反黨綱領，好奇怪的罪名！

沒有多少人同情林彪、陳伯達等，人們認為他們是壞蛋，但人們同時要追問，為甚麼這些壞蛋在文革中如此得勢？他們的罪惡僅

僅是他們個人的罪惡，還是與黨有關？他們的罪惡和陰謀往往得逞，難道與制度無關？

為了證明林彪集團確實反對黨，反對毛澤東本人，當局公布了據說是由林立果主持制定的「『571工程』紀要」，在這份文件中，這些中共高級軍官確實十分惡毒地攻擊了現行制度，攻擊了中共的政策，攻擊了毛本人。人們並未懷疑這份文件的真實性，但不少人同時發現，那些人說的話是真的。他們原來以為自己或多或少有類似的思想是危險和大逆不道的，但突然看到，原來統治集團中的核心人物早就這麼看，而且看得更透徹，說得更明白。

紅衛兵在文革中最深的感受、最大的教訓是他們被毛及文革派利用了，被當成了爭權奪利的工具，他們對於毛出爾反爾、縱橫捭闔印象深刻、心有餘悸。而「『571工程』紀要」以最確切、凝煉的語言反映了這一點：「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批，各個擊破。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最大倡導者。」「……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蜜語對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階下囚。」「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迫變成替罪羔羊。」

這份文件對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悲慘境遇有深刻認識，「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份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是變相受剝削。」這些話引起了人們的極大共鳴，它們和有些紅衛兵對社會現實的觀察與評價不謀而合。李九

蓮在因此而獲罪的日記中寫過：「幹部下放勞動，這期間血淚何其多！青年學生到農村去，這期間的痛苦和絕望又是何其多！知識份子們呢？不幹了，我國的知識份子太多了啊！這是甚麼現象呢？人們都在問，活着有甚麼意義？都渴望戰爭，希望在戰爭中消滅自己。」⑭

「紀要」把毛説成是在黨內政治鬥爭中老謀深算、心狠手辣的人，它對毛的揭露和批判，使最具有反叛思想的紅衛兵也自感弗如，從而在反叛的路上走得更遠：「從十幾年的歷史看，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生兒子也被他逼瘋。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後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實際上，當時不論是紅衛兵還是其他人，對毛及其「革命左派」的本質都不如「紀要」的作者看得那麼清楚。「紀要」中說：「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因此，對於思想大膽、深刻反思文革的前紅衛兵而言，「『571工程』紀要」和其他揭批林彪集團的材料，不但沒有起到「正面教育」的作用，反而起到了打開眼界、解放思想的效果，許多人即使不願多想，也難於維持以前的政治信念。對許多人而言，林彪事件是信仰改變的轉折點。

五　異端思想和書籍的影響

當紅衛兵以獨立精神反思文革，重新考慮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時，給他們最大啟發的是當時流傳的異端思潮和官方翻譯出版的某些(往往是內部發行的)國外書籍。它們使人的思想跳出所謂「兩條路線鬥爭」、「兩個司令部鬥爭」的窠臼，用與以前不同的方式看待中國的問題。

用今天的眼光看，那時的所謂異端思想和書籍並不是多麼出格的邪説，其中許多觀點完全可以容納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之內，但是在當時卻是如洪水猛獸般可怕。文革中官方的意識形態狹隘和「純粹」到了十分極端的地步，即使是馬克思思想也可能成為異端(事實上，若以毛澤東思想為準繩，不少純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點都會被判為異端，例如關於發展生產力的觀點)。另外，那些異端邪説雖然以無懈可擊的馬克思主義詞句和理論包裝起來，但顯然有「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嫌疑，它們與官方對立的傾向是明顯的，它們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威脅和危害也是明顯的。我將挑三個例子來略加説明，這三種異端思潮的提出者都受到了官方極其嚴厲的鎮壓。

文革中最早出現並產生巨大影響的異端思想，大概要算遇羅克在〈出身論〉等一系列文章(包括〈「聯動」的騷亂説明了甚麼〉、〈論鄭兆南烈士的生與死」〉、〈談鴻溝〉、〈談「純」〉等)中表達的反血統論觀點。遇羅克的任務極為艱難，出身問題對於當權者和全社會是最為敏感的問題，自60年代初以來，政策越來越左，到文革時老紅衛兵的血統論使由於家庭出身而產生的歧視和迫害達到極點。遇表面上是在力圖恢復和捍衛「黨的重在表現的政策」，實質上是站在**人權**(這是〈出身論〉中出現的字眼)的立場上要求人的平等和尊嚴。在

〈出身論〉中，作者提出「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過個人努力所達不到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在〈談鴻溝〉中，作者宣稱：「無論甚麼出身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他不是把歷來的歧視政策和後來的血統論僅僅當成「不利於團結大多數的左傾政策」，而是當成與黑人曾遭受的種族歧視，與印度、日本的賤民受壓迫的種姓制度無區別的東西。作者由此提出，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封建的東西還有廣大的市場，還頑固地盤踞在一些人的頭腦之中。」

遇羅克的〈出身論〉在北京反覆印刷出版，發行達九萬份以上。在外地，人們將它抄成大字報張貼，刻印成傳單，出版成鉛印小報，它流傳極廣，影響很大。設在北京四中的接待站門庭若市，每天來訪者絡繹不絕。全國除台灣和西藏外，都有讀者來信，這些信多達每天二、三個郵袋。

就思想本身的反叛性而言，〈出身論〉比文革中出現的其他異端思想更強烈更深刻，它反對的不僅是文革中最為偏激的東西，而且是文革前十七年政治統治和社會控制的基本政策。它不是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出發點，而是以人生而平等的普遍觀念為出發點。遇羅克 (還有支持和宣傳〈出身論〉的年輕女學生鄭小丹) 僅因自己的思想觀點而被判處死刑，這說明當局撲滅異端思想是多麼無所不用其極，以及文革的「大民主」是多麼虛偽。

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無疑代表了文革中對造反派影響最大的異端理論。我在前面已說過了此文的主要內容，在此想強調的是，它的基本出發點突破了文革中所有紅衛兵的思維框架。它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文革綱領，主張文革的目的是「推翻新生的資產階級，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其手段是實行財產和權力再分配。文章認為，雖然文革中所謂兩條

路線的鬥爭集中表現為剛開始五十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專政」，但中國的根本問題還是從1949年到1966年十七年的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對十七年的中國社會重作階級分析，以重組階級隊伍，明確團結誰、打擊誰。文章認為，革命的依靠力量是在十七年中受壓迫受剝削的合同工、臨時工、下鄉知青等等，而革命對象則是掌權的「紅色資本家」。文章認為，文革的目的並未因各省建立革委會而完成。從以上基本出發點可以看出，作者的立場是站在中國社會底層勞動人民方面，而不是站在「無產階級司令部」方面。

據我在全國的調查，紅衛兵中接受楊曦光觀點的人並不多，但知道他的見解並從他大膽、獨立的思考中得到啟發和鼓舞的人相當多。在他之後，全國各地不少紅衛兵陸續就文革和中國社會問題提出各式各樣的觀點，其中大多數人都看過〈中國向何處去？〉

林彪事件之後，紅衛兵對於文革和中國社會的認識日趨深入。廣州幾個紅衛兵以「李一哲」為筆名寫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就是這種批判性思考成熟的標誌。作者是幾個年齡不同、經歷和家庭背景也不同的紅衛兵，他們觀點的一致是大家在運動後期自覺交流思想的結果。文章作者之一對廣東省文革的嚴重惡果（比如全省數萬件冤案）有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同時，對西方民主國家的法律和政治運作程序也有一定了解，另一作者下鄉之後看見大批農民逃往香港，知道農民並不是熱愛，而是憎恨毛的政策。因此大字報既深刻地揭示了中國政治的現實，也提出了健康、積極的解決辦法。在當時，作者只能提出「批判林彪體系」，但他們批判的實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現實。

與官方的宣傳相反，大字報並不認為中國面臨的危險是「資本主義復辟」，它反覆強調，主要危險是封建性的法西斯專制，這種法西斯專制表現在以下各個方面：統治者的政治信念是「政權即鎮

壓之權」，與臣民的關係是「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統治階級成員無法無天、不要法制，可以橫行殺人、搶男霸女，等等。作者認為，文革的任務不在於「摧毀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而在於鍛鍊群眾的民主精神，要實現寫上了憲法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但是，人民並未通過文革而享受到這些自由，在文革後期，「在範圍廣大地區內，到處在抓人，到處在鎮壓，到處是牢獄。」在中國，完全沒有法制。

大字報提出了以下政治要求：人民應受到法律保護，不得以「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為標準對群眾施行鎮壓；應當保護人民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允許光明正大的反對派存在；應當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應當有具體的規定讓人民行使對國家幹部的監督權，當某些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失去群眾信任時，可以根據明確的程序撤換他們。大字報還要求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反對在「公產主義」口號下剝奪工農勞動群眾合理的經濟利益，主張適當地恢復獎金制，以使勤奮勞動者、有發明創造者得到更多物質報酬。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一文被反覆地抄成大字報張貼，刻成油印傳單散發，官方將其鉛印成小冊子作為反面教材批判，並抓捕其作者之一李正天，在廣東各地組織一百多場辯論會。當局一方面指揮部署批判，一方面允許李正天答辯和反駁（這可能出於省委中某些人的溫和與同情態度，因為大字報反林彪死黨黃永勝客觀上維護了地方文官的利益）。因此，大字報的內容在廣東是家喻戶曉，並在全國產生了廣泛、深入的影響。

在文革後期，前紅衛兵（甚至其他人）的理論熱情和探索精神達到了驚人程度。據我了解，不僅在每個地區，而是幾乎在每一個學校，都至少有一批或若干批人，結成嚴密的團體或保持鬆散的聯繫，認真刻苦地學習理論著作，傳播和討論社會政治思潮，形成自

己關於文革和中國社會的看法。這一段時間，專政機關製造的「反革命案」之多，青年因思想和言論被監禁乃至處死的人數之多，都達到驚人程度。當然，到了運動後期，大多數人都有一些政治經驗，他們不取組織形式，不給自己的研究團體加上「××會」、「××小組」的名稱，不大力宣揚研究結論，因此遭難者在探索者中仍是極少數。下面僅舉幾例，以窺當時情況之一斑。

1968年，寧夏銀川一批紅衛兵(一名大學生，其他為中學生)為文革中種種問題困擾，退出運動，學習理論。1969年，他們從銀川分配到全自治區六個縣市工作或勞動，為了交流和聯繫，他們創辦了名為《學刊》的油印小報，將自己的學習小組稱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成員共十三人。主要學習馬列原著和中外歷史著作，在《學刊》上登出二十多篇、共十多萬字的文章。其中一篇題為〈甚麼是法西斯主義〉，它這樣描述文革的現狀⑮：

> 禁止一切為世界公認的民主權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殘酷鎮壓一切反對或僅僅不同意暴力統治的人民，甚至採用公開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種種仇恨人類的反動謬論，例如宣傳種族優劣論、反動血統論、人為製造階級與階級劃分論等，來迷惑籠絡一部分人以達到鎮壓人民的目的，此外還極力推行愚民政策，實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隸主義的盲目服從精神，宣揚個人迷信和領袖至上的神話，從意識形態上已墮入完完全全的唯心主義。

1970年初，該學習小組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集團」，成員全遭逮捕，其中三人被判處死刑，另外有一人自殺，一位受牽連者判刑三年，在虐待中病死。

1970年前後，北京一批幹部子女形成一個文藝沙龍，為首的李堅持年齡稍長，不是紅衛兵，但因深深捲入文革而入過獄，成員多

數是前中學紅衛兵。他們的活動主要是傳閱供高幹閱讀的內部書籍，既包括當代蘇聯文藝作品，也包括《斯大林傳》、《新階級》等政治理論著作。後來文藝沙龍向政治方面轉化，其成員探討和研究中國的未來、民主和法制問題。他們的活動被公安部門長期監視，一些人在1975年9月遭逮捕⑯。

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在四川東部的萬縣，一批青年(包括文革中畢業的學生，其中有造反派頭頭)成立了「馬列主義研究會」，系統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外歷史，力圖對文革作出深入的剖析和批判，為首者是後來成為中國著名民營企業家的牟其中。研究會成員寫出了一系列長篇論文，其中有〈從文化革命到武化革命〉、〈社會主義由科學向空想的倒退〉、〈中國向何處去？〉、〈勞動價值論質疑〉。這個研究小組的特點是對中國的經濟結構與體制有認真分析，他們認為毛澤東「忘記了社會主義的物質利益的原則，把精神的作用強調到了主觀唯心主義即唯意志論的地步」，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體系」的主張，建議「工人實行計件工資制，農民實行包產到戶」。1975年8月，「研究會」被當作反革命集團取締，成員被捕判刑⑰。

前前後後離開政治舞台的紅衛兵當中，不少人狂熱而勤奮地讀書，力圖找到新的思想武器，對中國的政治問題作出回答。他們竭盡全力，通過一切途徑尋找各種書籍。由於嚴密的文化控制，書籍缺乏和來源單一，各地的前紅衛兵讀的書幾乎相同，在較長一段時間，他們的閱讀模式，從書中受到的啟發也相當一致。總的來說，他們是從文革中只讀毛澤東的書進而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並用包含人道主義因素的馬克思主義批判作為文革指導的毛澤東思想。在這之後，探索的道路發生了分化，有人皈依於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有人進而研究西方各種學說和理論；有人仍然專注於政

治，有人的興趣擴大到了哲學、歷史、西方當代文學及文藝理論、經濟等各個方面。

現在回頭來看看當年的基本讀物是有趣的，它們大致如下。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馬克思的《資本論》、《〈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普列漢諾夫的《一元論史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古臘瓦答臘夫人的《赫魯曉夫主義》、約翰．里德的《震撼克里姆林宮的十三天》、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評傳》和《背叛的革命》、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馬迪厄的《法國大革命史》等等⑱。文革前，官方出了一套供高級幹部閱讀的內部書，因一律為灰色封面而被稱為灰皮書，後來又搞了一套黃皮書。當時年輕人千方百計取得這兩套內部書，相互傳閱。內部書籍中，還包括一套《資產階級社會學資料選輯》，一套《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它們較為廣泛、系統地介紹西方現代學術思想和理論，比如哲學資料中包括杜威的幾部重要著作，而其中悉尼．胡克的《政治權力和個人自由》等五篇著作，阿克頓的《時代的幻覺》對馬列主義作了直接、尖銳的批駁。

內部書籍中包括大量蘇聯當代文藝作品，如《第四十一個》、《雁南飛》、《娘子谷》、《白輪船》，等等。這些書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品，但對紅衛兵來說仍是十分過癮的禁書，它們的刺激性和危險性表現在官方稱它們「散布修正主義毒素」。正如王蒙分析的，蘇聯文學作品有如下優點：一、它們承認人道主義，承認人性、人情，乃至強調人的重要、人的價值；二、他們承認愛情的美好，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性的地位；三、他們喜歡表現人的內心世界，他們努力塑造蘇維埃人的美麗豐富的精神世界；四、他們喜歡大自然和風景描寫以及靜態的細節描寫；五、那些在中國肯定會被批評為

「不健康」、「小資產階級的情調」、「無病呻吟」的東西，諸如懷舊、失戀、溫情、迷茫、祝福、期待、憂傷、孤獨……等等，都會有盡情抒發⑲，蘇聯文藝作品中的人性、人道主義精神，正是自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中國「革命文學」所缺乏的，更是文革運動力圖抹殺的。當紅衛兵厭倦了文革中的野蠻、殘殺與獸性時，這些作品像雨露滋潤荒漠，給正在向人性復歸的年輕人的心靈帶來慰藉和生機。

有些人還看到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報告、〈南共綱領〉、〈哥穆爾卡講話〉、林希翎在1957年的發言，以及彭德懷的〈意見書〉等更「危險」的東西。這時，他們發現自己的立場、思想和感情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本該嚴厲批判的「大毒草」對社會主義制度或中國現狀的說明或批判是那麼中肯，那麼一針見血，自己一直苦苦思索的問題，原來竟有人作了如此深刻的剖析和如此清晰的表達！

我在全國採訪時，經常是一小批前紅衛兵聚到一起，訪談變成了座談會。一提到文革後期所看的書，大家爭相發言，因為書目、內容、心得和啟發是那麼一致，每個人都唯恐自己的感受思想全被別人講了。比如，不少人還能背出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的下列一大段話，它在當時為不少人傳誦：「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對宗教的批判最後歸結為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樣一個學說，從而也歸結為這樣一條絕對命令：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係。」在文革中，尊重人、肯定人被指責為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罪惡，蔑視人、侮辱人、摧殘人成了革命的品質。紅衛兵從迷惘中覺醒，最根本的是從人性的失落到人性的復歸，他們驚喜地從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發現，原來馬克思是肯定人

性的！有人更進一步得出結論：任何有價值的學說，必須以人性為出發點，而不能像毛澤東的革命和專政理論那樣，無視人的需要和尊嚴，抹殺人的價值。

《第三帝國的興亡》是70年代中期許多人都讀過的書。當人們讀到第二編第八章「第三帝國的生活」時，發現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國和文革的中國在許多方面簡直是一模一樣。年輕人從歷史的相似性中得到許多啟示，他們恍然大悟：官方宣傳為史無前例、最偉大、最革命的事物，原來在法西斯德國，在人類最黑暗、最反動的時代早就有過。比如該書記載：「1933年5月10日晚上，也就是希特勒當總理後約四個半月，柏林發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中世紀末期以來未曾看到過的景象。在約莫午夜的時候，成千上萬名學生舉着火炬，遊行到了柏林大學對面的菩提樹下大街的一個廣場。火炬扔在堆集在那裏的大批書籍上，在烈燄焚燒中又丢了許多書進去，最後一共焚毀了大約兩萬冊書。在另外幾個城市也發生了同樣的景象。焚書開始了。」被焚毀的書中，許多是本國和外國的文學名著。新上任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在被焚的書籍化為灰燼之際向學生們講了話。『德國人民的靈魂可以再度表現出來。在這火光下，不僅一個舊時代結束了；這火光還照亮了新時代。』」⑳這事件、這講話使曾參與或目睹文革初期「破四舊、立四新」，聽到過當局把焚書當成「建立新文化的曙光」的紅衛兵感慨萬千。使青年們既吃驚又受啟發的是，當局把強迫他們上山下鄉說成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布署」，「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偉大創舉」，而看過《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之後人們發現，這套做法並不新鮮，在納粹德國，年滿十八歲的女青年團團員必須到農村勞動一年，這就是她們所謂的下鄉年，同青年男子的勞動服役相當。總之，在納粹德國，不論是少年隊的誓詞，還是青年團的軍訓，都和中國這一代人曾經受的「革命化教育」是一回

事。當他們開始用「法西斯主義」這個概念來觀察和思考中國的現實時，他們的思想無疑具有了某種歷史深度。

下面是我採訪Z時的錄音記錄，他的情況代表了年輕人在文革後期勤奮閱讀、嚴肅思考、認真交流、狂熱追求真理和探索中國社會問題的狀況。文革爆發時Z才十六歲，他因家庭出身問題而陷入政治和經濟困境，只斷斷續續念了四年小學。文革中，他是四川南部一個偏僻縣城的造反派紅衛兵骨幹份子，運動中十分活躍和有影響，現為非官方詩人。文革後期在一家製藥廠當臨時工時，他集中全力閱讀和思考。

> 我在燒鍋爐時讀了《普列漢諾夫選集》，《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文學》。(問：書從何來？)造反派搞打砸搶，他們討好我，我叫他們碰到好書就給我拿來，收集了相當一些書。看過羅素的兩本書，一本叫《社會改造原理》。還有密爾的《論自由》，柏拉圖的《理想國》，巴枯寧的傳記，一本忘了名字，是克魯泡特金的書，關於無政府主義的；以及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三卷縮寫本，我的歷史觀很受湯因比的影響。詩歌受雪萊、拜倫影響。小說看托爾斯泰的作品，但真正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約翰·克利斯朵夫》，那時我手頭不全，只有兩本，與別人交換着看，還有達爾文的著作和書信。我定了嚴格的讀書計劃，連走路都在看書。還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和《共產黨宣言》。看了《共產黨宣言》之後我才知道我們搞的甚麼初級社、高級社、公社，並不是毛的東西，而是照馬克思的藍圖搞的。我恍然大悟，大吃一驚。(問：當時有沒有受年齡大的人的影響？)有，有幾個人一起看，如……。當時大家很有抱負，準備搞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是反體制的，對文革重新研究。(問：思想何時轉變，以前不是想入團，思想正統，有革命熱

情嗎？）從69年、70年轉變。（問：以甚麼為契機？）對我而言，是從罷工開始。一投入文革就有一些反體制思想。我讀了一些書，但××的思想對我更有啟發，但他甚麼時候轉變的，我不清楚。他接觸過全國的一些人，而且組織過考察，到雲南等地。我們想搞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還跑到鄉下開過一次秘密會議，搞政黨的雛型。當時基本想法是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對馬列主義的歪曲，中國現在應當按馬克思的本意徹底改造社會。我們的小組最後沒有搞成，因為成都來的兩個學生提出我們看的書太少了，知識太欠缺了。……當時我們是兩大派的積極份子，但已經超越派性了，兩派發生武鬥時大家互相通消息，互相訪問時對方均提供保護。當時還未想到民主，未達到這一步。想的是社會民主主義，即經濟上搞社會主義，搞國有化，而政治上搞民主。當時對匈牙利事件、捷克事件都有自己的想法，但總體是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註釋

① 見牟志京：〈一個人的「文革史」〉，《新聞自由導報》，1993年5月連載。

② 見楊小凱：〈舵手〉，《中國之春》，1991年9月號，頁56-62。

③ 梁梁執筆：〈一個紅衛兵發起者的自述〉，《中國青年》（北京：中國青年雜誌社），1986年第10期，頁7。

④⑧ 安文江：〈我不懺悔〉，轉載於《千秋功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頁302；306。

⑤ 胡平：《血祭紅土地》（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頁10。李九蓮文革中是江西省贛州三中「衛東彪戰鬥兵團」副團長，她的這封信被收信人（其男朋友）上交。她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後懲罰升級，於1976年12月14日槍斃。此案於80年代初在胡耀邦的親自過問下得以平反。

⑥ Parris H. Chang, "Mao's Great Purge: A Political Balance Sheet", *Problems of Communism* XVIII, no. 2 (March-April 1969): 10.

⑦ 藍石：〈紅色大瘋狂〉，載於《作家報》，1993年6月26日。

⑨ 這種情況在不少知識青年回憶錄中有描述，例如，關於「憶苦會」，見楊帆：《共和國的第三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頁84，以及傅中：〈鬧紅衛兵那年〉，載於《草原啟示錄》(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頁17；關於搶吃「憶苦飯」，見張建軍：〈搶吃「憶苦飯」〉，載於《知青檔案》(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頁184。

⑩ 楊小凱：〈中國向何處去大字報始末〉，《中國之春》，1990年第12月號，頁67。

⑪ Gordon A. Bennett and Ronald N. Montaperto, *Red Guard: 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i Hsiao-ai*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71), 215-28.

⑫ 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在第一章即總綱中寫明：「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⑬ 林彪在這個講話中説毛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一萬句」，誰反對毛，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經毛的批准，中共中央將林的講話作為重要文件向全黨批轉，並説「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

⑭ 同註⑤，頁8。

⑮ 陳川：〈追求真理的青年〉，《春風化雨集》，下冊(北京：群眾出版社，1981)，頁68。

⑯ 見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頁73-75。

⑰ 袁光厚：《商海巨子——牟其中》(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頁34-57。

⑱ 關於這方面更詳細的説明，參見宋永毅：〈文革中的黃皮書和灰皮書〉，《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8月號，頁59-64。

⑲ 王蒙：〈蘇聯文學的光明夢〉，《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年6月號，頁76。

⑳ 威廉．夏伊勒 (William L. Shirer) 著，董樂山等譯：《第三帝國的興亡》，上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頁341-42。

第六章
後　果

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社會、對於中國的發展方向有極其深刻的影響。可以說，如果沒有文革，中國的情況會與目前的大不相同。文革造就了整整一代與在正常社會主義體制下成長的青年不同的人。這代人的特殊經歷使他們在思想和行為上具有某種獨特性，從而對中國的現狀和未來發展產生特定影響。

這一代人對自身經歷、對文革的反思值得首先注意。在這個方面有一種引人注目的對比。一方面，這代人對於原意識形態的背離達到了空前的程度，這是他們用自己的青春、前途乃至生命換得的經驗教訓；另一方面，以我的標準，這一代人對文革的反思又是很不深刻、很不徹底的。我的調查和研究表明，這代人的學習、反思、探索是忘我和艱苦卓絕的，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一步步逃離原來意識形態的樊籠，但是由於對文革的研討一直是禁區，每個人、每個小群體的思考結果不能在廣大的社會空間中交流、碰撞，因此這種反思在較大程度上帶有自發性和樸素性，從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中共中央在80年代初作出一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對於毛發動的文革作出正式評價，由此派生出對於紅衛兵在文革所起的作用的評價。總體而論，這一代大致可以接

受對文革的否定，但許多人難於接受該決議所包含的對於文革起因，對於紅衛兵行動原因的分析，認為那是簡單和教條的，充滿偏見的。在社會上，「紅衛兵」成了「歹徒」的同義語，不少人在「清理三種人」①的運動中受到嚴厲打擊，曾經當過紅衛兵的人(不論他們原先屬於甚麼派別)都盡量不提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歷，因此，雖然在70年代初他們的反思和探索的熱情令人驚異，但後來這種工作卻沒有繼續。而重要的恰恰在於，只有在與歷史事件適當拉開距離之後，對歷史的反思才最為有效。可以說，不僅紅衛兵一代人，而且中華民族全體對於文革的檢討和反省，都未能認真進行。

文革最重要的後果之一，是造就了一大批經歷過政治鬥爭的暴風驟雨、經歷過運動反覆曲折磨練的年輕人。他們對於中國社會，對於各階層人民的狀況，對於現有體制的弊端和不可觸動之處有深切了解；他們之中的知識份子不像上一代人，從學校到學校、機關、研究單位，而是對社會、對工廠、對農村有親身了解；他們不像上一代人，大多只與同自己學歷、職業、地位相同或相近的人打交道，他們在文革中，在下鄉的日子與自己的戰友、同學形成了密切聯繫，以後雖然前途各異，職業、地位不同，但相互間的聯繫仍然較為密切；他們經歷坎坷，能吃苦耐勞，意志堅強，只要有可能就要達到自己的目的。

下面來詳細看看文革對紅衛兵一代造成的變化及其社會後果。

一　退出運動後生活、工作和思想的一般狀況

紅衛兵從1968年秋開始退出文革的政治舞台。這一年的7月底，毛澤東派出解放軍和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佔據清華大學校

園，強令對立的兩大派談判並實行大聯合。此後，大學生由國家分配工作，大多數人先在部隊農場「勞動鍛鍊」一年，再走上與自己所學專業有關或無關的工作崗位（許多人分到廠礦子弟校當教師，曾有原子物理系學生分到縣農具廠的事），也有少數人未經農場生活階段而直接參加工作，還有更少的一些人（頭領或骨幹份子）因文革問題而被拘留或留校審查。中學生則從1968年底開始去農村、邊疆農場和生產建設兵團（少數人通過正式渠道或走後門方式參軍或進廠），經過三年或更長時間，由城市各種單位招工或因傷病、家庭困難等原因離開農村。

不能籠而統之地說這一代人的工作和生活狀況相比於社會正常時期同類人而言是好一些還是差一些，社會動亂和生活經歷的複雜曲折，使這批人的分化較正常時期為大。由於運動中生產和工作受到衝擊、破壞，經濟和社會秩序紊亂，加上受到捲入政治鬥爭的懲罰，大學生中一些人被分配到邊遠地區，得到與所學專業無關的工作。他們當中許多人從此一蹶不振，得過且過、怨天尤人地生活。其他人當中，有些人工作本來就較為令人滿意，還有的人在秩序恢復後由於國家建設急需人才，通過考研究生或調動工作而回到大城市，得到與專業相關或自己滿意的工作。由於文革的破壞，在行政或技術領導骨幹青黃不接問題顯得突出時，這些人很容易獲得迅速升遷的機會，他們之中好些人現在是各級領導崗位上握有實權的人物。中學生更多地承受了動亂的苦難，許多人很晚才回城，甚至有人至今也未返城。大部分人錯過了學習、成家立業的大好時機，甚至在農村勞動或招工過程中受到多種傷害，成為終生遺憾。即使在最終返城的人當中，不少人的生活和工作狀況也相當不佳，他們當中考上大學的人比例很小，就業困難，結婚成家困難，住房困難，許多人從事的是不需要知識的、報酬少的粗雜工作。但是，少數人

堅持自學或研究社會，當秩序恢復時，直接地或通過上大學或考研究生，填補了在科學技術、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及高等教育領域的空缺，獲得了在正常競爭條件下不一定能得到的成就和地位。由於文革前所受政治教育少於大學生，由於生活經歷更坎坷，了解社會更深，中學生後來對現存體制的批判強於大學生。他們之中後來學文科的更多(自學較容易)，當教師的比例相當大(我曾對某大城市某中學作過較完備統計，教師行業人數佔到大約10%。即該校1966年時一千二百名學生中有一百多人在大中學校工作)，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很大。其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1977年恢復高考後上大學的那些人，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解放思想、批判文革、引入西方新思潮的環境氣氛使他們和以前的大學生大不相同，他們的知識結構，對中國社會和世界形勢的了解，對原有意識形態的態度，使他們成為中國社會轉變時期的一代新人。

紅衛兵這代人中，在行政職務上獲得高位的不多，得到部級職位的屈指可數，當上局級或處級幹部的多一些，這方面和正常條件下情況無多大差別。除了上面提到的在教育和文化部門任職的較多以外，另一特點是經商人數比例較大。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工作、生活狀況不穩定，二是許多才具出眾的人因文革後遺症而不能在行政和科研崗位上發揮才能，市場經濟的出現使這些人獲得唯一的奮爭機會。

這一批人相互之間的聯繫遠較其他人群密切，尤其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全國各地出現「老三屆熱」之後，他們彼此間的聯絡由不自覺走向自覺，由一般地懷舊變成有目的的加強聯絡溝通，以便在事業上取長補短、互相幫助。在若干大城市，他們開辦了「老三屆酒家」、「老三屆餐廳」、「知青園」等等，為大大小小的聚會提供了方便場所。在某些學校，已經發展出全校性的同學會。當然，投

入聯絡的程度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境況較好者積極主動，境況差者則不願再見到舊日同學，而從商者在其中起到主導作用，因為他們最需要了解社會各方面情況，與各階層、各行業人士保持聯繫，他們的經濟條件、聯絡工具也為此類活動提供了條件。

這批人雖然生活在城市，但與農村的聯繫比其他人群密切。下過鄉知識青年中，返城者中有相當比例的人有回到當年插隊地方的紀錄。當初雖然在農村吃了不少苦，但返城而且生活安定之後，他們能夠以一種較為輕鬆、憶往昔不勝感慨的心情懷念以往艱苦而豐富多采的生活。有的人還萌生了為自己生活、戰鬥過的地方作一點好事、幫助農民擺脱貧困的思想，甚至有人把子女帶到故地，讓他們懂得生活、懂得社會。當然，每個地方都留下了一些人沒有回城，這就為人們返鄉提供了動力，也提供了方便。

就總體思想傾向而言，這一代人是向右轉了，因為文革暴露了他們以前憧憬的關於「革命事業」、「革命鬥爭」、「社會主義」的種種問題。這一點在與同齡的西方青年相比就更加明顯。好幾個曾在英國牛津大學學習過的人都説，他們曾為自己的思想傾向與英國知識份子正相對立而驚奇不已。在牛津，英國教師多持激進自由主義態度，對保守黨的政策加以批判，而中國學生則多支持保守黨而不喜歡工黨，他們以過來人的眼光，訕笑工黨的社會主義政策。有一個多次參加國際政治學會議的學者説，在與西方同行的交往中，有一種明顯的錯位：來自西方的學者表現出批判資本主義、理解和同情社會主義的傾向，而來自中國的學者則相反。驚奇之餘思索一下，發現原因也很簡單：中國人是經歷文革，發現社會主義已經失敗的前紅衛兵，西方人是經歷1968年校園造反，對資本主義弊病仍耿耿於懷的前造反者。這一代人對大陸的政治體制和一般方針持懷疑或批評態度，但有一點例外，那就是在涉及民族主義感情方面，例如

在對待台灣、香港、西藏等問題上，他們是全力支持中央政府的政策，很少保留或批判。他們畢竟是在封閉的環境中長大的。

一個前中學紅衛兵頭領在接受採訪時總結說：「我們這一代人不能說掌握了權力，但可以說掌握了社會。」

二　獨立意識

如果說不同的人對文革有不同看法，那麼以前的紅衛兵至少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他們共同認為文革的積極作用之一是增強了人的獨立意識。北京一位被採訪者Y (幹部家庭出身，文革中參加造反派) 說：「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全國十億人就只有一顆腦袋，也就是說，只有毛澤東一個人能夠思維，其他的人只有服從。其結果是，毛澤東想對了，則全國的事都對，毛澤東想錯了，則全國的事都錯。文革後，每個人都發現原來自己肩上也長了一個腦袋，也可以自己動腦筋想問題，不能以別人的思維代替自己的思維。」

從總體上說，紅衛兵一代人已經拋棄了文革前和文革初期那種虛幻的理想主義和盲目的英雄主義，以及狂熱的個人崇拜。他們再也不會把領袖的意志當成絕對命令，再也不相信有「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他們或者以憎惡的態度，或者以苦澀的心情對待過去的革命信念，因為這種東西欺騙、愚弄過自己，或者是使自己吃盡苦頭。這一代人對官方的意識形態宣傳持疏離、警惕、嘲弄的態度，尤其對以階級鬥爭為名義進行的政治運動持否定態度，在80年代，中國又搞了幾次政治運動，如「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但這種政治號令在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人或中年中完全得不到響應，他們之中各人觀點並不一致，但對於再搞類似於文

革的清洗運動或大批判運動都抱厭惡和抵制態度。他們在平時可能言行各異，但一致地恥於在政治運動中充當積極份子。文革之後，若干中共領導人不斷表示中國再也不會發生文革這樣的運動了。他們本來想說，是最高領導再也不打算搞政治運動了，這沒有真正做到，他們在感到需要時還要搞。但中國確實很難再發生文革這樣的事了，真正的原因在於投入政治運動的號召再也得不到作為社會中堅的中青年響應了，而且，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的思想和感情強烈地影響了下一代人的態度。

1981年，當我還在念研究生時，我曾與一位老教師有過一次對話。他在1949年之前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搞外文翻譯工作，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在「牛棚」中關了近十年。他抱怨說，下一代年輕人經過文革之後，拋棄了革命理想和對國家的責任感，只重視個人生活，對政治冷漠。我對他說，這一方面雖然令人不滿意，但需要對他們拋棄的究竟是甚麼樣的理想和信念作具體分析。我告訴他，我從變化中看到一個進步，那就是，以後再沒有甚麼最高統帥或革命導師能以革命名義讓他們狂熱地造反了。我說：「再也不會有年輕人一聽號令就聞風而動，貼你的大字報，把你打成牛鬼蛇神了，你難道不感到更安全嗎？難道你還寧願下一代，像文革時那樣有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和不顧一切的鬥爭精神嗎？」我告訴他，如果將來不再發生文革的代價是青年一代沒有理想和信念，那麼我也寧願如此，他聽了之後長久沉思不語，心情顯然十分複雜。

這一代人，以及受他們影響的更年輕的人，有時把獨立意識不無偏頗地發展成一種逆反心理：凡是受到批判的，我就同情和支持。有個美學家告訴過我，他在中國聲名遠揚不是因為他的學問多麼精深，而只是有人不斷地批他、整他。他說，在某種意義上，他是靠受打擊吃飯，他受到的批判越少，關注和支持他的人就越少。

在整個80年代，形勢與文革前和文革時正好相反，以前是越批越臭，後來是越批越香。這種情況持續到90年代初，相當一段時間，市面上出售的與社會問題有關的著作，哪一本不是因為官方批判或下禁令而走俏呢？無怪乎有個人(文革初期參加紅衛兵，積極過一陣子)上書獻策，勸當局少搞批判運動，不要製造殉難者和英雄，此人對同代人思想的了解，倒頗為準確。

文革前，人們的依順心理還表現在每一個單位的人都盲目地服從領導，或者畏懼領導，他們和領導的關係幾乎成了人身依附關係。文革後，這一切都改變了。首先，人們再也不像文革前那樣，把反對一個小小的支部書記或工作組長當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罪。更何況，人們在文革中見到了無數事例，知道即使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也並非真正的罪人，沒有甚麼了不起。在文革中，人們看到，不論哪一級領導，不論一位領導人地位多高，聲望多大，並無神聖性可言，並不天然代表真理。人們對領導的神秘感和敬畏感消失了，在文革中經歷了大風大浪，增強了自信。一位曾當過市革委常委的前紅衛兵在採訪中說：「以前當學生時，覺得黨委辦公室裏的活動和會議很複雜、很神聖，自己當了官，而且是很大的官之後，才發現這些事很簡單。以前覺得領導凛然不可侵犯，文革後才發現他們也會點頭哈腰，你有權力時他們也會討好你。」另一個前紅衛兵則說：「我在文革中和省委書記平起平坐，現在對領導也不買賬。」

領導權威的失落，還因為他們在文革中被寫了大字報，人們對大字報中揭露的情況記憶猶新，他們再要在群眾面前擺出道貌岸然的樣子是做不到了。另外，領導們也在文革中吸取了教訓，他們不像文革前那樣絕對服從中央，完全不考慮群眾的態度和疾苦。當中央的命令與群眾的要求有衝突時(例如搞政治運動，或者削減群眾

的經濟利益），他們在上面和下面之間搞折衷，他們往往盡可能維護本行業、本單位的利益，消極執行中央的政策。群眾也完全知道，經過文革後，領導們不會再像以前那樣完全忽視自己的要求了，頭頭們將文革前的壓制群眾改變為盡可能維持與群眾友好的關係，有時還要討好群眾，因此，人們敢於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

文革之前，中國老百姓大多對於政治膽小怕事，許多人養成了「莫談國事」的習慣。文革之後，這種情況完全改變了，文革中幾乎每個人每天都在關心國家大事，大家養成了暢所欲言議論國家大事的習慣。而且，文革中長期、曲折、複雜的鬥爭還給人們增添了兩項經驗。第一，人們知道，報紙上說的只是當局希望老百姓知道的東西，而不是對事實的報導，只有通過一種高明的破譯技巧，才能從報紙的字裏行間猜出形勢的實際情況和當局的真實意圖。文革後，幾乎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掌握了閱讀官方報刊的技巧。第二，人們認識到，在中央集權制度下，自己的利益和前途往往取決於最高當局的重大政策，比如，大多數年輕人的命運曾取決於中央決定恢復高考和下鄉知青一律返城的政策。因此，他們不僅關心身邊的、本單位的事情，更注意分析中央一級情況。他們保留了文革中積累的政治經驗，用自己的頭腦判斷中國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事情。一位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的學生在採訪中說：「我現在看中央的政策完全有自己的眼光和標準，不管他們說得多麼好聽，我一定要好好分析，看這項政策是對知識份子有利還是不利。有利的我就支持，因為建國幾十年的經驗證明，凡是黨想整知識份子的時候，也就是民族要遭殃的時候。我們全家每個人都因為父親的問題在文革中吃了大苦頭，父親的境況和每個人是高興還是煩惱密切聯繫着。」

經過文革，人們大大增強了抗衡壓制或鎮壓的能力，人們發現

了當權者對群眾實施專制的秘密：他們雖然掌握了鎮壓群眾的暴力，但不是一遇風吹草動就立即使用暴力，而是讓人永遠感自己頭上懸着達摩克利斯劍。縱觀中國幾十年的情況，可以發現專制成功的秘訣在於利用一整套嫻熟的政治策略，首先在心理上瓦解被打擊者的信心和意志，達到不戰而降的目的。一般而言，不到萬不得已，當權者不會動用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因為維持「人民群眾的專政」這塊招牌對他們是至關重要的。但文革中人們對於虛聲恫嚇、孤立打擊、分化瓦解那一套見得多了，這些招數就不那麼靈了。1989春季，幾批知識份子簽名發表公開信，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當局馬上作出反應，或上門打招呼，或找人談話加以警告，並放出風聲，說這一事件有「中國民陣」的背景等等。簽名者中，個別老知識份子在哄壓下表示了悔意，說自己是不了解情況而簽了名，但這種手法對多數中青年不起作用，其中一位說：「這一套我們在文革中見得太多了。中共的思維和行為邏輯就是這樣：一遇不同意見，不管事情原委如何，馬上斷定有一個反黨陰謀，有人策劃和操縱，於是搞分化瓦解，爭取和穩住大多數人，留待以後再慢慢收拾，先集中力量孤立打擊挑頭的人，把一般人定為受蒙蔽者，命令他們反戈一擊。」當大多數群眾不再追隨鎮壓者搖旗吶喊，當被打擊的人中被孤立者不再恐慌，一般人不再相信背叛會有好處時，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的那種鎮壓方式就失效了。

文革之後，告密和叛賣大為減少。文革前，官方的意識形態為告密者免受良心譴責提供了一種自欺欺人的保護，於是有人以「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為藉口，向上級打小報告，或在壓力之下出賣人。文革初期各種整人害人，賣友求榮的行徑後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革後官方意識形態軟弱無力，黨的權威大大下降，以上藉口難於站住腳了。另外，文革中鬥爭多次反覆，人們難於確切判斷

一個行為一定會導致對自己有利的後果，文革中有大量事例教育人們，告密者不一定獲利。因此，除了道義上的原因，實際利益的盤算也使人不輕易使用告密手段。另一方面，不少掌權者也從文革中汲取了教訓，他們不再那麼喜歡告密者，他們明智地認為：這個告密者今天向我告密，可能下次就會把我賣出去。在1976年「四五」事件和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出現了許多告密者不但不能討好，反而行為暴露，遭人厭棄的事例。「六四」事件之後，當局進行了大規模的、長期的清查運動，但許多人反映，被清查者普遍地不存在有罪或有錯的感覺。相反，倒是不少清查者私下向被清查者表示同情和安慰，以求得諒解。文革之後，人們普遍肯定了個人價值，個人的尊嚴，個人的利益，不再像文革前那樣，只是將自己視為實現領袖意志的工具。上海著名紅衛兵首領安文江在總結文革經驗的文章中說：「〈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長期以來，強權專制缺乏對人的價值的重視，對人的尊嚴的關注，對人的命運的關懷，無限擴大的階級鬥爭更使人與人成了『狼與狼的關係』。個體的人被剝奪對自由的追求，對幸福嚮往，對個性的全面發展。」而現在，「我驕傲地說，我的確活得很青春，很灑脱。我終於成了我自己的上帝。」②

三　道德危機

文革不僅改變了大多數前紅衛兵的政治信念，而且還改變了其中許多人的道德觀念。但兩者的後果有所不同，對原有政治信念持懷疑或否定態度所形成的信仰危機或信仰真空只是鬆動或瓦解了一元論的、獨斷的政治教條，但拋棄舊道德之後未能確立新道德而形

成的道德危機和道德真空，卻會對社會和民族造成損害。固然，虛偽的、不合情理、不能持久的說教破產了，但克己自律的精神，為國為民的信念也不多了。在文革前，對青年學生進行道德說教的核心是絕對服從，最典型的提法是：「聽黨的話跟黨走，一生交給黨安排」，「做黨的馴服工具」。文革中「造反有理」的精神深入紅衛兵一代人的骨髓，他們得到的最大教訓就是不能盲目服從，反權威主義是這一代人在文革後的普遍傾向。但是，對其中部分人而言，崩塌瓦解的不僅是政治神像、舊有的意識形態體系，還包括文革前人們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準則。對有些人來說，任何規範都是虛偽和有害的，任何束縛都應該衝決，遵守規則成了迂腐和頭腦僵化的表現，一些基本行為準則，如信守諾言、遵法守紀(例如在工作中克盡職守，不佔公家便宜等等)都被拋棄到九霄雲外。這些人根本不講操守和慎獨，只要做了壞事不被發現，或發現了不受懲罰，就可以為所欲為。

文革前，官方要求青年無條件地犧牲個人利益，為國家、為集體、為他人毫無保留地獻出自己的一切，經過文革，青年們看到，在那些提倡「毫不利己、專門為人」的當權者之中，許多人權欲、利欲熏心，他們要求人民群眾利他，無非是自己可以因此而輕易獲利。文革中和文革後當權者以權謀私的行徑不像文革前那麼包得住了，人們在憎恨當權者的虛偽之餘，也得到一個結論：如果不自己爭取和維護自己的利益，黨和國家是不會像他們所宣傳的那樣來照顧自己的利益的，人們自然地把個人利益置於首位。但是，有的人因為當權者把私利與公利混為一談，自己也理直氣壯地以私利侵犯公利，有人把私利看得如此之重，已到了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的地步。在這一代人中，當有人因樂於助人或利他損己而被稱為「雷鋒」時，這只是「傻瓜」或「不合時宜」的另一種說法。文革之後，報紙上已

有多起報導，說有人落水，圍觀者見死不救；歹徒行凶，人們袖手旁觀而無人見義勇為；還有許多人一本正經地討論，大學生冒着生命危險救一個普通群眾是否合算？從以上種種行為可以看出，在今天，道德律令對許多人已不起作用，露骨的、鄙俗的利己主義極為風行。

文革前，青年學生普遍持道德至上主義態度，並以極為教條的方式理解和執行當時的道德訓誡。對他們來說，「德」是人生的出發點和歸宿，人的任何其他素質，如能力、個性等等，和德比較起來都是微不足道的。比如，當時許多學生相信，一個大科學家或大藝術家，如果不首先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就很有可能於人民和人類無益。對他們來說，人出生在世就已經帶着原罪，這不是基督教中亞當和夏娃的那種原罪，而是指須要克服一輩子、改造一輩子的「資產階級思想」。他們對生活抱禁欲主義態度，並且以極度誇張的方式表示他們立場堅定、愛憎分明。比如，扔掉吃剩的半個饅頭不僅是浪費糧食，而且是思想品質腐敗的表現，是忘本和變修的第一步。愛穿漂亮衣服會受到下列警告：資產階級的腐蝕往往是從生活上打開缺口的！他們不但被要求要嚴於律己，「狠鬥私字一閃念」，而且對他人絕不寬容，對任何「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和行為，不論它們出自同學朋友，還是老師、長輩，都要立即對之進行鬥爭，否則便是自由主義，而這據說是革命的大敵。文革之後，人們一改過去嚴峻苛刻之風，並走向其反面——道德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玩世不恭被認為是正常的，維護某種行為準則會遭到嘲笑，在道德上認真被視為虛偽：對自己認真是可笑和自討苦吃，對他人認真是可惡。人們逐漸養成了不干涉他人私生活的習慣，這相對於文革前是一大進步，但人們竭力迴避對人的行為作道德評判，即使是有善惡是非觀念的人也羞於談論善惡是非，否則可能被認成是「有病」。

在文革前，青年學生首先和經常思索的問題是生活的意義，他們思考得認真艱苦，實踐得嚴肅甚至悲壯，為了達到「革命化」的標準，他們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為的是在現世躋身於革命隊伍，在來世靈魂升入共產主義天堂。文革之後，追求意義成了過時的事，成了頭腦呆板的表現，人們最經常抱怨的是「活得太累」，最大的願望是「輕鬆」，最嚮往的是「瀟灑」。「意義」一詞的含義在各個領域被消解掉了，對生命價值的追求，對社會正義的追求，對科學藝術中真和美的追求，對美好未來的期待和嚮往成了不合時宜的事情。人們羞於、恥於談論高尚、美好的東西，即使有人追求這些東西，也不得不用一些十會功利、世俗的言詞來加以掩飾。正如石文安(Anne F. Thurston) 對文革後果作總結時所說的③：

> 潛藏在對於文革後果各種反映後面的是一種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價值的失落；地位和榮譽的失落；前途和尊嚴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時間、真理和生命的失落；總之，幾乎一切使生命有價值的東西的失落。

道德問題還表現在，文革從政治上鍛鍊了紅衛兵，使他們不再盲從權威，不再懼怕政治高壓和打擊，但與此同時也使不少人學會了政治鬥爭手腕，練就了政客的頭腦和意志。文革中，紅衛兵學會了，凡要獲取利益，就必須掌握權力。這一代人的權力欲，對權力分配的敏感，肯定超過其他人。他們還學會了，要掌權，就要先造輿論，爭取群眾；如果有競爭對手，就要設法孤立、打擊；如果自己力量不夠強大，就要結盟，設法分化瓦解對方的力量，等等。文革造就了成千上萬的小政治家，他們有權力欲、有眼光、有鬥爭意志和技巧。這些人在爭權奪利時老練和無情。

當80年代初這批人中的佼佼者到國外留學，與西方或港、台同齡人相比時，他們的精神氣質和道德風貌便顯得特徵突出了。西方青年相比之下是異常的天真、輕信，而大陸學生則閱歷豐富、工於心

計。港、台學生相比之下文化訓練和教養程度要高一些，但大陸留學生覺得他們像循規蹈矩的小職員，自己則更具革命活動者或政治家氣質。他們打量着自己的海外同胞，會情不自禁的產生傑克·倫敦(Jack London)當初置身於上流社會的感覺：他們純潔、優雅，但沒有活力(clean, noble, but not alive)，自己呢？富有心機和活力，但令對方感到禮儀不足，且身懷韜略，令人生畏。戲劇家沙葉新以年長者的口氣預言，曠世奇才、大奸大雄都會出自這一代，此話有相當的洞察力。

針對文革之後道德衰頹的現實，有人力圖把原因歸結為文革損害了共產主義的道德和理想，他們把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描述為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生活中處處有雷鋒的道德黃金時代，他們認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加強教育，回到那個美妙的時代。事實證明，這樣的解決辦法行不通，必須首先指出，他們對50、60年代的描述並不正確。

在文革中當過紅衛兵的一代人中，許多人不諱言當代世風日下的趨勢，但他們認為50、60年代並不如某些人說的那麼好，而現在的局面也不如他們所說的那麼壞。他們指出，在50、60年代也有觸目驚心的道德問題，上層的腐化和巧取豪奪由於精心掩蓋而不為人知曉(文革中的揭發才使人大吃一驚)，下層的問題由於沒有新聞自由未能流傳開來。另外，50、60年代表面的道德風氣清純不能抵償以下兩方面的巨大代價，一是人們在高壓之下喪失了主動性和創造性，二是政治清洗和鎮壓使許多人喪生，政策失誤使數千萬人死於饑饉。如果可以說文革的爆發是一個突然事件，那麼人們的道德水準和精神狀況卻不會有突然變異，而應具有相當大的延續性，然而文革一開始人們就表現出令人瞠目結舌的野蠻、殘忍，產生了那麼多告密和誣陷，這很難證明文革前中國人道德水準有多高。

戈爾德(Thomas B. Gold)在一篇分析中國人際關係的文章中表述的觀點值得在此一提，他說：傅高義(Ezra F. Vogel)在1965年寫

過一篇經典性文章，叫做〈從人情到同志關係：共產中國人際關系的變化〉(“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其中認為，自1949年以來，中共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把人際關係的標準和行為特徵從中國傳統的人情式轉變成了同志式，這種價值轉變主要是通過恐懼而達到，文革極左派領導以極端、粗暴的方式改造人，超過了人性忍耐的界限，使以前的價值和典範失去信譽。文革使人甚麼也得不到，迫使人們尋找非正常渠道。以前革命的、階級的關係變成了重視私人關係，於是有現在的走後門、拉關係、請客送禮，等等。這表明中國的人際關係又回復到傳統模式的趨勢④。

我認為這麼說是恰當的，在50、60年代，中國的道德問題由於政治高壓和奴化教育而處於隱蔽和潛伏狀態，表現出來的是虛飾的升平景象，文革之後問題就顯現和突出了。

人們普遍注意到，目前的道德危機和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密切相關。文革之後，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開始發生巨大變化，這些變化不過是一個更長期、更深刻的變革過程的開端。在此期間，舊的道德被否定，而新的規範尚未建立，於是產生了道德脫軌或失範。石文安在北京採訪的一位社會科學研究者說⑤：

> 現在中國有一種認同危機，類似於杜克海姆 (Emile Durkheim) 在他對於無目的 (anomie) 這一問題著述時所描述的危機。準則是人類行為的基礎，但現在準則已經分崩離析，而沒有新的準則來代替。因此，我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正面臨一個無目的時期，人們不能肯定他們在追求甚麼，他們要甚麼。他們想要改變，但甚麼樣的變化是合適的，他們並不確切知道。

我採訪的L，前北京中學紅衛兵頭領，現北京某飯店副經理，則表現了十分樂觀的態度。他說，紅衛兵一代人是在革命教育和計劃經

濟體制中長大的，他們被教導要一心一意幹革命，但到頭來一無所獲，因此他們，以及比他們更年輕的人對舊道德持批判和否定態度。現在的人處在不完善的商品經濟體制中，國家不再包辦一切，因此，每個人要照顧自己的利益既是合理的，又是必要的。現在的商品經濟尚不完善，許多人作出了貢獻而得不到適當回報，權力在獲取經濟報酬中還起很大作用，這些使得人與人之間交易不規範，使有些人自私自利。到了商品經濟完善，公平交易實現之後，人們的道德將會面目一新。

我不敢持如此樂觀的態度。我認為，未來不可能是這樣：隨着良好的經濟秩序確立，人們的道德水平將自動提高。情況很可能是，人們現在的道德水平將決定在未來能否順利建立良好的經濟秩序。至少，這兩個方面是互相影響的。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文革之後的道德危機不僅表現在紅衛兵一代之中，更表現在更年輕的一代人之中，很可能還要表現在紅衛兵這代人的子女之中。

當然，我也不是過份悲觀。我認為，文革導致舊道德的崩潰，不如舊政治信念那麼徹底。不管文革前的道德說教包含了多少盲從、奴化教育的因素，它和每一時代的道德訓誡一樣，不得不以普遍律令的形式出現，它必定包含一些永恆和普遍適用的東西(毋庸多言即可知，掌了權的統治者自然希望社會道德風化是好而不是壞)，比如「為人民服務」、「公而忘私」，等等，不管人們是只繼承它們的一般形式，還定堅持其中的意識形態內容。另外，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時時會表現出一種道德直覺，人類向善的動力自然存在，永不枯竭。缺乏完整、合理的的道德體系固然是一個問題，但還不致於導致道德的全面崩潰。

不論怎麼說，文革對中國年輕一代道德的負面作用是不容忽視的。辛格 (Martin Singer) 說得好⑥：

> 對大多數中國青年學生而言，文革代表了一種傷害性的失去政治上的純真。這種純真——以及相伴的樂觀和獻身精神——對於奮力拼搏以告別過去並在現代各國中確立自己地位的國家而言，是很有價值的資源。這種純真只會失去一次……這種純真失落了，這是文革的真正悲劇。

四　代際差異

紅衛兵這一代人的特殊經歷，他們在文革後所持的特定政治態度和生活態度，他們對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強烈的異己感，使當代中國的代際問題變得十分突出。不論這代人身上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孰多孰少，有一點是必須正視的：他們在80年代和90年代扮演了社會中堅的角色，因此，研究他們的特徵，他們與上、下兩代人的差異，是很有意義的。

在每個時代和每個歷史時期，各代人之間總是有差別的。但對於平穩發展的社會和歷史時期而言，代際差異和衝突有如江河的前浪和後浪，具有重複和相互轉化的性質。子女輩終究要變成父母輩，他們年輕時會指責父母保守，壓制下一代，當他們變成老一代時，又會受到自己子女的相同指責。在中國，有「二十年媳婦熬成婆」的說法，形容代際間差別的轉化和循環。文革中紅衛兵這一代也有同樣特徵，他們指責上一代不開放和壓制，他們也遭到更年輕的人的同樣指責。但特殊之點在於，他們經歷的文革是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因此，他們和上、下各代之間關係的模式不可能隨着時間推移而在後面重現。

紅衛兵這代人一般被稱為中國的第三代，至於從第一代到第四

代如何定義和劃分，有不少文獻作了探討，各自形成自己的標準⑦。這裏不專門研究代際理論，只取一個粗略的劃分界限。一般把中共打江山的那批革命者，以及(用中共的語言來說)「舊社會培養的知識份子」稱為第一代；把50年代和60年代初受高等教育，即「新中國培養的知識份子」稱為第二代；把文革爆發時正在大學和中學學習，本書中稱為紅衛兵一代的人稱為第三代；把他們之後的人稱為第四代。

首先來看看代際衝突，我們發現，每一代人對其他人的評價都是貶抑的、尖刻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人對第三、四代人持懷疑和批評態度。前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預言的「和平演變」似乎正在他們身上實現。第一代人(不論是掌權者還是在文革前十七年中享受優厚待遇的知識份子)對第三代人在文革中衝擊、鬥爭過他們耿耿於懷、記憶猶新。第二代人對第三代人態度更為嚴峻，他們不僅在政治信念和生活態度上有很大差異，而且在地位、權力、社會資源方面存在某種競爭關係，這兩代人互相瞧不起，第二代指責第三代頭長反骨，野心勃勃，第三代指責第二代對上奴顏媚骨，對下以勢壓人(這裏着重講區別和衝突，相反情況無疑很普遍，尤其是第一代老知識份子與第三代青年知識份子之間，有一種近似祖孫輩之間的隔代相親)。

對於第一、二代而言，三、四代之間的差異是微不足道的。但實際上，這兩代之間互不理解，有時甚至是互抱敵意，達到了很深的程度，兩代人都把自己的偏見和批評見諸文字。我在採訪前紅衛兵時，聽到了他們之中大多數人對第四代的批評，最集中的是指責他們的極端利己主義和沒有社會責任感。下面引論兩段文字批評。

楊帆說⑧：

> 第四代人的生活，顯然比第三代人要輕鬆得多。他們的心理結構已發生變化，幾乎是完全個人主義的。他們肩上沒有「歷史

必然性」的包袱，不去為國事煩惱。甚至對自己的事，他們也不煩惱。當第三代人為入黨、提幹苦苦追求而不得時，他們卻連入黨申請也不寫。要「自由」而不要名利，也不要事業，是第四代人比較普遍的狀況。在性關係上，他們比第三代要「自由」得多，普遍的早戀、婚前同居，比起第三代一些人苦苦追求愛情而不得，想要離婚又不能的狀況，真是無比輕鬆自在。

凌巍說⑨：

這一代的特點是非傳統性和開放傾向，有寬度但少深度，故易於接受外來的新鮮事物，一觸即發(儘管先學到的是表面上一層)，適應性強。他們追求個人的價值，但往往物質化過強，理想色彩較淡。這一切都因為他們的少年兒童時代正趕上了十年動亂。因此，缺乏系統的知識教育，缺乏理想教育和傳統價值觀的教育，這一代人可以叫做「文化隔斷的一代」。

相應地，第三代人在第四代人眼中的形象也並不好，以下是《第四代人》一書中的評價，據調查，這種看法不是個別人的意見。

第三代被認為是性格極其複雜，令人捉摸不透的人，他們說話真切、率直，經常將自己的過去、自己的靈魂掬示於人，但你仍能感到他們心中還是深藏着一些東西。他們看起來天真無邪，與人相交無欺，但在人毫不覺察時會使人落入圈套。由於文革，第三代人的單純心靈變成了政治板塊，他們唯一的興趣和志向就是政治，在投入政治鬥爭時，他們可以把友誼和親情擊得粉碎。他們留戀文革那叱咤風雲的年代，希望那個時代留得更長久些。當新時代到來時，他們毫無準備，他們搭不上命運的列車，但又心有不甘，他們拼命追趕，力圖抓住一點甚麼。這一代人有明確的整體意識，因為他們所有的人都是被文革耽誤了的。他們既未受到系統、正規的教育，又沒有甚麼文學才華，但他們拼命通過文藝表現自己，在社會上大聲喧嘩⑩。

當我在北京採訪一位前中學紅衛兵時，他告訴我，一個屬於第四代的年輕人輕蔑的話語刺痛了他。那人說：「你們被文革耽誤了，結果是一無所有。說本事，你們沒本事，你們當中有多少人能考托福出國？你們沒有文憑，你們有多少人上了大學，念研究生？你們沒有地位，你們錢掙得少，第四代人馬上要衝掉你們在社會上的位置。」我的被採訪者現在是作家，在單位是處級幹部，還剛發表了一部長篇小說，他不過是沒有正規大學文憑而已。他都會受到很大的刺激，可以想像其他地位遠不如他的人面對年少氣盛者的蔑視心情是多麼沮喪了。

如果能盡可能不帶偏見，並去掉褒貶色彩，或許可以對第三代人的特徵作以下描述。

他們比其他人經歷坎坷，由於文革，他們的青春被耽誤了，其中大多數人沒有得到生活本應提供給他們的東西，尤其是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文革之後的下鄉，以及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遲遲實現的返城，使他們在職業、婚姻、待遇各方面遇到一系列嚴重困難。當生活中剛冒出一些機會(如恢復高考，經濟改革)時，他們在和下一代人的競爭中卻顯得軟弱無力，時代和社會對他們確實不公正，但歷史往往是不公正的，而且在製造了不公正之後照舊前進。

他們比上一代和下一代有更強的整體感和自我意識，因為文革確實給這一批人打上了鮮明的烙印，共同的經歷、境況和心態使他們能敏感地辨識同代人，並產生榮辱與共的心情。由於經歷複雜和遭遇不公，他們表達自己經歷的欲望十分強烈，由於文革的鍛鍊，他們善於做到這一點。文革之後的各種小說、回憶錄⑪，使人們強烈關注這一代人的遭遇，1990年底在北京舉辦的展覽「魂繫黑土地」以及1991年春在成都舉辦的「青春無悔」引起轟動，1995年電視劇《孽債》成為全國的熱烈話題，就是證明。

他們一直保持和顯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政治興趣和社會關懷。雖然文革使他們上當受騙，使他們宣稱厭惡政治，但他們總是習慣於從政治上着眼看待中國的各種問題。也許這是因為文革前的教育使他們習慣地認為，關心國家和社會比關心一己私利高尚；也許是文革中的經驗使他們認識到，解決局部問題有賴於全國形勢的變化和一般性政策的實施。他們之中不少人成了作家、學者，但這些人的興趣很少局限於純文學和純學術領域，他們多多少少熱衷於政治文化，從來不忘「文以載道」。這一代人在政治上曾受過大挫折，但仍然相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這代人曾有輝煌的過去，但其中許多人的現狀卻是碌碌無為，這種巨大落差使他們產生難於擺脱的失落感。他們表現出強烈的自我中心主義，認為自己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中仍將起到關鍵作用。他們自認為是承先啟後的一代，既有前輩的理想主義和社會責任感，又不像他們那麼因循守舊；既有後一代那樣的開放性和對新事物的敏感，又不像他們那樣極端利己和玩世不恭。

如果説，在中國的中青年一代中有甚麼信仰危機和道德危機，那麼這主要指的是第三代人。第二代人作為總體與原先的意識形態沒有決裂，第四代人與舊信念淵源甚淺，談不上否定和拋棄。只有第三代人對昔日的信念懷着愛恨交織的感情。他們的價值取向中仍保留着古典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成分。他們對舊意識形態的清算最熱心，但以前所受革命和理想教育的根基卻並未從心中徹底消失，就像《牛虻》中的主人公亞瑟，在公開的政治鬥爭中無情地嘲弄和打擊蒙泰尼里主教，但內心深處仍把最神聖的一角為他保留着。這一代人最能體現新舊交替的紊亂和困惑，他們比其他人更沉重地承載着歷史的負擔。

第三代人身上抹消不掉的政治化傾向和歷史感不但與他們的文

革經歷有關，也與他們文革前的教育有關。第四代人是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西方思潮大量湧入時接受教育的，他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情趣更為開放多元。但是，恰恰是在政治方面，他們受了第三代人的強烈影響。在1977和1978兩屆大學生中，兩代人共居一校或共居一班，那時第三代人無疑成熟得多，尤其是1980年在全國高校普遍掀起的競選人民代表的風潮中，第三代人大唱主角，第四代人的政治傾向就是在第三代人的強烈影響下形成。在1989年風起雲湧的民主浪潮中，這兩代人共同投入，在政治思想上已看不出甚麼差別了。

上面談到第三代人的特徵時，實際上主要指紅衛兵一代人中前中學生的特徵，這批人被稱為「老三屆」。一般人往往把他們的特點當成整個第三代人的特點，這是因為他們在第三代中佔大多數，而且在社會上只聽到他們的聲音。事實上，只談代際區別是不夠和不準確的，前紅衛兵中大學生和中學生的區別同樣引人注目。

文革後一個明顯事實是，前大學生中除個別優秀人物在社會思想領域發表深思熟慮的見解外，大多數都在本職崗位上埋頭苦幹，把社會輿論空間拱手讓給了前中學生，而前中學紅衛兵在社會上活躍異常，這與文革的情況恰成鮮明對照。這方面最有力的證據是，文革後新一代活躍的小說家、詩人、畫家、電影導演等等幾乎全是老三屆的人。初看起來，他們對生活的理解，他們的審美情趣，他們的政治批判態度和政治理想，似乎支配了中國的文化舞台。為甚麼同樣當過紅衛兵，後來在行為上有這麼大的差別呢？原因僅僅是年齡嗎？

除了年齡差別外，還有多方面原因。年齡差別在運動後期就顯示出來了。當紅衛兵在政治上失望之後（大約在1968年），大學校園內戀愛成風，再過兩三年，大學生們紛紛張羅結婚之事，而中學生

則不是這樣，他們在文革後期受到的對待、他們自己的表現都和大學生判然有別。文革後期當局對中學生的懲處要輕得多，除了個別地區，一般只追究嚴重的刑事犯罪問題，而大學生則普遍受到追查和清理，這使大多數大學生對政治感到恐懼，自願或被迫地遠離政治。中學生的生活待遇與大學生迥然不同，大學生在文革後領取工資(在當時中國社會中相比而言還相當可觀)，進入國家幹部行列，而中學生則被迫上山下鄉，這迫使他們正視中國社會的苦難，思索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雖然大學生中也有許多人下到農場，或分配到基層，但大中學生在經濟地位上的巨大差別使得他們對社會的感受會有所不同。另外，大學生有自己的專業，雖然許多人只念了一、兩年書，但他們在文革後已另有奔頭，他們力爭找到適合自己專業的工作，希望通過進修和自學完成專業訓練，其中的佼佼者還想在科學技術上有所作為，這些說起來不算庸俗的打算把大學生的興趣從政治和社會問題方面轉移開了。而中學生談不上自己的專業，他們之中聰明、有上進心的人大多把興趣放在便於自修的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只有少數人自學數理化和外語。

雖然中國文化陣地上到處活躍着老三屆的人，但這並不意味着紅衛兵大學生這一代放棄了在中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發言權。他們起另一種作用，這種作用是靜悄悄的，但卻是巨大而有力的。比起紅衛兵中學生來，大學生在科技、行政部門佔有更高的權力地位。文革結束後，人們發現由於高等教育中斷近十年，由於一大批領導和業務骨幹在經歷運動後因年齡或受過迫害而被自然淘汰，因此在行政和業務領導崗位形成了斷層，於是紅衛兵大學生紛紛被提拔，佔據了這些位置。他們當然不會像中學生一樣在社會上盡情喧嘩，但在決定中國未來的各種力量中，他們是十分有力的因素，他們在文革中獲得的經驗決不會不起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前

大學生(雖然為數不多)對於參與中國社會變革有着高度的自覺意識，他們或是在參與制定政策和改革實踐方面，或是在更新中國文化傳統方面擔當了重要角色，發揮着巨大作用。中國的社會條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他們在文革時萌生的歷史感和逐漸成型的批判意識卻沒有改變。

一般而言，每一代人都過份珍惜和鍾愛自己的獨特經驗，都誇大自己的苦難，都強調自己的作用，總之，都有自我中心傾向。上面談到的代際差異和衝突，是不精確和有誇張成分的。顯然，這種差異將隨着歲月的流逝而變小。

五　文革中的「民主」和文革後的民主運動

文革結束之後不久，從進入80年代開始，以青年學生為先導和主力的民主運動開始湧現並不斷發展壯大。這種運動明確提出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口號，希望逐步改變現存的一黨專政制度。這和1957年由於毛澤東號召而產生的大鳴大放不同，也與文革中因為毛澤東鼓動而掀起的造反運動不同，這是群眾自發的運動，是以世界公認的價值準則為訴求，而不是受黨內派系鬥爭左右或影響的運動。事實上，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可視為這種真正的民主運動的開端，它雖然表現為群眾支持黨內溫和派，反抗文革派，但它的基本精神是反對專制和獨裁。「秦始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這個口號足以標誌中國人民的覺醒程度，標誌中國真正的民主運動的開端。就此而言，文革結束是和民主運動興起同時發生的。

同樣是在毛的授意和煽動下向黨發起批判，1957年的鳴放運動最後變成了反右鬥爭，興奮了一陣的知識份子成了「人民的敵人」，

而文革卻導致了真正的民主運動，這是為甚麼呢？顯然，這不能僅用「時代不同了」作為解釋，我們需要對文革和民主運動之間的關係作出分析。

文革和民主運動的聯繫是不難被人注意到的。邁克爾 (Franz Michael) 早在1967年就預言：「毛攻擊黨組織可能要為爆發巨大的群眾性不滿打開口子，而隨着偶像的跌落，這可能變成反對共產主義本身。」⑫約瑟夫 (William A. Joseph) 則說：「政治變革的一些最緊急和有說服力的要求出自以前的紅衛兵，特別是出自那些有幸完成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現在在運動的前線為中國民主事業作先鋒，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他們和同代中的許多人一樣具有政治上的懷疑精神，但他們是積極投入而不是漠不關心。」⑬他們的說法是對的，群眾由毛挑起攻擊毛在黨內的政敵，但後來發展為攻擊黨本身，文革運動的先鋒紅衛兵在運動後期投入了民主運動。但我們需要更詳盡的分析。因為人們自然會問，不論從中共黨內民主還是從國家法制觀點看，文革都是反民主的，這一場黨內血腥的鬥爭怎麼能孕育出民主運動呢？難道毛澤東在文革中恩賜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再加上大串連，就產生了真正的民主嗎？

有些文革研究者和前紅衛兵認為，文革本身就是一場民主運動，或者至少是日後民主運動的預演。他們之中有的人提出，中國人民在文革中真正享有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另外有人提出，毛澤東反官僚特權的思想為中國人民爭取民主和自由提供了思想武器。從這些說法可以推論，文革後的民主運動不過是在繼續實踐毛澤東的文革理想，不過是要恢復人們在文革中一度享有的政治自由。

我堅決反對這種看法，在深入討論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看這種見解的具體表述。

依斯梅 (Jean Esmein) 認為，文革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在文革一段時間中，人們「贏得了完全的出版、結社自由」⑭。

楊小凱在一系列文章中反覆說，文革中人民享有結社自由。比如：「毛澤東以支持結社自由，支持造反派的辦法，換取中國民眾對他搞掉劉少奇、鄧小平的支持。」⑮「1966年8月到1968年中，有兩年時間，毛澤東下令停止軍隊外的共產黨組織活動，允許市民在政府註冊自組政治組織……當時的中國有真正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市民運動。」⑯「『十六條』正式規定學生可以自發結社。而這種非官方結社在中共歷史上都是反革命……不管文革中的紅衛兵相信甚麼意識形態，三人為伍就可以成立『戰鬥隊』，這本身是個很大的制度變化。」他還把群眾造反派組織稱為「政黨型組織」⑰。

晉君在〈談毛澤東後期可貴思想〉中說：「毛澤東同志的偉大之處正是在於，他對他親自建立的國家採取了批判態度，衝擊了一個他當主席而應當維護的社會秩序，對他擔任主席的黨採取了批判態度，衝擊了一個他之所以稱為主席的黨……」⑱

許多文革研究者和前紅衛兵都不同意以上觀點，他們認為人民群眾在文革中並沒有享有民主和自由。

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指出：「文革中『敢於造反』的權力並非人民固有的權力，而是被奉為神靈的毛的權威給予他們的權力，因此也是可以由他收回的權力。」⑲

G.杜特和V. P.杜特 (Gargi Dutt and Vidya Prakash Dutt) 指出：「毛給了學生集會、結社、言論和出版的權力，這些權力以前是一直沒有的，這些權力只是使學生可以鬥爭毛的打擊對象。」⑳

當然，還是中國人說得一針見血㉑：

打倒劉少奇了，你就有批判劉少奇的自由。

「英明領袖」上台了，你就有歌頌「英明領袖」的自由。

林彪是「副統帥」了，你就有敬祝他「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的自由。

林彪葬身溫都爾罕了，你就有說他是個逃兵，是個常敗將軍、鴉片槍將軍的自由。

「批林批孔」了，你就有說孔子是個色鬼、吸血鬼的自由。

「反擊右傾翻案風」了，你就有認為武則天、呂后是大法家、大革命家的自由。

……

在「文革」十年裏，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對於人民來說，只是鋼板與複印機，刻上甚麼，就是甚麼，要複寫的是甚麼，就是甚麼。

一位被採訪的大學紅衛兵說：「在大事情上，毛能駕馭形勢，收放自如。如他派工宣隊管學校，一下子就把紅衛兵平下去了。我們當時不光是服從，在內心也覺得應該如此。誰也不能說不要軍宣隊，不要工宣隊。我們曾經浴血奮戰，在社會上所向披靡，有人甚至當了省革委副主任，但說退就退。因為當初起來就是毛發號召，中央發文件，現在又是命令和文件，豈能不服從？」他稱紅衛兵在文革中只是「受權革命」。

文革中著名的「公安六條」充分證明文革中並未給予人民言論自由。這個規定的正式名稱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發於1967年1月13日，其中第二條規定，凡攻擊毛澤東和林彪都屬於現行反革命行為，要受到懲處。第五條規定，「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其他手段，散布反動言論」的，要受到群眾鬥爭，或由公安部門處理。「十六條」中也規定，「四大」是用來「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的。顯然，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只是打倒「階級敵人」的手段，並不意味着言論自由。據統

計，在上海市，僅因「炮打中央文革」(即反對張春橋) 等罪名製造的冤假錯案就有二十四萬九千起，受到株連的群眾在一百萬以上㉒。

與楊小凱講的不同，「十六條」並沒有保證學生的結社自由，關於組織形式，它只提到「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並且說它們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十六條」強調運動中不整學生，但又補充說，對於「真正的右派份子」，要放到運動後期處理。這也證明，「十六條」要保證讓學生起來造反，打「走資派」，至於其他越軌行為，則在毛達到目的後再來收拾。

當然，文革中對於人民群眾的言行的禁令是大大放寬了，這使得像楊小凱、李一哲等人趁機發表了非毛澤東所願的言論，也有少數人結成自由探討和學習的組織。但是，當局一經發覺，就立即取締和鎮壓。文革中成千上萬的人因言獲罪，因組織「共產主義學習小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之類組織而入獄。其中不少人甚至被判處死刑。這哪有一點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的影子？至於造反派組織，它們純屬毛澤東打倒政敵的工具，當毛達到目的後，一聲令下就把它們解散了，這算甚麼「政黨型組織」？當然，在群眾運動中，有個別人可以利用群眾組織作掩護幹一些與文革無關的事，但這並不能改變群眾組織的性質，就像有人可以抱着自己的目的鑽進共產黨一樣。

毛澤東鼓動群眾攻擊現存的黨政體制，是否說明他站在群眾一邊，為他們爭自由、爭民主呢？是否說明毛發動文革的目的是要摧毀官僚特權呢？當然不是。王希哲回答晉君時說的話雖然有可商榷之處，但本質是正確的：「毛澤東的反動之處恰恰在於，他不滿意這個按照斯大林模式建立起來的黨和國家已經達到的專制程度和極權程度，他要求更加專制和更加集權，而黨內民主改革派阻礙了他

的這一企圖，這一阻礙嚴重到了這個地步，甚至危及到了他繼續騎在這個黨的脖子上號稱主席的前途，於是，他才下決心衝擊這個黨，粉碎這個黨，建立一個毛澤東法西斯黨。」毛澤東不能以黨內合法鬥爭手段清除反對派，「除了欺騙人民，利用人民，別無他法。而要欺騙人民，就要把自己真實的意圖隱蔽起來，掩飾起來。於是，毛澤東告訴人民，那些反對派們都是一些很壞的傢伙，是一些官僚，他們一上台，人民就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那些反對派打倒而讓毛澤東永遠在台上。理論上這就叫做使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除了毛澤東之外再沒有別人了！」㉓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文革中的大民主並不是真正的民主。一位前中學紅衛兵在採訪時說：「文革中一段時間紅衛兵幾乎可以為所欲為，他可以不經過法律程序就揪鬥、抓捕『牛鬼蛇神』和『走資派』，這不是民主，而是無法無天。如果我們紅衛兵這麼做是對的，那麼當我們挨整時又有甚麼理由抱怨呢？」另一個說：「文革中，除了李一哲的大字報，那麼多異端邪說都沒有正確論述民主問題，我和周圍的人後來對民主的認識是文革後獨立思考的結果，不是文革中產生的要求，我們的民主意識基本上屬於新生，而不是延續。」

當約瑟夫指出以前的紅衛兵現在是民主運動的先鋒時，他緊接着說：「他們再次對中國的政治制度作出深刻評論，但現在他們要求的是像分權、監督、制衡、競選、法治、出版自由這樣的東西——他們一度視為不過是資本主義圈套的那些原則和程序」㉔。

如果說文革起源於中國的專制制度，其目的是加強毛的個人獨裁，那麼怎麼解釋文革之後中國民主運動的興起呢？文革前，在中

國根本談不上有民主運動，任何小範圍內爭取民主的努力都被扼殺在襁褓之中，而自從有了文革，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就目睹了多次大規模的民主示威。任何人，不論他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態度如何，都承認中國民主運動因為文革而產生的實質性發展。但前面又說，文革本身既不是民主運動，也不是民主運動的前奏，它的目標和理論也絲毫無助於促進民主，那麼文革是在哪種意義上促進了民主運動呢？

我認為，任何要在二者之間找到因果關係或直接聯繫的企圖都會導致錯誤，但看不到二者的密切聯繫就不能理解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起因和特點。關鍵在於，二者的聯繫是間接的、複雜的、曲折的。但可以肯定，沒有文革，中國的民主運動就不會有今天的局面。也許較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民主運動是文革的副產品。

文革中「民主」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這固然是出於毛想要打倒政敵的需要，民主成了他爭取群眾的手段。但事情還另有一面，人們一方面在行動上實踐毛給民主規定的內容（打倒「走資派」），同時又在理念上肯定了民主的普遍價值。當毛從魔瓶中釋放出「民主」這個妖怪，以為它會永遠當自己的奴隸時，他實際上控制不住它，不能將它再收回瓶中。長期以來，在共產體制和傳統封建文化雙重箝制下，民主的要求除了存在於少數先進知識份子心中之外，很難得到公開的表達，而文革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如前面所說，文革的後果是大大打擊了黨的權威，增強了人們的獨立意識，這無疑增加了人們追求民主的精神能量。

要把民主的願望變成爭取民主的行動，最大障礙是人們的恐懼心理，而文革大大減輕了群眾的恐懼，這一點對紅衛兵尤其適用。他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親眼見到人民動員和團結起來後的巨大力量，他們看清了掌權者並不是威力無邊的，他們的力量

正是建立在群眾的孤獨隔絕狀態之上。文革中鬥爭的反覆和曲折還使他們知道，一時的失敗和挫折並不意味着徹底完蛋，當權者現在把你打成反革命，可能過不了多久你就會得到平反，可能他自己就會因此垮台。以前人們一旦被戴上政治帽子就抬不起頭、見不得人，經過文革，人們不再懼怕這一套了。另外，長期有效的專政手段也部分失靈了，不再像以前那麼森嚴可怕了。文革前，如果你被公安局叫去問話，你會心情沉重、愁眉苦臉，你的鄰居或同事會從此把你當成一個傳染病人，對你害怕和逃避。文革之後，人們不再會以膽小如鼠的態度對待公安局的傳訊，對待他們的監視、竊聽電話、查閱郵件，等等。

文革還刺激了人們，尤其是青年學生對政治的興趣。一位被採訪者説：「文革前政治是禁區，後來發現政治是人人都可以玩的。我們發現自己在文革中幹得挺不錯。當然，文革不是真正的社會變革，我們不過是在籠子裏跳舞，但跳上了癮，就想在外面去跳。」文革使一大批人受到鍛鍊，使他們掌握了政治鬥爭和抵抗鎮壓的技巧。

文革中大字報大多是用來揭發批判「走資派」的，但人們由此看到言論和輿論的重要性及力量，知道言論自由是無權者爭取自己權利的最佳武器。文革使人們能熟練地運用這個武器，在文革後的每一次民主運動中，它都是民運人士和大學生主要使用的武器。「四大」本身並不等同於言論自由，但它使人們明白到言論自由的價值和力量。著名中國民運代表之一胡平就一直強調，言論自由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基石，是中國民主化的起點。他這個觀點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這個見解是他在文革中形成的，並在1968年以大字報的形式作了表述。與大字報相似，文革中的大串連也為日後的民主運動提供了一種活動方式。

1976年爆發的「四五」運動，是一場全民的抗議文革、追求民主的運動，它也包含和體現了紅衛兵一代人長期積累的懷疑、探索與反叛。從狂熱、盲目地投身於文革運動，發誓要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毛的「革命路線」和中央文革小組，到毫不掩飾地表達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紅人的鄙視與厭惡，直至把毛視為「當代的秦始皇」，這表明人們反省之後得到的結論已與原有的信仰徹底決裂；與此同時，把中國的希望寄託於一兩個中共黨內具有道德形象的領導人身上，也反映了人們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思想的局限。這是中國一代人精神和思想發育史上的里程碑和轉折點，它給文革畫上了句號，同時翻開了新的一頁，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探索中國歷史的走向。

1978年和1979年西單民主牆的大字報，雨後春筍般的民間刊物和傳單，到北京上訪人員和民間藝術家的遊行，1981年高校競選活動中的大辯論，高校學生自辦刊物以及校際間、城市間的串連，1987年、1989年的示威遊行，校園中的各種組織，全國學生赴京支援在天安門堅持鬥爭的北京學生，等等，等等，都使人聯想到文革中紅衛兵的活動。當然，目標、內容是完全不同了，但如果不是因為文革，青年學生不會那麼自然地、不假思索地一下子就採取各種適於鬥爭的形式。這些方式當然有其普遍性(東歐國家的學生也採用了)，但如果沒有文革，恐怕學生們不會掌握得那麼快，運用得那麼嫻熟。

六　未解決的社會矛盾

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文革結束於1976年。這是因為毛死於這一年，在他死後，他的遺孀江青和其他文革派領導人被抓捕了。在

這之前，毛和「四人幫」顯然已不得人心，但是，毛的政治理想(儘管有人認為是欺世之談，但許許多多的人還是信以為真)會因為他去世和他最親近的追隨者在一場宮廷政變中失敗就完全消失嗎？毛的魅力對前紅衛兵和其他群眾不起作用了嗎？他們對文革中種種激勵人心的事物毫不留戀嗎？更為重要的是，當初促使廣大青年學生和其他群眾起來造反的因素完全消失了嗎？

毛逝世之後，文革被徹底否定，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資派」基本上全部恢復了權勢，當初追隨毛而攻擊這些人的廣大群眾後來怎麼看他們呢，雙方的關係如何呢？

文革成了被譴責和詛咒的對象，中共領導人反覆宣稱中國再也不會有文革了，人們對這種聲明的興趣和理解僅在於，現在的當權者承諾再也不會像毛那樣發動整人的政治運動了，這是不甚可靠的，至於他們不想有自己被整的文革，那倒是極為可信。但問題在於，人民與官僚特權階層的矛盾消失了嗎？有沒有一些人在重溫文革舊夢呢？有沒有人想用與文革相同或不同的方式，實現他們心目中的文革目標，即取消特權，人民成為國家真正的主人呢？

對「四人幫」垮台，除了極少一部分人，全國絕大多數人是熱烈歡迎的。這少部分人中，有一些是在文革中升到高位的幹部和造反派頭領，他們的反感是由於既得利益，另外較多的人是忠於文革理想的造反派，但這後一部分人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們把文革派的失敗看成特權官僚的勝利復辟，另一方面，他們了解民心，知道文革派倒行逆施已經喪失了大多數人的支持。

如果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主張(堅持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在中共高層佔了上風，那麼前造反派和前「走資派」的矛盾會繼續存在下去，因為人們不可能理解這些政變成功者何以可能一手抓捕毛的遺孀，一手仍然高舉毛的文革大旗。

但實際情況是鄧小平、胡耀邦的非毛化方針取得了勝利，他們以經濟建設和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取代令人厭倦的階級鬥爭，他們以人民富裕、國家強盛的新理想取代了文革的「防修反修」理想，他們的綱領和口號更吸引人。以前的造反派發現，他們從前的對手——前「走資派」的方針更符合人民的利益：下鄉知識一律回城，並且再不搞強制性上山下鄉了；高考制度恢復了，研究生制度恢復了，科學研究恢復和大大發展，這一切為前紅衛兵提供了釋放自己智力，以文明、健康的方式獲得升遷的機會；工廠恢復獎金制，農村實行包產到戶；這一切使人們把希望寄託在以前被斥為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措施上，絕大部分造反派不再把前途寄託在發生社會動亂上，以便「亂世出英雄」。

連西方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文革造反派立場和態度的轉變，陳佩華、駱思典和安德佳指出，以前的造反者從新政策中得到好處，特別是進入大學，他們曾想摧毀的黨組織勝利了，但最終以有利於他們的方式解決了「階級」之戰，這是一個諷刺㉕。是的，這的確有諷刺意味，但又確實是事實。採訪中一些前造反派頭頭抱怨說，他們早已放棄了文革的理念，他們應該是國家現代化建設中可以依靠的力量，但當局似乎並不了解這一點，長期對他們懷疑和排斥。

文革前最重要的一類社會矛盾開始消解，進入80年代後，年輕人的家庭出身不再是決定前途的關鍵因素了；對絕大部分「右派份子」平反、恢復名譽了；農村中，地主、富農份子的帽子摘掉了。

中國社會相當大一部分人無端受到壓制的情況改變了，這是他們一直期盼而不敢指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夠實現的。照文革的標準來看，各種取消政治標籤的做法純然是「復辟」，但恰恰是這些做法使中國告別了一種新型的種姓制度，使社會生活和人們的心態正常多了。

但是，社會矛盾並未全部消除。

一黨專政制度依然存在，政治依然是禁區，黨的領導人、黨的政策仍然不容批評，人們仍然會因為思想和言論獲罪。

這種矛盾很快就變得十分明顯和尖銳，原因有二。第一，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萬象更新的氣氛中，人們期待着政治上的鬆動，而當權者的某些言論也鼓勵了人們的這種期待；第二，在鄧小平搞垮華國鋒的鬥爭中，他完全摹仿文革初期毛澤東的手法，打民主牌，爭取民心。他曾表態支持西單民主牆，他的態度刺激了人們的熱情和希望，但他成功地搞掉華之後，馬上收回了自己的承諾。魏京生因批評鄧而被判重刑，全力以赴替鄧衝鋒陷陣的黨內民主派知識份子被冷落，他給中國的政治生活套上了「四項基本原則」的緊箍咒。人們對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做法記憶猶新，文革已過，但舊戲重演，這使人們認識到中國的問題是制度問題，沒有因領導人的改變而變得不同。

官僚特權問題也突現出來，成了全社會關注的焦點。

文革中被打倒或靠邊站的當權派恢復了職位，某些人以權謀私的行徑更厲害和不加掩飾。他們急欲撈回文革中失去的東西，還要為兒孫們安排錦繡前程。一位後來成為保守派代表人物的官員把他們的心情表達得最為露骨，在某個部級機關的黨代會上，代表們紛紛提出高幹為子女開後門，把他們安排到條件優厚的機關內和崗位上的問題。這個人公然說：「我們在文革中吃了十年苦頭，我們的子女跟着我們受苦，我們內心充滿歉疚之情。現在我們恢復工作了，當然會想對子女作一些補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個問題比在文革前尖銳得多。一是因為機會更多、更誘人了（出國就是一種新的利益、新的機會，當權者自己可以出國，也可以設法把子女弄出國；安排子女進入「第三梯隊」，當接班人，也是一種新的利

益；從80年代後期開始，搞經濟、辦公司，以政治權力兌換經濟利益，則更是高幹及其子女們熱衷的事情）。其次，文革之後，中央權威衰落，黨內綱紀鬆弛，官僚們謀起私利來毫不掩飾，他們不願意為了黨的全局和長遠利益而有所收斂。特別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期間，兩種體制並存，為權錢交易留出了巨大空間，腐敗比文革前不知厲害多少。

1989年爆發的民主運動，恰恰是以上兩種社會矛盾積聚和加劇的結果。學生之所以大張旗鼓地舉行悼念胡耀邦的活動，是因為胡是黨內政治上最開明的人物，他竭力造成中國寬鬆的政治空氣，他保護了許多「自由化」份子，不主張嚴厲鎮壓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因為他的消極和抵制，「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兩次政治運動都沒有搞成，無疾而終。學生們對他的高度讚揚，是和他們憎恨政治上的專制和高壓，以及盼望政府官員清廉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學生們在八九民運中喊出「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激起了整個社會的共鳴、響應和支持。這一次，人民不再打出「造反有理」的旗號，不需要借助毛澤東的權威，而是直截了當地表達自己的心願。

看來，現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對於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對於廣大人民群眾的情緒是不甚了解的。鄧小平在六四鎮壓之後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講話時說，參加民運的「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會渣滓」，（他為甚麼不說參與者中有大量共產黨員和政府工作人員，包括部長、副部長級以及成百上千的司、局級官員呢？為甚麼不說許多離退休幹部，包括在紅軍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參加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也支持學生的訴求，反對鎮壓呢？）他用民運有造反派參加來安慰自己，自欺欺人，似乎這麼一來運動的性質就是不正義的了，下令鎮壓就有理由了。他理解不到，如果群眾在文革和八九民運中反對的目標有一致之處的話，那麼其中反映的社會矛盾

就是中國社會制度中的痼疾，就應該引起十分的注意。他的頑固和遲鈍令人想起他在文革初期的麻木和遲鈍，他顯然沒有深刻總結他和劉少奇敗在毛澤東手下的教訓。這是他的政治生涯中的悲劇之一。另一悲劇是，在1976年，毛澤東和「四人幫」以「支持中國的納吉——鄧小平」為口實，用血腥手段鎮壓天安門的和平民主抗議，鄧是這次事件的犧牲者，但事後成為英雄。而十三年後，鄧卻用與毛和「四人幫」相同的手法，誣蔑學生「要搞反革命暴亂」，用更血腥的手段鎮壓和平示威者。如果他有歷史眼光，他一定會千方百計迴避第二個天安門廣場事件，他應該看到，第二次天安門鎮壓的凶殘與可恥將把他在上一次天安門事件中形成的高大形象擊得粉碎。

八九民運之後，中共政權陷入極大的危機。在國內，廣大青年學生、知識份子和其他人對屠殺者深惡痛絕，勢不兩立；在國際上，蘇聯和東歐共產政權紛紛垮台，共產主義運動從總體上講已經消亡；在黨內，保守勢力施加強大壓力，竭力把改革開放的政策倒退為毛澤東時代的方針。在這種時刻，鄧小平顯示了他的堅定性，他通過一系列講話，通過1991年南巡，扭轉了倒退趨勢，堅持了改革開放的方向。在這方面，他從來都表現出一種洞察力。他深知，不能靠僵硬的計劃經濟和閉關鎖國來維持和挽救面臨深重危機的共產制度，對他來說，唯一的努力方向是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鄧的南巡極大地緩解了中國在進入90年代的緊張局勢。

但是，政治專制和官僚特權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中國各地監獄和勞改農場中，還關押和拘禁着無數因思想和言論獲罪的政治犯，憲法中還列有與法治精神相矛盾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規定，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官員以權謀私的問題更嚴重了。當1968年楊曦光提出「紅色資本家」概念時，大多數人都不以為然，認為那是言過其實、危言聳聽。確實，和現在相比，文革前政府官員的特權和腐

化算甚麼呢？到了90年代，當權者以權謀私、以勢斂財的行徑變本加厲，除了開後門、收受賄賂這些常規手段外，新的機會、新的手法層出不窮，比如官辦公司，利用價格雙軌制賣批文，在企業內部發行股票時以優價獲得原始股，甚至得乾股，等等。在1993年底至1994年初，我在海南省和另外幾個省都聽到群眾中一種最生動的比喻、最流行的說法：如果把當官的排行一串，把每個人都當貪官打，那麼免不了會有冤假錯案，但如果隔一人打一個，則肯定有漏網的。從此論可見老百姓對當權者的看法。中國的官僚已經從70年代反對改革變成90年代擁護改革。改革的趨勢是把公有制度變為私有制，在化公為私的過程中，掌權者「近水樓台先得月」，搶先把公產變為私產。在高級幹部當中，人們很難數出幾家人來，他們的子女沒有倚仗家中的權勢辦公司、發大財。

我認為，社會民主和社會公正一直是共產黨政權的兩大難題。中國的統治者中大多數人一直不理解這兩個問題，而即使理解的人（比如毛就比鄧理解）也找不到正確方法加以解決。對於社會民主化，中共從來都沒有表現出鬆動和讓步的意願，對於社會分配不公，他們倒是作了不少努力以圖解決。他們以前靠運動，現在靠監督、舉報、懲辦。但是，這全然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堅持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任何監督實質上只是自我監督，而自我監督，就像它歷來主張的自我批評一樣，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

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只有合法的反對黨才能使監督有效，只有實現言論自由，利用輿論監督，才能彌補少數官辦監督機構作用如杯水車薪之弊，只有讓廣大人民、各種政治力量有機會參與，他們才能共同承擔社會變革中的責任。改革越是深入發展，就有越來越多的問題屬於新舊時代交替期間自然會發生的問題，共產黨不應該獨力承擔責任，它也不可能獨力解決問題。分

享責任和分享權力是同一個過程，如果中共不抗拒多元化和民主化潮流，它將逐漸變得世俗化，即不那麼專橫和意識形態化。與此同時，有變革社會和民主要求的人也將變得世俗化，即他們將就事論事地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而不會把所有的賬都算到中共頭上。這是中國政治格局和社會安排的最佳前景，但現在還看不到任何光明，顯示中共領導人理解這一點和有願望向這種安排努力。

對於中國人而言，文革確實是一場浩劫，但它可以給我們提供寶貴的經驗教訓。分析文革中群眾造反的社會根源，無疑將有助於加深對於中國社會問題的理解。我認為，不論是當權者還是老百姓，都可以從研究文革中獲益。

註釋

① 所謂「三種人」，指幫派體系頭目、堅持派性的人和打、砸、搶份子，文革之後清理三種人的運動，打擊的主要是造反派組織的頭領、骨幹和活躍份子。

② 安文江：〈我不懺悔〉，《千秋功罪》(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頁332-33。

③ Anne F. Thurston, "Victim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visible Wounds ", part 1, *Pacific Affairs* 57, no. 4 (Winter 1984): 605-606.

④ Thomas B. Gold, "After Comradeship: Personal Relations in China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04 (December 1985): 657-68.

⑤ Anne F. Thurston, "Victim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visible Wounds ", part 2, *Pacific Affairs* 58, no. 1 (Spring 1985): 24-25.

⑥ Martin Singer, *Educated Youth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1), 83.

⑦ 參見凌巍：〈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代人〉，《知識份子》，1986年春季號，頁50-52；張永傑、程遠忠：《第四代人》(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頁40-133；楊帆：《共和國的第三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頁2-3。

⑧　同上，楊帆，頁144-45。

⑨　同註⑦凌巍，頁52。

⑩　同註⑦張永傑、程遠忠，頁94-107。

⑪　比如梁曉聲的《一個紅衛兵的自白》和《雪城》，老鬼的《血色黃昏》，梁恆的《革命之子》，閻曉懷的《狂風乍起》，以及反映上山下鄉的《北大荒風雲錄》、《中國知青部落》、《青春無悔》、《草原啟示錄》、《知青檔案》、《風潮漲落》、《中國知青夢》、《苦難與風流》，以及訪談錄《劫後輝煌》等。

⑫　Fraz Michael, "The Struggle for Power", *Problems of Communism* XVI, no. 3 (1967): 21.

⑬㉔　William A. Joseph, "Foreword" to Gao Yuan's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xxix.

⑭　Jean Esme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Anchor Press, 1973), 330.

⑮　楊小凱：〈評《中國「文革」十年史》〉，《爭鳴》，1990年8月號，頁70。

⑯　楊小凱：〈六四省悟；為文革造反派翻案〉，《中國之春》，1990年8月號，頁43。

⑰　楊小凱：〈再談「文革」〉，《中國之春》，1992年10月號，頁79。

⑱　轉引自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1981年2月號，頁28。

⑲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324.

⑳　Gargi Dutt and Vidya Prakash Dutt,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70), 51.

㉑　胡平：《血祭紅土地》(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頁28。

㉒　圖們、孔弟：《共和國最大冤案》(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頁195。

㉓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1981年2月號，頁335。

㉕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September 1980): 446.

附錄一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一　著作、文集

于輝編：《紅衛兵秘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

《上訪通訊》編輯室編：《春風化雨集》，上、下(北京：群眾出版社，1981)。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王江主編：《劫後輝煌》(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

王朔：《我是王朔》(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

王希哲：《走向黑暗》(香港：民主大學，1996)。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香港：三聯書店，1993)。

李少民編：《大陸知識份子論政治、社會、經濟》(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

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

吳文光：《革命現場一九六六》(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周明等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一至六卷 (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1989)。

金大陸編：《苦難與風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胡平：《血祭紅土地》(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威廉．夏依勒 (William L. Shirer) 著、董樂山等譯：《第三帝國的興亡》(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

袁浩等編：《千秋功罪》、《兵變！兵變！》、《統帥部的鬥爭》、《八載秦城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淩耿：《天讎》(香港：新境傳播公司，1972)。

《草原啟示錄》編委會編：《草原啟示錄》(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

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南京：江蘇出版社，1991)。

賴希 (Wilhelm Reich) 著，張峰譯：《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

張永傑、程遠忠：《第四代人》(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

曾小嘉等編：《青春無悔》(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1)。

陽木編著：《「文革」闖將封神榜》(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

閔雲森編：《咱們老三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

燕帆：《大串連》(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歷史的審判》(北京：群眾出版社，1981)。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歷史的審判》，續集 (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

蕭思科：《超級審判》，上、下 (濟南：濟南出版社，1992)。

楊帆：《共和國的第三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 。

楊智雲等編：《知青檔案》(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 。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

劉小萌、定宜莊、史衛民、何嵐：《中國知青事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

劉中陸主編：《青春方程式：五十個北京女知青自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 。

劉國凱主編：《封殺不了的歷史》(香港：劉山青出版發行，1996) 。

劉曉慶：《我這八年》(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2) 。

劉濤主編：《大串連》(北京：知識出版社，1993) 。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 (Roderick MacFarquhar) 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編譯組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二卷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

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

二 資料

丁望主編：《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明報月刊社，第一卷：1967；第五卷：1970；第六卷：1972) 。

內蒙古自治區檔案局、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內蒙古自治區大事記 1947-1987》(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

中國山東省委研究室編：《山東四十年紀事》(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

石家莊市檔案館：《石家莊市大事記》(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玄默著：《中共文化大革命與大陸知識份子》(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73)。

《紅衛兵資料》，第一至二十卷，續編，第一至八卷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76)。

郝維民編：《內蒙古自治區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

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

袁悅編：《林彪事件原始文件彙編》(台北：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1973)。

張維楨主編：《昆明歷史資料》，第十四卷 (昆明：昆明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89)。

程超、魏皓奔主編：《浙江文革紀事：1966.5-1976.10》(《浙江方志》編輯部，1989)。

《當代中國的江蘇》編委會、江蘇省檔案館編：《江蘇省大事記：1949-198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

《當代寧夏紀事》編寫組：《當代寧夏紀事》(西寧：寧夏人民出版社，1990)。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第一卷，1971；第二卷，1974；第三卷，1975)。

《廣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編寫小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三　官方報刊

《人民日報》，1965年11月—1976年10月。

《文匯報》，1965年10月—1976年10月。

《中國青年》雜誌（半月刊）1951年1月—1966年8月。

《北京日報》，1966年1月—1976年12月。

《四川日報》，1966年1月—1968年12（1967年初有間斷，並一度改為《紅色電訊報》）月。

《光明日報》，1966年1月—1966年8月。

《長江日報》，1966年1月—1976年10月。

《紅旗》，1966年1月—1976年10月。

《南方日報》，1966年1月—1976年10月。

《湖北日報》，1966年1月—1976年10月。

《廣州日報》，1966年1月—1976年10月。

四　文革中非正式刊物

北京汽車分公司文革大字報辦公室等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

（編者未署名）《毛澤東思想萬歲》（上、中、下）。

《資料選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關文件匯集》。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首都第三司令部)、《首都紅衛兵》編輯部、《文選》編輯組：《為毛主席而戰》。

首都紅代會新北大井岡山兵團星火燎原戰鬥隊：《紅衛兵文選》。

首都紅代會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團《文革風雲》編輯部：《文革風雲》。

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中山大學《新中大》編輯委員會：《新中大》。

中山醫學院革命委員會《新醫學》編輯部：《新醫學》。

中共中央黨校紅旗戰鬥隊：《紅旗戰報》。

中共北京新市委工作組資料組：《清華大學大字報選編》，1-20。

中國人民大學紅衛兵紅衛隊紅衛軍編輯部：《大字報選編》。

中國科學院臨時文化革命委員會辦公室：《大字報選》。

天津大專院校紅代會、河北大學毛澤東思想「八．一八」紅衛兵：《紅炮兵》。

天津南開大學《衛東》雜誌編輯部：《衛東》。

天津大學「八．一三」紅衛兵：《千鈞棒》。

《文化革命》編輯部(哈爾濱市)：《文化革命》。

北京大學工作組辦公室編：《大字報選》。

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委會)辦公室編：《大字報選》(增刊)。

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大字報組編：《大字報選》。

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作戰部資料組：《大字報選》。

北京師大井岡山公社鬥批改委員會大字報編輯組：《大字報選編》。

北京經濟學院文革造反團、北京化工學院《紅衛兵宣傳員》戰鬥組、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匯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4)。

北京六中遵義戰鬥兵團：《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新人大公社：《新人大》。

《文化大革命通訊》編輯部：《文化大革命通訊》。

四川大學東方紅「八．二六」戰鬥團資料室：《戰鬥的歷程》。

四川大學東方紅革命委員會、「八．二六」戰鬥兵團、紅衛兵川大支隊機關報「八．二六炮聲」編輯部：《八．二六文選》。

共青團上海市委機關《紅衛東》編輯室：《紅衛東》。

吉林師大革命造反大軍、「八．一八」紅衛兵革命大批判聯合戰鬥兵團：《革命大批判》。

清華井岡山通訊社：《首長講話》(1967.1-1968.6)。

清華大學衛東戰鬥兵團：《首長講話集》(1-3集)。

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宣傳隊：《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蒯大富同志的大字報)。

浙江美院工農兵美術大學紅旗戰鬥隊《文革通訊》編輯部：《文革通訊》。

山東師範學院《黃河評論》編輯部：《黃河評論》。

山東師範學院文革串聯指揮部《橫空出世》編輯部：《橫空出世》。

曲阜師院革命委員會教育革命辦公室：《起宏圖》。

《文匯報》資料研究部：《報刊動向》。

上海東方紅編輯部：《革命參考文獻》。

上海鐵道學院井岡山兵團《紅鐵道》編輯部：《紅鐵道》。

上海市教育局東方紅公社《中小學大批判》編輯室：《中小學大批判》。

上海市教育局東方紅公社《資料和動態》編輯室：《資料和動態》。

南京工學院《東方紅》雜誌編輯部：《東方紅》。

南京東方紅《紅色造反者》雜誌紅色造反者編輯部：《紅色造反者》。

東北工學院革命委員會：《東工通訊》。

貴陽師範學院革命委員會：《六六戰報》。

哈爾濱工農兵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色造反團《紅衛兵》編輯部：《紅衛兵》。

華南師院革命委員會政工組：《新華師》。

廣東工學院革命委員會：《新廣工》。

駐暨大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暨南大學革命委員會政工組：《暨大通訊》。

駐武漢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武漢大學革命委員會：《武大簡訊》。

武漢工學院革命委員會政工組：《武工簡訊》。

五　紅衛兵和其他群眾組織的小報

《中學論壇》編輯部：《中學論壇》。

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北師大井岡山公社：《井岡山》。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首都第三司令部）：《首都紅衛兵》。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首都紅衛兵》。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政治部：《紅衛兵》。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一司令部宣傳部：《紅衛兵》。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聯絡站：《東方紅》。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東方紅》。

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北京礦業學院東方紅：《東方紅》。

首都中等學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兵團戰報》。

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傳部：《中學文革報》。

首都中學紅衛兵司令部：《東風報》。

首都紅代會清華井岡山兵團「四．一四」總部：《井岡山報》。

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紅衛兵：《人大三紅》。

首都第三司令部首都政法兵團：《政法兵團》。

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委員會《新北大》編輯部：《新北大》。

北京大學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紅旗戰報》。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紅旗》。

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報》編輯部：《東方紅報》。

北京建築工程學院毛澤東思想兵團：《革命串聯》。

北京鋼鐵學院革命造反公社：《新鋼院》。

北京中學紅衛兵首都風雷宣傳部：《首都風雷》。

北京市中學紅衛兵聯合縱隊：《紅衛兵評論》。

紅代會北京鋼鐵學院延安公社《東方紅》報編輯部：《東方紅》。

紅代會《中學戰線》編輯部：《中學戰線》。

新北大附中《湘江評論》編輯部：《湘江評論》。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兵團戰報》。

清華大學井岡山報編輯部：《井岡山》。

上海大專院校紅代會、上海中等學校紅代會：《上海紅衛戰報》。

上海工學院《東方紅兵團》編輯部：《東方紅戰報》。

上海中等學校紅代會：《紅衛戰報》。

上海中等學校紅代會中專中技半工半讀籌委會：《紅代會戰報》。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人造反報》。

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革命造反報》。

上海市紅旗中學革命聯合指揮部紅衛兵公社革命造反委員會：
《北京公社》。

上海市延安中學紅衛兵團《井岡山》編輯部：《井岡山》。

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反到底》。

上海交通大學革命造反指揮部：《交大造反報》。

上海交通大學革命委員會籌委會：《紅交大》。

上海科技大學《紅色造反者》編輯部：《紅色造反者》。

上海紅衛兵總部：《紅衛兵》。

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東方紅》。

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東方紅反到底》。

赤衛軍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赤衛軍：《赤衛軍》。

紅衛兵上海市北郊中學兵團：《指點江山》。

紅衛兵上海市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報》。

紅衛兵上海科技大學第三司令部、紅衛兵上海市嘉定縣第三司令部：《紅色造反者》。

紅衛兵復旦「八・一八」總部：《紅復旦》。

紅衛兵總部赤衛軍華東化工學院革命委員會：《紅旗》。

復旦大學「八・一八」紅衛兵師《復旦戰報》編輯部：《復旦戰報》。

復旦大學新聞系中南海警衛團：《紅色造反報》。

復旦大學革命委員會：《新復旦》。

華東師大《新師大》編輯部：《新師大》。

青浦縣紅衛兵總司令部紅色造反司令部：《紅旗戰報》。

天津大學《八・一三紅衛兵》編輯室：《八・一三紅衛兵》。

天津大學「九・一五」造反兵團：《九・一五》。

天津工學院「八・二五」紅衛兵：《紅衛兵》。

天津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天津紅衛兵》。

石家莊工人造反聯合會：《五一戰報》。

石家莊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主沉浮》。

河北大學《井岡山》報編輯部：《井岡山》。

河北保定紅衛兵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紅色造反報》。

河北保定紅衛兵代表大會(紅代會)：《保定紅衛兵》。

紅代會天津工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新天工》編輯部：《新天工》。

紅衛兵石家莊革命造反司令部：《紅衛兵報》。

南開大學紅色造反團《新南開》編輯部：《新南開》。

南開衛東紅衛兵《衛東》編輯部：《衛東》。

山西大學「八．一四」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先鋒大隊：《先鋒報》。

山西大學「八．八」紅旗戰鬥隊：《八．八戰報》。

山西大學紅色造反者革委會籌委會：《新山大》。

山西大學紅旗公社：《進軍報》。

山西革命造反兵團：《兵團》。

山西革命造反聯絡總部：《紅旗報》。

山西革命造反聯絡站政宣組：《紅色造反》。

山西紅色造反聯絡站：《九五紅旗》。

山西紅衛兵團：《紅衛兵團》。

山西紅聯站財院「東方紅公社」動態組：《千層浪》。

山西晉南紅總司、新山大紅革會、山西師院遵義公社：《聯合報》。

山西農學院指揮部宣傳部：《紅旗》。

大同市紅色造反總部《東方紅》編輯部：《東方紅》。

大同市輕院東方紅兵團：《東方紅》。

大同市革命造反指揮部宣傳部：《革命造反》。

大同市紅衛兵糾察隊《紅衛兵戰報》編輯部：《紅衛兵戰報》。

太原工學院紅衛兵戰鬥隊第四野戰軍革命造反兵團紅色造反隊：《紅尖兵》。

太原工學院革命造反指揮部：《紅太工》。

太原工學院《紅衛兵》編輯部：《紅衛兵》。

太原市紅衛兵聯絡總站：《紅衛兵》。

太原地區大專院校紅衛兵大聯合籌備處：《紅衛兵》。

三司《文革評論》：《文革評論》。

三司通遼師範學院《東方紅》報編輯部：《東方紅》。

呼三司中學部《進軍號》編輯部：《進軍號》。

呼三司內蒙紅旗總部：《紅旗》。

呼三司革命聯絡總部：《聯合戰報》。

呼市三司內蒙古醫學院東方紅公社：《白求恩》。

呼和浩特第三司令部、紅代會：《紅衛兵》。

呼和浩特市紅衛兵臨時總部：《紅衛兵》。

呼和浩特大中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呼三司》。

呼和浩特大中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革命造反報》。

呼和浩特職工革命造反司令部：《首都通訊》。

呼和浩特工代會：《工人風雷》。

內蒙古大學井岡山：《井岡山》。

內蒙古工學院革命委員會：《挺進報》。

內蒙古印刷學校延安縱隊：《延安戰報》。

內蒙古師範學院東方紅紅衛兵指揮部戰鬥縱隊總部：《東方紅》。

內蒙古哲盟三司紅色革命造反團：《新聞》。

內蒙古海拉爾紅色造反兵團：《紅色造反報》。

內蒙古師院包頭分院東方紅紅衛兵總部東方紅戰鬥兵團編輯部：

《東方紅戰報》。

包頭市大中專院校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紅衛兵》。

集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紅衛兵戰報》。

《紅炮兵》編輯部：《紅炮兵》。

阜寧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阜寧紅衛兵》。

阜寧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革命造反報》。

大連鐵道學院紅色造反兵團：《紅鐵道》。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大連海運學院紅色造反大軍：《春來報》。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紅港（旅大市總部）《紅衛兵》報編輯部：《紅衛兵》。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瀋陽總部：《紅衛報》。

紅衛兵瀋陽大專院校總部編輯部：《紅衛兵》。

遼寧大學「八．三一」紅衛兵紅色造反團：《八．三一戰報》。

遼寧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遼大紅衛兵》。

遼寧大學革命大聯合指揮部、《新遼大》編輯部：《新遼大》。

遼寧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遼聯站報》。

遼寧鞍山鋼鐵學院《東方紅》編輯部：《東方紅》。

瀋陽市革命串連聯絡總站：《紅衛報》。

瀋陽農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革命造反兵團：《炮聲隆》。

錦州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紅色風暴》。

錦州市師範學校《換新天》編輯部：《換新天》。

旅大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部《渤海紅旗》編輯部：《渤海紅旗》。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吉林大學總部：《反修報》。

吉林工業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紅衛兵戰報》。

吉林工業大學革命造反大軍《新工大》編輯部：《新工大》。

吉林師範大學革命造反大軍「八．一八」紅衛兵：《革命造反軍報》。

吉林農業大學紅衛兵革命造反大軍：《新農大》。

吉林公社吉林電力學院毛澤東思想「八．卅一」紅色造反團：《八．卅一》。

吉林財貿學院革命造反大軍紅衛兵：《造反報》。

東北人民大學紅旗野戰軍：《人大紅野》。

東北人民大學《新東北人大》編輯部：《新東北人大》。

東北人民大學革命造反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反修報》。

二總部東北人民大學紅色造反大軍毛澤東思想總部：《反修報》。

二總部吉林工學院革命造反大軍：《工院戰報》。

二總部吉林工業大學紅色造反大軍《紅軍報》編輯部：《紅軍報》。

紅色造反者吉林省革命委員會：《革命造反報》。

紅色造反者長春市紅衛兵總部(二總部)：《吉林造反報》。

紅色造反者長春市紅衛兵總部(二總部)：《長春紅衛兵》。

長春二總部白求恩醫科大學紅色造反軍編輯部：《紅軍戰報》。

長春公社東北人民大學紅旗野戰軍：《紅野戰報》。

《長春公社》報編輯部：《長春公社》。

長春地質學院毛澤東思想戰鬥兵團：《地院戰報》。

哈工大新曙光造反團《新曙光》編輯部：《新曙光》。

哈爾濱工業大學《紅衛兵》編輯部：《紅衛兵》。

哈爾濱工業大學文化大革命籌委會：《文革快報》。

哈爾濱工業大學革命委員會機關報：《新哈工大》。

哈爾濱中學紅代會籌備處：《造反到底》。

哈爾濱中等學校紅代會：《哈爾濱紅衛兵》。

哈爾濱市六中紅色造反團：《新六中》。

哈爾濱市捍衛革命「三結合」聯合總指揮部：《東方戰報》。

哈爾濱電工學院紅色造反團：《電工曙光》。

哈爾濱紅後代紅衛兵總部：《紅後代戰報》。

哈爾濱紅衛兵總部：《紅旗戰報》。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紅軍工》。

黑龍江工學院《衛東戰報》編輯部：《衛東戰報》。

黑龍江大學紅色造反團《新黑大》編委會：《新黑大》。

東北林學院紅色造反團：《新林院》。

東北林學院紅色造反團：《造反戰報》。

東北林學院紅色造反團：《千鈞棒》。

東北石油學院東方紅公社通訊社：《東方紅》。

東北林學院紅色造反團宣傳組：《風雷激》。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黑龍江大學紅色造反團：《黑龍江大學》。

齊齊哈爾市「八．一八」紅色造反團：《八．一八紅總紅色恐怖報》。

牡丹江一中革命委員會：《激揚文字》。

南京大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聯合指揮部：《紅衛報》。

南京大學「八．二七」革委會宣傳組：《八．二七戰報》。

南京大學革委會：《新南大》。

南京大學紅色造反隊：《農奴戟》。

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三司)：《革命造反報》。

南京工學院《七．一戰報》編輯部：《七．一戰報》。

南京紅三司大聯合《紅衛兵戰報》編輯部：《紅衛兵戰報》。

南京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南京紅三司》。

南京郵電學校紅色造反團：《郵電戰報》。

毛澤東思想戰鬥總部宣傳組：《工人造反報》。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鎮江司令部：《革命造反報》。

江蘇東方紅公社：《江蘇東方紅》。

江蘇省紅色造反總司令部中等學校司令部：《南京紅衛兵》。

江蘇省紅色造反總司令部中等學校中教紅色造反司令部：《南京紅衛兵》。

江蘇省紅色造反司令部、中等學校司令部、中教造反司令部：《南京紅衛兵》。

江蘇省常州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委會)：《大聯合戰報》。

江蘇省無產階級革命派：《人民江蘇》。

紅衛兵鎮江市總部：《紅衛兵》。

紅衛兵南京工學院東方紅總部：《東方紅戰報》。

鎮江紅衛兵：《紅衛兵》。

浙江杭州市大中專院校紅衛兵總部籌委會：《紅衛兵報》。

浙江省紅代會：《紅衛兵》。

浙江大學革命造反報編輯部：《革命造反報》。

浙江大學《紅衛兵戰報》編輯部：《紅衛兵戰報》。

浙江大學紅色暴動委員會吶喊兵團：《紅色暴動》。

浙江東湖師範六月風暴新六四一主辦：《紅衛戰報》。

浙江杭州大學東方紅兵團《東方紅》編輯部：《東方紅》。

浙江省革命聯合指揮部：《紅色風暴》。

浙江溫州一中東方紅戰鬥大隊：《東方紅》。

浙江海寧一中東海兵團：《東海戰報》。

浙江醫科大學反修兵團政宣組：《反修戰報》。

浙江醫科大學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鬥江專刊》。

樂清中學紅色造反兵團宣傳部：《紅色造反報》。

紅代會溫州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紅衛兵》。

紅代會溫州紅衛兵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紅衛兵戰報》。

寧波蕪湖中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紅衛兵報》。

紹興革命造反聯絡站：《革命造反者》。

長興中學紅色造反團：《紅旗戰報》。

合肥工業大學革命委員會：《新工大》。

合肥市大中學校紅色造反司令部：《安徽八．二七》。

合肥安徽大學：《安大八．二七》。

合肥地區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安徽紅衛兵》。

合肥紅衛中學《紅衛兵》編輯部：《紅衛兵》。

合肥師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八．三一戰報》。

合肥師範學院革命委員會：《新師院》。

《安大風雲》編輯部：《安大風雲》。

安徽「八．二七」宣傳部：《八．二七快報》。

安徽大學大聯合委員會：《安徽大學》。

安徽合肥工大縱隊：《八．二七戰報》。

安徽合肥工業大學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籌委會：《八．二七戰報》。

安徽合肥大中學校紅代會：《江淮紅衛兵》。

安徽合肥師範學院《東方紅》編輯部：《東方紅》。

安徽合肥師範學院紅衛兵總隊等：《紅衛兵》。

安徽合肥地區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安徽紅衛兵》。

安徽紅衛師範學校：《反修戰報》。

安徽省「八．二七」革命到底聯絡站：《革命到底報》。

安徽工業學院革委會：《紅安工》。

安徽淮南紅衛兵司令部三中延安兵團：《延安》。

安徽淮南紅衛兵司令部革聯三中紅衛兵：《紅兵》。

皖南大學紅衛兵總部革命到底聯合指揮部：《新皖大》。

蕪湖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蕪湖造反報》。

巢縣第一中學革命司令部：《一中造反報》。

「八·二九」總司令部福州司令部：《福州八·二九》。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福建革命委員會政治部：《福建紅衛兵》。

廈門「八·二九」公社：《八·二九公社戰報》。

廈門大學公社：《廈門前線》。

廈門大學《新廈大公社戰報》編委會：《新廈大公社戰報》。

廈門大學獨立團：《新挺進》。

福州工人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福州工人》。

福建省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人戰報》。

福建師範學院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師院戰報》。

江西九江二中東方紅公社：《東方紅》。

江西大學井岡山紅衛兵指揮部《井岡紅旗》編輯部：《井岡紅旗》。

江西大學《革命造反報》編輯部：《革命造反報》。

江西工學院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政治部：《紅江工》。

江西工學院井岡山紅衛兵師政治部：《井岡山之聲》。

江西冶金學院紅衛兵革命委員會：《東方紅》。

江西冶金學院紅衛兵革命委員會東方紅戰鬥兵團：《東方紅》。

江西冶金學院東方紅戰鬥兵團：《紅色造反通訊》。

江西冶金學院《東方紅戰報》編輯部：《東方紅戰報》。

江西師範學院《井岡山》編輯部：《井岡山》。

江西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大專院校革命師生總指揮部：《井岡山》。
江西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籌委會：《工學戰報》。
江西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南城紅代會新共大《井岡山野戰師報》編輯部：《井岡山野戰師》。
江西省《火線戰報》編輯部：《火線戰報》。
江西省革命造反派聯合總部：《江西造反報》。
江西輕化工業學校井岡山兵團：《井岡山》。
江西農學院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井岡山兵團：《紅農戰報》。
江西醫學院《滿江紅》編輯部：《滿江紅》。
《江醫戰報》編委會：《江醫戰報》。
新江大《新江大戰報》編輯部：《新江大戰報》。
南昌六中井岡山兵團全無敵造反兵團：《紅旗》。
南昌市中等學校紅衛兵「反復辟」聯絡站：《中學紅衛兵》。
南昌師範學院《反到底》編輯部：《反到底》。
南昌航空工業大學井岡山兵團：《南航井岡山》。

山東大學紅旗戰鬥隊：《紅旗戰報》。
山東工學院革委會：《井岡山》。
山東工學院革命委員會：《七．二一戰報》。
山東化工學院紅旗兵團總部：《逼上梁山》。
山東中醫學院紅衛兵：《紅衛兵》。
山東紅代會魯迅大學紅二三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指揮部：《紅二三戰報》。
山東師範學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文革串聯小組：《東方紅》。
山東省大中學校紅代會：《大批判報》。

山東省農學院東方紅兵團《東方紅》報編輯部：《東方紅》。

山東聊城一中紅旗：《紅旗》。

青島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委員會：《紅衛兵》。

紅代會紅衛兵山東農學院指揮部：《猛進》。

紅衛兵山東指揮部濟南十六中《紅旗》編輯部：《紅旗》。

紅衛兵山東指揮部東方紅紅衛兵：《東方紅》。

紅衛兵濟南指揮部：《前衛報》。

紅衛兵煙台師專指揮部：《風雷激》。

魯迅大學(山東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紅衛戰報》。

魯迅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魯迅大學》。

魯迅醫學院「東方紅」：《東方紅》。

煙台市紅衛兵聯絡站：《紅衛兵》。

濟南紅衛兵師師部編：《紅衛兵報》。

濟南中等學校紅代會：《濟南紅衛兵》。

河南二·七公社：《二·七戰報》。

河南二·七公社：《二·七公社報》(原為：《直搗中原》)。

河南二·七公社《河南二·七報》編輯部：《河南二·七報》。

河南二·七公社延津一中：《紅總戰報》。

河南二·七公社宜陽一中二七總部：《錦屏烈火》。

河南二·七公社、許昌分社：《風雷激》。

河南二·七公社新鄉師院《八·一八戰報》編輯部：《八·一八戰報》。

河南二·七公社鄭州工學院《指點江山》編輯部：《指點江山》。

河南二·七公社鄭州大學《革命造反報》編輯部：《革命造反報》。

河南省革命造反總指揮部：《河南造總》。

《河南紅衛兵報》編輯部：《河南紅衛兵》。

河南鄭州工學院革命造反總部「赤遍中原」戰鬥隊：《赤遍中原》。

河南鄭州工學院革命造反總部：《中原烈火》。

河南鄭州紅衛兵總部：《紅衛兵報》。

河南醫學院「東方紅」：《東方紅》。

河南開封紅衛兵總部：《紅衛兵報》。

河南開封市紅衛兵代表大會：《八．二四紅衛兵》。

河南省會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紅衛兵》。

河南省會中等學校革命造反司令部政治部：《紅衛戰報》。

湖北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辦公室：《湖大戰鬥隊》。

湖北新高校東方紅聯合指揮部：《滿江紅》。

湖北醫學院革命委員會《新湖醫》編輯部：《新湖醫》。

毛澤東思想三新紅衛兵武漢地區大中學校代表大會籌委會：《武漢紅代會(籌)》。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武漢鋼二司》。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武漢機械學院總部：《孫大聖》。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地質學校總部：《吶喊》。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武漢醫學院總部宣傳組：《紅衛戰報》。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新華師總部：《新華師戰鬥報》。

沙市中等學校紅衛兵總部：《紅衛兵戰報》。

東方紅紅衛兵華中工學院總部、華中工學院東方紅戰鬥兵團：《東方紅戰報》。

武漢市中學紅衛兵聯合委員會新一中革命造反司令部：《新一中》。

武漢百萬雄師《紅武兵》報編輯部：《紅武兵》。

武漢地區大專院校紅衛兵總指揮部：《紅衛兵戰報》。

武漢地區毛澤東思想「九．一三」戰鬥兵團：《九．一三戰報》。

武漢地區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大中學校代表大會《武漢紅代會》編輯部：《武漢紅代會》。

武漢地區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東方紅》編輯部：《東方紅》。

武漢地區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武漢大學「八．八」紅衛兵、井岡山紅衛兵、紅旗紅衛兵聯合主辦：《井岡山紅衛兵》。

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百萬雄師」聯絡站：《紅衛兵》。

武漢地區第三司令部《東方紅》編輯部：《東方紅》。

武漢華中師範學院：《新華師戰報》。

武漢師範學院文化革命籌委會辦公室：《武師戰鬥報》。

武漢紅三司武大指揮部《新武大》編輯部：《新武大》。

武漢紅衛兵《紅衛兵》編輯部：《紅衛兵》。

武漢新湖大《紅八月公社》編輯部：《紅八月公社》。

武漢新湖大革命造反臨時委員會：《新湖大通訊》。

武漢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三司革聯新武大紅色造反團：《紅色造反報》。

新武醫《東方紅》編輯部：《東方紅》。

華中工學院戰鬥隊編輯室：《華工戰鬥報》。

華南工學院革命造反委員會《紅旗報》編輯部：《紅旗報》。

長沙市紅衛兵高校造反軍：《高校造反軍》。

長沙市高中等學校紅衛兵總部：《紅衛兵戰報》。

長沙市高等院校風雷挺進縱隊：《高校風雷》。

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紅衛兵》。

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延安公社：《戰報》。

長沙鐵道學院文革籌：《長院戰報》。

長沙鐵道學院革命造反指揮部：《全無敵》。

湘江風雷挺進縱隊總司令部《湘江風雷》編輯部：《湘江風雷》。

湘江風雷挺進縱隊金猴戰團：《金猴》。

《湖大戰報》編輯部：《湖大戰報》。

湖南大學河東戰鬥隊：《「八．九」戰鬥報》。

湖南大學「八．一九」公社：《八．一九烽火》。

湖南中等學校革命造反紅衛兵總部：《驅虎豹》。

湖南邵陽市紅代會四中井岡山兵團：《井岡山》。

湖南紅旗軍造反司令部《湖南紅旗軍》編輯部：《湖南紅旗軍》。

湖南省革命造反派工人聯合籌備委員會：《湖南工聯》。

湖南省高等院校紅代會籌委會：《迎朝陽》。

湖南師院「九．一七」公社：《新師院》。

湖南師院東方紅公社：《東方紅》。

湖南醫學院紅旗：《紅旗》。

第一師範革命委員會：《叢中笑》。

紅代會長沙鐵道學院東方紅公社：《東方紅》。

紅衛兵長沙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紅代會》。

紅衛兵長沙市大專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師院井岡山《井岡山》編輯部：《井岡山》。

紅衛兵長沙市高等院校革命造反軍：《井岡山報》。

紅聯高司《湖醫戰報》編輯部：《湖醫戰報》。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湖南大學總部：《紅衛兵戰報》。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長沙造反有理軍：《造反有理軍報》。

韶山大學革委會：《韶山大學》。

高師湖南師院總部：《雲水怒》。

廣州中學紅代會：《中學紅代會》。

廣州中學紅代會紅衛兵中學革聯：《中學紅衛兵》。

廣州紅司通訊社：《紅色通訊》。

廣州紅代會中山大學《八．三一》編輯部：《八．三一》。

廣州紅代會中山大學《中大紅旗》編輯部：《中大紅旗》。

廣州紅色造反司令部《廣州紅司》編輯部：《廣州紅司》。

廣州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三司戰報》。

廣州《紅旗論壇》編輯部：《紅旗論壇》。

廣州地區大專院校紅代會：《廣州紅代會》。

廣州東風學革會中山分會、中山聯委革命造反委員會：《中大戰報》。

華南工學院《紅旗報》編輯部：《紅旗報》。

「四．二二」廣西工總《廣西工總》編輯部：《廣西工總》。

南寧「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四．二二戰報》。

南寧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百萬雄師》。

桂林市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紅衛兵報》。

桂林市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聯合主辦：《桂林老多》。

株州《井岡山》編輯部：《井岡山》。

柳鐵工機聯：《工機聯戰報》。

柳鐵東方紅公社：《東方紅》。

柳州紅衛兵革命造反總指揮部《戰惡浪》編輯部：《戰惡浪》。

柳州工交兵團：《工交兵團報》。

柳州紅衛兵報革命造反編輯部：《紅衛兵》。

柳州聯指「八．一八」紅衛兵總司令部：《紅衛兵報》。

廣西一反到底紅衛兵總司令部：《一反到底》。

廣西「四．二二」梧州革命造反大軍工交司令部：《工運》。

廣西「四．二二」柳州革命造反大軍：《大軍報》。

廣西「四．二二」柳州革命造反大軍柳州工總：《柳州工總》。

廣西「四．二二」柳州革命造反大軍赴京匯報團：《大軍報》。

廣西梧州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梧州聯指》。

廣西桂林市大中學校紅代會：《紅衛兵報》。

廣西南寧市「八．一八」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八．一八戰報》。

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廣西聯指報》。

《山城反到底》編輯部：《山城反到底》。

《山城紅旗》編輯部：《山城紅旗》。

四川大學東方紅「八．二六」戰鬥兵團、紅衛兵川大支隊《八．二六炮聲》編輯部：《八．二六炮聲》。

四川石油學院紅岩公社《紅岩戰報》編輯部：《紅岩戰報》。

四川石油學院井岡山編輯部：《井岡山》。

井岡山野戰軍（四川大學）：《野戰井岡山》。

西南農學院「八．二六」戰鬥團：《八．二六驚雷》。

成都工學院「一○．一一」部隊：《飛鳴鏑》。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一一．一九」分團：《一一．一九戰報》。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兵團戰報》編輯部：《兵團戰報》。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財貿分團：《驚雷》。

紅衛兵成都部隊政治部：《紅衛兵》。

紅衛兵成都部隊電訊支隊成電東方紅戰鬥兵團《東方紅戰報》編輯部：《東方紅戰報》。

重慶大專院校紅衛兵反到底司令部川外紅衛兵團四川外語學院「八．二六」戰鬥兵團：《造反者》。

重慶反到底革命派《工總司》等：《山城反到底》。

重慶反到底戰報編輯部：《反到底戰報》。

重慶市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建築工程學院紅衛兵、「八・一八」戰鬥兵團：《八・一八戰報》。

重慶市革籌組中學生紅衛兵紅聯會宣傳部：《中學生紅衛兵》。

重慶市革聯會宣傳委員會：《山城戰報》。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山城紅衛兵》。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八・一五」戰鬥團：《八・一五戰報》。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師專紅衛兵總部「八・一五」戰鬥兵團：《八・一五烽火》。

重慶無產階級革命派：《山城戰報》。

安順地區工代會、農代會常委會、紅代會《新安順》編輯部：《新安順》。

毛澤東思想貴州大學革命委員會：《貴州大學》。

毛澤東思想貴州大學革委會：《新貴大》。

毛澤東思想貴州農學院保衛紅色政權聯絡站：《衛紅戰報》。

毛澤東思想貴陽六中革命造反指揮部、省紅代會貴陽六中紅代會：《戰鬥》。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貴州工學院革命委員會：《春雷》。

貴州省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代表大會常設委員會：《紅衛兵》。

貴州省工人革命造反指揮部：《貴州工人》。

貴州省工代會常設委員會：《貴州工人》。

貴陽市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司令部：《紅衛兵》。

貴陽師範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六・六」戰鬥團：《六・六戰報》。

貴州銅仁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紅色造反報》。

貴州遵義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代表大會常設委員會：《紅城紅衛兵》。

貴州農學院無產階級革命造反委員會宣傳組：《新農院》。

省紅代會毛澤東思想新貴工「九．一五」戰鬥團：《新貴工》。

新貴醫《文革簡訊》編輯室：《新貴醫風雷》。

銅仁城區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代表大會常設委員會：《紅衛兵》。

遵義地區革委會：《新遵義報》。

遵義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遵義戰報》。

畢節地區紅代會常設委員會：《捍紅戰報》。

昆明「八．二三」戰鬥兵團：《八．二三戰報》。

昆明師院「八．二三」戰鬥兵團：《師院八．二三》。

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聯合指揮部：《鐵流》。

新雲南革命造反派大聯合聯絡站：《新雲南》。

毛澤東思想紅宣兵雲南革命造反兵團：《紅宣兵戰報》。

毛澤東思想雲南革命造反文攻團「火與劍」戰鬥隊：《戰地黃花》。

雲南大學毛澤東主義炮兵團：《九．一四戰報》。

雲南大學「共產黨宣言」公社：《共產黨宣言》。

雲南毛澤東思想戰鬥兵團：《紅色造反者》。

雲南毛澤東主義炮兵團：《紅炮手》。

雲南省級機關革命造反司令部《紅炮兵》編輯室：《紅炮兵》。

雲南省工農兵科協革命造反派《紅色戰報》編輯部：《紅色戰報》。

中央民族學院抗大公社：《高原紅旗》。

《西藏日報》紅色新聞造反團：《紅色新聞》。

西藏自治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造反總指揮部：《風雷激戰報》。

西藏民族學院「農奴戟」紅衛兵政治部：《農奴戟戰報》。

拉薩革命造反總部：《紅色造反報》。

西北大學籌委會光陰迫兵團：《光陰迫》。

西北工業大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紅衛兵》。

西安交通大學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委員會：《人民交大》。

西安地區大專院校文革統一指揮部所屬陝西工大（籌）促聯合戰鬥隊：《促聯合》。

西安地區大專院校文革統一指揮部紅冶院西軍電西工大「革命到底」：《大批判》。

西安礦業學院籌委會「七一二〇」光陰迫兵團：《兵團戰報》。

陝西工業大學「風雷激」兵團：《古城風暴》。

陝西西北農學院文革籌委會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總部：《登險峰》。

陝西西安大中院校統一指揮部西安公路學院紅臨會：《公路學院》。

陝西西安外國語學院臨委會：《東方紅》。

陝西西安地區大中專院校統一指揮部新政法「光陰迫」兵團：《光陰迫》。

陝西西安地區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紅衛兵》。

陝西西安無線電工業大學文革籌委會宣傳部：《革命到底》。

陝西西安醫學院「八．三一」毛澤東主義戰鬥兵團：《八．三一戰報》。

陝西師範大學文化大革命籌委會：《新師大》。

陝西寶雞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指揮部：《紅衛兵》。

陝西寶雞市中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八．一七戰報》。

陝西寶雞紅總紅旗中學文革籌備委員會：《紅旗》。

延安大學《八．二八戰報》編委會：《八．二八戰報》。

新西大「光陰迫」兵團：《光陰迫》。

甘肅紅色造反派第三司令部：《紅三司》。

甘肅師範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籌委會：《新師大》。

甘肅師範大學紅色革命造反司令部：《紅色風雷》。

《紅色長征報》編輯部：《紅色長征報》。

紅衛兵蘭州「九．三」革命總部：《紅衛兵》。

蘭州大學「六．七」通訊社：《文革通訊》。

蘭州大學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新蘭大》。

「八．一八」紅代會冷湖指揮部、「八．一八」冷湖聯絡站：《八．一八戰報》。

「八．一八」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大批判》。

西寧市「八．一八」革命造反派戰報編委會：《西寧戰報》。

青海「八．一八」大聯委宣傳部：《崑崙紅旗》。

青海「八．一八」紅衛戰鬥隊互助聯絡分站：《紅衛戰報》。

青海「八．一八」嘉裕關地區革命造反司令部：《八．一八紅衛報》。

青海大學畜牧獸醫學院文化大革命籌備處：《崑崙紅旗》。

青海紅衛兵總部：《青海紅衛兵》。

青海省「八．一八」紅宣兵戰鬥團：《紅宣兵》。

青海省「八．一八」紅衛兵司令部：《八．一八戰報》。

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紅衛兵代表大會：《八．一八戰報》。

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大批判》。

青海省中醫班文革籌委會、省中醫班「八．一八」紅衛兵：《戰鬥》。

青海省東方紅公社、東方紅紅衛兵指揮部：《東方紅》。

青海省級黨政群眾系統「八．一八」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指點江山》。

青海省海南州「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海南戰報》。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寧夏大學指揮部：《東方紅》。

寧夏大中專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指揮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寧夏大中學校無產階級革命派造反司令部：《挺進報》。

寧夏大學六盤山縱隊：《六盤山》。

寧夏大學井岡山戰鬥兵團：《井岡山》。

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紅色教工司令部：《紅色文教》。

紅二司新疆大學《東方紅》編輯部：《東方紅》。

紅二司新疆工學院：《人民戰爭》。

紅促會八一中學紅色造反總部政治部：《東方欲曉》。

新疆八一農學院紅旗革命造反宣傳部：《紅旗戰報》。

新疆紅二司「三八．五」野戰兵團：《持久戰》。

新疆紅二司《新疆紅衛兵》編輯部、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新北大》編輯部合編：《新疆紅衛兵　新北大》。

新疆紅色革命造反司令部（紅二司）：《新疆紅衛兵》。

新疆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一司令部：《反修紅衛兵》。

新疆紅衛兵革命到底聯絡站：《革命到底》。

新疆紅衛兵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紅三司）政治部：《紅三司》。

烏魯木齊地區紅衛兵總部籌委會：《紅衛兵》。

烏魯木齊地區大專院校紅代會促進會政治部：《紅衛戰報》。

說明：文革期間，群眾組織所辦小報，有時會更改名稱，更經常的是報紙主辦單位的名稱發生變化，例如，著名造反派組織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的報紙《井岡山》主辦者至少有五個不同名稱：(1) 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井岡山》編輯部；(2) 首都紅代會北師大井岡山公社《井岡山》編輯部；(3) 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北京師大井岡山公社《井岡山》編輯部；(4) 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紅代會北師大井岡山公社《井岡山》編輯部；(5) 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紅代會北師大井岡山公社。這裏沒有對報紙和主辦者名稱的更改作辨析和詳盡羅列。

英文部分

Ahn, Byung-joon.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ynamics of Policy Processe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

Bennett, Gordon A., and Ronald N. Montaperto. *Red Guard: 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i Hsiao-ai*.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71.

Brugger, Bill. *Contemporary China*. London: Croom Helm, 1977.

———. *China: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78.

———. *China: Radicalism to Revisionism: 1962-1979*. London: Croom Helm, 1981.

Cell, Charles P. *Revolution at Work,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Chan, Anit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5.

Domes, Jurgen.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Politics between Two Party Congresses*. Trans. Annette Berg and David Goodma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Dutt, Gargi, and Vidya Prakash Dutt.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70.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at Harvard University, 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Esmein, Jea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Anchor Press, 1973.

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ng, 1966-1976*.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Inc., 1990.

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Harding, Harry. *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Hinton, William.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Hsia, Adria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Orbach and Chambers Ltd., 1972.

Joseph, William A., Christine P. W. Wong, and David Zweig.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Kwong, Juli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April 1969*.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Lee, Hong Yu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Leys, Simon.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Allison and Busby Limited, 1981.

Lifton, Robert J.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Lin, Jing. *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 1991.

Lipman, Jonathan N., and Stevan Harrell, eds.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Liu, Alan P. L. *Political Culture and Group Conflict in Communist China*. Santa Barbara, Calif.: Clio Press, 1976.

Luo, Ziping. *A Generation Lost: China und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90.

Maitan, Livio. *Party, Army, and Masses in China*. London: NLB, 1976.

Mosse, George. *Nazi Culture*. Trans. Salvator Attanasio, et al.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68.

Raddock, David M. *Politic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Kwangchow*. Tucson, Ariz.: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7.

Rosen, Stanley.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2.

Taylor, Robert. *Education and University Enrolment Policies in China, 1949-1971*.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3.

Tsou, T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Unger, Jonathan.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White, Gordon. *The Politics of Class and Class Origin: The C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6.

White, Lynn T. *Politic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附錄二　被採訪者一覽表

序號	代名	採訪日期	教育程度	家庭出身	文革中情況	被採訪時狀況
1	ZSX	1992.6.15	大學	貧農	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成員	幹部
2	WHS	1992.6.10	大學	職員	北京大學「井岡山」成員	科技工作者
3	GSH	1992.6.12	大學	工人	清華大學「井岡山」成員，到西南煽風點火	科技工作者
4	BZM	1992.9.14	大學	革命幹部	清華大學「四．一四」骨幹，介入武鬥	科技工作者
5	YYH	1994.3.17	大學	職員	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活躍份子	科技工作者
6	HZB	1996.1.6	大學	工人	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骨幹	銀行職員
7	LSD	1993.5.6	大學	工人	北京外國語學院造反派組織掛名，不積極	翻譯
8	YSB	1994.3.9	大學	中農	北京外交學院學生，逍遙派	學者
9	HSB	1992.9.28	高中	革命烈士	老紅衛兵，「聯動」骨幹	公司經理
10	HXP	1992.9.24	高中	革命幹部	老紅衛兵，上天安門城樓，受毛澤東接見	工程師
11	YGC	1994.5.4	高中	革命幹部	北京老紅衛兵，到上海、武漢串聯，攻擊當地黨委	大公司經理

12	MBD	1995.2.7	高中	工人	北京老紅衛兵，1967年初轉入造反派組織，並成為骨幹	幹部
13	SXH	1995.7.11	初中	革命幹部	北京老紅衛兵，曾到廣州煽風點火，衝擊公安部被抓	音像出版公司編輯
14	YXH	1992.5.25	高中	革命幹部	北京某中學造反派曾因保本校領導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	幹部，作家
15	LLJ	1992.8.3	高中	工人	北京「四四」派負責人，北京市中學紅代會常委	大飯店經理
16	TTZ	1965.6.13	初中	革命幹部	北京老紅衛兵，「首都共產主義小組」發起人，起草宣言，運動後期受到處理	雜誌編輯
17	MZJ		高中		北京四中學生造反派，《中學文革報》負責人，遇羅克的戰友	美國大學教師
18	CXP	1996.4.26	高中	革命幹部	北京四中學生，曾為老紅衛兵，後父親被打成「黑幫」而被清除	幹部
19	YY	1993.10.15	高中	「黑五類」	北京某大學附中造反派成員，武鬥隊長	大公司經理
20	GXW	1995.1.20	高中	職員	北京一○一中「四·四」派積極份子	高校教師
21	YHZ	1995.1.22	高中	工人	北京學生，曾赴江西介入武鬥	民營企業經理

22	CGL	1993.8.5	大學	教師	中央黨校學員，造反派	學者
23	HYP	1996.4.20	高中		北京學生，運動後期末下鄉，民間文化沙龍主持人	從商
24	HDD	1994.5.20	初中	教師	北京，參加運動不積極，母親是中學校長，文革中被批鬥	高校教師
25	YKY	1992.6.2	高中	醫生	造反派，清華附中學生，但在校外活動，被本組織人員開槍誤傷	民營公司職員
26	XX		初中		北京民間文化沙龍活躍份子，曾被捕入獄	作家，編輯
27	HMD		初中	革命幹部	北京二中學生，因父母在運動初期被打成「走資派」而未介入運動	大公司經理
28	HSJ	1992.9.12	大學		上海造反派負責人，因「炮打張春橋」而被拘禁	高校教師
29	LJJ	1995.8.7	大學	革命幹部	上海造反派骨幹，因「炮打張春橋」而被清查，分配工作受影響	學者
30	JWA	1995.8.5	大學	工人	上海造反派負責人，因「炮打張春橋」而被拘禁	高校教師，作家

31	SHZ	1992.9.15	高中	革命幹部	上海某中學保守派負責人，與北京「聯動」成員有密切聯繫	由幹部轉從商
32	YDP	1992.9.26	高中	革命幹部	上海保守派，但參加運動不積極	高校教師
33	TSW	1992.9.16	高中	職員	上海中學造反派，「紅西南」積極份子	出版社編輯兼經商
34	CJL	1992.9.14	高中	資方代理人	上海中學生，運動初期被歧視，未參加組織，獨自到工廠參加運動	醫務工作者
35	SHW	1996.1.6	初中	職員	上海「中串會」成員，運動後期曾受清查	學者
36	FXH	1992.9.14	高中	工人	上海造反派骨幹	工人
37	GYC	1992.9.16	高中		上海造反派骨幹，〈一切為了九大〉起草者之一，運動後期受清理	工人
38	ZXQ	1992.9.14	初中	工人	上海新中學生，參加運動積極，曾被誤認為「書寫反動標語」而被追查	高校教師
39	WGH	1995.10.7	大學	教師	天津醫學院學生，逍遙派	科技工作者
40	YCL	1994.6.16	大學	職員	天津某大學學生，一度參加保守組織	高校教師
41	XYZ	1993.9.19	大學	工人	華北某高校學生，造反派成員，運動後期被清查	幹部

42	LSD	1994.7.2	大學	下中農	華北某高校學生，造反派成員，曾結合進本校革委會	幹部
43	QWG	1992.5.7	大學	貧農	山東某大學造反派骨幹	科技工作者
44	LXM	1993.528	初中	職員	山東某中學早期保守派	中學教師
45	QG	1994.4.14	初中	革命幹部	南京某中學造反派，目睹「破四舊」事件	作家
46	YJJ	1994.5.5	初中	教師	南京學生，由保守派轉為造反派	幹部
47	LDJ	1993.6.2	初中	教師	南京學生，逍遙派	學者
48	DLY	1994.7.18	初中	幹部	南京學生，未參加組織但積極參加運動	在國外攻讀學位
49	DXL	1993.3.25	初中	下中農	安徽某縣城造反派積極份子	在國外大學任教
50	RHJ	1995.10.20	大學	貧農	安徽「八．二七」派，做宣傳工作	科技工作者
51	YUK	1992.5.8	大學	工人	浙江學生，由保守派轉為造反派	幹部
52	WMH	1993.6.29	大學	革命幹部	浙江醫科大學造反派積極份子	主任醫生
53	LMH	1992.6.5	大學	城市貧民	江西《火線戰報》編輯，造反派骨幹	學者
54	MXY	1994.4.12	初中	工人	南昌中學造反派，積極參加武鬥	中學教師
55	XTQ	1992.6.18	大學	教師	福建保守派，不積極	科技工作者
56	GLH	1994.6.18	高中	城市小手工業者	福建造反派骨幹	在海外從商
57	JKD	1993.2.5	大學	教師	東北保守派，後逍遙	學者

58	HH	1994.7.9	大學	革命幹部	保守派積極份子	幹部
59	HXJ	1992.6.9	大學	教師	東北造反派一般成員	科技工作者
60	ZKG	1994..8.7	初中	革命幹部	哈爾濱保守派，轉造反派	作家
61	DCL	1993.3.27	初中	工人	東北某地區造反派負責人，曾參與武鬥	雜誌編輯
62	WAN	1994.5.4	高中	中農	東北某縣城造反派骨幹	個體經營者
63	WDC	1995.4.15	高中	手工業者	東北某市造反派負責人，曾任地區革委會常委	大學教師
64	CZM	1996.3.19	大學		遼寧省造反派	學者
65	ZDJ	1993.3.2	高中	工人	吉林「長春公社」派積極份子	正在英國某大學攻讀學位
66	HYJ	1995.8.9	大學	革命幹部	黑龍江大學學生，造反派，不積極	黨校教師
67	YXL	1992.7.14	高中		西安造反派骨幹	大學教師
68	DYQ	1996.1.17	初中	革命幹部	西安保守派一般成員	工人
69	CJQ	1992.9.10	高中	職員	陝西某縣造反派積極份子，作宣傳工作	學者
70	ZZN	1996.1.17	高中	教師	西安造反派積極份子	大學教師
71	LXR	1996.1.17	高中		西安中學生，運動初期因「家庭出生不好」而被「勞動改造」	大學教師
72	WYL	1992.7.8	大學		新疆大學「三司」派成員	學者
73	LBD	1994.12.5	大學	革命幹部	新疆「三促」派成員	幹部
74	WEM	1992.7.10	大學	教師	青海醫學院「八·一八」派成員	醫院幹部
75	BJ	1993.3.29	大學	城市貧民	蘭州大學保守派	科技工作者

76	JYQ	1994.5.6	高中		甘肅某地區造反派積極份子	作家
77	YZS	1995.8.3	初中	職員	甘肅某縣逍遙派	幹部
78	XXL	1993.6.7	高中	小商人	寧夏造反派，後期因「思想問題」受到審查	小商店經理
79	HRQ	1994.3.7	初中	工人	寧夏造反派骨幹，曾參與武鬥	工人
80	DRW	1995.6.3	大學	職員	西北造反派骨幹	科技工作者
81	YHJ	1992.7.17	大學	工人	西南某造反派負責人，曾任省革委會副主任	科技工作者
82	CAL	1992.7.21	大學	革命幹部	西南某造反派負責人，曾任市革委會副主任	科技工作者
83	JCX	1992.7.23	大學	「反動軍人」	西南某造反派積極份子，從事文革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	大學教師
84	JLW	1996.1.22	大學	貧農	西南某造反派負責人，運動後期被關押	由技術人員轉為公司部門負責人
85	BWC	1996.1.20	大學	「紅五類」	西南造反派負責人，曾任省革委會副主任	大公司董事長
86	ZRB	1993.9.19	大學	「紅五類」	西南某造反派負責人，指揮武鬥	不詳。屬說明中第2項
87	MYC	1993.3.25	高中	城市貧民	成都「紅城」派積極份子	記者
88	XZ	1992.6.8	高中	工人	西南某造反派機關報編輯，下鄉後因思想探索而受追查	幹部

89	PYW	1992.7.18	高中	職員	四川某中學造反派負責人	大學學報編輯
90	SCW	1992.7.17	高中	教師	四川某中學造反派負責人	律師
91	HSH	1992.7.18	高中	「黑五類」	成都「紅成」積極份子	科技工作者
92	XJS	1992.7.16	高中	城市貧民	成都「八．二六」派積極份子，從事文革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	學者
93	ND	1992.7.20	初中		成都「紅成」派積極份子	幹部
94	XYZ	1996.1.19	高中	城市貧民	成都某中學學生，未參加組織，被誣為「組織反革命集團」而被判刑十八年	個體經營者
95	QYF	1994.5.20	高中	工人	成都「八．二六」派一般成員，被誣為「散發反動傳單」被捕	律師
96	HXX	1993.7.5	高中	革命幹部	成都「八．二六」派成員	大學教師
97	YLZ	1994.8.5	初中	舊軍政人員	四川某縣造反派宣傳骨幹	自由寫作詩人
98	FX	1995.10.12	初中	教師	重慶「反到底」派宣傳骨幹	中學教師
99	YWJ	1995.10.13	大學	工人	重慶大學「八．一五」派骨幹，從事調查省委幹部工作	科技工作者
100	LZZ	1992.7.12	高中	舊軍人	貴陽中學生，逍遙派，因結社活動入獄	學者
101	FGH	1995.917	初中	「黑五類」	貴陽中學生，逍遙派	學者
102	GHW	1994.8.14	高中	資本家	昆明逍遙派	工程師

103	SXD	1994.8.15	大學	工人	雲南某大學造反派	科技工作者
104	MMR	1993.8.14	大學	職員	西藏造反派骨幹	圖書資料管理員
105	ALL	1992.9.7	大學		武漢造反派骨幹，運動後期被判刑	無業
106	ATF	1992.9.9	大學		武漢造反派理論骨幹，運動後期被判刑	外資企業雇員
107	MML	1992.9.8	高中	革命幹部	武漢某中學造反派，運動後期因理論探討和寫大字報被捕和監督勞動	學者
108	LHX	1994.10.7	大學		武漢「鋼二司」派成員	科技工作者
109	YFH	1992.9.10	高中	職員	武漢某文藝宣傳隊負責人	作家
110	GHS	1993.12.10	初中		武漢某文藝宣傳隊成員	作家
111	YXG	1993.3.20	高中	革命幹部	湖南造反派，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作者	經濟學家，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教授
112	QHH	1993.12.8	高中		湖南長沙造反派	大學教師
113	XFL	1996.1.16	大學	「紅五類」	河南造反派負責人，曾任省革委會常委，運動後期入獄	無業
114	XCW	1996.1.16	大學	「紅五類」	河南造反派	個體經營者
115	MWC	1996.1.16	初中	「紅五類」	河南造反派骨幹，曾任市革委常委	工廠一般幹部
116	YMZ	1996.1.26	高中	中農	河南某地造反派負責人，曾被提名為地革委常委	無業
117	YL	1996.4.2	初中	職員	河南某地造反派	學者

118	LTZ	1992.10.3	大學	「舊軍人」	廣東造反派宣傳骨幹，「李一哲」大字報作者之一	美術學院教師
119	WXZ	1993.4.1	高中		廣東某中學造反派負責人，「李一哲」大字報作者之一	剛出獄
120	WDF	1995.11.28	大學		廣州中山大學造反派	大學教師
121	HQ	1992.8.13	初中	民主人士	廣西「四．二二」派，從事宣傳工作	學者
122	YYL	1992.9.13	初中		廣西「四．二二」派	作家
123	ML	1993.6.25	大學	職員	江西造反派骨幹，《火線戰報》編輯	學者
124	SXZ	1993.8.15	初中	工人	江西南昌某中學造反派積極份子，曾參與武鬥	工人
125	ZSS	1992.6.5	大學		北大哲學系教師，熟知北大運動情況	大學行政幹部
126	YZD	1995.4.22	初中		北京新華印刷廠工人，工宣隊骨幹，進駐清華大學	個體經營者
127	YZZ	1992.9.9	高中	城市貧民	武漢中學教師，造反派理論骨幹，曾被判刑	教師
128	MFZ	1994.12.13	大學		廣東某報社造反派負責人，與軍區有密切聯繫	報紙編輯
129	FGH	1993.12.8			湖南長沙工人造反派	退職在家
130	RD	1993.8.14	大學		西藏醫務工作者，參加群眾組織，自稱「紅衛兵」	醫務工作者
131	QGS	1992.9.15	高中	舊軍人	上海某工廠工人，逍遙派	學者

說明

⑴ 應某些被採訪者要求，對他們的身分、所在地等情況未作精確和具體的說明；
⑵ 有時未記錄採訪時間和被採訪者家庭出身、採訪時狀況等情況，有時對一人有多次採訪，採訪時間只列出第一次或最主要的一次；
⑶「逍遙派」指文革中未參加組織，也未參加活動者，這並不意味着他們不關心、不了解情況；「負責人」指一大派或一個組織的最高領導者，文革中稱為「勤務組」成員；「骨幹」指群眾組織中的中級負責人，如分團、支隊、戰鬥組、報刊、宣傳隊負責人，或(因家庭問題)不具名義的實際負責人；「科技工作者」指在自然科學或技術研究機構從事科研工作的人；「學者」指從事人文或社會科學研究的人；
⑷「紅(黑)五類」指出身好(不好)，但知之不詳；「舊軍人」或「舊軍政人員」指1949年前國民黨政權下的軍官或行政官吏；
⑸ 上表最後七名被採訪者文革時不是學生，但他們的口述對於了解當地運動情況、某些重要情節或群眾(包括學生)投入運動的原因和心態很有幫助。

附錄三　索引

一　畫

二　畫

三　畫

四　畫

五　畫

六　畫

七　畫

八　畫

九　畫

十　畫

十一畫

十二畫

十三畫

十四畫

十五畫

十六畫

十七畫

十八畫

十九畫

後　記

本書的構思和寫作始於1992年，完成於1996年——距文化大革命發動整整三十年。在此期間，採訪了分布於全國各地的一百多位前紅衛兵，閱讀了文革期間各種出版物，研究了西方學者的有關著作，和國內外研究文革的學者進行了交流切磋，並發表了論文若干篇，作為本書的前期準備。本書的完成，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

我數次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邀請作哲學與文化研究，或赴英途經香港而受到該所熱情招待，每次都乘便在中文大學的大學服務中心閱讀有關文革的資料。

我在研究中得到「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研究基金」的資助，使我得以支付外出採訪，購買資料等研究活動所需的費用。因此而完成的研究論文〈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行為動因的調查和分析〉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年5月號。

在採訪過程中，武漢、上海、西安、成都、北京、河南等地的朋友極為熱心地為我聯繫採訪對象，甚至花很多時間全程陪同我進行採訪，並提供自己保存的資料。

經好友W君的安排，我得以在某資料中心用兩個月時間閱讀全國各省的紅衛兵小報，形成對文革期間全國形勢的全面而系統的了解。

眾多被採訪者克服了種種不便，甚至冒着一定風險，接受了我的採訪。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的口述，我作了錄音，並逐字逐句整理，這形成了一筆最為寶貴的研究財富。

若干朋友慷慨地將自己保存的文革材料全部送給我，或讓我閱讀精心保存的幾大箱資料。

本書初稿寫成後，我在文革中結識的、屬於不同派別的X君(在文革中以擅長理論研究而著名)，專程趕到北京，認真通讀全書，提了不少寶貴意見。

本書定稿過程中，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金觀濤教授、劉青峰教授提出了不少有啟發性的意見和建議，對於提高本書學術質量，使其更符合學術規範，有極大的幫助。

僅向以上機構和個人，表示由衷感謝。當然，本書觀點方面的問題，一概由我本人負責。

最後，我也要感謝我的妻子楊功煥，她一直鼓勵我，不斷鞭策我完成此書。此外，她還乘出差之便，替我在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採訪。